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古道西风

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

林梅村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古道西风

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

林梅村著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1363-0

Ⅰ.古… Ⅱ.林… Ⅲ.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Ⅳ.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914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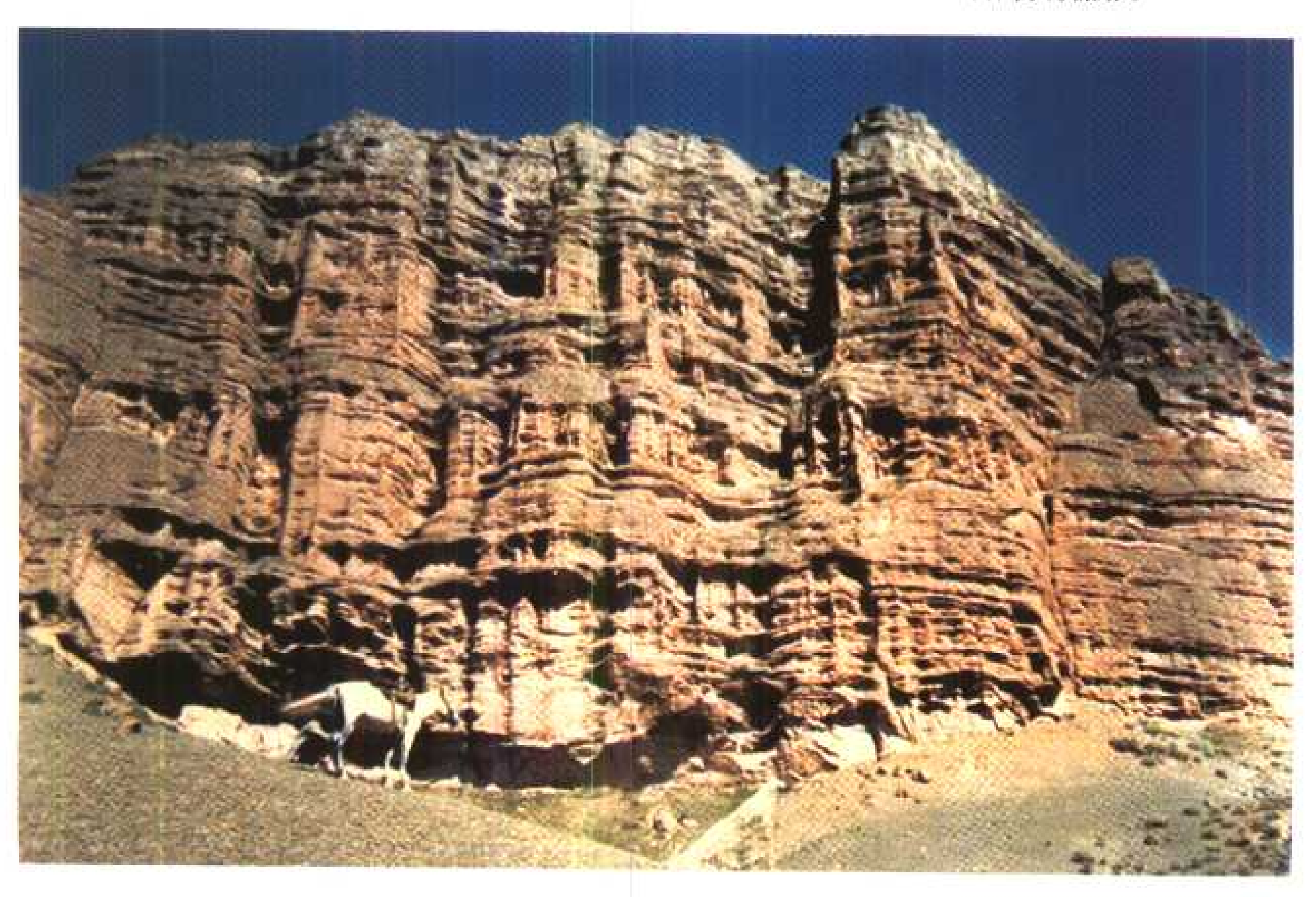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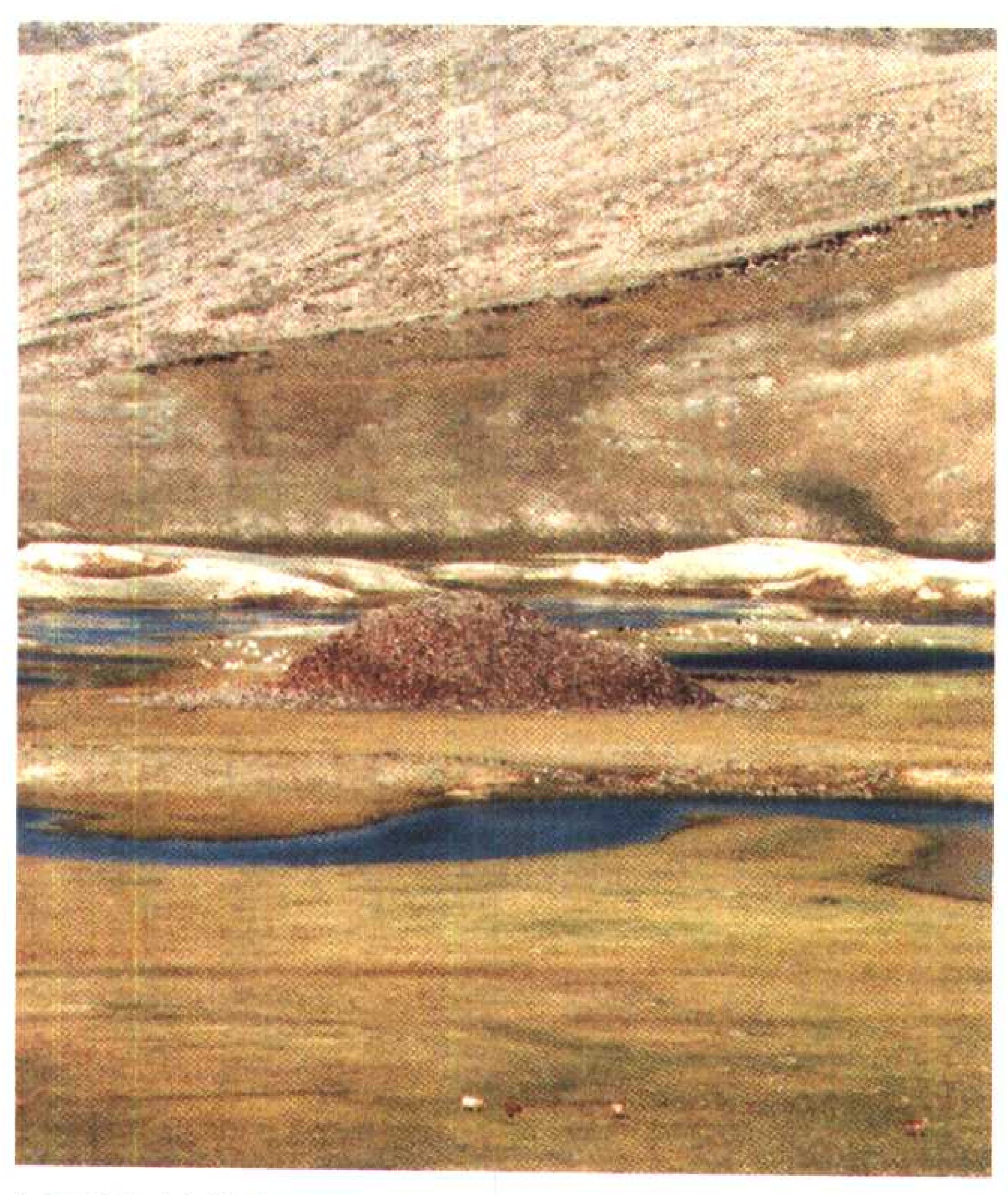
1. 楼兰古城(杨洪摄影)



2. 阿富汗席巴尔甘大月氏土陵出土双马神黄金坠饰（*After V.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 - 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5*）

3. 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祭祀双马神的古代岩画（林梅村摄影）





4. 阿尔泰深山金字塔式陵墓(林梅村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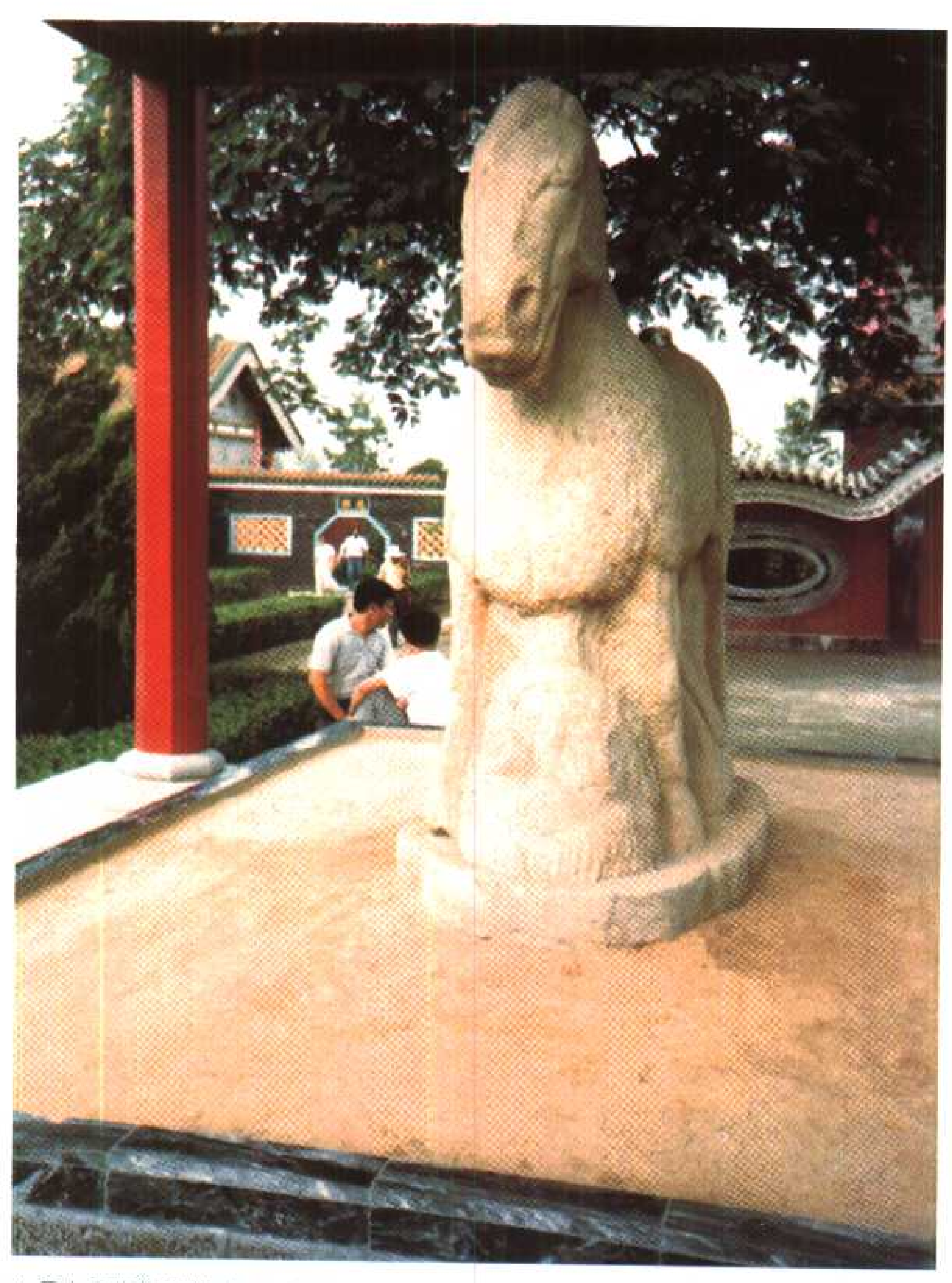
5. 汉景帝阳陵德阳殿出土石日晷（据李文炳主编:《陕西旅游博览》，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年）



6. 汉长安城太液池大石鱼（郭物摄影）



7. 新疆哈密五堡墓地出土青铜文化时代的车轮，约前1750—前1300年（据刘国瑞、祁小山编:《哈密古代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77年）



8. 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林梅村摄影）



9. 青海海晏县出土西海郡石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青海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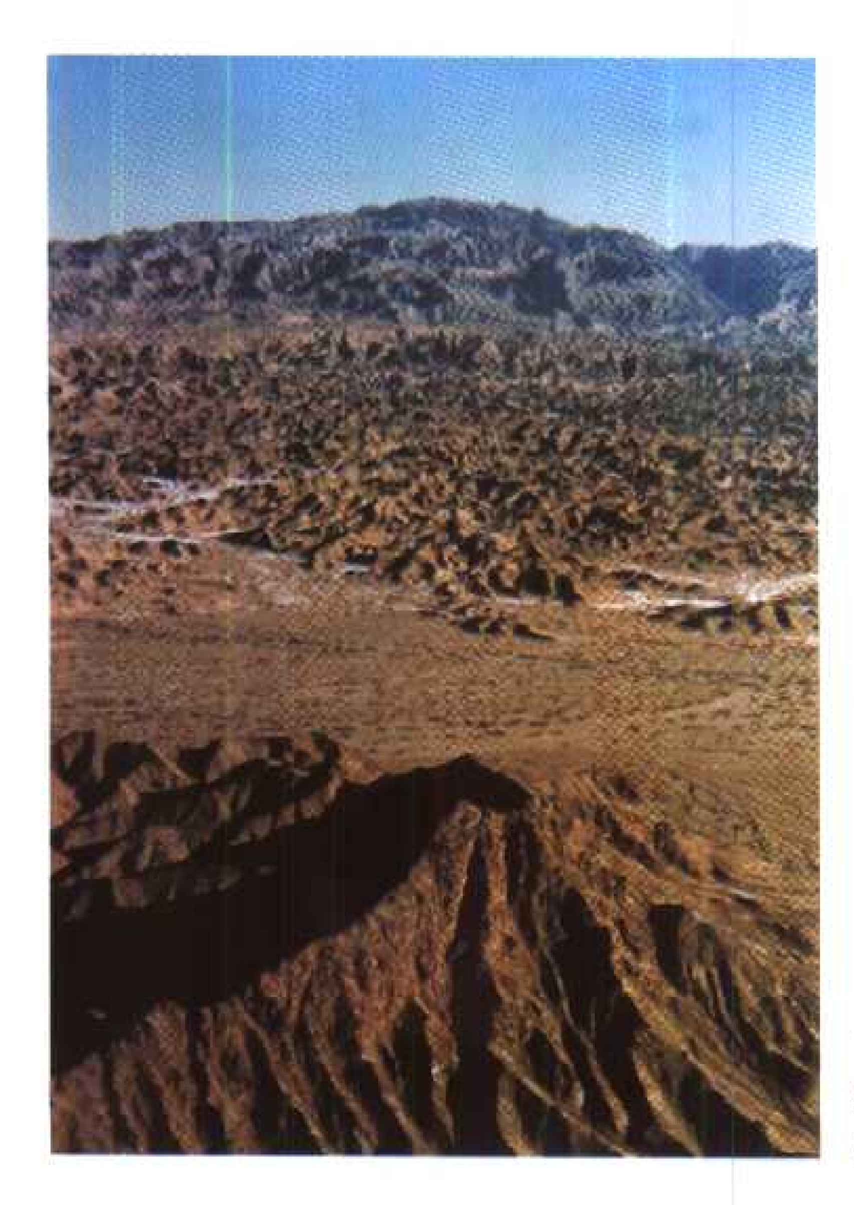
10. 新疆疏附县出土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大理石浮雕（祁小山供稿）

11. 汉元帝渭陵寝殿出土带翼玉狮（据李文炳主编：《陕西旅游博览》，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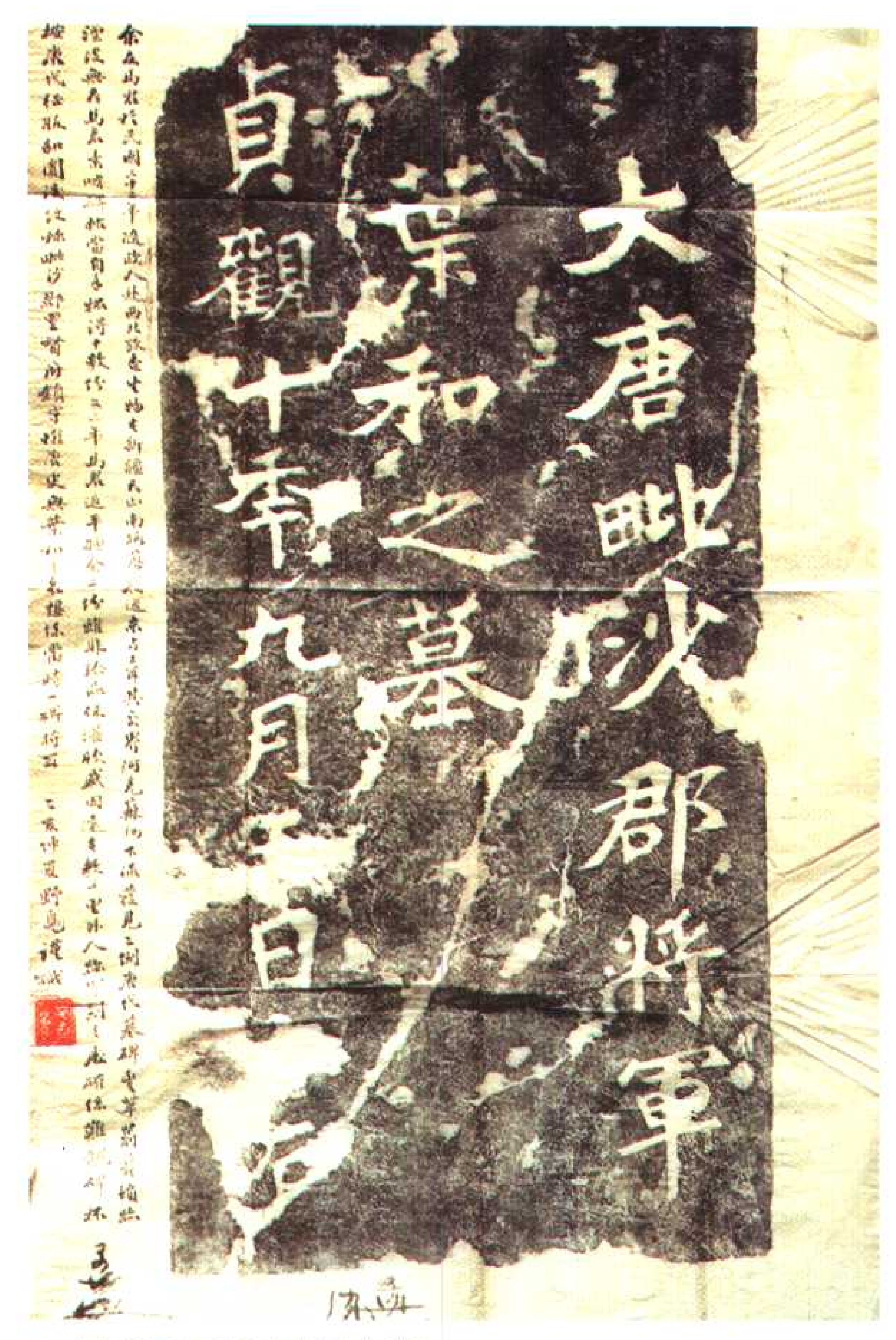
12. 鸟瞰墨山城（林梅村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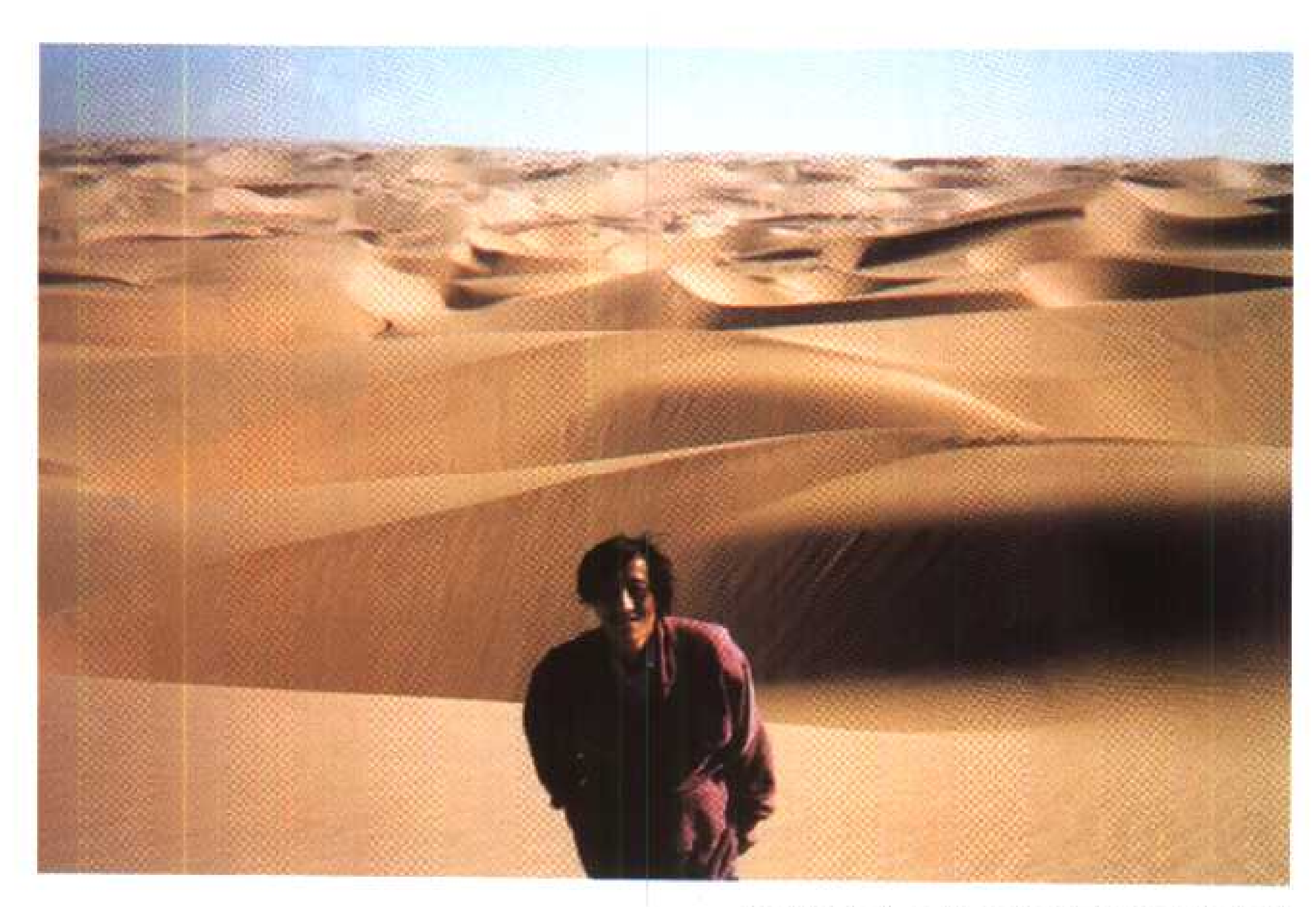
13. 古代墨山——新疆东部库鲁克塔格山（林梅村摄影）



14. 身着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纺织物的墨山国贵族（刘玉生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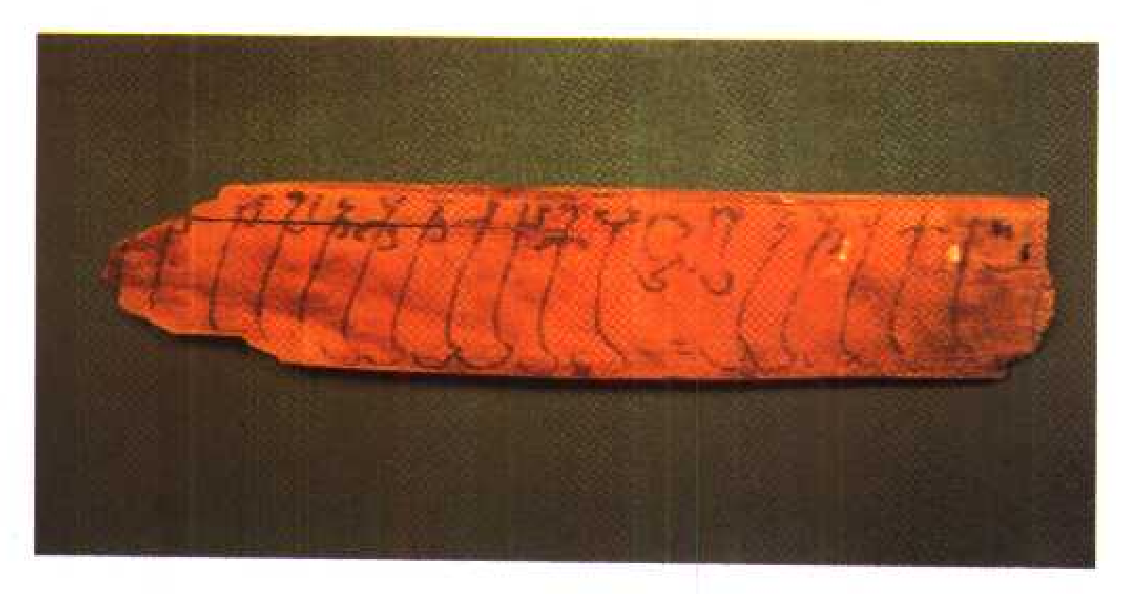
15. 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墓表（侯立中供稿）



16.1994 年作者在远离绿洲 100 多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寻访古城(杨毛然摄影)

17. 大英图书馆藏尼雅出土佉卢文皮革文书(林梅村摄影)





18. 大英图书馆藏尼雅出土佉卢文佛教神秘字母 Arapacana（林梅村摄影）



19. 梁元帝萧绎《职贡图》所绘鄯善使者（据张治安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原始社会至南北朝绘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科学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新进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缩略语表

AA = *Artibus Asiae*, Paris.
AI = *Acta Iranica*, Tehran-Liege.
AM, n.s. = Asia *Major*, new series, London.
AO = *Acta Orientalia*, Copenhagen.
APAW =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BAIPAA =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Per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BMFEA =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EFEO = *Bulletin de l'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Orient*, Paris.
BSO(A)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CAJ =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The Hague and Wiesbaden.
EW = *East and West*, Rome.
IIJ = *Indo-Iranian Journal*,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JA =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JAOS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ew Haven/ Ann Arbor.
JIES =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Washington D.C.
JRAS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JSFOu = *Journal de la Sosiété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MSFOu = *Mémoires de la Sosiété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NC =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London.
SAS = *South Asian Studies*, Leiden.
SII =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SPAW	=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TP	= *T'ong Pao*, Leiden/ Paris.
UAJ	=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Wiesbaden.
ZVORAO	= *Zapiski Vostochnogo Otdeleniia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Archeologicheskogo Obshchestva*, St. Petersburg.

自　序

>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
> ——元散曲《秋思》

元代散曲大家马致远的这首小令，从几个景物的特写，渲染出一种悲怆、孤独的气氛，旨在表述作者怀才不遇、浪迹天涯的心绪。“古道西风瘦马”一句尤其传神，引起无数后人的共鸣和遐想。同时，这也正是我们考察丝绸古道时经常见到的景致——古道漫漫，西风萧瑟，瘦马嘶鸣。本书借此为题，对中国与西方在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文化交流作新一轮考察。

今天，古老的中国正和现代西方进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方经济、文化艺术，乃至价值观念正在全面冲击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从而引起一系列复杂的矛盾。比如：古老文明与现代化，自然环境与工业污染，乡村都市化与可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等等矛盾。更为不幸的是，虽然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道德标准却每况愈下。其实，类似的情况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曾发生过。我们或许能从中汲取某些教训。

正如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中国与西方的交流至少在商周时代业已开始(见本书第一编第1章)。通过丝绸之路或古代海上交通，我们从西方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比如：在纺织品上织

金线，是向罗马艺人学的(见本书第三编第2章)；制作黄铜的技术，是从波斯工匠那里学会的(见本书第三编第3章)；佛教及其艺术则得益于印度高僧(见本书第四编第2章)。另一方面，历史也留下了许多惨痛的教训。由于汉长安宫廷穷奢极欲地追求西方奢侈品(见本书第三编第1章)，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最终导致汉代上层社会的全面腐败，汉帝国的灭亡自然也就为期不远了。据说，梅毒16世纪初才从西方传入，东南沿海的广东人首先深受其害，时人谓之“广疮”(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鸦片也来自西方，唐代从罗马传入中国的胡药“底也伽”就含鸦片(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由此看来，西方并非什么东西都好。因此，本书所做的调查亦非仅仅是发千古之幽思，而是有其现实意义。

这本书是作者继《西域文明》和《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之后，撰写的第三部探讨西域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专集，主要围绕四个专题展开讨论：

第一，东西方远古文化的最初接触：吐火罗人原始故乡，中国与西亚古战车的关系等问题，堪称当今西域古史研究的难题。我们凭借对吐火罗语“神”字的解读，找出一批吐火罗人原始宗教艺术品(包括岩画、黄金艺术品及青铜牌饰等)。这项研究将大大深化人们对原始印欧人分化迁徙的认识。中国古战车被普遍认为与西亚战车有联系，但是近年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我们从考古资料中发现一套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这套工具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青铜文化早期(约公元前1800年)，因而为探讨东西方古战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考古学依据。

第二，秦汉大型石雕艺术源流考：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古

代艺术被认为缺乏世界其他古文明常见的纪念碑式大型金石雕像。近代金石学家则认为汉代大型石刻如神道柱等,受西方艺术影响。欧美和日本学者或把秦汉大型金石雕像的起源归之于斯基泰艺术、西亚艺术或中亚犍陀罗佛教艺术。不过,我们的研究表明,秦汉大型金石雕像的起源实际与西亚古代艺术风马牛不相及,产生年代亦远在中亚犍陀罗佛教艺术出现以前。就现有资料而言,三种文化因素对中国大型石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基于中原本土文化因素;其次,受欧亚草原,尤其是阿尔泰语系游牧人古代艺术的强烈影响;其三,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石刻艺术才开始和中亚希腊化艺术以及西亚波斯艺术进行交流。

第三,汉唐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明发展到汉唐达到了巅峰时代。汉唐长安城成了古代东方最著名的国际都市之一。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中国学者向达和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先后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可是他们只讨论过唐代长安城。近年考古发现积累了大批新资料,这些资料生动、直观地反映了汉长安城如何受外来文明影响。本编首先探讨汉长安城所见中西文化交流。汉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史近年不断取得重要进展。罗马玻璃器、纺织品、金银器、铜镜等不断在新疆乃至广州的汉代遗址中出土,说明早在汉代,罗马商人已开始在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李约瑟博士的一个建议很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居延汉简提到的“秦胡”指大秦国胡人,也即古罗马人。本编将专章讨论这个问题。输石是中国古代著名舶来品之一。丝绸之路开通后,输石从波斯、印度等地相继输入中国。输石工艺品很快成为汉唐达官贵人追求的时髦装饰。输石袍带甚至成了唐朝士大夫表示等级身份的标志之一。汉唐朝野大行外丹黄白术,输石则

是中国炼丹师点石成金的重要方剂。然而,这种神奇的外来方物究竟是什么?如何影响中国文明?目前仍缺乏系统研究。《鍮石人华考》将系统研究这个问题。近年于阗考古取得许多重要进展,最重要的莫过于贞观十年大唐于阗将军叶和墓表的发现。从表文看,墓主人即便不是于阗王,也是唐初于阗国的显赫人物。于阗出土唐代纪年文书原以新疆策勒县达玛沟所出开元十八年于阗语佛教律部残文书年代最早,大唐于阗将军叶和墓表首揭唐文化西传于阗当在贞观十年。不仅如此,这个发现还将有助于揭开隋末唐初于阗史上许多不解之谜。众所周知,隋末唐初于阗国相继产生过两位艺术大师,时称大小尉迟氏。他们将西域绘画技法带到长安,不仅改变了隋唐时代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风格,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海东日本亦有影响。由于史籍失载,这个时期于阗与中原关系问题一直不清楚,以致大小尉迟氏的许多名作究竟是隋画抑或唐画,迄今仍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疑案。所以我们将以大唐毗沙将军叶和墓表作为切入点,探讨隋末唐初于阗与中原的关系。

第四,中亚古语与丝绸之路:佉卢文犍陀罗语是丝绸之路流行的最早的国际交际用语,汉魏南北朝时成为塔里木盆地诸国的官方文书用语。本编的五章就是根据中国境内出土犍陀罗语实物资料,分别讨论中印古代文学领域的交流,丝绸之路地理,西域古代纺织物,首次披露了日本龙谷大学所藏佉卢文藏文双语文书。佉卢文的流行年代不晚于公元5世纪,那么这批双语文书有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古藏文文书之一。

书中某些专题是和我的研究生在课堂上共同讨论的。这是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们敢于思索,提出过很多真识灼见,并帮我核对资料,通读全稿。其中两位同学参加了《九姓回鹘可

汗碑研究》(本书第三编第7章)的撰稿,郭物同学帮助绘制了书中的插图。可以说,本书也凝聚了他们的心血。

本书写作过程中还曾得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Victor H. Mair 教授、法国国家图书馆钱币馆馆长 F. Thierry 先生、日本友人小岛康誉先生、日本京都龙谷大学上山大峻教授、日本京都佛教大学真田康道教授、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教授、中国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新疆文物局局长岳峰先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王炳华、于志勇先生在各自领域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摄影师刘玉生、祁小山和新疆巴州旅游局的杨洪先生提供了一些照片资料,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这里,我还要感谢三联书店的领导和编辑。他们不仅大力支持本书的出版,而且为编辑拙稿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使本书避免了许多错误,一并在此致谢。至于书中存在的错误,自然要由我个人负责。

1999年10月5日于北京海淀寓所

目　　录

第四编　中亚古语与丝绸之路

The Prevalence of Western Custom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Contents

Part III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Han-Tang China

Part IV The Ancient Language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 Silk Roads

彩图目录

插图目录

第 一 编

商周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1

吐火罗神祇考

吐火罗语是塔里木盆地流行的一种印欧语系的死语言。本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古代遗址和敦煌藏经洞曾发现大批用这种语言文字书写的宗教、文学和医药文献。起初人们不知道这种语言叫什么名字。根据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的有关记载,德国语言学家缪勒和西格将它定名为"吐火罗语"。[1]

吐火罗语和公元前1650—前1190年赫梯王国(今土耳其和叙利亚)流行的印欧古语——赫梯语关系密切,例如:两者都用/r/作为中间语态后缀,所以它有可能是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2]印欧语系具有显著的地理特征,可分为东方语支(包括雅利安语、大夏语、粟特语、波斯语、斯基泰语、斯拉夫语等)和西方语支(包括意大利—凯尔特语、希腊—拉丁语、英语、德语等)两大语组。语言学界把印欧语西支称作"肯特姆语"

---

〔1〕 F.W.K. Müller und E. 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PAW*, 1916, pp.416~417.

〔2〕 H. Pedersen, "Hittite and Tocharian," *Language* 9, 1933, pp.13~34; A. Meillet, "Le Tokharien", *Indo-Germanisches Jahrbuch*, 1, 1914, pp.1~19; D. Q. Adams,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AOS*, 104, 1984, pp. 395~402.

(the Centum languages),而将印欧语东支称为“森特姆语”(the Satem languages)。研究者惊奇地发现,尽管吐火罗语的地理位置在印欧语东方语支分布区,但语言特征却属于西方语支。例如:数目字“一百”在吐火罗语两个方言中写作 känt 和 kante。这与拉丁语 centum(一百)十分相近,而和梵语的 śata(一百)不尽相同。

正如中亚语言研究所揭示的,吐火罗语至少有三个方言:其一,西部方言,或称吐火罗语 B,见于新疆库车石窟和遗址出土的 8—9 世纪婆罗谜文写卷、题记和文书;其二,东部方言,或称吐火罗语 A,见于新疆焉耆和吐鲁番古城出土的 8—9 世纪婆罗谜文写卷和题记;其三,楼兰方言,未见完整的文献,但是大量楼兰语词汇保存在新疆楼兰和尼雅古城出土的公元 3 世纪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中。[1]此外,吐火罗语还有第四种方言,就是从敦煌西迁中亚的大月氏人所操方言。“吐火罗人”这个名字就是希腊地理学家对大月氏人的称谓。[2]可惜月氏人亦未留下文字材料,仅有零星月氏语借词保存在先秦史籍和中亚贵霜碑铭中。

吐火罗语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欧亚大陆远古民族分化迁徙的认识。就吐火罗人起源问题,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激烈讨论,但是吐火罗人究竟何时与讲肯特姆语的赫梯人、凯尔特人以及希腊人分离?又如何千里迢迢来到塔里木盆地?

---

〔1〕 W. Winter, "A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of 'Tocharian' B Texts," *JAOS*, 75, 1955, pp.216~225; T. Burrow, "Tocharian Elements in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JRAS*, 1935, pp.667~679.

〔2〕 关于古典作家对吐火罗人的记载,参见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V, trans. by H. L. Jone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61。

至今仍是个谜。70 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吐火罗人起源问题研究,并在考古、语言和人类学三个方面取得许多新发现和重要研究成果。这些发现与研究表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印欧人在东方的分布已达新疆孔雀河流域至哈密盆地一线。许多学者相信,这些年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就是后来定居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的嫡系祖先。[1]

与此同时,中亚大月氏考古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79 年盗墓人在阿富汗西北边境席巴尔甘东北 5 公里一个叫黄金之丘(Tillya-tepe)的地方发现一处古代游牧人墓地。正在阿富汗进行考古调查的苏联—阿富汗联合考古团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发掘。由于阿富汗战争爆发,他们只挖了 6 座墓就被迫停止工作。这 6 座墓的规模都不太大,但出土遗物相当惊人,仅黄金艺术品一项就达 2 万余件。据墓中出土安息银币、罗马金币和西汉昭明镜判断,黄金之丘墓地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后几十年。席巴尔甘距离大夏首都蓝氏城(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附近)不远,当时大夏已在北方游牧人大月氏统治之下。所以研究者普遍认为,黄金之丘墓地的墓主人就是公元前 175 年从敦煌西迁中亚的大月氏人。

尽管大月氏西迁中亚已近百年,但是黄金之丘墓地出土文物仍然反映了吐火罗人本族文化特征。其中一个突出例证就是他们的许多艺术品都以龙为主题。敦煌写本《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图经》记载:"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两《唐书》记焉耆的吐火罗王以龙为姓氏。敦煌汉文、于阗文和藏文写本悉称留居河西走廊的月氏残部小月氏为"龙家"。基于上

---

〔1〕 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学术集林》卷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年,304～314 页。

述考虑，我们在近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黄金之丘墓地那些以龙为题材的艺术品属于大月氏本族文化，龙是吐火罗人的图腾。[1] 中亚大月氏墓地的发现对寻找他们在中国的故乡具有相当重要的考古学意义，但是限于资料，我们当时只是提出问题，未能就此展开讨论。

1993 年，应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之邀，笔者到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专门从事中亚古代语言研究。那一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对吐火罗人的语言和宗教作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并在语言学方面找到解决大月氏人故乡问题的一个突破口。[2] 1996 年 4 月重访美国，出席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的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古民族学术讨论会。殊不知，我们近年一直潜心研究的吐火罗人问题竟然成为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3] 这次会议促使我们加快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大月氏故乡实际在今新疆天山东部巴里坤山、博格达山和阿尔泰山之间广大草原地带，而不是以前一直认为的在今甘肃敦煌。[4] 本文将要讨论的是吐火罗人原始宗教体系，旨在从宗教学角度探讨吐火罗系统民族的来龙去脉。尽管某些论点仍不十分成熟，但我们还是想拿出来供大家讨论，以期推动中国西部远古文明研究的深人。

---

〔1〕 林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及其对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义》,《文物天地》1991 年第 6 期;收人《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267～279 页。

〔2〕 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 年第 6 期,22～24 页;收人《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64～69 页。

〔3〕 徐文堪:《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学术集林》卷九,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262～279 页。

〔4〕 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 年第 1 期,11～20 页;收人《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70～86 页。

一、中亚大月氏墓地出土宗教艺术品的启示

大月氏人一向以将佛教推广到东方各地而闻名，但是黄金之丘墓地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黄金艺术品中几乎看不出有什么佛教色彩。可见，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人尚未皈依佛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创作的艺术品多以龙为主题。例如：黄金之丘2号墓出土的双龙守护国王金头饰(2.7)、3号墓出土的背向双龙金头饰(3.50)以及4号墓出土的双龙纹金剑鞘(4.9)等(参见插图1:1—2)。[1]因此吐火罗人的原始宗教应是某种龙神崇拜。龙非世间所有，大月氏的龙神究竟指什么？值得深究。我们注意到，大月氏龙神的艺术形象有两个特点。第一，大都表现了马蹄和马鬃，其艺术原形显然是马；第二，往往成双成对出现。我们认为，吐火罗人的龙神源于古代印欧人宗教中的双马神。

双马神是印欧人原始宗教系统中最古老的神祇之一。印度婆罗门教经典《梨俱吠陀》将其称作 nāsatya(= aśvinau，或译"双马童")。据雅利安宗教传说，双马神是一对孪生的青年神使，常在黎明时刻降临，给人类带来财富，免除灾难和疾病。[2]既然吐火罗人和雅利安人都崇祀双马神，他们共有的这种宗教习俗必然产生于吐火罗人与雅利安人从原始印欧人部落分化以前。

---

[1] V.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5, p.93, pp. 98—103, p.220.

[2] M.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9 (repr. 1979), p.116 and 538；金克木：《梵语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1—23页。

目前学界对印欧人的起源地尚存争议，但更多的证据表明，里海—黑海北岸铜石并用时代的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和原始印欧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据人类学材料，颜那亚人属于原始欧洲人种长颅类型。这个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起南乌拉尔，西至德涅斯特河，南达北高加索，北抵伏尔加河中游。颜那亚墓葬一般为堆冢竖穴单人葬，旧称"竖穴墓文化"（Pit-Grave Culture）。据70多个碳$_{14}$年代数据的统计分析，颜那亚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600—前2200年。这个时期印欧人显然已有宗教意识。例如：黑海—里海北岸的诺伏亚勒克谢伏卡地区一座颜那亚古墓内曾发现一具婴儿骨架被放置在两个马头之间。1973年，黑海北岸克尔诺索伏卡地区颜那亚墓地发现的石人像为研究印欧人原始宗教起源问题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这个高约1.2米的石人像上身刻有一束梅花、三把斧头和一把柳叶剑，石人像下方刻有双马神图像（参见插图1:3）。

70年代初，在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谢泽地区发掘的颜那亚墓地不仅发现用双马殉葬的葬俗，还出土了一个长约7厘米的双马神残石像（参见插图1:4）。[1]这个双马石像显然就是黄金之丘大月氏3号墓所出黄金头饰（3.50）上双马神像的祖型。大月氏人改奉佛教后仍然尊奉双马神。例如：印度河上游犍陀罗佛教建筑的石柱头上就有双马神像。[2]古代印欧人崇祀双马神的习俗后来为欧亚草原游牧人所传承。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和塞人等印欧语系游牧人都在各自艺术品中创作了

---

〔1〕 J.P. Mallory,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Language, Archaeology and Myth*,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 p.176, 204, pp.210～221.

〔2〕 樋口隆康：《シルクロード考古学》，京都：法藏馆，昭和61年，16页，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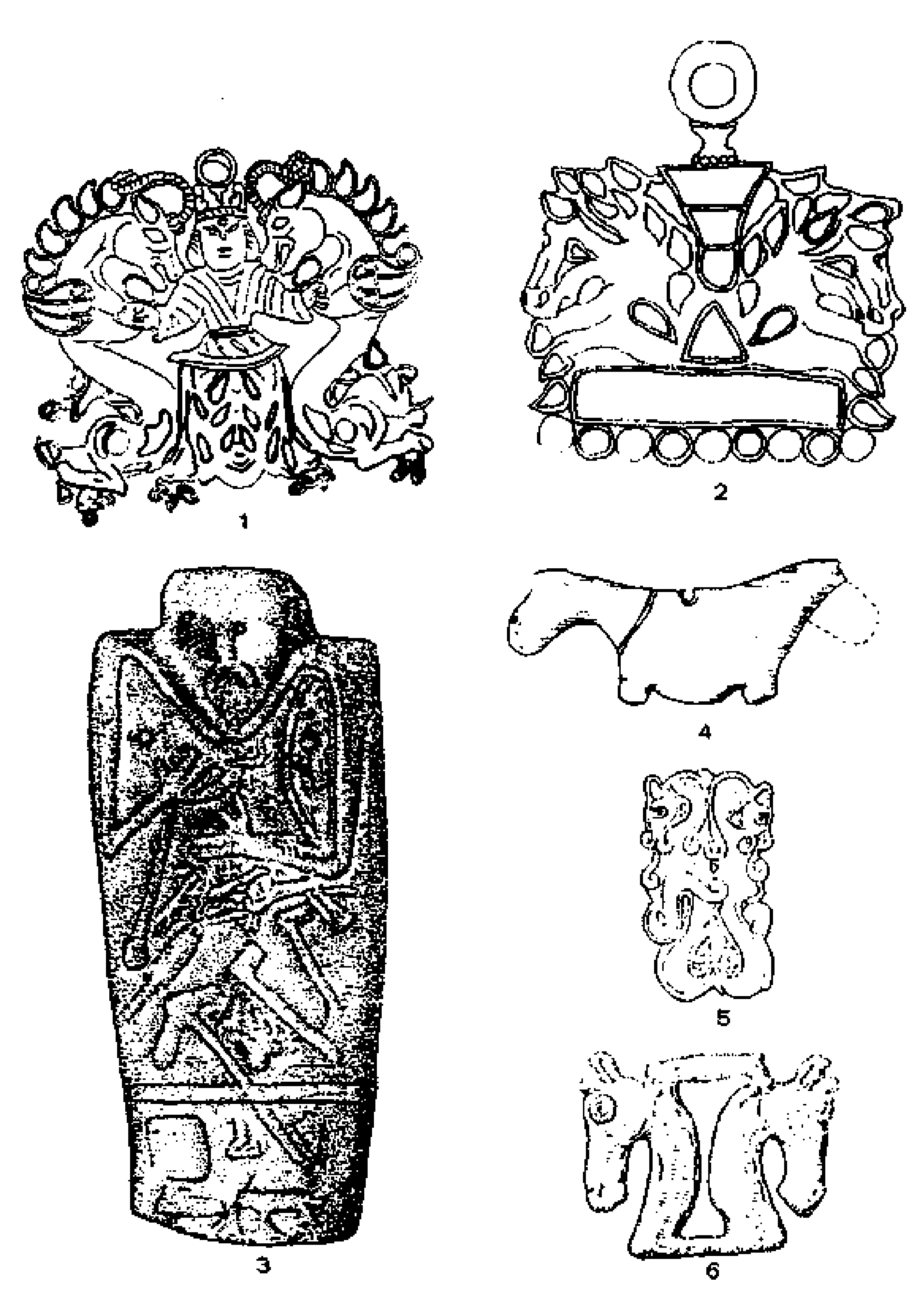


插图 1 1-2. 席巴尔甘大月氏墓地出土双马神像;3-4. 里海—黑海北岸萨尔马提亚墓地出土双马神像;5. 东南欧斯基泰墓地出土双马神像;6. 哈萨克斯坦塞人墓地出土双马神像

大量双马神像(参见插图1:5—6)。[1]南西伯利亚的塔加尔文化和塔施提克文化墓地也发现过一些双马神像。一般认为,这两个文化的创造者是阿尔泰语系游牧人。吐火罗人主要分布在塞人与阿尔泰语系游牧人之间,所以阿尔泰语系游牧人大概从吐火罗人那里接受的印欧人宗教文化。[2]

二、从语言资料看吐火罗人的原始宗教

在印欧语系古民族中,雅利安人最先进入近东历史舞台。公元前1450年,他们从北高加索南下,首先控制了本属胡里安人领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随后兼并叙利亚和伊朗山地,建立了世界史上第一个雅利安国家—米坦尼王国。雅利安人统治米坦尼的历史长达140年,公元前1360年灭于亚述。早期研究者曾把米坦尼王国的臣民胡里安人也当作印欧人。后来的研究表明,胡里安人实际上有自己独立的宗教和语言,既不属于印欧文化,也不属于近东本地的闪米特文化。换言之,在米坦尼王国中只有上层统治阶层属于雅利安人。米坦尼遗址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公元前1380年左右赫梯和米坦尼两国订立的协约,今称Mitanni Treaties(《米坦尼协约》)。这份协约的最后罗列了一系列胡里安宗教的神名,接着记录了一组雅利安宗教的神祇,计有

---

[1] J. Davis-Kimball, V.A. Bashilov and L.T. Yablonsky (ed.),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Zinat Press, 1995, pp.39,49,127, pp.220~222 and 311.

[2] 参见J. Davis-Kimball等人,前揭书,39、49、127、220~222和311页及吉谢列夫著、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62~63页及图版叁柒·2和叁捌·3。

mi-it-ra(光明之神)、in-da-ra(雷神)、a-ru-na(水神兼司法神)和na-sa-at-ti-ya(双马神)。米坦尼协约记录的雅利安诸神对研究印欧人古代宗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不仅可以和古代印度、波斯宗教文献记录的神祇直接进行语言学比较,还有助于我们考察吐火罗人原始宗教的渊源问题。

印欧人原始宗教属于多神教,崇拜对象大多为自然神,米坦尼的雅利安人仍然保持着这个古老的宗教传统。米坦尼协约记录的四位雅利安神分别相当于印度婆罗门教经典《梨俱吠陀》中的双马神奈撒特耶、雷神因陀罗、光明之神密多罗以及水神兼司法神伐楼那。[1]雅利安人和古代伊朗人有着更为直接的血缘关系。伊朗这个族名就是从"雅利安"一词演变而来。雅利安人和波斯人本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梨俱吠陀》和波斯古经《阿维斯塔》的许多内容,甚至神名都是相同的。例如:雅利安宗教的光明之神 mitra 就是波斯火祆教的火神 mihr。现存伊朗古代宗教文献中未见和雅利安宗教水神相当的神祇,但是提到雷神和双马神。不同的是,在伊朗古代宗教中它们均以魔鬼身份出现。在《温蒂达德》(Vendidad10.9 和 19.43)中,这两位神灵分别写作 indra 和 nāŋhaiθya。[2]为便于比较,我们将上述四种古代印欧语神名列表于下:

---

〔1〕 关于《梨俱吠陀》的雅利安神,参见 C.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9 (reprinted in 1990).

〔2〕 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讨论,参见 T. Burrow, "Proto-Indoaryans," *JRAS*, 1973, pp. 123~124; R. Ghirshman, *L'Iran et la Migration des Indo-Aryens et des Iraniens*, Leiden, 1977; A. Parpola, "Margiana and the Aryan Problem," in: F. Hiebert (ed.), *New Studies in Bronze Age Margiana (Turkmenistan)*, *Information Bulletin*, 19, 1993, pp. 41~55.

表一　四种古代印欧语神名比较表

神名	双马神/双马童	雷神	光明之神/太阳神	水神兼司法神
音译	奈撒特耶	因陀罗	密多罗	伐楼那
米坦尼雅利安语	na-sa-at-ti-ya	in-da-ra	mi-it-ra	a-ru-na
印度雅利安语	nāsatya	indra	mitra	varuṇa
古波斯语	nāŋhaiθya	indra	mihr	—
吐火罗语	ñakte	ylaiñākte	mittär	—

双马神本为雅利安人、伊朗人、斯基泰人、塞人等印欧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祇之一。印欧人离开原始故乡迁徙到世界各地以后，他们的宗教也逐渐从多神教向一神教演变。例如：印度的婆罗门教推崇公牛湿婆，羽人阿胡拉·玛兹达成了古代伊朗火袄教的主神，阿尔泰山的塞人则对狮身鹰头的格里芬情有独钟。[1]吐火罗人的原始宗教显然也经历了从多神教向一神教的演变，这从他们对"神"的称谓与其他印欧人不同可以说明。"神"字在吐火罗语B方言中写作 ñakte(= A方言的 ñkät)，相当于雅利安语的 deva(天神)。例如：新疆库车出土的犍陀罗—吐火罗双语文书中，吐火罗语B方言的 ñäkteṃts soy 和犍陀罗俗语的 devaputra(天子)对译。[2]此外，在吐火罗语宗教写本中该词往往和佛教或摩尼教神名共同构成复合词。例如：kauṃñäkte(太阳神)、pudñäkte(佛神)、bramñäkte(梵天神)和 ylaiñäkte(雷神)等。由于吐火罗人对神的称谓和其他印欧人不同，研究者至今不明

〔1〕关于塞人宗教问题，参见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页。

〔2〕W. Winter, "Tocharians and Turks," *Aspects of Altaic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PIAC held at Indiana University, June 4 – 9, 1962, Ural and Altaic Studies 2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3, pp. 239 – 251.

吐火罗语“神”字的实际含义。德国萨兰德大学的鲁道夫·诺米尔推测这个吐火罗语词相当于雅利安语的 nihvaya(n)te(祈祷)。[1]温特教授认为其说不足信,但是这位德国吐火罗语专家亦未指出该词的确切含义。[2]据上节讨论,吐火罗人的神就是印欧人原始宗教中的双马神。既然如此,吐火罗语表示“神”的词 ñakte 应该相当于雅利安语 nāsatya(双马神)。两者在语音学上确实有联系。因为雅利安语/s/或/ś/在吐火罗语中通常写作/k/。例如:数目字“一百”在雅利安语中写作śata,相当于吐火罗语 B 方言的 kante(= A 方言的 känt“一百”)。由此推之,如果吐火罗语中有“双马神”一词,它应写作※nākatya(=《梨俱吠陀》的 nāsatya),或※nakatiya(=《米坦尼协约》的 na-sa-at-ti-ya)。这个词无疑即吐火罗语 B 方言的 ñakte,该词本义应是“双马神”,后来才演变为吐火罗人对神的统称。

三、从古代岩画看吐火罗的古代宗教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段文字出自元朔元年(前 128 年)张骞向汉武帝所作报告。据陈梦家考证,元封四或五年(前 107/

---

〔1〕 R. Normier, “Tocharisch ñäkte \ ñkät ‘God’,”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Band 94,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1980, pp. 251~281.

〔2〕 W. Winter, “Tocharian B ñäkte, A ñkät ‘God’: Two Nouns, Their Derivatives, Their Etymology,” *JIES*, 15.3~4, 1987, pp. 296~323.

106年)汉朝才在敦煌设立郡县。[1] 也就是说,张骞时代敦煌郡尚不存在。张骞从大月氏人听到的"敦煌"是否指汉代敦煌郡所在地(今甘肃敦煌)需要慎重考虑。众所周知,中国北方游牧人与农耕民族的分界大致在长城地带;在西域则以天山为界。大月氏是游牧人,他们的故乡不会在长城和天山以南地区。据我们最近研究,张骞报告中的"祁连"实际上在唐代祁罗漫山,他所谓"敦煌"指《山海经·北山经》的"敦薨山",也就是《汉书·西域传》提到的天山山北六国中的"单桓"。前者在今新疆哈密巴里坤山,后者在今新疆昌吉博格达山,两山大致位于东部天山北麓。[2]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兴起以前,长城以北的政治格局是"东胡强而月氏盛"。可见月氏人鼎盛时期,向东可达鄂尔多斯草原。

《淮南子·要略》介绍长城以北流行的古代宗教说:"操舍开塞,各有龙忌。"高诱注:"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崔浩注:"西方胡皆事龙神。"汉代文献称长城为"边塞",或简称"塞"。西方胡指讲印欧语系语言的西域人,自然包括月氏、龟兹、楼兰等吐火罗系统古部落。那么长城以北月氏人的"龙忌"或"请龙"应是某种龙神崇拜。据前文讨论,吐火罗人的龙神实乃双马神。他们"请龙"的宗教仪式疑与雅利安宗教的aśva-medha(马祠)或 haya-griva(马祭)有共同的宗教渊源。[3]

---

[1] 陈梦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90页。

[2] 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11~20页;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70~86页。

[3] 关于印度雅利安人的马祭,参见 R. H. van Gulik, *Hayagriva, the Mantrayanic Aspect of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 Leiden: E. J. Brill, 1935。

《诗经·大雅·皇矣》提到周人有"禡类禡马"之俗。关于周人的这种宗教活动,《周礼·夏官·瘦人》介绍说:"乃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圉马。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战国一尺相当于23.1厘米,八尺则是1.85米。这种身高近两米的高头大马自然不是蒙古马,而是来自西域的"天马"。祭祀八尺以上中亚马的宗教活动当即胡人所谓"请龙"。汉代文献也提到龙系八尺以上的高头大马。《说文·马部》曰:"马七尺为騋,八尺为龙。"因此周人" 禡马"的宗教活动实乃胡俗。周人故乡古豳国(今陕西长武)地近戎狄,因而有此胡俗。那么大月氏故乡——东部天山地区的古代宗教遗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1987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东部天山深处发现了一处反映古代宗教内容的大幅岩画,发现地点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西南约75公里,当地人称"康家石门子"。1989年9月,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的陪同下,我和国家文物局的几位同事到呼图壁实地考察了这处古代岩画。岩画刻在巨大的悬崖峭壁底部的崖壁上,石质系侏罗纪顶部喀拉扎组砂砾岩。整个画面东西长14米,上下高9米,总面积达120多平方米,十分壮观。岩画内容可分为七组(I—VII)。其中,"I组居岩壁最上方,是一列裸体女性舞蹈图像和一个斜卧的男性形象,共刻画10个人物形象。其中女性9人由右向左,逐渐缩小。每3人之间,有一组对马图形……这组群像不仅位置高,而且形体大,特征鲜明。最右侧的女性最高,达2.04米……两组对马图案,一组位于右起的第三与第四人之间。对马的头、前腿和后腿,彼此联结,形成一个封闭的图形。马长头长颈,身体细瘦。尾垂于下,通体涂朱。另一组对马,位于右起第六与第七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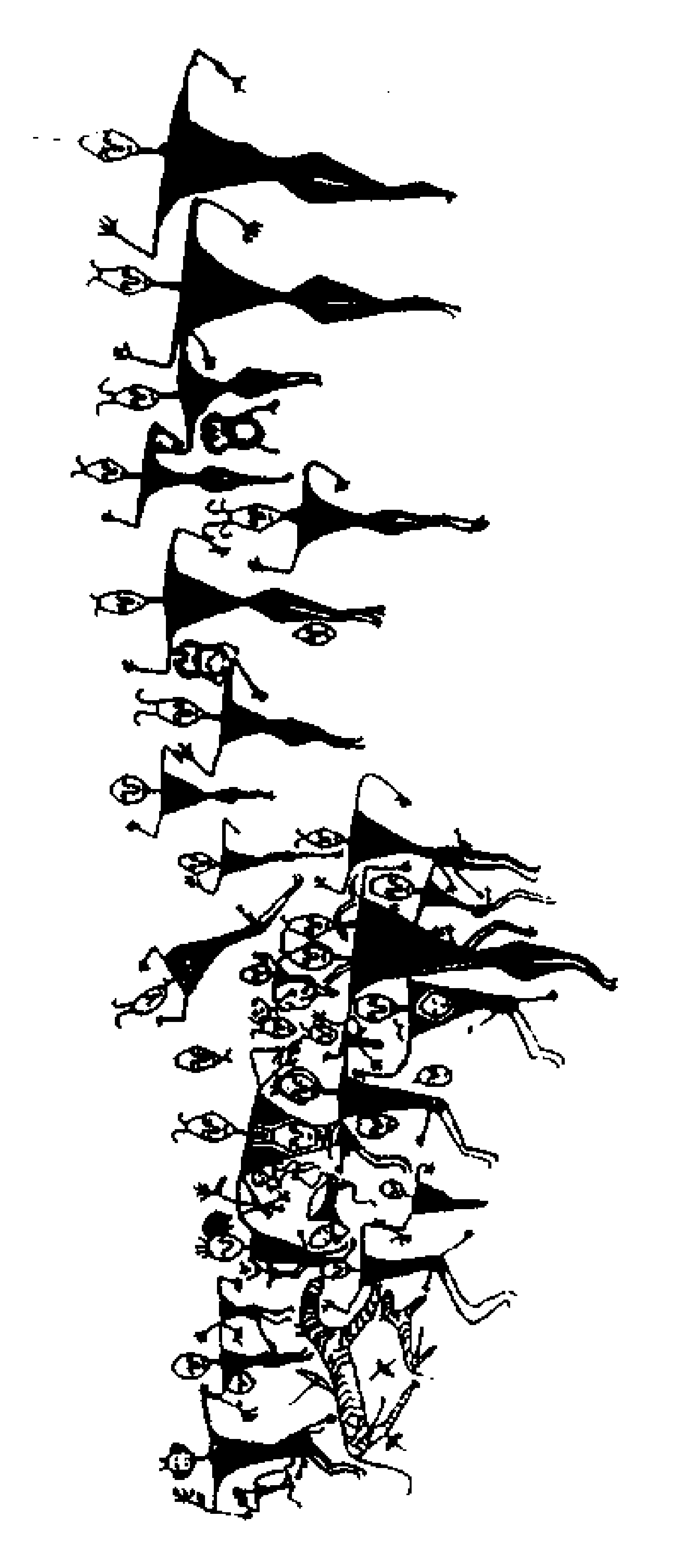


插图2　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古代岩画上祭祀双马神像的宗教舞蹈

间。形体特征基本同前，只是突出画了雄性的生殖器官，彼此相接，未涂颜色。"[1] 由于康家石门子岩画以裸体舞蹈和男女交媾为主要内容，目前被称为"生殖崇拜岩画"(参见插图2)。

王炳华注意到，康家石门子岩画上的对马图像与伊朗高原卢里斯坦出土的青铜器中的双马神有联系(参见插图3:1-2和4:1-2)。这个宗教传统还影响到后来的波斯艺术，所以古波斯石刻艺术中亦有双马神像(参见插图3:3)。

卢里斯坦位于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区，自本世纪20年代起，这里陆续发现大批具有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铜器，包括车马器、管銎式镉斧、柳叶剑、动物纹牌饰。可惜多为盗掘品，经科学发掘的不多。有些铜器与带有阿卡德时期楔形文字的器物共存，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但是多数铜器年代较晚，属于公元前900—前700年间。美国伊朗艺术史家波普倾向于将卢里斯坦青铜器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2]据此，王炳华将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年代断在公元前1000年前半期，并推测其内容或与塞人的宗教活动有关。[3] 我们的看法略有不同。塞人主要分布在伊犁河流域至阿尔泰山区一线。由于势力强大的吐火罗人的阻隔，塞人很难进人天山东部地区。所以塞人在中国史籍中出现较晚，张骞通西域以后才见诸文献。另一方面，塞人起初以狮身鹰头的格里芬为图腾，后来改奉火祆教。[4] 而康家石门子

---

〔1〕 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初探》，收入《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362～367页，图三。

〔2〕 A.U. Pope, "Dated Luristan Bronzes," *BAIPAA*, VII, 1934, pp.19～20; P.R.S. Moorey, "Towards for the Luristan Bronzes," *Iran*, vol. IX, 1971.

〔3〕 王炳华，前揭书，381～382、397～398页。

〔4〕 关于塞人宗教问题，参见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页；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54～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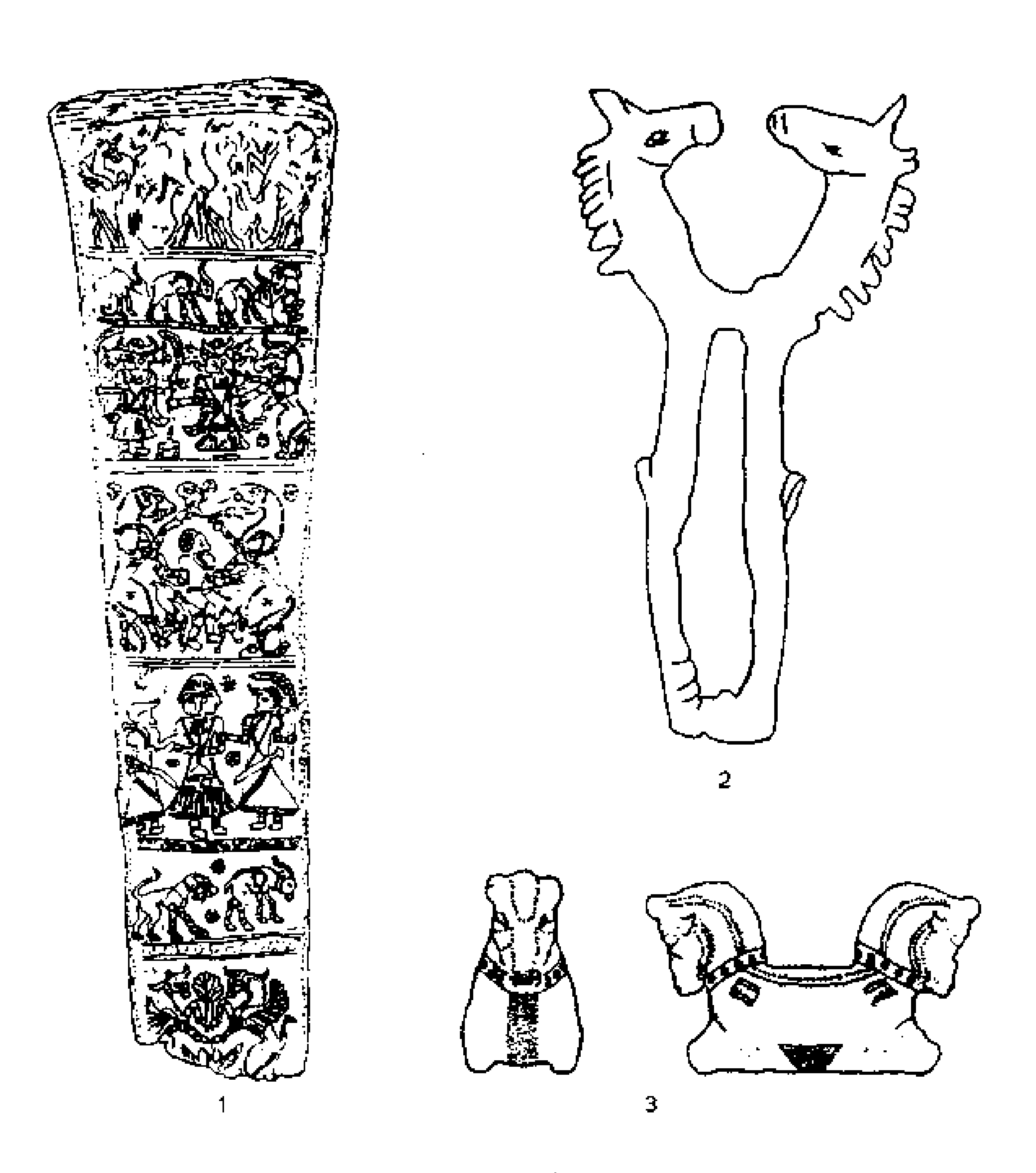


插图3 1-2. 伊朗卢里斯坦青铜器上的双马神像；
3. 古代波斯石雕中的双马神像

岩画上的对马显然是吐火罗神祇——双马神。所以康家石门子这组岩画的宗教内涵应为《淮南子·要略》提到的胡人宗教“请龙”，当与吐火罗人的宗教活动有关。

先秦时期，月氏人是吐火罗系统民族中最为活跃的一支。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大，西起天山南北，东至鄂尔多斯草原。所以长城以北地区也有胡人“请龙”的宗教遗迹。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盖山林调查，内蒙古阴山地区共发现五组双马神岩画（参见插图 4:3-7）。

第一组（插图 4:5）：位于阴山北麓乌拉特中旗西南部几公海勒斯太（蒙语“东榆树山”）沟第 6 地点，编号 6:11 组。“高 0.20，宽 0.45 米。岩画凿刻在山西面山脚下的一块面朝上的巨石上。画面是一对马，头相对。左边那匹马作蹲踞状，右边的则作伫立之形。”此地南距五原县约 40 公里，西南距东地里哈日约 5 公里。这是阴山岩画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阴山岩画最靠东方的地点。[1]

第二组（插图 4:7）：位于阴山南麓五原县韩乌拉山第 12 地点西地里哈日山腰，编号 12:29 组。“高 0.30，宽 0.60 米。岩画凿在必金河西畔岩壁上。画面只表现了头对头的一对马，而左边的那匹马尾巴短小，身躯高大得不成比例。”[2] 这里曾是古代交通要道，赵武灵王修筑的赵长城，就经过韩乌拉特山之北，一直到两狼山口一高阙塞。《淮南子·要略》所云胡人“操舍开塞，各有龙忌”或许就在此地。

第三组（插图 4:4）：位于阴山南麓五原县韩乌拉特山第 13 地点东地里哈日山腰，编号13:7组。“高0.25，宽0.60米。画面

---

〔1〕 盖山林：《阴山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8、45、48～49 页，图 49。

〔2〕 盖山林：前揭书，96～97 页，图 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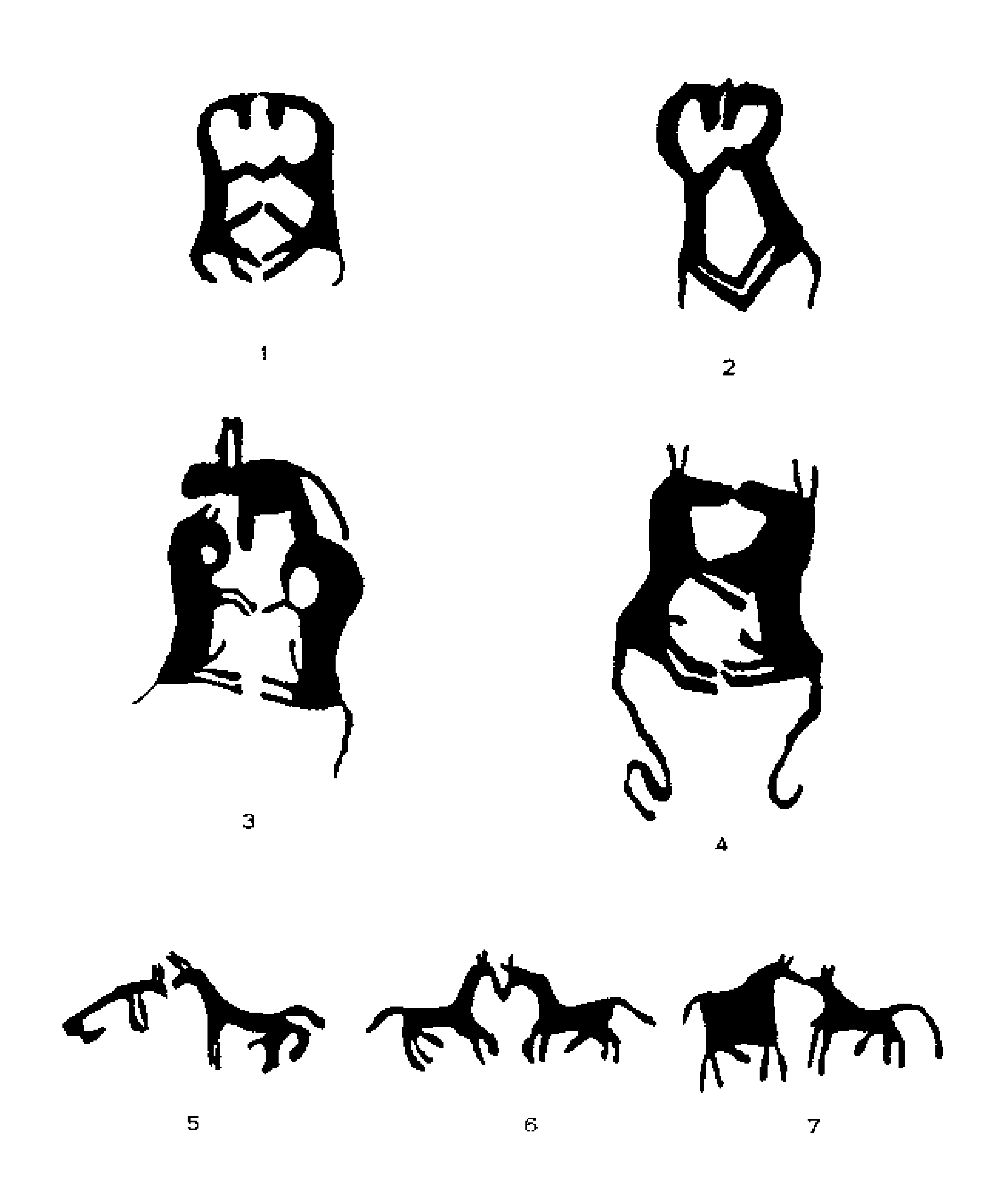


插图 4 1-2. 天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
3-7. 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

是两头公马，头对头，造型生动。"这组岩画位于第一组阴山双马神岩画发现地点东北约5公里。[1]

第四组（插图4:6）：位于内蒙古磴口县西北阿贵庙以北黄河西岸的托林沟北山（长斯特罗盖）东段第26地点，编号26:7组。"高0.43，宽0.26米。岩画凿刻在山顶一块迎南的石壁上，两马相对。它的敲凿方法是，先琢凿成轮廓，通体再用尖凿加以仔细雕琢。凿下的细小的麻点尚能看出。"[2]磴口县于汉代属朔方郡窳浑县，是中原与西北游牧人交往的主要通道。《汉书·地理志》朔方郡条："西部都尉治窳浑（县）……窳浑，有道西北出鸡鹿塞，屠申泽在东。"东汉窦宪三战北匈奴就是从鸡鹿和高阙两塞出兵漠北。古地名"鸡鹿"似乎来自胡语。如果真是胡语，该词可能源于吐火罗语A方言的śaru（= B śerwe，猎人）。据美国语言学家Don Ringe博士分析，这个吐火罗语词源于原始印欧语的kēruos，意为"牡鹿、野兽"。[3]这个地名的胡语词源表明，鄂尔多斯曾为吐火罗系统游牧人的牧地。

第五组（插图4:3）：位于内蒙古磴口县托林沟北山（长斯特罗盖）东段第26地点，编号26:20组。"高0.67，宽0.35米。凿刻在小山顶的立壁上，迎北。下方是一对马，造型美观自然。上方又凿了一只笨拙的动物。"[4]

大月氏人王庭在祁连山，今新疆巴里坤山。近年在巴里坤也发现了双马神岩画，今称"八墙子岩刻"。这处岩画位于巴里坤县

---

[1] 盖山林：前揭书，99～100页，图381。

[2] 盖山林：前揭书，265、270页，图1084，图版四一·2。

[3] JR. Don Ringe, *On the Chronology of Sound Changes in Tocharian*, vol. 1,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6, p. 11.

[4] 盖山林：前揭书，269、273页，图1097。

城东北38公里的八墙子村附近,地处天山东脉莫钦乌拉山西段深山之中。这里山峦重迭,沟谷幽深,水草丰茂,为游牧狩猎提供了极好的场所。八墙子岩画分布在三个地点。双马神岩画在第三个地点,位于一座山顶岩壁上。据近年考古调查,这里有近百幅岩画,其中"一幅'对马图',二马四蹄相对。这种造型与新疆呼图壁生殖崇拜岩画和内蒙古阴山岩画颇有相似之处。"[1]

目前古代岩画研究的最大难点是如何断代。不过,有迹象表明,天山和阴山岩画中的双马神像的年代甚早,可能要追溯到晚商时期。因为晚商青铜器的族徽符号中出现了类似于阴山岩画的双马神像(参见插图5)。例如:《金文编》著录的"双马与大象"(父辛鼎)、"双马与大豖"(作从簋)、"双马与大马"(屯簋)、"双马与大马"(作父辛尊)、"双马与大马"(作父丁尊)以及上海博物馆藏作父从卣上的"双马与大马"。[2] 大豖部族见于武丁卜辞,是商代晚期一个重要部族。大豖曾承王命讨伐商朝的敌国,时常以"致羌"或"以羌"等形式向商王朝献俘,称臣纳贡。[3]

羌人起源于甘肃和青海。印欧人向东迁徙时代,甘青地区分布着两个颇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据人类学测定,这两个文化的创造者均属蒙古人种。[4] 所以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两个文化可能代表了羌人早期文化。[5] 四坝

---

[1] 王毅民主编:《哈密文物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240页。

[2] 容庚:《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844页。其中作父从卣目前正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

[3] 葛英会:《金文氏族徽号所反映的我国氏族制度的遗痕》,《北京文物与考古》,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45~47页。

[4]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2期。

[5] 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收入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80~121页。



插图 5　晚商青铜器族徽上的双马神像

文化相当发达，近年考古发现表明，四坝类型的陶器向西一直分布到新疆哈密盆地。[1]看来，以齐家和四坝两个文化为代表的强大的羌人集团遏止了古代印欧人东进的步伐。据碳$_{14}$年代数据，四坝文化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大约公元前1600年逐渐衰落。那么印欧人继续东进，最后抵达鄂尔多斯草原，大概在四坝文化衰落以后的晚商时期。既然晚商大豕诸部与羌人为邻，这些以双马神为图腾的古代部族或许就是活跃在巴里坤至鄂尔多斯草原的吐火罗系统游牧人。

70年代，新疆哈密盆地曾发现与殷墟妇好墓所出形制完全相同的龙首刀，同样的龙首刀亦在山西保德晚商墓葬出土。[2]可见从康家石门子经巴里坤、哈密、山西保德，最后到殷都大邑商（今河南淇县）有一条非常古老的通道。晚商以来，以月氏人为代表的吐火罗系统游牧人一直控制着这条东西交通孔道。妇好墓出土的和田古玉就是经吐火罗系统游牧人之手，从新疆传人中原的。[3]那么，天山和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则要追溯到晚商时期——公元前1400～前1100年间。

---

〔1〕此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吕恩国先生见告，谨致谢忱。

〔2〕新疆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301页，图一六一·1；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4期，63页及图版陆。

〔3〕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文物》1989年第1期，72～74页（英译稿见"Tocharian People: Silk Road Pioneers," *Significance of Silk Road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s*, ed. by Tadao Umesao and Toh Sugimura, Osaka, 1992, pp.91－96）。

四、吐火罗艺术在中国北方草原的传播

春秋战国到西汉初年,月氏人一度称霸中国北方草原。《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是之时(前209年),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匈奴单于的称号"头曼"即后世突厥可汗的称号"土门",突厥语作 tümana。英国突厥学家克劳森首先注意到这个突厥语称号实际上来自吐火罗语,相当于吐火罗语 A 的 tman 和吐火罗语 B 的 tumane,本义为"万",引申为"万户长"。[1]匈奴单于和突厥可汗的"万户长"称号疑为大月氏王所封。据《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太子冒顿曾被送到月氏王庭作人质。由此可见,月氏人一度是中国北方草原诸部落的霸主。他们在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频繁活动,不可能不留下任何遗迹。既然吐火罗人崇祀双马神,那么,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出土的各类双马神艺术品应该属于吐火罗宗教艺术。

1978年,河北易县燕下都辛庄头战国晚期墓地30号墓出土了一批带双马神像的金银牌饰和马具。计有双马纹金方牌3件、双马纹金节约4件、双马纹银方牌5件(参见插图6:1-2)。[2]这些发现为研究战国时代吐火罗艺术的东传提供了重要标本。[3]这座墓为中字形土坑竖穴墓,墓室长6米,宽5米,墓口到墓底深8米,南墓道长8米,北墓道长4.2米。随葬的仿

---

[1] G. Clauson, "Philology and Archaeology," *Antiquity*, XLVII, 1973, pp. 40~42.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715~718页。

[3] 宿白等编写:《中国の金银ガラス展》,大阪:NHK大阪放送局,1992年,图版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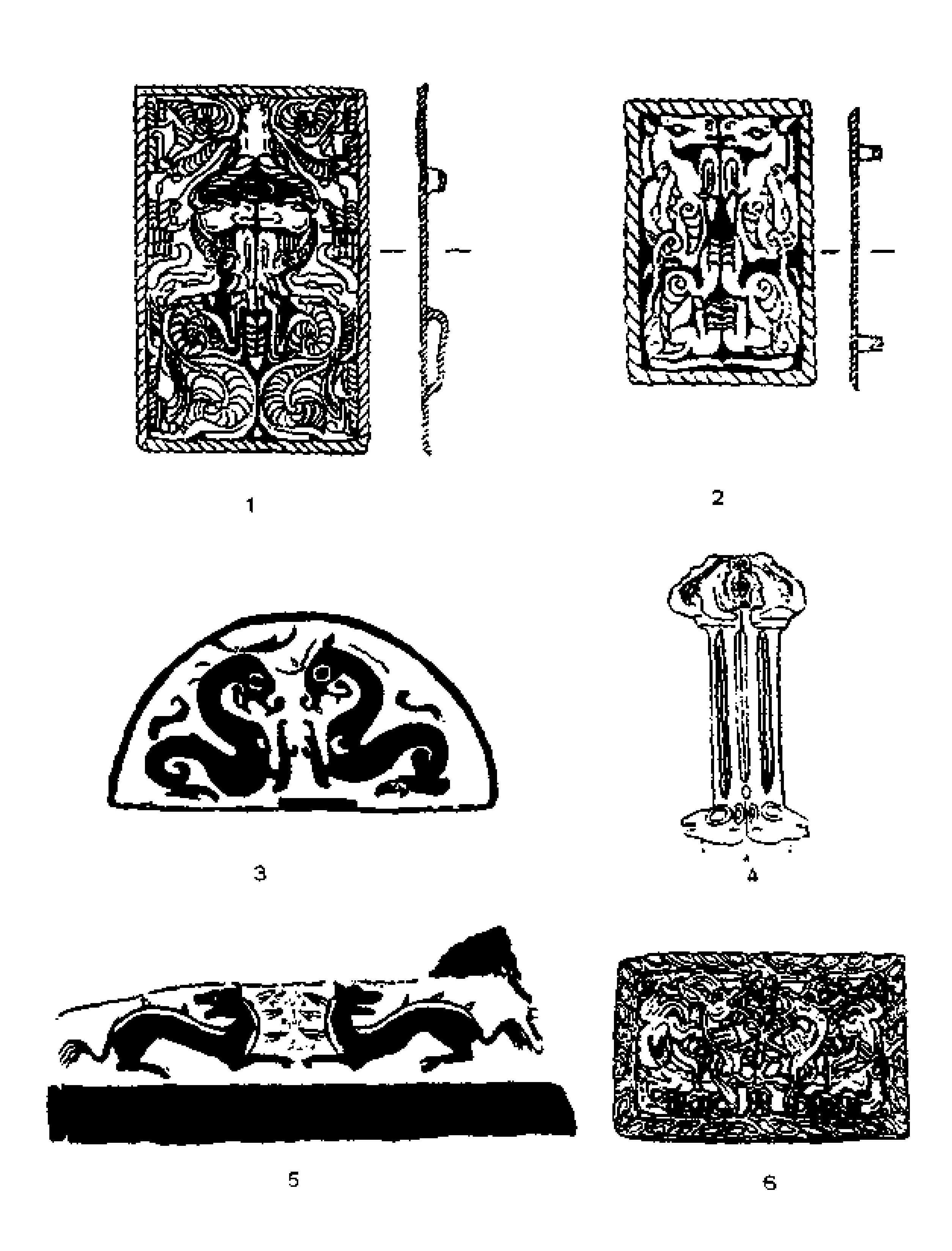


插图 6　1-3 和 5. 河北易县燕下都 30 号墓出土的金牌饰、瓦当和阑干砖上的双马神像；4.《内蒙古长城地带》著录的青铜剑柄上的双马神像；6. 南西伯利亚出土的双马神金牌饰

铜陶礼器有七鼎六簋。报告推测墓主人应是燕国贵族,并说:"30号墓出土的金柄铁剑和金银饰件上的纹饰绝大部分都是牛、马、羊、骆驼、鹿、熊和怪兽等,显示了燕文化与北方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1]

春秋初期,周王室军事力量日渐衰败,燕国开始处于北方戎狄的包围之中。春秋中期以后,燕国屡遭山戎等北方游牧人的侵扰,国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国崛起,称霸中原。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出兵伐山戎,这才拯救了燕国。[2] 此事见于许多先秦文献,《管子·小匡》曰:齐桓公"中救晋公,禽(擒)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附,乘浮济河,至于石枕,县(悬)车束马,逾太行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这段文字对了解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古民族的分布相当重要。据考证,山戎在今燕山北部,孤竹在今河北卢龙,离支在今河北迁安县。[3] 史载匈奴王族姓挛鞮氏。[4]齐桓公所伐"离支"在其他文献中作"泠支"(《管子·小匡》)或"令支"(《逸周书·王会篇》)。而挛鞮、泠支、令支读音相近,疑指同一部族。所以齐桓公所伐离支可能就是后世之匈奴。泰夏或作"大夏",地近流沙(今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大致在今鄂尔多斯草原。

齐桓公首先讨伐的孤竹、山戎地近东方,似属东胡系统游牧人;最后讨伐的大夏地近西方,疑即吐火罗系统的月氏人。大夏

---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前揭书,730~731页。

〔2〕 事在齐桓公二十三年,参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3〕 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54~59页。

〔4〕 《汉书·匈奴列传》:"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

其名和古希腊作家提到的中亚东部草原部落“吐火罗”读音接近，所以王国维以来，研究者大都认为先秦文献的“大夏”就是唐代文献的吐火罗。[1] 文献亦称大夏为“龙夏”。《管子·轻重丁篇》曰：“敢问齐国方几何里，(海)涯龙夏。”同书《山至数篇》亦曰：“龙夏以北至于海庄，禽兽牛羊之地。”吐火罗人以龙为图腾，故有“龙夏”之称。所以燕下都30号墓所出双马纹艺术品可能来自称霸北方草原的吐火罗系统月氏人。吐火罗艺术对燕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金银装饰艺术方面，可能还渗透到燕文化建筑艺术中。燕下都出土瓦当和阑干砖上的双龙纹(参见插图6:3和5)与南西伯利亚出土古代游牧人黄金牌饰(参见插图6:6)上的双龙纹如出一辙，艺术母题可能都渊源于吐火罗人双马神宗教艺术。[2]

1979年，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墓地发现一批带有双马神像的艺术品，因而为研究吐火罗艺术在鄂尔多斯草原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标本(参见插图7:1－3)。其中2号墓出土了两件双马神金饰片。其一为卧马纹金饰片(编号2:47)，“长方形，框内有双马对卧纹，四肢内屈。金片中间有折叠痕迹。长11.7、宽5.7厘米，重13克”。其二为双马纹饰片(编号2:59)，“长方形，框内有双马纹，头部相对。金片一端有圆形孔，孔上有钉眼，上压金泡形饰。长9、宽3.4厘米，重4克”。[3] 该墓还有一个对马纹铜带扣(编号2:80)。这座墓的墓坑呈南北向，有男性人

[1] 王国维：《西胡考》下，收入《观堂集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13页。

[2] 傅振伦：《燕下都发掘品的初步整理与研究》，《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18～26页。

[3]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354和356页图四·6和图五·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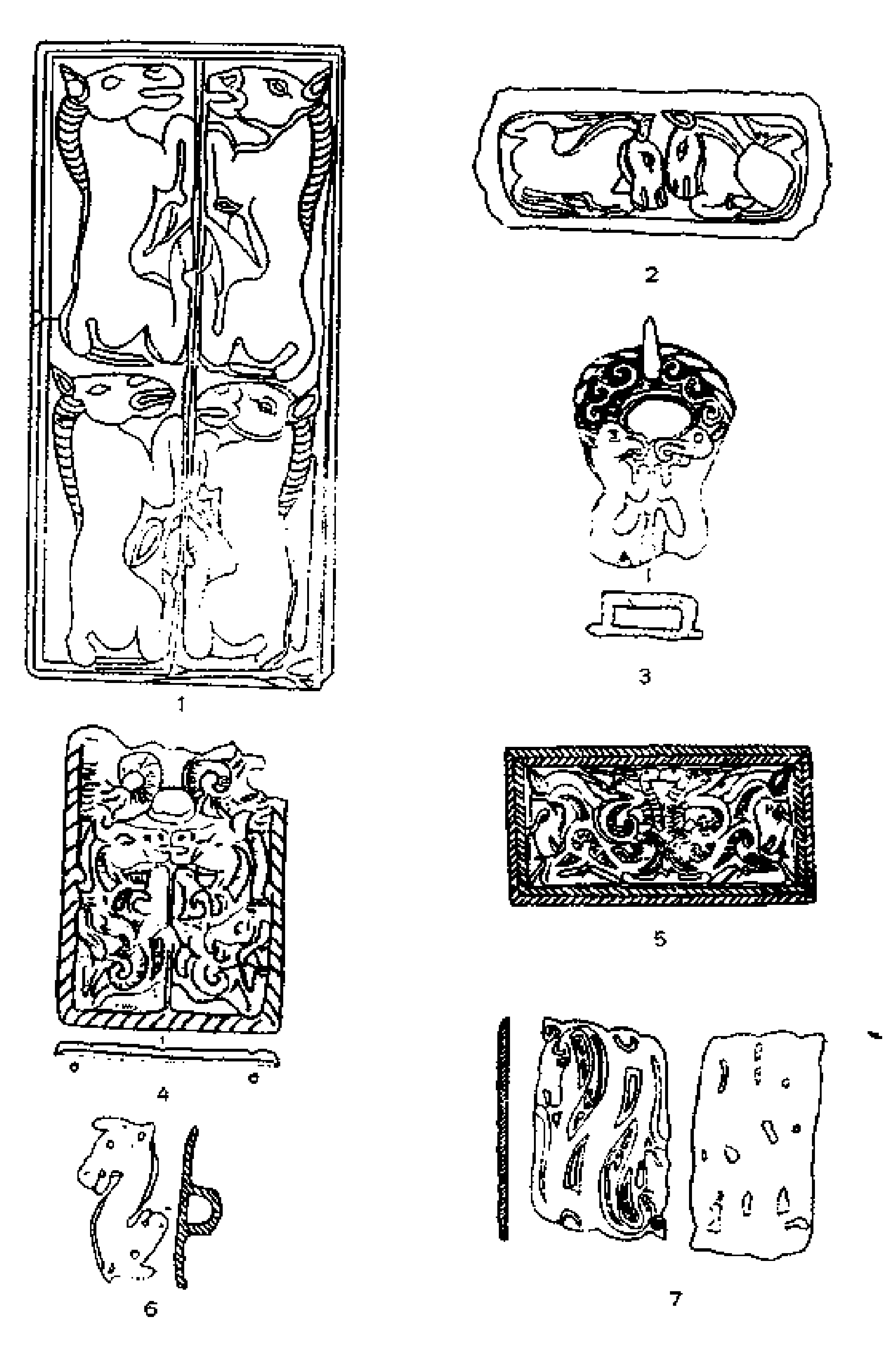


插图7　1-3. 内蒙古西沟畔战国墓出土双马神金牌饰和带扣；4-5. 宁夏倒墩子西汉墓出土双马神牌饰；6. 新疆轮台县琼巴克古墓出土双马神牌饰；7. 新疆吐鲁番艾丁湖西汉墓出土双马神青铜牌饰

骨,头向北偏东25度,无葬具,墓圹不清。在头骨左侧发现马、羊头骨多具。发掘简报推测此墓与匈奴人有关。但是从墓中随葬双马神艺术品看,墓主人可能是当时称霸中国北方草原的吐火罗系统游牧人。早在30年代,鄂尔多斯就曾发现许多带有双马神像的金银或青铜牌饰,大多流散海外,属于巴黎卢芹斋收集品。[1]双马神圆雕纹饰亦见《内蒙古长城地带》著录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其中一把兽柄青铜剑上的双马纹的后肢呈180°翻转状(参见插图6:4)。这种后肢翻转的动物纹广泛流行于欧亚草原,流行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前4世纪。[2]

1983和1985年,宁夏同心县倒墩子西汉中晚期游牧人墓地再次发现双马或双龙纹牌饰(参见插图7:4-6)。其中1号墓出土了一件透雕双龙纹牌饰(编号1:4),上有"透雕双龙纹,边框饰柳叶形花纹,双龙间有兽头及圆形、菱形纹饰……长10.2、宽5.9厘米";5号墓出土了两件对马纹鎏金铜牌饰(编号5:9和11),"两件相同,均鎏金,浮雕两个伏卧状马,后半个躯体向上翻转、马身配一兽头、边框饰麦穗纹……残长7.3、宽5.6厘米";19号墓出土两件双马神鎏金铜牌饰(编号19:9和10),"两件相同,均鎏金,浮雕两个伏卧状马、后半个躯体向上翻转,周边饰麦穗纹……长10.6、宽5.3厘米"。[3]这个墓地含有长方形

---

[1] A. Salmony, *Sino-Siberian Art—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C. T. Loo Publisher, 1933, Pl. XXVI-VII.

[2] 田广金和郭素新:《鄂尔多斯青铜器》,175页,图一二二·4;杜正胜:《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3年,351页。

[3]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期;《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68年第3期,343—344页,图九·7、10和13,图版拾柒。

竖穴墓和偏洞室墓两类墓葬,双马纹牌饰均出自竖穴墓。倒墩子1号墓所出透雕双龙纹牌饰的艺术主题是双龙守护生命树,俄国学者以前在南西伯利亚曾采集到类似的青铜牌饰,但是制作工艺更为精美,年代断在公元前4世纪。[1]发掘简报推测倒墩子墓地属于南匈奴遗存。从汉代文献记录的匈奴语词汇看,匈奴王族轢鞮氏可能是讲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游牧人,但是匈奴部落联盟众多部落的种族成分相当复杂,既包括阿尔泰语系游牧人,亦有塞人和吐火罗人部落。倒墩子墓地的文化成分显然不是单一的。其中竖穴墓和内蒙古西沟畔战国墓以及中亚大月氏人墓葬形制相同,并出有双马神牌饰(参见插图7:4-6)。这些墓葬的墓主人也许是匈奴部落联盟中吐火罗系统游牧人。

大月氏故乡的双马神像目前已发现两例。其一,近年新疆轮台县琼巴克古墓出土了一件双马神牌饰(参见插图7:6),据碳$_{14}$年代测定,这批墓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00—前400年间;[2]其二,1980年,新疆吐鲁番艾丁湖畔发现一处汉代墓地,其中出有紫铜质"带扣动物纹饰牌1件(80TADM0:13)。长8.2厘米,宽4.5厘米,厚0.3厘米;正面铸成透雕状一对卧马,马背相联,头尾相衔,背面有三个环纽,位于三个角部"(参见插图7:7)。[3]这个双马纹透雕牌饰和汉初铜镜共存,而艾丁湖距

[1] G. Borovka, *Scythian Art*, London: Bouverie House, 1928, Pl.52B; M. I. Artamonov, *Sokrovisha Sakov*, 1973, 157, No.208;孙机先生认为,这个金牌的年代可能和倒墩子西汉墓相近,说见所著《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67页。

[2] Jianjun Mei and Colin Shell, "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 in Late Prehistoric Xinjiang,"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II,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Inc., pp.589~591 and fig.5-5.

[3]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葬》,《考古》1982年第4期。

离大月氏统治中心巴里坤草原不远。这个发现为寻找大月氏故乡的遗址和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以上四节讨论,吐火罗人的古代宗教是某种龙神崇拜,先秦文献称之为"请龙"。中亚大月氏墓地所出以龙为题材的艺术品表明,吐火罗人龙神的艺术原形实乃印欧人原始宗教的双马神。这和先秦文献将中亚马称作"龙"是一致的。这个认识还得到语言学证据的支持。吐火罗人对"神"的称谓 ñakte 正相当于印度雅利安语 nāsatya,或米坦尼雅利安语的 na-sa-at-ti-ya,意为"双马神"。双马神本是印欧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祇之一,最早见于公元前 3200—前 2200 年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随着印欧人的分化迁徙,他们的宗教逐渐从多神教向一神教发展演变,印度雅利安人推崇公牛湿婆,羽人阿胡拉·玛兹达成了伊朗火祆教的主神,阿尔泰山的塞人以狮身鹰头的格里芬为神灵,而吐火罗人独尊双马神。由此可见,新疆天山、内蒙古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出土的双马纹艺术品,即使不是吐火罗人亲自制作的,也是在其宗教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原载北京大学传统文化中心编:《国学研究》第五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收入本书时略有补充)

2

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

世界文明史上的许多科技发明都为推动社会进步提供过巨大动力。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发明莫过于双轮马车。《周礼·考工记》曰：

> 攻木之工：轮、舆、弓、匠、车、梓……故一器而工聚者，车为多。

意思是说，造车技术集中体现了各种古代造作，尤其是机械制造的工艺水平。中国幅员辽阔，既有长江、黄河，也有草原和戈壁荒漠。双轮马车在促进中国各地方国或部落交往与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显得尤为重要。马拉战车的出现使跨国远征成为可能，从而为中国从“小国寡民”时代向统一大帝国过渡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战车的产生甚至影响到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战车不仅对研究科技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古代军事史，甚至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战车究竟如何产生？文献不足征。70年代以来，有关欧亚大陆古战车的考古资料迅速积累，海内外研究者都在利用考古资料积极探索战车起源问题，从而成为当今世界考古学

研究最大的热点之一。先后参加讨论的有：英国考古学家皮古特(1974)、苏联考古学家诺甫戈罗多娃(197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1980)、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林沄(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宝成(198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田广金和郭素新(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长寿和张孝光(198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盖山林(198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翟德芳(1988)、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198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1991)、中国历史博物馆孙机(1993)、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1993)、陕西考古研究所李自智(1993)、俄罗斯考古学家伊林娜·库丝米娜(1993)、中山大学邱克(1994)、新疆大学历史系苏北海(199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乌恩(1994)、美国哈特维克学院人类学系大卫·安托尼(1996)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1998)。[1]上述研

---

[1] S. Piggott, "Chariots in the Caucasus and in China," *Antiquity*, XLVIII, 1974, pp. 16～24；诺甫戈罗多娃：《蒙古山中的古代车辆岩画》，《苏联考古学》1978年第4期(陈弘法译文收入张志尧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林沄：《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历史专集》(二)，1980年；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第6期；田广金和郭素新：《鄂尔多斯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张长寿和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中国考古学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盖山林：《内蒙古青铜时代的车辆岩画》，《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翟德芳：《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夏含夷(E.L. Shaughnessy)：《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汉学研究》(台湾)1989年第7卷第1期；李学勤：《中国和中亚的马车》，《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104～116页；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饶宗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收入张广达和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12～13页；李自智：《殷商两周的车马殉葬》，收入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周文化论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168～186页；Elena E. Kuzmia, "Decouverte des civilisations d'Asie centrale," *Les Dossiers d'Archeologie*, N185, Paris, 1993 (汉译见刘文锁：《青铜时代的

究主要围绕双轮马车的年代与类型、驾驭方法，东西方古战车比较研究等问题展开的。我们今天对欧亚大陆古战车能有如此丰富的知识，首先归功于他们的深入研究。

中国所见最早的战车实例是殷墟出土单辕双轮马车。这种战车由上百件精密木构和青铜零件组装而成，从设计思想到工艺技术相当完善。战车在殷墟突兀出现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在中国境内迄今未见古战车的雏形或育成期。另一方面，殷代战车和近东双轮辐战车似乎存在某种亲缘关系，而西亚战车出现的年代甚早。所以许多研究者怀疑殷代战车起源于近东。[1]麦克奈尔在他的《世界史》中提出战车最初发明于伊朗或阿塞拜疆地区，并于公元前1700—前1400年传向世界各地，遥远的中国也是如此。他认为："西方战车御夫的到来，可能导致了商王朝的建立。"[2]林巳奈夫说得更明确："中国殷代出现的单辕马车与近东的马车在构造、套马方法、驾御方法

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新疆文物》1996年第2期，116～118页）；邱克：《论殷代战车源自西方说》，收入《中国交通史论》，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苏北海：《新疆岩画》，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乌恩：《论古代战车及其相关问题》，收入李逸友等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327～335页；David. W. Anthony, "The Opening of the Eurasian Steppe at 2000BCE," in Victor H. Mair,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1, Washington: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1998；王巍：《商代马车臆测》，《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380～388页；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及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寻根》，1998年第4期，17～21页。

〔1〕 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收入上官鸿南、朱士光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纪念学术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20页。

〔2〕 W. N. Mcneill, *History of World*, Oxford, 1979, pp.49～50.

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不能不说，拥有马车的极少数人费尽艰辛，驾驶着他们自己的马车从遥远的近东地区来到中国，以这种方式将马车传人中国，并在中国仿制出来。"[1]夏含夷援引赫梯文献记载公元前1700年安纳托里亚王曾动用40辆马车作战，而里海沿岸古墓出土的双轮辐马车比殷墟战车早300到500年，说明殷代战车起源于西方。[2]

然而，先秦典籍却说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战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前325年）以前，战车甚至是中国最主要的军事装备之一，所以汉语"军"字偏旁从车。就在安纳托里亚王将马车引人战争时，商族首领成汤正在发动推翻夏朝末代君主夏桀残暴统治的战争。《吕氏春秋·简选》说：

> 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战于成 ，登自鸣条，遂有夏。

殷汤是殷墟卜辞经常燎祭的开国君主成汤，他和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不同，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关于夏桀兵败鸣条后的去向，《商书·仲虺之诰》说"成汤放桀于南巢"。《括地志》解释说："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3]南巢在今天安徽巢湖地区。1972年巢湖西岸肥西县大墩孜遗址发现了商文化二里岗期青

---

〔1〕林巳奈夫：《中国先秦时代の马车》，《东方学报》39册，280页。

〔2〕夏含夷：《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汉学研究》（台湾）1989年第7卷第1期。

〔3〕《史记·夏本纪》正义引。

铜器，和这批铜器伴出的无舌单扉铜铃值得注意。[1]这件铜铃并非商器，而是二里头遗址夏文化层（第3—4期，约公元前1800—前1600年）的典型器物。[2]

夏代流行一种木舌铜铃，名叫“木铎”。《夏书·胤征》说：“每岁孟春，猷人以木铎徇于路。”孔传：“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二里头遗址夏文化层的无舌铜铃顶部带有两个系舌小孔，可见这种铜铃原有铃舌，因为使用木舌，所以没保存下来。我们怀疑，二里头文化的无舌铜铃就是夏代木铎。巢湖一带出土夏代木铎不是偶然的，它以出土实物证明《商书·仲虺之诰》所说“成汤放桀于南巢”本自殷人实录，当为信史。那么成汤伐夏桀和安纳托里亚王动用40辆马车作战几乎同时发生，我们很难想像成汤伐夏桀用的70部“良车”来自万里之外的安纳托里亚。

相传中国造车史始于夏代。《世本·作篇》将车的发明归功于夏朝车正奚仲。《管子·形势解》说：“奚仲之为车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奚仲造车不久就被夏启用于战争。《夏书·甘誓》说：

>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

〔1〕安徽省博物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好博物馆工作》，《文物》1978年第8期，2~3页。

〔2〕安家瑗：《中国早期的铜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年第10期，35~38、59页。

《史记·夏本纪》转录了这段文字。据《尚书》孔颖达疏和《史记》孔安国注,“御者”指驾御马车的人,“左”指战车内左侧车兵、“右”指战车内右侧车兵。先秦车制:“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孙子兵法·作战篇》杜牧注引《司马法》)。殷墟发掘资料表明,一车、四(或二)马、三士的军事编制后来被殷代承袭。[1]那么,《夏书·甘誓》大意说:夏启率师亲征,在甘之野(今陕西户县)大战有扈氏。出征前召集六军将领说:“负责六军的将领听我说!我敢发誓,有扈氏罪孽深重。他们不仅辱没了仁、义、礼、智、信五行,而且抛弃了天、地、人正道。所以老天爷要结束他们性命。我们要替天行道,立即讨伐有扈氏。如果车左的士兵不攻左路,就是不服从命令。如果车右的士兵不攻右路,就是不服从命令。如果车中间的驾车者不驱马向前,也是没服从命令。凡服从命令者,将在祖先宗庙内论功行赏;凡不服从命令者,将在土地庙处以极刑,并株连九族。”那么,夏初爆发的甘之战实际是一场车战。

《竹书纪年》将甘之战系于夏启二年。[2]夏朝纪年尚无定论,史学界根据文献将夏启即位元年定在公元前2100年。1984年,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对二里头遗址夏文化层的碳$_{14}$年代数据作过如下分析。他说:“现在已测量二里头文化的碳$_{14}$数据20个,除个别的明显偏高应予舍弃外,绝大部分都落在1750±100B.C.—1350±100B.C.之间,用树轮校正当在公元前2080—

---

〔1〕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5~24页;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五册,19~21页。

〔2〕 《墨子·明鬼》引《夏书·禹誓》说甘之战的指挥者是夏启之父夏禹。

前1580年左右。"[1] 如果《夏书·甘誓》出自夏朝史官实录，那么，公元前2081年中国已进入车战时代，而夏启派战车讨伐有扈氏比公元前1700年安纳托里亚王用马车作战至少早300年。

尽管文献对殷代以前中国有战车言之凿凿，但是迄今未见早于殷墟车马坑的任何车迹。这里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中国"始以木为车"，[2]殷代以前的战车不带任何青铜饰物，而木车遗迹难以保存至今。其二，车马殉葬制是造车手工业发达阶段的产物。据《夏书·舜典》记载，车马是夏天子赏赐功臣的名贵之物，所以殷代以前中原可能不用车马殉葬。然而不用车马殉葬并不意味着殷代以前中国无战车。所以仅以车马坑所见车迹作为研究对象，不能解决中国古代战车起源问题。

我们注意到，除车马坑外，三代车舆随葬制还采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即在墓中随葬一套或数套造车工具。贵族阶层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这些造车工具显然是作为表示贵族等级制度的礼器随葬墓中的。《三代吉金文存》卷二十著录了三件晋墓随葬的空首斧。其一有铭曰："郘大叔以新金为贰车之斧十。"这条金文可与先秦文献有关造车工具的记载相印证，说明先秦贵族墓随葬造车工具无异于随葬真车马或车马明器。中国青铜时代起初以木为车，但是整个青铜时代却始终使用青铜工具造车。工艺精湛的殷代战车就是用这套造车工具制造的。若要证明殷代战车是否源于近东，首先得证明殷代造车工具是否肇源于西亚青铜工具。那么东西方青铜工具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无疑将给我们更多启示，为最终揭开中国战车起源之谜提供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尽管青铜造车工具屡见于三代墓葬，但是随葬这套工具

[1]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43页。

[2]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的寓意以及它们对研究中国战车起源问题的重要价值尚未引起学界充分讨论。本文拟分四节探讨这个问题。

一、考古资料所见先秦时代造车工具

史载先秦时代通用一套造车工具，士大夫乘车出行，车兵驾车出战，亦随身携带这套青铜工具。文献屡次提到这套工具，择要摘录于下：

其一，"輂：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輂加二版二筑"（《周礼·地官·乡师》郑玄注引《司马法》）。

其二，随周公驾车东征的车兵作歌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惶），既破我斧，又缺我锜……既破我斧，又缺我銶"（《诗经·豳风·破斧》）。

其三，"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管子·海王篇》）。

其四，"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管子·轻重乙篇》）。

上引文献所列造车工具名单中某些器物虽然和造车相关，但其本身并不是工具。《说文·金部》说："釭，车毂中铁也。"据考证，釭是战国以后才广泛使用的一种加固车毂的金属零件，河北易县燕下都第23号遗址曾发现一例，器型呈圆筒形，两侧有突出的凸榫，可以卡在木毂上。[1] 那么，《管子·轻重乙》的"釭"实系维修战车的零配件。至于《司马法》"二版二筑"，《周礼·地官·

---

〔1〕 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原载《文物》1985年第8期；收入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32～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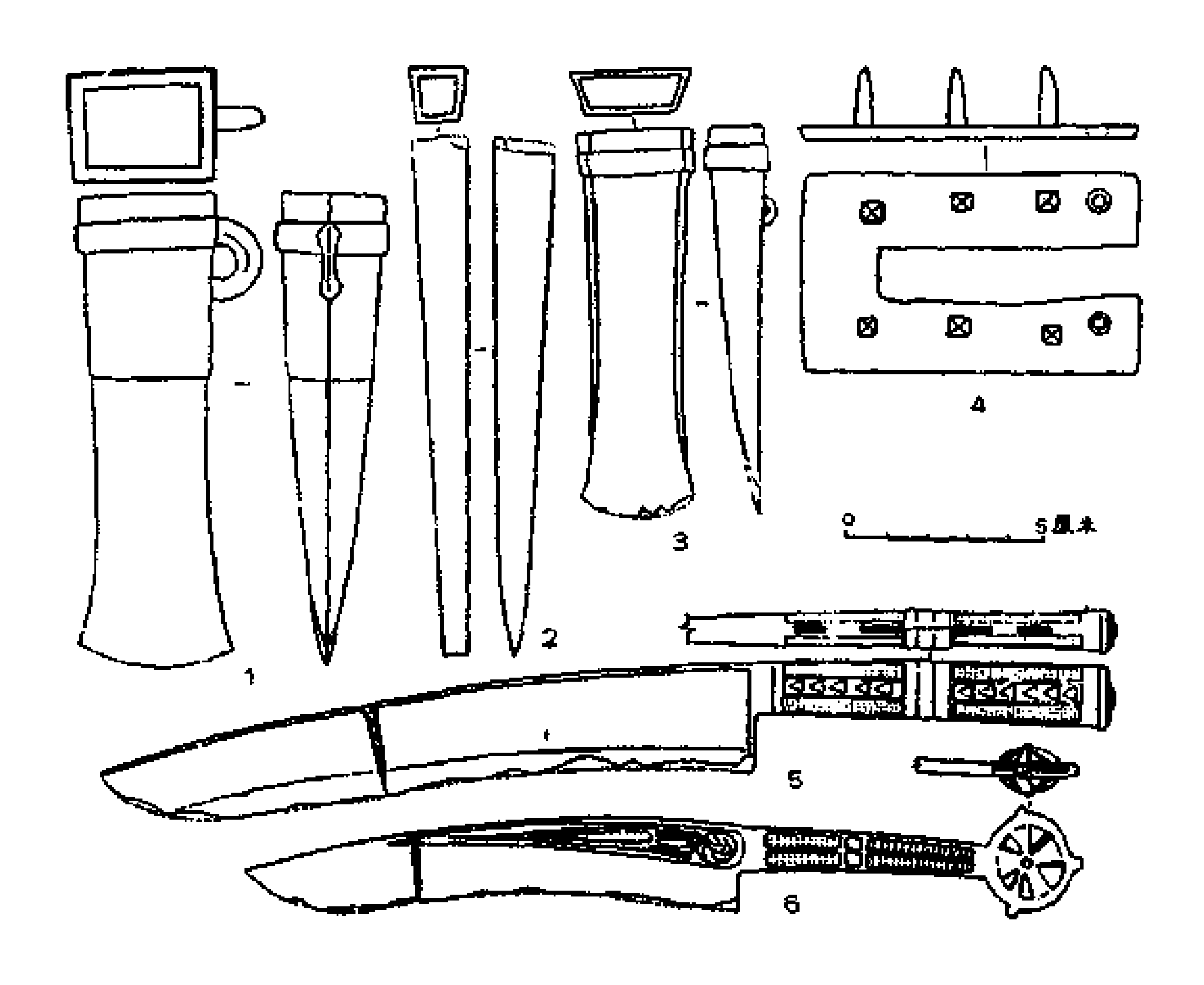


插图8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随葬的造车工具 1.斧(2:39) 2.凿(2:41) 3.锛(2:40) 4.U形器(1:70) 5、6.削(1:63、2:38)

乡师》孔颖达疏："云周辇加二版二筑者，筑者，筑杵也。谓须筑军垒壁。"故知"二版二筑"指车箱四边护板，亦非造车工具。我们还注意到，有些工具的名称使用通假字，或同器异名。例如：这套工具中的"斨"指空首方銎斧，因此《豳风·破斧》的"斨"实际就是《司马法》的"斧"。《管子·轻重乙》的"轲"是"柯"的通假字，指斧柄而言。铚、锜、剞古音相近，当指一器，也即木工用的削刀"剞"。锄是农具中除草用具，很难和造车工具相联系。古文锄、钼可通假。故疑《司马法》的"锄"实为"钼"的通假字。钼或称"钼铻"，指木匠工作台上一种固定木材以便加工的青铜工具。

综合上述文献，一套完备的造车工具包括一斧（斨）、一斤、一刨（梩或锜）、一凿、一銶、一锯、一锄（锄铻）、一锥、一钻、一柯（轲），凡十件工具。

为了便于全面了解这套造车工具的源流，我们从经过科学发掘的早商至战国墓或车马坑各挑选一组造车工具作为研究对象。商代标本选自1974年在湖北盘龙城李家咀发掘的早商墓葬M2，以下简称"盘龙城商墓"；[1] 西周标本选自1972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的西周墓葬M2，以下简称"灵台西周墓"；[2] 春秋标本选自1978年在山东滕州市薛国故城附近发掘的春秋墓葬M2，以下简称"滕州春秋墓"；[3] 战国标本选自1980年在陕西凤翔县西村战国墓地发掘的车马坑M118（= S1），以下简称"凤翔车马坑"。[4]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套工具和古代舆服制度有关，灵台西周墓发掘简报正确地将它们和《管子》所说造车工具相联系，并分析说："春秋时期，行军作战的车必须携带一套修理工具，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M2第三层车马器和工具共存，可能也是这种作用。"[5] 凤翔战国墓地所出青铜工具则直接葬于车马坑中。发掘简报分析说，它们"当是以备随时修车之用"。[6] 这些研究和分

---

〔1〕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33页。

〔2〕初仕宾：《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99～129页。

〔3〕山东济宁市文物管理局：《薛国故城勘查和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472～474页及图一五·12。

〔4〕李自智、尚志儒：《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8～35页。

〔5〕初仕宾，前揭文，126页。

〔6〕李自智、尚志儒，前揭文，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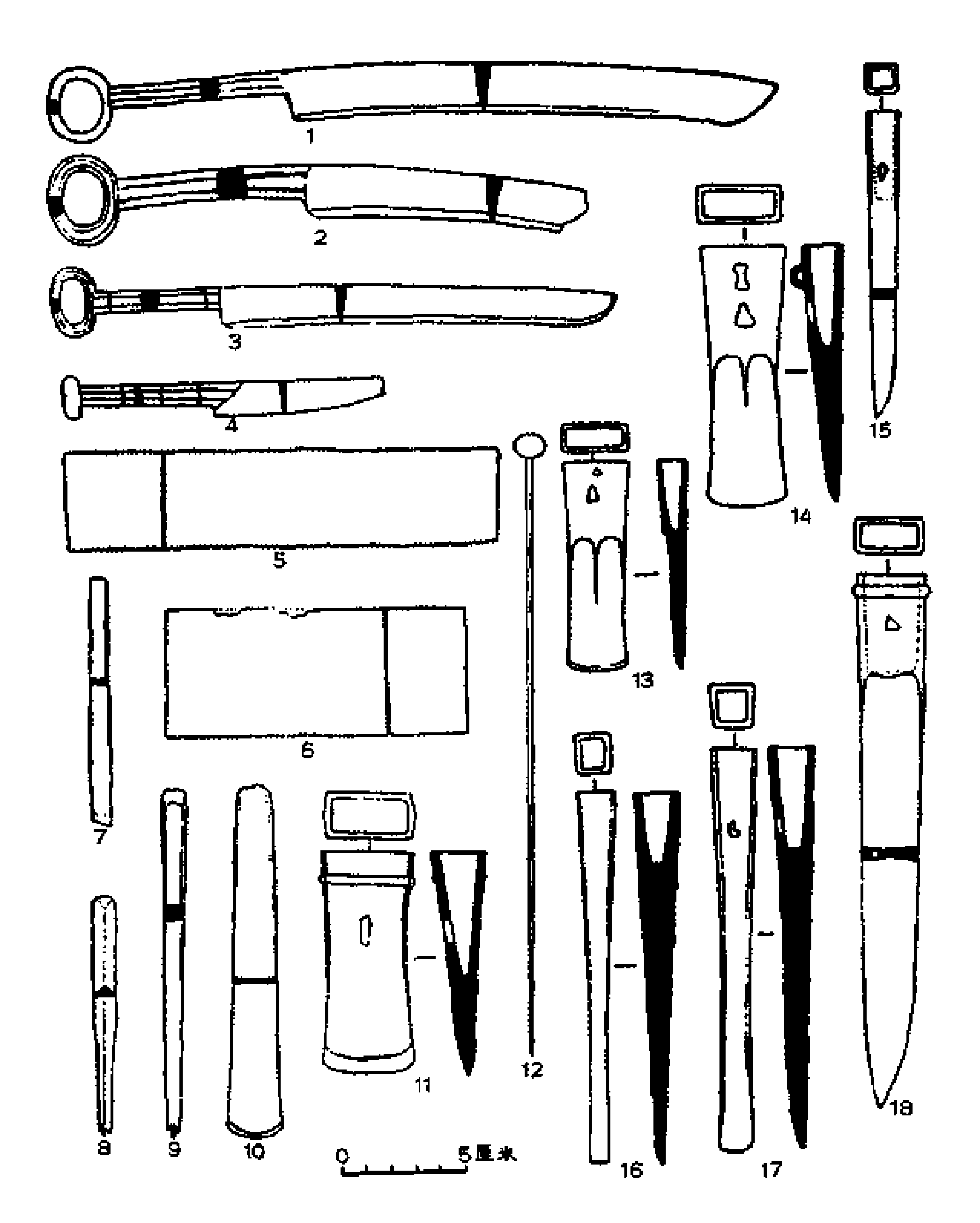


插图 9　山东滕州薛国春秋墓随葬的造车工具

1. Ⅰ式削刀(M2:44) 2. Ⅰ式削刀(M2:26-1) 3. Ⅱ式削刀(M2:22) 4. Ⅲ式削刀(M2:51) 5、6. 锯(M2:46、M2:47) 7. Ⅰ式刻刀(M2:43-1) 8. Ⅱ式钻(M2:131) 9. Ⅰ式钻(M2:130) 10. Ⅱ式刻刀(M2:45-1) 11. 斧(M2:6) 12. 刻针(M2:39-1) 13、14. 锛(M2:7-2、M2:7-1) 15. Ⅱ式凿(M2:38-2) 16、17. Ⅰ式凿(M2:35、M2:36) 18. Ⅱ式凿(M2:38-1)

析都是正确的。但是确切地说，这套青铜工具应是作为车舆的替代物随葬墓中的，实乃先秦车舆随葬制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研究者对这些青铜工具的定名不尽相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我们对各种工具定名问题重新作了研究，结论如表一所示。[1]

表中四组造车工具均未留下柯的痕迹，但是近年在内蒙古克什克滕旗龙头山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前 1000—前 300 年）墓葬内发现一例，我们将和斧一起讨论柯的问题。下面结合文献，逐一讨论表一所列造车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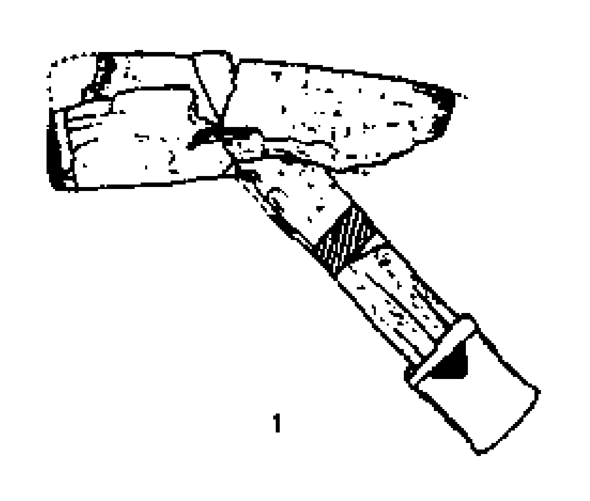
表一　先秦时代四组造车工具定名对照表

古称	盘龙城商墓	灵台西周墓	滕州春秋墓	凤翔车马坑
1. 斧/斨	一斨(2:17)	一斧(2:39)	一斧(2:6)	一斧(118:12)
2. 斤	一锛(2:64)	一锛(2:40)	二锛(2:7-1 和 2)	一锛(118:15)
3. 削/锂/锜	一削(2:6)	一削(2:38)	四削(2:22、44 和 51 等)	一削(79M43:1)
4. 凿	一凿(2:72)	一凿(2:41)	二 I 式凿(2:35 和 36)	一凿(118:32)
5. 銶			二 II 式凿(2:38-1 和 2)	一凿(118:24)
6. 锯	一锯(2:69)		二锯(2:46 和 47)	
7. 鉏/鉏铻		二 U 形器(2:56)		
8. 锥		一锥(2:42)	二钻(2:130 和 131)	一钻(118:9)
9. 钻			一刻针(2:39-1)	一镞(118:10II2)

1. 斧（附柯）

表一第 1 项所列四把青铜斧（斨）的年代跨度很大，但它们

[1] 第一栏的器名是我们对这些工具的定名，第二～五栏的器名是原发掘报告对这些工具的称谓。器名后带比号的数字为发掘报告中器物原始编号。其中比号前为墓号，比号后为器物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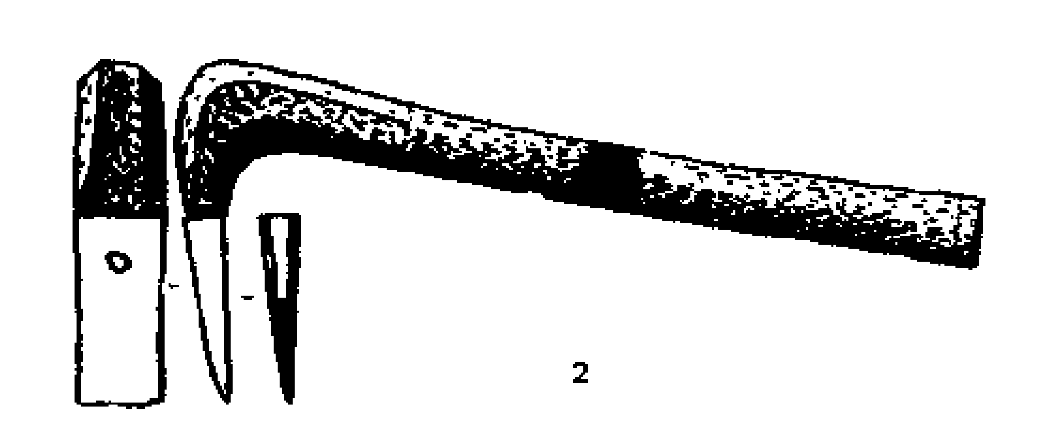


插图 10　1 内蒙古龙头山夏家店上层墓葬出土斧柯；
2 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斤欘

的基本形态几乎没有变化。灵台西周墓简报介绍说：标本“2:39，长方銎，双面弧形刃，长 12.5、宽 4 厘米，后侧一鼻纽”。文献对斧的形态和用途有详细描述。《说文·斤部》说：“斧，所以斫也。从斤，父声。”《释名·释用器》说：“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那么古今斧的用途完全一样，都是伐木工具。不过从甲骨文“斧”的象形文字看，先秦斧与现代斧不尽相同。大概出于节省青铜材料方面的考虑，先秦匠人将斧柄设计成锄状，仅在斧首安装青铜斧头。所以先秦青铜斧头都设计成

空首銎。先秦斧头又分为空首方銎和空首椭圆銎两类。《诗经·豳风·破斧》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传:“隋(椭)銎曰斧,方銎曰斨。”《说文·斤部》亦曰:“斨,方銎斧也。”因此盘龙城商墓简报将这种空首方銎斧定名为“斨”是正确的。古人似乎对斧、斨并不严格区别。《三代吉金文存》卷二十著录了三把春秋晋国郘大叔斧。这种铜斧为空首方銎,本该称“斨”,但是铭文却自称为“貳车之斧”。无论如何,表一所列四件空首方銎的青铜工具就是《司马法》等书说的第一件造车工具“斧”。

斧柄古称“柯”,其名屡见于文献。《豳风·伐柯》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毛传:“柯,斧柄也。”《国语·晋语八》韦昭注:“柯,斧柄,所操以伐木。”《说文·木部》曰:“柯,斧柄也,从木,可声。”故知柯为木制斧柄。据文献记载,斧柯兼有量具功能。《考工记·车人》郑玄注:“柯长三尺,谓斧柄,因以为度。”同书贾公彦疏:“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柯是木制品,不易保存至今。前人都是通过《考工记·车人》的记述来揣摩柯为何物。我们今天能够较为深入地了解柯的形制,归功于90年代考古最新发现。

1990年,内蒙古克什克滕旗龙头山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发掘出一把残存木柄的青铜斧。据发掘者介绍:“这件Ab型扇刃斧的木质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斧与手柄间的连杆,系扁方体木条,下端较薄,与斧銎套接,上端变厚,与手柄斜向榫接。杆长9.8、宽2.8、厚0.9—1.3厘米。手柄部分由粗渐细,截面大致呈半椭圆形。柄面圆滑并略有弧度,粗头平截,细头略残。柄长17.2、宽2—4.5厘米。”[1] 显然,这把木制斧柄就是先秦文

[1] 齐晓光:《夏家店上层文化空首青铜斧及相关问题》,收入李逸友等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319~320页。

献所谓"柯"。《广雅·释器》曰:" 纵谓之斤。"王筠《说文句读》曰:"斤之刃横。"也就是说,斧刃与斧柯平行,纵向安装;斤刃类似于锄,十字交叉横向装在斤柄上面。商周斧斤有时在侧面或正面铸造一耳或双耳,以便系绳加固。斧耳一律铸在斧头两侧,而斤耳一般铸在正面中间部位。凡此表明,斧刃必与斧柯平行安装,斤刃必与斤柄交叉安装。龙山头出土的斧柯实物证明了这一点。

据《考工记·车人》,柯是车匠造车时测量尺寸的标准量具,车轮的直径、车箱的尺寸均以柯为计量单位。所以柯必须按照一定规格来制作。《考工记·车人》说:"车人为车,柯长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首。"意思说:车匠造车用的斧柯有标准尺寸。柯身长三尺,宽三寸,厚一寸半。车匠把柯身长度等分为五份,用其中一份的长度作为柯首的长度。[1] 据殷墟出土古尺,殷代一寸约合今1.58厘米,殷代一尺约合今15.8厘米。那么柯的标准尺寸是:柯身的长度约合今47.4厘米,宽度约合今4.74厘米,厚度约合今2.37厘米;而柯首长度为柯身长度的五分之一,约合今9.48厘米。《考工记·车人》的柯首相当于龙山头古墓所出斧柄的连杆部分。据测量,这件斧柄的连杆长约9.8厘米,这与《考古记·车人》所记柯首长度9.4厘米仅相差0.4厘米。若按柯首长度为柯身的五分之一推算,龙山头这件斧柯原来的身长应是49厘米(9.8×5)。由于年久木朽,出土时其身长仅残存17.2厘米。

另一方面,柯还是造车时测量角度的量角器。《考古记·车

---

[1] 闻人军对这段文字有详细考证,但他把"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首"解释为"以柯长的五分之一作为斧刃的长度"似有误。参见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99页。

人》说："车人之事。半矩谓之宣，一宣有半谓之欘，一欘有半谓之柯，一柯有半谓之磬折。"意思说：车匠测量角度的方法是：矩角(90°)的一半作为宣角(45°)；宣角加上宣角的一半作为欘角(67°30′)；欘角加上欘角的一半作为柯角(101°15′)；柯角加上柯角的一半作为磬折角(151°52′30″)。磬是中国古代流行的一种成套的石质打击乐，或称"编磬"。磬折角指编磬顶角的角度。不过《考工记·磬氏》对磬折角还有另一说法。文中说："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那么磬折角的倨句值或为"一矩有半"，相当于今135°角。从出土实物看，古代编磬顶角的倨句值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接近《考古记·车人》的磬折角151°52′30″，另一类接近《考工记·磬氏》的磬折角135°。[1] 清儒程瑶田将《考古记·车人》的磬折角"一柯有半"擅改为"一矩有半"显然不行。[2] 根据实测，龙山头出土斧柯的"连杆与手柄斜向榫接，与手柄大头形成130度的夹角"。我们怀疑，龙山头这件青铜斧的柄与连杆之间的角度原来可能是135°角，也就是《考工记·磬氏》所言"一矩有半"的磬折角。由于年久木朽，这个角度有点变形。至于这件斧柯为什么采用磬折角？目前尚不十分清楚。据《周礼·考工记》，磬折角不单用于磬匠制磬，还广泛应用于琿人制鼓、车人制耒以及农人挖渠。值得注意的是，"一矩有半"的磬折角很容易和柯角进行换算，相当于"一柯有三分"，或说柯角(101°15′)加柯角的三分之一(33°45′)。也许制斧者试图使这把斧柯能够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古代工艺制作，所以采用磬折角(135°)，而

---

〔1〕 此据闻人军调查，说见闻人军前揭书，146～147页。

〔2〕 程瑶田(1725—1814)：《阮中丞寄示李尚书之〈考工记〉郑氏磬图第一、郑氏求磬倨句图第二、县磬图第三凡三图率尔书后》、《考工记创物小记》，收入《皇清经解》卷一二五至一二六。

没用斧柯本该采用的柯角(101°15′)。

2. 斤(附欘)

文献对斤的形态和用途有详尽的描述。《说文·斤部》说:“斤,斫木斧也。”段玉裁注:“凡用斫物者皆曰斧。斫木之斧则谓之斤。”按照这个说法,斤的形态类似斧,专用于木材加工。正如陈梦家指出的,现代木工工具中的锛相当于古代的斤。[1]那么表一第2项所列四件“锛”均应正名为“斤”。灵台西周墓简报介绍说:标本“2:40,梯形銎,单面弧刃,后侧一鼻纽,长10、宽3厘米。”关于斤的用途,《释名·释用器》说:“斤,谨也。板广不得削,又有节,则用此斫之。所以详谨,令平灭斧迹也。”那么斤是对原木进行粗加工的工具。比较表一罗列的标本不难发现,斧、斤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在刃部。斧的用途是伐木,切断木材,所以斧双面开刃;斤的用途是将原木加工成材,所以斤单面开刃。正如前文讨论的,斧斤开刃不同,装柄方式亦当有别。《说文·金部》曰:“鉏(锄),立薅斫也。”段玉裁注:“薅者,披去田草也。斫,斤也。斤以斫木……今俗作锄。”《国语·齐语》韦昭注:“斤,形似鉏(锄)而小。”由于斤刃横向装在斤柄上,所以注家说斤的外形和农具锄相似。

陈梦家先生早年将斤柄称作“柲”似有误。[2]先秦文献所谓“柲”实际指兵器的柄,如戈、戚、战斧的柄皆可称“柲”。文献对斤柄另有专称。《管子·小匡》说:“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欘,试诸木土。”这里说的“欘”即指斤柄而言。《说文·木部》说:“欘,斫也……一曰斤柄,性其

---

〔1〕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七册,44页。

〔2〕陈梦家,前揭文,28、47~48页。

曲者,从木属声。"甲骨文"斤"的象形字可证斤欘在形式上类似于斧柯,由首与身两部分组成,但是斤与斧的装柄方向和角度均不同。斤柄按欘角安装,故名"欘";斧柄按柯角安装,故名"柯"。据《考工记·车人》,欘角相当于现代角度67°30″。那么斤欘的首与身之间的夹角呈67°30″。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M1出土一件完整的斤欘,但在发掘报告中被称作"锛"。报告介绍说:"锛一件。标本1—705,铜质。长6.5、宽2.9—3.1、上部厚1.5厘米,单面刃,正面上部中间有一銎眼,长0.6、宽0.5厘米,銎眼中钉以竹钉,将锛头固定于柄上。锛有长方形銎口,长2.5、宽0.8、深3.1厘米。柄为木质,头端弯曲,出棱,柄身为一圆棍。长28.0、直径2.1—2.4厘米。"[1] 据该报告的图版和线图,这件斤欘的首与身的夹角基本呈67°30″,可见《考工记·车人》说斤按欘角安装是有根据的。从出土实物看,斤欘的首与身是在同一块木头上加工出来的。这和斧柯用榫卯连接首与身不同。长台关的斤欘和一套文具共出,似为制作竹简的文具之一。既然斤欘是古代各类工匠普遍使用的工具,那么造车、建房和制简用的斤欘可能会有大小之别,但基本形制无疑大同小异。

3. 剘(梩或锜)

注家或谓梩为插。[2]盘龙城商墓确实发现插与造车工具共存。但插是古代取土开渠工具,难以和造车相联系。古文

---

〔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64~65页,图四四·3。

〔2〕《周礼·地官·乡师》孔颖达疏:"云一梩者,或解以为插也,或解以为锹也。锹、插亦不殊。"

椳、锜、饥可通假。《史记·周本纪》记文王受命四年“败耆国”，此耆国在《尚书·西伯戡黎》称“黎国”，在《史记·殷本纪》中称“饥国”。《豳风·破斧》毛传说“凿属曰椳”并无实据。造车工具中的“椳”和“锜”疑即古代木工刮削工具“剞”。《说文》曰：“剞劂，曲刀也。”《考工记·筑氏》称剞为“削”。文中说：“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尚书·顾命》正义引郑玄注：“曲刃刀也。”《汉书·扬雄传》注引应劭曰：“剞，曲刀也。”《淮南子·叔真训》高诱注：“剞，巧工钩刀也。”陈梦家援引上述文献详考“剞”就是木工刮削工具曲刃削刀。[1]其说甚是。灵台西周墓和滕县春秋墓的削刀和造车工具一起随葬，说明造车工具中的“椳”或“锜”实际上就是木工刮削工具“剞”。从功能看，剞是和斤配合使用的木材深加工工具，车轮的辐条就是用这种工具加工而成。

4．凿(附枘)

《楚辞·九辩》曰："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从。"意思是说：方形的凿把难以装在空首圆銎的凿头上。故知古今凿的样子类似，都有凿柄"枘"。所以凿是一种带銎的青铜工具。河北藁城台西商墓 M17 的一把青铜凿尚存凿柄残迹，也就是文献说的"枘"。[2]从出土实物看，古今凿的样子没有太大变化。现代凿和锤配合使用，用于木材开卯。《墨子·备城门》说："门者皆无得挟斧、斤、凿、锯、椎。"其中"椎"相当于今天的锤，汉代称"槌"。《论衡·效力》说："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可见古今凿

〔1〕 陈梦家，前揭文，47页。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24页，图七三·5。

的操作方法相同，和锤配合使用，造车工具的凿亦然。表一第4项所列四把青铜工具都有安装“枘”的空首方銎，无疑即是造车工具中的凿。

5. 銶

銶究竟为何物，史无明载。《豳风·破斧》曰：“既破我斧，又缺我銶。”毛传：“[銶]，《韩诗》曰凿属也。”那么銶应是凿一类的工具。表一所列造车工具中有两种凿：一为平刃，另一为曲刃。据前文讨论，平刃凿相当于造车工具中的凿，那么曲刃凿大概是文献说的“銶”。《汉书·扬雄传》注引应劭曰：“剞，曲凿也。”《淮南子·叔真训》高诱注：“剞者，规度刺画墨边笺也。所以刻镂之具也。”故知曲刃凿曰“剞”。銶，剞读音相近，或指一器。滕州春秋墓简报介绍这种凿说：“II式[凿]：二件(M2:38)，体扁平，中部内凹，单面刃。M2:38－1，长方形銎，銎部有一周突棱，突棱下有三角穿。长22厘米。”类似的青铜工具还见于凤翔车马坑(编号80M118:24)和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M3随葬的造车工具(编号3:29)。[1]《释名·释用器》说：“斫有高下之迹，以此鐁弥其上而平之也。”《集韵》说：“鐁，平木器。”据孙机先生考证，鐁是一种双刃、装木柄的刮刀，或称“削”。《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削，两刃句刀也。”从孙机罗列的春秋至汉唐鐁的实物标本看，鐁的形制和我们讨论的“銶”十分接近。[2]故疑“銶”也许是“鐁”的古称或别称。总之，表一第5项所列青铜工具应与《管子·轻重乙》所言造车工具的“銶”相关。

---

[1]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254页。

[2] 孙机：《我国古代的平木工具》，《文物》1987年第10期，71～72页。

6. 锯

相传锯为春秋时鲁国工匠鲁班发明，但考古资料可证其说不确。因为商代遗址已发现锯，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墓出土过一把刀式锯。[1] 盘龙城商墓随葬的造车工具中也有锯，但简报未附线图或图版，仅用文字描述说："锯，一件（李 M2:69），背内凹，刃有齿。"盘龙城的锯似属锯的早期形式刀式锯。[2] 滕县春秋墓出土的双刃青铜锯片为研究春秋时期流行的锯提供了实物标本。据简报介绍，这两个锯片呈"长方形薄片状。M2:46，两侧边都有锯齿，一边为斜齿，一边为正齿。长 17.6、宽 4、厚 0.2 厘米。M2:47，一侧边有斜齿，长 12.2、宽 5.2、厚 0.2 厘米。"战国时期仍流行这种双刃锯，山西永济薛家崖曾出土一例。据马承源分析，这类锯的木柄，可能夹装在中腰，露出两面锯齿，以便把握使用。[3] 无论如何，表一第 6 项所列青铜工具为研究造车工具中的锯提供了实物标本。

7. 钼铻

先秦墓葬所出造车工具中或伴出一对带六个齿牙的小件青铜器，在灵台西周墓简报中称作"U 形器"。文中说："U 形器，三件。1:70、71，二件，尾端各穿一小孔，背有三对钉牙，长 8.5、宽 5.6 厘米。2:56，圆角，余同上，长 8、宽 5 厘米。"类似的铜器

---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124 页，图七三·8 及图版九·6。

〔2〕 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 年第 2 期，33 页。

〔3〕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43～44 页。

亦见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随葬的一套造车工具，但被称作“马蹄形器”。[1]这类铜器总是和造车工具共存，疑与造车有关。《六韬·军用》曰：“盖重车上板，结臬钼铻。”《楚辞·九歌》曰：“圜凿而方枘，吾固知其钼铻。”《考工记·玉人》孙诒让正义：“钼牙，谓就其剡处刻之。若锯齿然，不平正。”可知钼铻是一种带齿牙的铜器。《司马法》的造车工具表中有“锄”，但《释名·释用具》说：“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如所周知，锄是古代农具，与造车无涉。《司马法》的“锄”想必不是农具锄。锄、钼读音相近，故疑《司马法》的“锄”为“钼”的通假字，也即钼铻或钼牙之“钼”。先秦墓葬中常和造车工具伴出的带六个齿牙的铜器或许是“钼铻”或“钼牙”。我们甚至怀疑钼字也许得名于“俎”，后者专指厨师切肉的案板。那么，钼铻可能是木匠工作台上固定待加工木材的一种青铜工具。这种工具往往成对出土，疑为一钼一铻。

8. 锥

锥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工具。《说文·金部》：“锥，锐也。从金隹声。”《战国策·齐策一》：“五家之兵，疾如锥矢。”高诱注：“锥矢，小矢。”从先秦各种镞的实物看，锥矢指三棱箭头。那么古代造车工具中的“锥”似为一种锐利带棱的钻刺工具。灵台西周墓简报将“断面三棱形”的工具定名为“锥”是正确的。虽然表一第8项所列“钻”的形式各异，但都是三棱钻刺工具，应即文献所列造车工具表中的“锥”。除三棱锥外，考古资料中也有截面呈四棱或圆形的铜锥。古代铜锥一般要镶嵌在木柄或骨柄上使用。新疆巴里坤南湾青铜文化墓地发现过一把镶嵌在木柄上的四棱

---

〔1〕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257～258页，图一八·1。

铜锥，全长7厘米左右。[1] 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所出铜锥“木柄表面髹漆，柄的近锥一端缠绕细丝线，排列紧密。残长9.8、柄长9.4，上径2.8、下径1.5，锥径0.3厘米。”这两件木柄铜锥为了解古代铜锥形制及其装柄方式提供了实物标本。

9. 钻

钻也是非常古老的工具，用于钻孔或取火。《管子·轻重戊》曰：“燧人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新石器时代流行石钻，到青铜时代被青铜钻取代。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过两枚铜钻（编号T4:7和T3:7），说明铜石并用时代已有铜钻。这种工具由钻弓和钻杆两部分组成，钻头装在钻杆的一端，操作时用钻弓的弦带动钻杆打孔。近现代修瓷器的工匠仍用这套工具在瓷器上打孔。钻弓和钻杆一般为竹木制品，不易保存至今。但是青铜时代的钻头往往为青铜制品。凤翔车马坑曾发现一例，可惜误作“镞矢”。从凤翔车马坑简报所附线图（图十六·2）看，这枚镞其实是青铜钻头。滕州春秋墓所出“刻针”和凤翔车马坑的青铜钻大同小异，估计也是《管子·轻重乙》所列造车工具中的“钻”。

二、中国造车工具之起源

据上节讨论，早在商文化二里岗期长江流域盘龙城墓葬已

[1] 火烧沟骨柄铜锥见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收入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102页所附四坝文化分期图；巴里坤木柄铜锥见羊毅勇：《新疆的铜石并用时代》，《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40页。

开始随葬造车工具。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盘龙城的商文化实际上来自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早商墓葬中经常随葬这套造车工具。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墓 M14 有一斧、一斤、一剞、一凿、一锯；M17 有一斧、一剞、一凿、一锥；M103 有一斤、一剞、一凿。[1] 目前所见黄河流域商代遗存中，山西平陆县前庄二里岗下层遗存所出造车工具年代最早，估计年代可达公元前 1600 年左右。[2] 殷墟妇好墓随葬的造车工具规格最高，计有三斧、六斤、二剞、三凿、二锥、二钻。[3] 如何随葬这套工具，遵循一定的礼制，而古代礼制的建立是一个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这将导致表一所列造车工具的组合存在差异。总之，借用造车工具表现车舆随葬的礼制至迟在公元前 1600—前 1400 年已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全面实施。199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在郾师商城发现商代早期双轮车的辙印。[4] 这个发现可与本文考订的早商时期的造车工具相印证，说明商王朝建立之初造车手工业已在中原兴起。

先秦文献所言造车工具起源甚早，不仅见于商文化二里岗

---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124 页，图七三·5—7；132 页，图七九·5—7；147～148 和 157 页墓葬说明。我们对若干器名作了修订。

〔2〕 卫斯：《平陆县前庄商代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季刊》（太原）1992 年第 1 期，18～19 页，图版贰·5。报告根据伴出的陶鬲将这批铜器归入二里岗上层文化。承蒙我的同事孙华告知，前庄商代遗址的陶鬲和铜器不是一个时期的东西。铜器属于二里岗下层文化，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商器。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100～102 页，图版六四·1—10。我们对原报告的器物定名作了若干修正。报告没提到锯，但 101 页提到妇好墓出有"刀二十三件，大多成碎片。"商代或把刀刃做出锯齿作锯用，故疑其中或许有锯。

〔4〕 杜金鹏等：《郾师商城东北隅考古发掘新收获的学术意义》，《中国文物报》1996 年 12 月 29 日第 2 版。

下层文化遗存，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史传说中的夏代。尽管目前学界对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尚存争议，但大量事实表明，以二里头遗址第1—4期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早期青铜文化和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

80年代初，严文明和张忠培对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器作过两次综合调查。他们罗列二里头文化和东下冯类型遗址墓葬所出青铜器10余种，计有铜爵、铜锛、銎内戈、直内戈、铜凿、铜锥、铜刀、铜镞、铜鱼钩、铜铃等。[2]尔后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种类陆续有新的发现。例如：1980年在河南郾师二里头遗址IIIM2发掘出镂孔刀柄的环首刀；1984年在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发掘出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青铜牌饰。[3]二里头上述青铜器构成丰富多采的夏文化铜器群。

耐人寻味的是，夏代铜器群不仅有文献所言车战五兵"矛、戟、钺、盾、弓矢"，[4]而且有整套造车工具，例如：空首铜斧(=东下冯铜斧石范H501:1之1-4)、铜斤(=铜锛/III.T212F2:10)、铜剞(=铜刀VH51:2和东下冯T1022:4:19)、铜凿(VT7E③:11、东下冯铜凿石范/T5501:3D:18、东下冯铜凿/

[1] 邹衡：《夏文化研讨的回顾与展望》，《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1～12页。

[2]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43页；张忠培：《中国早期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收入《中国北方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31～239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0年秋河南郾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图十·9；张德勤等编：《中国文物精华199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247页及彩版87。

[4] 此据《谷梁传·庄公二十五年》范宁注。关于古代车战五兵的详细讨论，参见孙机：《中国古代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21页。

T4423:3C:12 和 H9:17)、铜锥(VH66:1)等。[1] 东下冯遗址第3期文化堆积出土的空首铜斧石范相当重要,它的显著特点是铜斧中央有一道竖线突纹(参见插图 11:1)。这道竖线突纹在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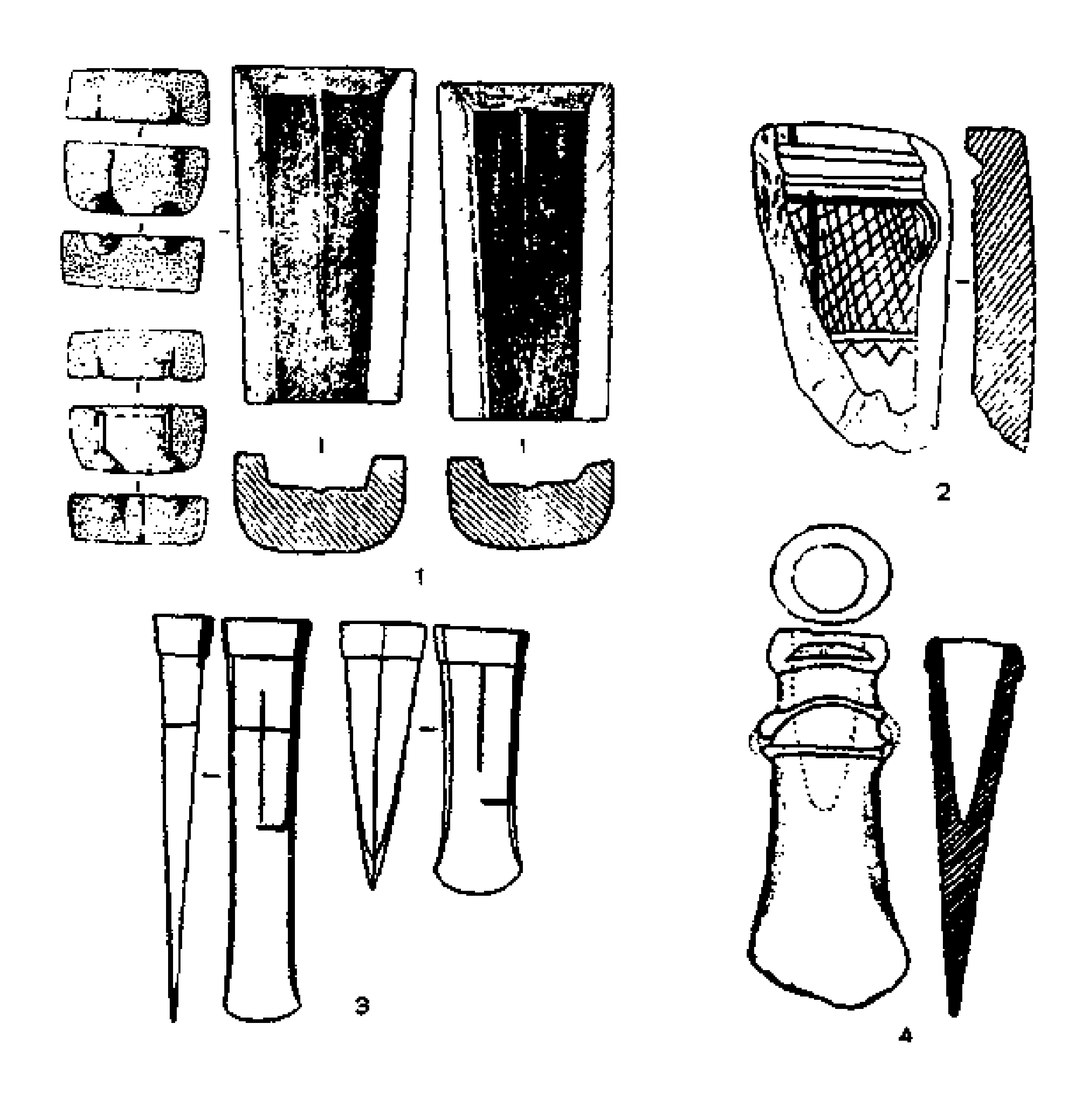


插图 11　公元前 2000—前 1800 年左右中国流行的空首铜斧和铸造空首铜斧石范

1. 东下冯遗址出土空首铜斧石范;2. 朱开沟遗址出土空首铜斧石范;3. 河南出土空首铜斧;4. 新塔拉出土空首铜斧

[1] 东下冯资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县东下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商同类铜斧上改为十字线突纹(参见插图 11:3 左),因而将夏代铜斧与商代铜斧清楚地区别开来。《内蒙古长城地带》曾著录一件用东下冯类型石范铸造的青铜斧(编号 C.20),据说出自河南(参见插图 11:3)。[1] 前文讨论的山西平陆县前庄二里岗下层遗址所出青铜斧也属于这个类型。东下冯的发掘品首次证明这种铜斧属于二里头文化,始见于二里头文化第 3 期。那么,以空首斧为代表的造车工具至迟在公元前 1800 年左右已在夏王朝统治中心地区流行。

据我们调查,这套造车工具中铜斧的最初形式是一种双耳铜斧。30 年代法国神甫桑志华在内蒙古八苏木城采集到一件,后来入藏天津北疆博物馆。[2] 70 年代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在鄂尔多斯又采集到一件。据田广金介绍,这件铜斧器身呈长条形,断面为椭圆形。上有椭圆形銎口,外缘有凸棱,两侧有环形耳。在左右两侧中间有凸起的铸缝,弧形刃。长 10.9 厘米、宽 4.8 厘米。他还分析说,双耳铜斧应比商周时期的单耳铜斧年代早,可能相当于商代晚期。[3] 80 年代内蒙古朱开沟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双耳铜斧的年代有了新认识。虽然朱开沟遗址未直接发现双耳铜斧,但是发掘出铸造带耳铜斧的残石范(编号 T102②:1)(参见插图 11:2)。这个石范用滑石刻成,残长 8.9 厘米,右

---

[1] 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内蒙古长城地带》,东京和京都:东亚考古学会,1935 年,第二篇附录《北支那青铜利器集成图》图 C.20。

[2] E. Licent, *Les collections néolithiques du Musée Hoang ho Pai ho de Tien Tsin*, Tian Tsin: Publications du Musée Hoang ho Pai ho de Tien Tsin, No.14, 1932, Pl.110-1;并见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绥远青铜器》,《内蒙古长城地带》第二篇,东京和京都:东亚考古学会,1935 年,6~7 页。

[3] 田广金和郭素新:《鄂尔多斯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40~43 页。

侧有一半环小耳,左侧石范已残。不过从斧范中央有一道竖线突纹看,似为鄂尔多斯流行的带对称双耳的铜斧石范。据简报介绍,这个残范出自朱开沟遗址第5段文化层,相当于商文化二里岗上层阶段,至迟不会晚于殷墟一期。[1] 正如田广金指出的,单耳铜斧是双耳铜斧的一种简化形式。1974年河南灵宝东桥商墓资料证明单耳铜斧与二里岗上层青铜礼器有明确的共存关系。[2] 那么单耳铜斧的前身双耳铜斧流行年代不迟于商文化二里岗晚期。朱开沟遗址所出斧范中央带有竖线突纹,这是夏代铜斧的特征,其年代有可能早于商代。无论如何,公元前1600—前1400年左右双耳铜斧已在鄂尔多斯草原流行。

7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研究这套青铜造车工具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其一,80年代初甘肃广河齐家坪齐家文化遗存出土了一件双耳空首铜斧。据报道,这件铜斧为空首长方銎斧。斧长15、刃宽3.2、头宽4、厚3.1厘米。銎内仍残存柯的断茬。斧头两侧有对称的两个半环形耳,一面还有铸成的对称三角形花纹,器身厚重,是用多块范铸成的,两边有合范的铸痕。据成分测定,这件铜斧是红铜制品。[3] 不过从铸造工艺采用组合铸范看,它的工艺技术相当先进。目前学界对齐家文化年代下限最保守的估计是公元前1900年左右,齐家文化晚期已有许多青铜器,那

---

[1] 田广金:《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327、330页。

[2] 杨育彬:《河南灵宝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考古》1979年第1期,20～22页。

[3]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278－279页;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39页;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299页。

么齐家坪所出双耳红铜斧至少是齐家文化中期的产物，约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

其二，1976 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在河西走廊西端玉门市火烧沟发现一处早期青铜文化墓地，共清理墓葬 312 座。其中随葬铜器的墓多达 106 座，出土斧、镢、镰、凿、刀、匕、矛、镞、锥、针、泡、钗、管、锤、镜等铜器凡200余件。火烧沟墓地的年代相当于齐家文化后期，大致与夏代同时。在最初的报道中，这个墓地被称为“火烧沟类型的文化”。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个墓地的文化性质属于以前在甘肃山丹四坝滩发现的所谓“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发掘报告尚未发表。从一些零星报道可知，火烧沟墓地出土铜斧中有夏文化东下冯类型和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所见空首铜斧。四坝文化陶器类型学和碳$_{14}$数据的全面分析表明，火烧沟墓地大致在公元前2000—前1800年左右。据分析，火烧沟的空首铜斧属于四坝文化五个发展时期的第 4 期。四坝文化第 4 期墓葬所出骨柄铜锥亦见于中亚草原奥库涅夫文化（约公元前2000—前1800年）。[1]在青铜工具上安装骨柄是中国西部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一个特征。1976 年甘肃临夏莲花乡魏家台子齐家文化遗址曾出土骨柄铜刃刀。[2]凡此表明，火烧沟四坝文化空首铜斧的年代当在公元前 1900 年左右。

其三，1979 年新疆和硕县博斯腾湖北岸新塔拉遗址早期文化堆积中发现一件空首青铜斧，通高 17.3 厘米，弧刃，空心圆

〔1〕 马克西缅科夫著、林沄译：《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参考资料》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年，84～85 页，图一·2。

〔2〕 田毓璋：《甘肃临夏发现齐家文化骨柄铜刃刀》，《文物》1983 年第 1 期，76 页。

銎，銎径3厘米，深8厘米。斧身上端有三道棱脊，两侧有一对半环小耳，残重997克(参见插图11:4)。后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掘，确认该遗址属于新疆早期青铜文化遗址，现被命名为新塔拉文化。[1] 据我们观察，这个遗址的考古文化明显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文化的石臼和陶器亦见新疆阿尔泰地区克尔木齐墓地早期遗存，后者文化面貌和奥库涅夫文化非常相似，应属同一时期。据碳$_{14}$测定，新塔拉遗址早期遗存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835至前1445年间，[2] 这和奥库涅夫文化年代下限接近。新塔拉双耳铜斧或许产生于这个时期。

其四，90年代中亚青铜文化考古最新发现，使我们对60年代初新疆伊犁河流域特克斯县铁里氏盖出土的一组窖藏铜器的年代有了新认识。特克斯窖藏铜器是1961年当地乡民挖水渠时，在距离地表约3米以下地层中发现的，计有残铜斧、残铜锥、剑或刀的残铜柄、牛头饰、月牙饰物、素面铜镜等14件铜器和一个重达5公斤的铅球。除残铜斧可能为青铜器外，其余13件铜器均为红铜制品。[3] 特克斯窖藏铜器中的牛头权杖头颇具时代特征。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第4期墓葬所出四羊青铜权杖头的材料和制作技术均比这个红铜牛头权杖先进。[4] 那么特克斯窖藏铜器群的年代至迟在四坝文化第4期(约公元前

[1] 吕恩国:《和硕新塔拉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399～407和476页。

[2] 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收入《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51～152页。

[3] 王炳华:《特克斯县出土的古代铜器》,《文物》1962年7—8期合刊,114～116页。

[4] 1994年这个青铜权杖送到日本大阪展览,彩色照片刊于展览目录《ツルケロードのまもり——その埋もれた记录》,大阪府立近つ飞鸟博物馆,1994年,图版9—2。

1800年)以前。我们这样认为,还考虑到这个窖藏铜器中的素面铜镜年代甚早。据报道,特克斯窖藏铜器中的两件素面铜镜为"红铜质,遍体绿锈,直径分别为13、10.5,厚分别为0.2、0.3厘米,中间微见下凹。"1989年美国哈佛大学和土库曼斯坦联合考古团曾在马尔吉那早期青铜文化墓地40号墓发掘出和特克斯铜镜形制几乎完全相同的素面铜镜。马尔吉那的素面铜镜为青铜质,圆形,微内凹,直径14、厚0.3厘米,重约195克。镜边带有厚约0.5厘米、截面呈三角形的镜棱。[1]这座墓的碳$_{14}$年代(经树轮校订)约在公元前1994年左右。[2]据发掘者介绍,这种类型的铜镜是中亚早期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屡见于阿富汗、土库曼斯坦青铜文化遗址和墓葬以及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铜镜出自齐家文化晚期墓葬,青海贵南尕马台和甘肃广河齐家坪各出一件。齐家文化的两面铜镜为青铜质,制作技术相当先进,中央铸有一桥状纽,尕马台铜镜的背面还铸有七角星图案。[3]那么无论从材料还是制作技术看,特克斯的红铜镜都显得比马尔吉那无纽素面青铜镜和齐家文化晚期带纽铜镜的年代早。据报道,新疆吐鲁番艾丁湖、阿拉沟和鱼儿沟也出土过无纽、无座的圆形素面铜镜。[4]所以天山南北即便不是铜镜的发源地,也是最早使用这种铜镜的地区之一。

特克斯窖藏铜器中最先进的器物是残铜斧。这个残铜斧为合范铸造,两侧均见上下贯通的范铸痕迹。铜斧上半部残断,残

---

〔1〕 F. Hiebert and D. Killick, "Metallurgy of Bronze Age Mergiana," in: F. Hiebert (ed.), *New Studies in Bronze Age Margiana (Turkmenistan)*, Information Bulletin, Issue 19, 1993, pp. 187~188.

〔2〕 F. Hiebert, 前揭书, 9页。

〔3〕 严文明, 前揭文, 39~40页。

〔4〕 羊毅勇:《新疆的铜石并用时代》,《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41页。

长5.5—6.2、宽5.9—6.9、厚0.2—1.8厘米。这个铜斧的成分没有经过检测,简报说是合金。特克斯窖藏铜器与一个重达5公斤的铅球共存,表明这个铜斧的合金成分可能是铅青铜。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铅青铜是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M99出土的铜环(编号M99:2)。火烧沟四坝文化墓地所出铜器约43‰是铅青铜制品,可见使用铅青铜是中国西部早期青铜文化一个显著特征。[1] 中亚早期青铜时代流行两种不同类型的铜斧,即纳马兹加文化4—5期的管銎铜斧以及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始见流行的空首铜斧。[2] 纳马兹加铜斧的斧刃呈月牙形;四坝文化空首铜斧材料尚未发表,但从齐家文化空首铜斧以及二里头文化铸造铜斧的石范看,这个系统的空首铜斧平面呈矩形,斧刃相对平直。虽然特克斯铜斧上半部折断,但从残留的下半部分看,平面基本呈矩形,斧刃相当平直,当属空首斧类型。

据王炳华研究,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所出木材有深达5—10厘米的砍伐痕迹,这些伐痕非常光洁,非青铜斧所不能。他推测古墓沟人当时使用的伐木工具可能是新疆近年发现的一种蕉叶纹有銎青铜斧。[3] 但是蕉叶纹有銎铜斧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典型器物,流行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因此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古墓沟文化使用的青铜伐木工具究竟是什么值得深究。目前惟一可行的解释是古墓沟人使用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新塔拉早期文化流行的空首铜斧。所以,特克斯

---

〔1〕 黄盛璋:《论中国早期(铜铁以外)的金属工艺》,《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150页。

〔2〕 纳马兹加文化4-5期铜斧参见F. Hiebert and D. Killick,前揭文,187~188页;齐家文化空首铜斧参见严文明,前揭文,39~40页。

〔3〕 王炳华,前揭文,149页。

铜斧的年代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 2100 年左右。

据以上讨论，公元前 2100—前 1800 年左右中国造车工具中最重要的工具空首铜斧已经在天山南北和河西走廊广为流行。空首铜斧在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遗存中并非孤立存在。特克斯铜器群中已有一斧、一剞、一锥。70 年代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在内蒙古朱开沟相当于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地层中发现过青铜锥。[1] 火烧沟四坝文化墓地和空首铜斧伴出的工具还有铜斤（原报道称“镢”）、铜剞（原报道称“刀”）、铜凿、铜锥、铜锤等。[2] 总之，先秦文献所言造车工具的完整组合在公元前 2000～前 1800 年左右已在中国北方草原初步形成，这套工具很快传入夏王朝统治中心地区。为便于今后的研究，我们把殷代以前中国各地发现的造车工具列表于下（符号○表示空首銎类型）：

表二　公元前 2000—前 1400 年中国各地出土造车工具一览表

文化性质	斧	斤	剞	凿	锯	锥	钻	年　代	备　　注
新疆早期青铜文化	○		×			×		2100～1800B.C.	新塔拉和特克斯铜器群
甘肃齐家文化中晚期	○×		×	×		×	×	2100～1900B.C.	齐家坪等地遗址墓葬
甘肃四坝文化第 4 期	○	○	×	×		×		1900～1800B.C.	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
鄂尔多斯早期青铜文化	○	○	×	○		×	×	1800～1500B.C.	朱开沟遗址及采集品
二里头文化第 3～4 期	○	×	×	×		×		1800～1600B.C.	二里头和东下冯遗址
商王朝统治中心地区	○	○	×	×	×	×	×	1600～1400B.C.	郑州南关外铸造遗址等
黄河流域早商墓地	○	○	×	×	×	×	×	1600～1400B.C.	河北藁城/山西平陆商墓
长江流域早商墓地	○	○	×	×	×			1500～1400B.C.	湖北黄陂盘龙城商墓

〔1〕李逸友：《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年，71 页。

〔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年，142～143 页。

如果将中国流行的这套造车工具和巴比伦、印度、埃及、安纳托里亚使用的青铜工具相比较，不难发现它们分属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1] 不同文化系统的青铜工具制造出的战车是否同源，令人生疑。

三、从现代驯化马的故乡和古代岩画看东方古战车发源地

殷代战车用马牵引，所以我们首先得讨论马在中国何时开始驯化。尽管家马在中国古代"六畜"中排名第一，但家马在黄河流域出现的时间晚于牛、羊、鸡、犬、豕等其他家畜。以前曾有人提出龙山文化(约公元前 3000—前 2300 年)饲养的家畜中有马，但是鉴定材料十分零碎，许多标本要么层位不清，要么不能确定是否为家马。[2] 中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马骨或带有砸痕，说明马在当时只是人们摄食的对象。

中亚草原是现代驯化马的故乡之一。公元前 2500—前 2100 年，中亚草原的阿凡纳羡人最早用家畜殉葬，虽然不十分普遍，但是随葬的家畜种类已经包括绵羊、牛和马等。[3] 既然阿凡纳羡人用家马殉葬，那么他们应是中亚最早驯化家马的民

---

[1] 关于欧亚大陆不同文化系统的青铜工具，参见 J. Hawkes, *The Atlas of Early Man* , London: Macmillan London Ltd, 1977。

[2] 周本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畜》,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194~196 页。

[3] 吉谢列夫著、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 年,24 页。

族之一。俄国学者托尔斯托夫注意到，塔里木盆地也分布有阿凡纳羡文化类型的陶器和石器。这批古物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1913—1915年）在新疆叶尔羌河下游绰勒淖尔（Chölköl）南端与斯坦因25号营地之间某遗址发现的。[1] 70年代初，阿凡纳羡类型的陶器再次在新疆奇台县坎儿子遗址露头，包括两件阿凡纳羡类型的蓖纹圜底夹砂黑陶罐及其残陶片和一个石磨盘。[2] 尽管这些材料相当零碎，但是提醒我们注意阿凡纳羡文化不仅可达天山东部山脉，而且越过天山，向南一直分布到塔里木盆地的叶尔羌河下游地区。那么中亚草原的驯化马可能在公元前2500—前2100年间就随阿凡纳羡文化的传入而出现在天山南北了。

除了中亚草原之外，中国北方还有另一个古老的家马驯化中心。美国古生物和古人类学家奥尔森（S.J. Olsen）博士提醒我们注意，中国北方草原无疑是现代驯化马的故乡之一。“早在西域马输入中国之前，原产于中国北方的马早已被大量利用”。[3] 语言学资料支持奥尔森的论点，中国北方草原阿尔泰语系游牧人和西域地区印欧语系游牧人对马的称谓不同。此外，中国北方草原艺术中很早就出现马的艺术形象。1988年，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黄谷屯三星他拉遗址出土了一个动物

---

〔1〕 吉谢列夫，前揭书，30、162页注56；关于这批陶器和石器的详情，参见M.A. Stein,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 p.85 and fig.88。

〔2〕 薛宗正：《新疆奇台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与古墓》，《考古学集刊》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22～24页及图版柒：2。正如南京大学水涛教授指出的，这批陶器实际和阿凡纳羡文化有关。参见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69页。

〔3〕 欧阳志山（S.J. Olsen）撰，殷志强译：《中国北方的早期驯化马》，《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89～91页（原载 *Archaeology*, vol.37-1, 1984）。

纹玉佩，在考古报道中称作"玉龙"。[1] 龙非世间所有，其艺术原形似与马有关。三星他拉的动物纹玉佩既无龙角，亦无龙爪，分明是马的形象。三星他拉遗址属于红山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过一件形制与此相同的玉马，类似的玉马亦见于传世品。既然红山文化时期马已被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对象，那么马在当时已是北方草原古代居民的亲密伙伴。甘肃永靖秦魏家的齐家文化墓地出土家畜遗骸中发现了马骨，火烧沟四坝墓地殉葬的家畜中也有马的遗骸，四坝陶器上绘有形态逼真的彩绘马。[2] 如果说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的玉马不足以证明鄂尔多斯草原已有驯化马的话，那么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古墓殉葬马或许说明公元前2300—前1800年河西走廊的古代居民已经驯化出家马。

古代岩画资料表明，中国北方草原的古代居民很早就驯化了家马，同时他们使用马车的历史也相当悠久。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一个文物普查队在河西走廊西端嘉峪关市西北20公里黑山山谷崖壁上发现一批古代岩画。他们在黑山岩画分布中心地区四道鼓心沟发现一幅单辕双轮车岩画（编号S62）。据简报介绍，"此画在四道鼓心沟中段距沟底5米许高的一方崖壁上，似为一单辕车。前为单辕双轭，中以三个圆圈表示车轮、车厢后拖一物。车通高24、宽16厘米。岩画使用双线减地凿刻成轮廓，刀凿痕迹明显"。[3]黑山岩画年代甚早。据黑山岩画调

---

〔1〕 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第6期，6页转10页，彩版图一。

〔2〕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142～143页。

〔3〕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嘉峪关黑山古代岩画》，《考古》1990年第4期，344～347页。

查报告以及所附图版和线图(参见插图 12:5),岩画上描绘的是一种整木轮单辕双轮车,也即文献说的“椎车”。椎车是中国最古老的车种之一。汉桓宽《盐铁论·非鞅》说:“椎车之蝉攫,相土之教也。”王利器注引张敦仁曰:“椎车者,但一斫木使外圆,以为车轮,不用三材也。”《世本·作篇》提到“相土作乘马”。相土是商王朝开国皇帝成汤的第十一代祖先,殷墟卜辞经常燎祭这位先祖,系夏代历史人物。既然相土所造椎车以马作牵引,那么黄河流域使用马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黑山岩画上那辆椎车后面所拖一物不像牛,更像一匹马。考虑到黑山岩画地处中国最早流行造车工具的考古文化之一——四坝文化分布区,火烧沟四坝墓地殉葬的家畜中有马骨遗骸,四坝文化陶器上绘有形态逼真的彩绘马。所以黑山岩画描绘的马拉椎车完全可能是四坝文化时期的马车。

80 年代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阴山巴音乌拉山谷古代岩画上也发现了马拉椎车。据盖山林介绍,这辆马车为双轮,车轮无辐条,但是有对轴的刻画。两轮间有一车厢,车厢前为单辕双马,右边还有一小马随行(参见插图 12:6)。[1] 既然鄂尔多斯草原是中国最早流行造车工具的地区之一,那么阴山椎车岩画和甘肃黑山椎车岩画属于同一时期。

关于中国早期战车最重要的发现在新疆哈密五堡墓地。这个墓地出土了一个椎车的车轮,直径 79 厘米,轮宽 12 厘米左右。用胡杨木相叠并以榫卯连接而成。中有轴孔,孔径 9.4—10.2厘米,孔内残留有轴。单轮表面有明显使用痕

[1] 盖山林:《阴山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69 页,图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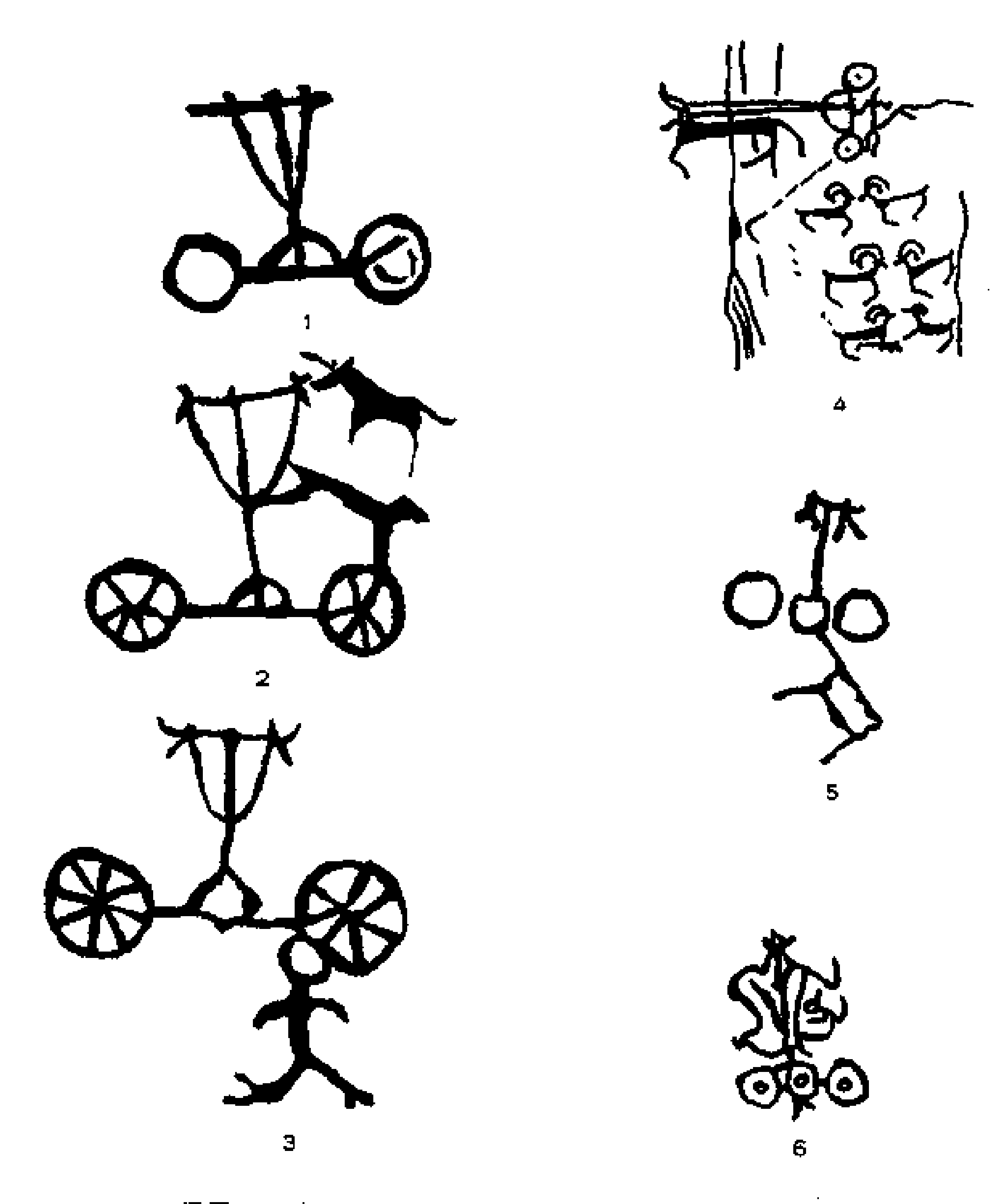


插图 12　中国北方和蒙古草原古代岩画所见椎车和钩车

迹。[1]哈密五堡墓地发掘报告尚未发表。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这个墓地属于新疆东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焉不拉克文化。陶器类型学和碳$_{14}$数据表明，焉不拉克早期文化属于青铜文化，约在公元前1750—前1300年；晚期文化则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约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2]哈密五堡墓地椎车车轮相当原始，似属焉不拉克早期文化。

中国造车工具起源于西北地区，中国家马最早在西北草原驯化，甘肃黑山和内蒙古阴山岩画上绘有中国最古老的车种——马拉椎车，新疆哈密发现中国最早的椎车遗迹。因此，中国战车发源地要在西北草原追寻。文献对此亦有所述。《周礼·地官·乡师》郑玄注引《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孔颖达疏："胡奴车者，胡则北狄是也。"顾名思义，殷代战车是殷人从北方草原俘虏来的工奴设计制造的，故有"胡奴车"之称。《周礼·考工记》记载："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意思说：胡人没有专门的弓匠和车匠，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制弓和造车的人材，而是他们的成年男子个个都能制弓或造车。凡此表明，中国北方草原很早就有发达的造车手工业传统。

夏代的余车在《太平御览》卷七七三中引作"子车"。据李零考证，子车即辇车，指辎重车。[3]古代辎重车一般用牛牵引。

---

〔1〕 王毅民主编：《哈密文物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310页；刘国瑞、祁小山编：《哈密古代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图版048及书末说明。

〔2〕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9页；陈光祖撰、张川译：《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1995年第1期，85～86页。

〔3〕 李零：《司马法译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74页。

除余车外，夏代还有一种名叫“钩车”的战车。《司马法·天子之义》记载：“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礼记·明堂位》曰：“钩车，夏后氏之路也。”郑玄注：“钩，有曲舆者也。”孔颖达疏：“曲舆，谓曲前栏也。”那么夏代钩车是一种车箱前栏呈弯曲状的战车。台湾学者石璋如先生曾将安阳小屯宫殿区 M20 和 M40 出土的殷代战车前栏复原为半圆形。[1] 他对殷代战车的复原方案有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殷墟车马坑的多次科学发掘证明，殷代战车车厢平面实际上均呈长方形。[2] 殷墟卜辞或商周金文从未出现过表现钩车的象形文字，可见钩车的流行年代应在殷代（约公元前 1300 年）以前。

尽管中国北方草原没有发现夏代车迹，但是中国北方和蒙古草原的古代岩画上屡次发现车箱前栏呈弯曲状的钩车。60 年代初，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在戈壁阿尔泰省查干河沿岸阿尔泰山一个狭窄的山谷中发现一组表现钩车的古代岩画（参见插图 12:1-3）。1970 年诺甫戈罗多娃对这组岩画重新作了调查。这位苏联考古学家介绍说：“在查干河峡谷的无数岩画中，大多是匈奴—萨尔马特时代的记号、船棺葬题材和无数动物画面。所有车辆（查干河上只有 3 幅）都位于山崖上最难接近的部位，刻在离山脚 3 米多高的一块突出状石块的水平岩画上。车辆没有套牲口，也没有画赶车人和马匹。尽管岩画十分简略，尺寸又小（最大的为 27×25 厘米，最小的为 10×7.5 厘米），所有主要构件却表现得清清楚楚：单辕条，辕条上的横梁和丫状轭。

〔1〕 石璋如：《殷代的车》，《大陆杂志》第 36 本第 10 期；《小屯四十墓的整理与殷代第一类甲种车的初步复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本下册。

〔2〕 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 年第 6 期，546～555 页。

所有在三部车辆的车厢都成半圆形，位于车轴前方，并似乎与车轴相连接。其中小型车的车轮没有画出辐条，中型车的车轮各有6根辐条，第三部车有8根(左轮)和7根(右轮)辐条。每部车辆的挽具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型车的横梁两端弯向与车厢相对的方向。这三部车辆无疑都属于同一时代。"[1] 查干河谷岩画描绘的三辆车的车厢前栏均呈弯曲状，自然不是匈奴—萨尔马特时代的战车，而是夏代流行的钩车。这幅岩画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东方古战车如何从整木轮椎车向多轮辐钩车演变的具体过程。第一辆钩车使用整木车轮，也即钩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第二和第三辆6—8轮辐钩车则生动反映了钩车从整木轮向多轮辐的历史演变。殷代26轮辐战车大概从这种6—8轮辐钩车发展而来。

80年代初，新疆阿勒泰市乌吐不拉克和多兰特山谷发现4幅古代椎车岩画。据张志尧报道，乌吐不拉克古代岩画上的车舆有两个车轮，无辐条，但在车轮中心均凿有表示车轴的圆点。两轮中间的车厢呈半圆形，车后有一驱牛赶车者形象(参见插图12:4)。多兰特山谷岩画表现的马车和查干河谷钩车岩画相仿，系单辕双畜型车，车轮无辐条，但在中心凿有表示车轴的痕印，两轮间车厢前栏呈弯曲形。[2] 这两辆车的车厢都采用钩车形式。阿勒泰古代岩画上的钩车都没有表现轮辐，有的车或以牛作牵引。因此，阿勒泰古代钩车岩画有可能早于蒙古查干河谷

[1] 诺甫戈罗多娃：《蒙古山中的古代车辆岩画》，《苏联考古学》1978年第4期(陈弘法译文收入张志尧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147页)。

[2] 张志尧：《新疆阿勒泰发现古代车辆岩画》，《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5期，12～18页。

钩车岩画。

无论如何，甘肃黑山和内蒙古阴山的椎车岩画以及蒙古国查干河谷和新疆阿勒泰钩车岩画可与《司马法·天子之义》有关夏代战车的记载相印证，说明中国使用战车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夏代。

《世本·作篇》等先秦文献均将车的发明归功于夏车正奚仲。《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滕县条记载："奚公山在县东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汉书·地理志》鲁国薛县条班固本注："夏车正奚仲所国，后迁于邳。汤相仲虺居之。"上述文献的史料根据是《左传·定公元年》引薛宰之言。他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杜预注曰："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薛宰说薛人乃奚仲之后显然是和滕人争长的一种托词。事实并非如此。古代中原男子把头发束在一起，再用发笄别上，士大夫还要戴冠。而汉字"奚"是个象形文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辫发少数民族形象。故知奚仲出身奚族，本非中原人士。

1964 年，苏联考古学家刘克甫对这个问题作过如下分析："马就是从北方传来的极其重要的文化成果，无论仰韶人还是龙山人都不知有马。关于殷人从北方获得马匹一事，卜辞中即有记载。有一条卜辞说奚部落送来了马，奚部落俗以编发为辫。很可能殷人还从北方草原部落那里借用了马车，因为它的早期形式根本不见于龙山新石器时代。"[1] 刘克甫说的卜辞指殷墟出土的小臣墙刻辞。这篇刻辞中的奚字偏旁从阜，可推知殷代

〔1〕 刘克甫著、莫润先译：《东亚古代文化的起源》，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参考资料》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37 页(原载苏联《亚洲人民》1964 年第 6 期，85～86 页)。

奚部落得名于奚山。据我们研究，奚山就是西周金文多友鼎提到的“漆山”和《史记·五帝本纪》所谓“黄帝鸡山”。据宁夏史地研究者近年调查资料，“黄帝鸡山”系宁夏泾源县六盘山一支脉，因山峰形似鸡冠，故名鸡山。[1] 那么，奚仲的故乡或在鸡山附近奚族部落。

我们对奚部落在宁夏泾源鸡山的推论还可以从奚仲家族的姓氏来进一步验证。《山海经·海内经》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吉光之“吉”即古代牒谱之“姞”姓。据《潜夫论·志氏姓》记载，姞姓是中国最古老的十二姓氏之一。《诗·小雅·都人士》曰：“彼君之女，谓之尹吉。”郑笺：“吉读为姞，尹氏姞氏，周室旧昏（婚）姻之旧姓也。”既然姞奚和姬周互为婚娅，那么奚族部落应该距周人的原始故乡古豳国不远。近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古豳国可能在今陕西长武县。[2] 长武县之西就是六盘山地区，所以奚部落在六盘山支脉古鸡山附近是可能的。

1972 年，在距离泾源古鸡山不远的甘肃灵台白草坡发现西周初年奚部落酋长㶇伯墓。[3] 灵台一带本是姞姓密须国所在地。《史记·周本纪》记文王受命四年“伐密须”似在此地。武王伐纣曾借助于西土八国的军事力量，于是随武王东征的戎人将领成了周人的开国元勋。据《尚书·立政》记载，西土八国首领均被封爵赐地，甚至迁入中原。这件事亦见《史记·匈奴列传》。文

---

〔1〕 鲁人勇等：《宁夏历史地理考》，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356～357 页。

〔2〕 胡谦盈：《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 6 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123～142 页。

〔3〕 初仕宾：《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 年第 2 期，99～129 页。

中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丰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㶏伯墓就在泾水流域，从墓中随葬大批青铜礼器和兵器看，墓主人似为随武王克商的戎人将领之一，因功晋爵才从泾源鸡山迁到灵台白草坡。《左传·昭公十五年》引周景公的话说："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杜预注："密须，姞姓国也，在安定阴密县。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搜）。"意思说：密须国的鼓和大路车都是周文王用来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用的。那么，直到商末周初甘肃东部姞姓部族仍有高度发达的造车手工业。

耐人寻味的是，甘肃灵台和宁夏泾源都在中国最早流行造车工具的考古文化——齐家文化分布区。[1] 既然中原造车手工业最初兴起于和齐家文化密切相关的姞姓奚族部落，而夏车正奚仲很可能出自这个部落。既然如此，先秦文献记夏车正奚仲造车以及夏启在甘之野与有扈氏进行车战，绝非无稽之谈。

---

〔1〕 钟侃、张心智：《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齐家文化遗址》，《考古》1964 年第 5 期，232～233 和 244 页；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固原海家湾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73 年第 5 期，290～291 页；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3 期，22～24 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海源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9 期，1～14 页。

3

昆山之玉

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有代表各自时代的艺术代表作，如商周青铜器，汉代丝绸和漆器、唐代金银器、宋元瓷器。但有一种艺术品却能亘古不变，这就是玉器。

纯正的玉石是两种链状硅酸盐单斜晶系辉闪石矿物集合体，可分两类。一类是角闪石族钙角闪石组透闪石一阳起石系列的具交织纤维显微结构的变种玉石，通称“软玉”；另一类是辉石族钠辉石组的硬玉，俗称“翡翠”。[1] 翡翠产于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中国不产翡翠。中国古书说的“玉”多指软玉而言。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用玉。玉不琢不成器，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学会了雕琢玉器，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不断发现精美的玉石雕刻。除了用作装饰品外，这种耗时费工的艺术品往往作为财富的象征。商周王公贵族则把玉器作为燎祭先祖的祭品。秦王嬴政试图以 15 座城池换取赵国的和氏璧，可是赵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竟然对 15 座城池不屑一顾。秦王勃然大怒，依仗强大的秦军，一举攻灭赵国，这才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和氏璧。秦朝灭亡后，和氏璧成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传

---

〔1〕 闻广和荆志淳：《沣西西周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1993 年第 2 期，251～279 页。

国之宝,经过100多位帝王之手,历时1600余年,最后毁于公元936年石敬瑭之乱。此后,中国历代王朝皆以玉玺作为传国或掌握皇权的标志。由此可见,玉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国美玉又以新疆昆仑山出产的"昆山之玉"最为著名。《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国在流沙中者,墩端、玺唤,在昆仑墟东南。"又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墟东南。"新疆昆仑山东南就是盛产白玉的和田县。有学者以为,"墩端"当即和田古译名。史载于阗"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1]关于和田人如何采玉,宋应星《天工开物》这样写道:

> 凡玉映月精光而生,故国人沿河取玉者,多于秋间明月夜,望河视玉璞堆聚处,其月色倍明亮;凡璞随水流,仍错乱杂石浅流之中,提出辨认而后知也。白玉河流向东南,绿玉河流向西北亦力把力地。其地有名望野者,河水多聚玉,其俗以女人赤身没水而取者,云阴气相召,则玉留不逝,易于捞取。此或夷人之愚也。

白玉河出产的白玉品质优良,又分普通白玉和籽玉两类;籽玉洁白如羊脂,俗称"羊脂玉",是品质最优的和田玉。

于阗人很早就和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频繁交往。战国时代,苏厉在写给赵惠文王的书信中说:假如秦兵占领了勾注山,

---

[1]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切断恒山(今山西北部)一线,则昆山之玉不复为赵王所有。[1]先秦小说《穆天子传》借周穆王西游故事记述了从黄河流域到昆仑山的路。为了满足王公贵族对玉石的贪欲,成千上万的采玉者翻山越岭,穿越戈壁沙漠,到昆仑山采玉。由于路途遥远,充满艰难险阻,这些采玉者十之八九客死他乡。先秦思想家尸子对此慨然叹道:

> 玉者,色不如雪,泽不如雨,润不如膏,光不如玉。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至。中国覆十万之师,解三千之围。[2]

古代于阗盛产玉石已被考古发现证实。陕西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湖北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及贵族墓等地不断出土和田玉。研究者注意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古玉,有些玉石矿物成分与和田玉相似。[3]这些发现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于阗就开始和中原频繁交往。

中国玉石工艺的发展在商代出现第一个高潮,公元前11世纪末,武王率周八师攻入商都朝歌,商纣王被逼无奈,自焚身亡。《逸周书·世俘解》说:

> 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琏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千)人求之。四千庶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

[1] 《史记·赵世家》。
[2] 参见《二十二子·尸子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80页。
[3] 尹达:《新石器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武王俘商旧玉万四千，佩玉亿有百万。

这个数字似乎有些夸大，但是商代开采玉石的数额巨大则无可置疑。

纣王用天智玉自焚，似乎受古代“假求外物以自坚固”的金丹思想的影响。中国方士很早就意识到金有稳定的化学性能，而无机盐有防腐作用，东晋炼丹大师葛洪就认为“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1]考古发掘出土的古尸常见用金玉保存尸体，或在人体九窍塞以金玉之器。古代帝王死后，甚至装入玉匣安葬。这种玉匣用金线编连而成，又称“金缕玉衣”。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发现了一件完整的金缕玉衣。墓主人刘胜是汉景帝之子，汉武帝的庶弟。这件金缕玉衣相当精美，外观和人体相仿，全部用金缕编连玉片制成。据统计，一共动用金丝1100克，玉片2498片。纣王“取天智玉琰缝身”自焚大概就指身穿金缕玉衣自杀。[2]

追求不死之药的方士们由此受到启发，进而推想服食金玉和无机盐可使人长生不死。[3]这种思想由来已久。楚国诗人屈原《九章·涉江》说：“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东晋葛洪援引古代《玉经》说：“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又说：“玉亦仙药，但难得耳……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阗玉尤善。”[4]于是昆仑山在古代方士心目中变得十分神

[1] 《抱朴子内篇·对俗》。

[2] 关于满城汉墓出土金缕玉衣的统计数据，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317页。

[3] 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235页。

[4] 《抱朴子内篇·仙药》。

秘，不仅是不死之药的著名产地，而且是中国神话传说的一个中心。

商朝王公贵族用玉随葬被考古发现证实。197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发现商王武丁(前 13 世纪)嫔妃妇好墓，从中发掘出 750 多件玉石雕刻，雕琢之美，种类之多，令人叹为观止。经专家鉴定，这批商代古玉中相当一部分是新疆和田出产的籽玉，也就是“昆山之玉”。[1] 1989 年发掘的江西新干大洋洲一座商墓，出土 150 余件各类玉器及近千件小玉珠、玉管、小玉片等，玉料经初步鉴定有新疆和田玉、蓝田洛翡玉、南阳密玉及独山玉等。大量和田玉器的出现，预示了以和田玉为主流的玉器工艺美术新时期的到来。[2]

周王朝建立后，完全继承了商王朝用玉的传统，不断派人到西方采玉。1993 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公布了他们对一批西周古玉的研究。这批古玉标本出自古都西安市附近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其中许多古玉都是在昆仑山采集的和田玉。[3]

汉武帝派张骞出访西域，终于查明了和田玉的真实产地。据张骞介绍，“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他根据先秦文献《禹本纪》，认定黄河源头在于阗，并把于阗河发源的山脉定名为昆仑山。《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

〔2〕 赵朝洪：《先秦玉器和玉文化》，《中华文明之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150～152 页。

〔3〕 闻广和荆志淳：前揭文，251～279 页。

于是和田玉成了历代于阗王觐献中原王朝的重要方物，同时，中原王朝不断派人到于阗采玉。

和田玉不易得，只有皇亲国戚才有资格佩戴。晋朝舆服制度规定："贵人、夫人、贵嫔三夫人佩于阗玉。"[1] 当然，于阗玉主要还是用来制作玺印。《魏书·祖莹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文中说："孝昌中，于广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莹与黄门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莹云：'此是于阗国王晋太康中所献。'乃以墨涂字观之，果如莹言，时人称为博物。"

于阗国起初只能觐献玉石原料，6世纪中叶起，开始觐献于阗玉雕琢的工艺品。《南史·于阗传下》记载："于阗者，西域之旧国也……大同七年(541年)，又献外国刻玉佛"。[2] 唐天宝年间(742—756年)，于阗王尉迟胜到长安城朝见唐玄宗，献名马和美玉。玄宗大喜，将唐朝宗室一位公主许配给这位于阗王，而且授予他右威卫将军一职。[3]

唐德宗即位(779年)不久就派人到西域寻找于阗玉。内给事朱如玉受命率唐使团到西域，求得各种于阗宝物，其中包括"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宝等"。这些于阗宝物竟然被贪心的朱如玉全部私吞，还向朝廷谎称途中遭回鹘人劫掠。后来东窗事发，朱如玉被判流放罪，死在恩州。[4]

和田玉矿脉呈葡萄状，规格都不太大，一般只有指甲盖大小，鸡蛋大小的于阗玉已属罕见之物。最精美的于阗玉工艺品，

[1] 《晋书·舆服志》。
[2] 《梁书·西北诸戎传》。
[3] 《旧唐书·于阗传》。
[4] 《新唐书·于阗传》。

首推唐长安城靖善坊大兴善寺收藏的于阗玉佛造像，它由整块和田玉雕琢而成。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描述这尊玉佛像说："于阗玉像，高一尺七寸，阔寸余，一佛、四菩萨、一飞仙。一段玉成，截肪无玷腻，彩若滴。"据唐代古尺，唐代一尺约合 30 厘米，那么这尊于阗玉佛像高约 50 厘米，不过段成式说这尊玉佛"阔寸余"似有误，疑为"宽尺余"，否则这尊佛像的造型将不成比例。

西域龟兹国曾用一块罕见的大玉石雕刻佛祖足迹，这块玉石很可能采自邻国于阗。唐玄奘西行求法时，凭吊了这块刻有佛祖足迹的巨玉。《大唐西域记》卷一介绍说：龟兹国的"东昭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最大的于阗玉是南北朝时发现的。史载南朝齐武帝"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即柔然)使。至六年乃还，得玉长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1] 后来南朝使臣费尽周折，历时三年才将这块巨型于阗玉运回江南。北宋年间于阗再次发现一块大玉，重 200 多斤。开宝二年(969 年)，于阗王派使者直末山来宋朝觐献方物，声称本国发现一块重 237 斤的大玉，要献给皇帝，请宋朝派人来取。不久，于阗高僧善名到宋朝进贡名贵药材阿魏子，宋太祖赐号昭化师，令他回于阗取大玉。[2] 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向佛国于阗发动大规模"圣战"，这件事被耽搁下来。宋徽宗时朝廷终于派人到于阗起运大玉。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记载：

---

[1] 《南齐书·河南传》。

[2] 《宋史·于阗传》。

大观(1107—1110年)中，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一日忽有国史奉表至。故事，下学士院，召译表语，而后答诏。其表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条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要者玉，自家甚是出心力，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当时传为笑谈。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有人推算，这块于阗大玉至少在100公斤以上，大概就是于阗使者直末山提到的那块重达237斤的大玉。唐代舆服制度规定：天子用八玺。宋袭唐制，亦用八玺。自宋徽宗得和田大玉起，始改九玺。他把于阗大玉制作的玉玺称作"定命宝"，作为九玺之首。政和八年(1118年)正月一日，宋徽宗还为这件事专门举行了受宝典礼。[1] 昆仑山是否真有重达237斤的大型玉石？1980年，昆仑山开采出的一块巨型玉器终于解开了这个谜。这年7月，和田县火箭乡两位牧民在海拔4400米的昆仑山巅意外发现一块方形巨玉，重达1180公斤，洁白润泽，定为一级品，据说利用率达95%以上，是目前所见最大的和田玉。[2]

---

[1] 《宋史·舆服志》。

[2] 殷晴：《和田玉古今谈》，《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创刊号，86页。

4

谁是阿尔泰深山金字塔式陵墓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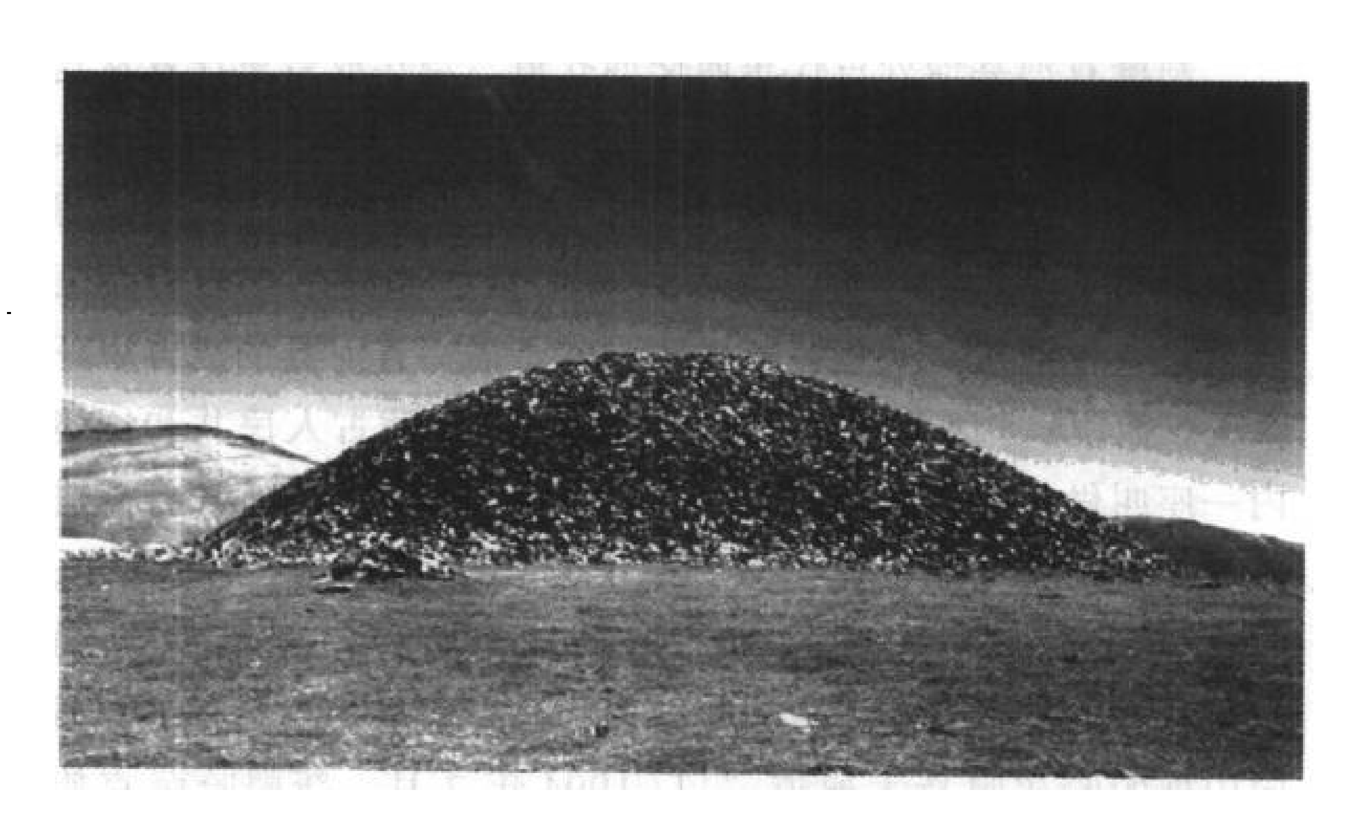


插图 13 阿尔泰深山金字塔式陵墓

我国西北边陲的阿尔泰深山蕴藏着许多秘密，前几年阿尔泰高山湖泊——喀纳斯湖发现鱼怪的消息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如今隐秘在阿尔泰深山的金字塔式陵墓再度引起新闻界的注意（参见插图 13)。《南方周末》1998 年 10 月 23 日刊登了一篇关于这座陵墓的长篇报道，题为《阿尔泰山中的神秘皇

陵》。据说这座古代皇陵位于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靠近中蒙边境，当地牧民传为成吉思汗陵。报道者引证新疆地理研究所两位教授的研究，认为这个陵墓不是成吉思汗陵，而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汗之墓。这里牵涉到中亚考古学一些常识问题，作为考古工作者，深感有必要向广大读者澄清事实。

一、蒙古皇陵之说不足信

新疆青河县地处古代东西交通孔道，当年成吉思汗就从这个地方六度金山（今阿尔泰山），率蒙古大军西征欧亚大陆。所以青河县至今保留有大批蒙元时代的文化遗迹，尤以成吉思汗大道至为著名。80年代末，友人张承志到阿尔泰山考察蒙元遗迹，他的散文《荒芜英雄路》就是描写青河县的成吉思汗大道。他说："那条古道应当备忘如下：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座叫做乌兰大坂（*Ulan Daban*）的山口，自34号界碑进入阿勒泰。于克勒干敖包东侧南下，绕边、中、花3个海子；与自35号界碑人境的另一条古路于卡增大坂（*Kazen Daban*）以东汇合。汇合后的大道遇滩消失，遇山修起，陡谷石筑，通向山外的哈尔嘎特大通道。"[1] 1994年7月，新疆哈萨克族学者哈德斯再次到青河县考察蒙元古迹。据他调查，成吉思汗大道起自青格勒河上游，经巴特巴泉，南到齐巴尔格勒湖，再经西边湖泊，翻越克勒干敖包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青河县境内的成吉思汗大道原为石筑路面，宽达7.6至10

---

〔1〕张承志：《荒芜英雄路》，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7—8页。

米。[1] 当年40匹挽马拖着成吉思汗宫帐大车就从这条大道走过，蒙古大军缴获的列国珍宝也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回漠北成吉思汗大营。青河县境内成吉思汗大道旁的巨石陵冢是否也属于蒙元时代呢？这座陵墓气势宏伟，墓底直径长92米，高达15米，是新疆境内古代游牧人陵墓中最大的一座，那么它根本不可能是蒙古皇陵。

历史上，北方草原王公贵族一度流行陵冢制度，由于盗墓问题愈演愈烈，他们不得不废除陵冢，代之以"潜葬"。例如：后赵石勒(319—333年)之母死后，"潜窆山谷，莫知其所"，而又虚埋于襄国城(河北邢台)南。石勒本人死后，也是"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于襄国，号高平陵"(《晋书·石勒载记》)；又如：南燕慕容德(398—404年)死后，"乃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晋书·慕容德载记》)。那么，早在十六国时期，北方草原的王公贵族就开始实行潜葬制度。

蒙古汗国兴起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继承了北方草原游牧人"潜葬"的习俗。据说蒙古皇族下葬后，先用几百匹战马将墓上地表踏平，再在上面种草植树，尔后派人长期守陵，直到地表不露任何痕迹方可离开，知情者则全遭杀戮。正因为蒙古贵族普遍采用潜葬，我们迄今尚未发现成吉思汗陵和其他蒙古贵族陵墓。

1226年，成吉思汗麾师南下，攻打西夏王国；次年，这位不可一世的蒙古开国皇帝猝死于六盘山下。关于成吉思汗和蒙古皇族的葬地，众说纷纭。13世纪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听说成吉思汗和贵由汗葬在阿尔泰山。这个传闻显然不可信。

---

[1] 哈德斯：《哈萨克族克烈部及其王汗吐合热勒》，《遗产》(哈文版)1995年第2期。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教授提醒我注意这个材料，谨致谢忱。

据《元史·太祖本纪》记载，成吉思汗的灵柩被运到起辇谷安葬。在成吉思汗灵车返回家乡的近3个月的旅途中，凡是见到成吉思汗灵柩返乡的人均被杀戮。据《马可波罗游记》，有2000多人为此丧命。尔后，元朝历代皇亲国戚大都聚族而葬，埋在成吉思汗陵墓附近。我们目前只能粗略地知道蒙古皇陵建在起辇谷，而确切位置却无人知晓。

问题是，起辇谷究竟在今天什么地方？据考证，起辇谷又称Keluren，旧译"怯绿涟河"，也就是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克鲁伦河流域。自1989年5月以来，蒙古国家科学院与江上波夫为首的日本学术研究团连续数年，共同寻找成吉思汗陵，据说拆资上亿元，采用了各种现代化技术在起辇谷寻找成吉思汗陵，结果一无所获。假如阿尔泰深山巨石陵墓真是蒙古皇陵，正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然而，无论蒙古葬制抑或文献记载，我们都得不出这座巨石陵墓系蒙古皇陵的结论。贵由汗有可能战死在阿尔泰深山，但是他死后必然和祖先聚族而葬。《元史·定宗本纪》记"三年戊申春三月，帝（指贵由汗）崩于横相乙儿之地……葬起辇谷。追谥简平皇帝，庙号定宗"。这就清楚地说明，贵由汗葬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流域，而非新疆阿尔泰山。

二、阿尔泰山巨石陵墓年代之谜

60年代初，三道海子的巨石陵墓就引起新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迟至198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明哲先生才首次披露这座巨石陵墓的存在。他在一篇介绍阿勒泰古代岩画的短

文中介绍说："如前所述，包括蒙古和阿勒泰在内的北亚和西北亚草原地带，还存在着被认为是斯基泰人（即塞人）遗存的巨大的石柱雕刻——鹿石，其时代据苏联学者吉谢列夫认为，约当公元前5至4世纪。这种鹿石，我们1965年在清河县的花海子高山调查时也曾发现过，其规模十分巨大，正面雕刻面向东方，其后还有一座极大的石堆墓。"[1] 王明哲说的花海子石堆墓就是三道海子那座巨石陵冢。

1994年7月，哈德斯先生到青河县查干郭勒乡进行考古调查。据他报道，三道海子的巨石陵冢有内外两圈石围墙，外墙周长700米，外墙厚3米，内墙周长280米，内墙厚5米，外墙与内墙相距70米。内外墙之间有四条石道相连，呈十字形，每条石道长70米，宽3米。石冢之上及周围有六个石碑，每个石碑高2.60米，宽0.50米，厚0.40米，分布似无规律。中间堆石冢直径80米，高4米，估计有15万到20万立方米堆石。所用巨石大都从陵墓对面山坡开采。[2]

1996年，《中国阿尔泰山草原文物》一书再次报道了三道海子巨石陵冢。据作者王林山和王博研究，这座陵墓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环石圈石堆墓，底直径约60米，高20余米，石圈宽3—5米，直径达210米。石堆和石圈之间摆有呈车辐形式的砾石，为四道。墓地及附近发现6通鹿石，气势宏伟，为新疆境内特大墓冢之一，发现于青河县三道海子。"[3] 尽管他们记录的某些数据和《南方周末》的报道不太一致，但是两者无疑指同一座

---

[1] 王明哲：《新发现的阿勒泰地区岩刻画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80页。

[2] 哈德斯，前揭文。

[3] 王林山、王博：《中国阿尔泰山草原文物》，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

陵墓。

青河县巨石陵墓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80 年代末有两位比利时学者要求到阿尔泰山调查此墓，不知是否成行。一位新疆朋友告诉我，哈佛大学尼古拉·乔玛(Nicola di Cosmo)教授到青河县调查了这座陵墓，他是西方研究欧亚草原古代文化的权威人士，尽管他见过欧亚草原许多巨石陵墓，但对三道海子这座巨石陵冢规模之大仍感到十分震惊。

目前青河县巨石陵墓尚未作深入的考古调查，一时尚无法确定其绝对年代，只能根据墓葬形制和墓前石碑推断其相对年代。就目前资料而言，这座墓的时代大概要比贵由汗(1206—1248 年)卒年早 2000 年左右。

这座巨石陵墓上及周围矗立着六通石碑，《南方周末》刊登了其中一通"刻着神秘符号"的石碑照片，最上方刻有"彡"字符号，最下方刻了一匹马，中间刻了一把尚方宝剑。这座巨石陵墓年代学之谜就隐藏在这些石碑之上。这类石碑是中亚草原游牧人创造的一种纪念碑式大型石雕艺术，学术界通称"鹿石"。实际上，鹿石上雕刻的动物种类不单是鹿，有的还刻有野猪、马、牛、羊或其他动物，由于以鸟首鹿身纹为主，故称"鹿石"。据王林山、王博刊布的照片，三道海子巨石陵墓旁也有通体刻鹿纹的典型鹿石。

鹿石广布于蒙古草原，蒙古人称为 *Olenniye Kamni*，是青铜时代欧亚草原游牧人实施狩猎或战争巫术的一种碑形石刻(参见插图 14)。根据截面不同，鹿石可分圆形、三角形和板形三种形制，大的高达 3 米，小的也有 1 米左右。据调查，鹿石主要分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现已发现 500 多通。鹿石还见于俄罗斯的图瓦和南西伯利亚、我国新疆的阿勒泰、吉尔吉斯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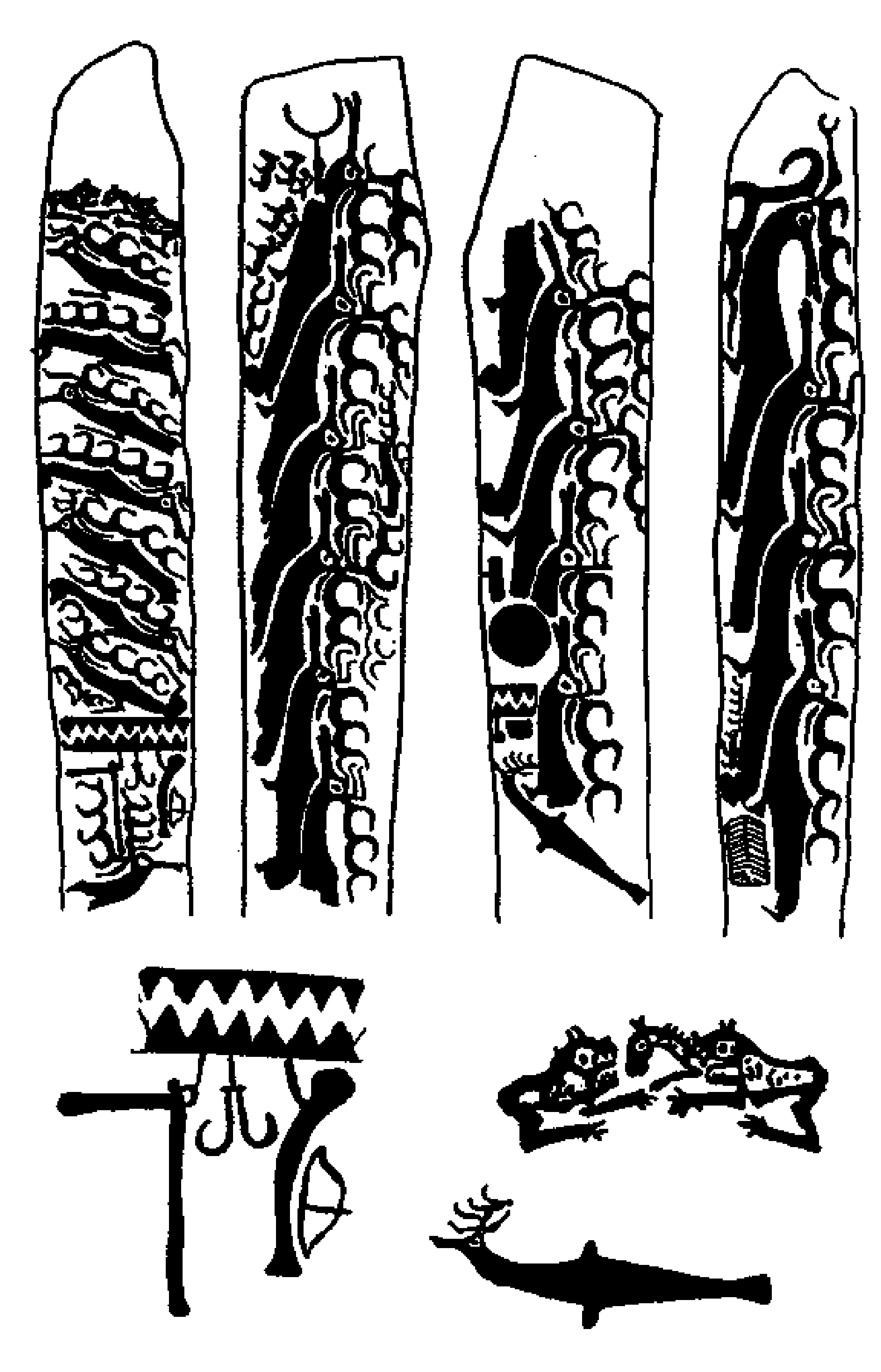


插图 14　蒙古草原的鹿石，约公元前 10 世纪左右

坦和哈萨克斯坦草原，俄罗斯黑海沿岸和南乌拉尔山也有零星分布。鹿石向西最远一直分布到欧洲，西界可达德国额尔伯河流域。在西方，如保加利亚的金麦里人古坟前发现过鹿石，年代约在公元前8—前7世纪；在东方，如蒙古、图瓦和阿尔泰山鹿石的年代较早，可能始于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8世纪以后，鹿石逐渐被墓地石人（蒙语作 *Baba*）取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金博教授近年主编出版了《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人》一书，汇集了欧美学者对上述问题的权威性阐述。[1]

鹿石一般立于地表，亦有随葬墓中之例。它的上半部往往画有一个圆圈，有学者以为是萨满巫师施咒术时射箭用的靶心。除鹿纹外，鹿石上也刻其他动物、人物、车马、兵器或巫术符号，有的还刻有管銎战斧、青铜短剑和弓形器等卡拉苏克文化典型器物。凡此皆为研究鹿石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卡拉苏克文化属于中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文化，分布于蒙古草原、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和哈萨克草原。在中亚考古文化系列中，其年代晚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而早于塔加尔文化。目前学界倾向于把卡拉苏克文化分为早晚两期，也即公元前13—前11世纪的卡拉苏克期和公元前10—前8世纪的石峡期，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晚商至西周中期。据《南方周末》刊布的照片，三道海子巨石陵墓前的鹿石上刻有卡拉苏克文化晚期（石峡期）青铜短剑图像。尽管这座陵墓的鹿石上没有雕刻卡拉苏克文化典型器物——弓形器，但中亚草原发现的同类鹿石上往往刻有弓形器，说明鹿石的流行年代不晚于公元前8世纪。弓形器在黄河流域商周大墓中经常出现（参见插图15），较晚的几例出自甘

[1] J. Davis-Kimball (ed.), *Nor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Zinat Press,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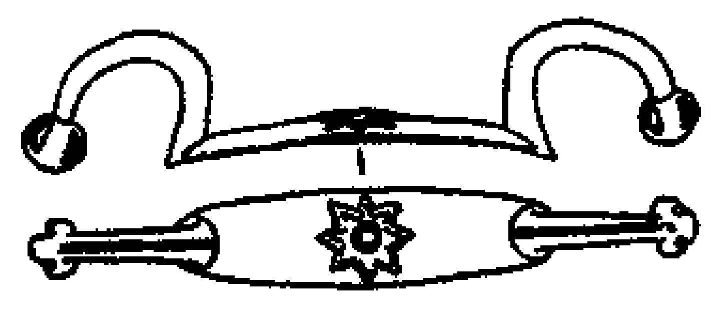


插图 15　殷墟出土弓形器

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陕西宝鸡㢭国墓地和山西天马—曲村西周墓等，属于西周早期墓，最晚的一例出自北京昌平白浮西周中期大墓。[1]既然弓形器的流行不晚于西周中期，那么阿尔泰深山巨石陵墓的兴建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8世纪。

三、谁是阿尔泰深山金字塔式陵墓的主人

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中亚草原游牧人开始进入历史舞台。最早记录这个地区历史的是古希腊人。希腊的普罗康奈斯岛诗人阿利斯铁阿斯(Aristeas)曾经漫游中亚草原，东达北海而还。回到希腊的家乡后，他写了一部六韵体叙事诗集《独目人》记述其中亚之行。欧洲人对中亚地理的最初认识就来自阿利斯铁阿斯的诗作。可惜《独目人》其诗早佚，大概古典时代末期就散失了。除12世纪拜占庭诗人柴泽斯(Tzetzes)保留下来的若干片断外，希罗多德(Herodoti，前484—前420年)的《希波战争史》多处引用阿利斯铁阿斯的叙事诗。这首诗对研究中亚东部地理相当重要。诗(IV.13)中说：

---

[1]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我的同事孙华教授提醒我注意，此墓年代原误定为西周早期，后来确认属于西周中期；详见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293页。

他曾在阿波罗神鼓励下远游伊塞顿(Issedones),过了伊塞顿就是独目人(Arimaspu),然后就是看守黄金的格里芬人(Griffins),最后直到海滨的希伯尔波利安人(Hyperboreans)。除希伯尔波利安人外,这些民族均在独目人统领下侵犯过他们的邻邦。伊塞顿人被独目人驱赶出他们的故土,而伊塞顿人又赶走了斯基泰人。原来住在南海(指黑海)的金麦里人,又为斯基泰人逼迫而放弃了他们的领土。[1]

阿尔泰山是中亚著名黄金产地,希腊史料所谓"看守黄金的格里芬人(Griffins)"疑指阿尔泰山古部落。在希腊神话中格里芬的形象是鹫头飞狮,似为这个山地部落的图腾。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发掘了5座随葬大批黄金制品的巨冢,今称"巴泽雷克古冢"。这些陵冢被认为是游牧于阿尔泰山北麓古代塞人的王陵,时代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巴泽雷克2号冢发掘出土了格里芬木雕像和格里芬红铜浮雕饰物。[2]希腊诗人所谓"格里芬人"大概指巴泽雷克古冢的墓主人。

这个地理坐标点确立后,就可以据以探讨阿利斯铁阿斯记述的中亚草原其他古部落。海滨之"海"疑指《山海经》屡次提到的"北海",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汉武帝时苏武被匈奴虏人漠北,曾在北海牧羊。若以音求之,西伯利亚

---

[1] 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重印本,270~271页。本文引用时对个别译名作了规范化处理。

[2] 蒙盖特著、潘孟陶等译:《苏联考古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1963年,142页。

(Siberian)殆源于希腊史料对北海的称谓 Hyperboreans(希伯尔波利安)。据《汉书·匈奴传》,汉代游牧于南西伯利亚的古民族有丁零、坚昆等。大概由于他们都在北海一带游牧,故被希腊史料统称为"西伯利亚人"。

至于希腊史料提到的"伊塞顿人"是哪个中亚古部落,目前学界尚无统一意见。日本学者榎一雄早年怀疑,汉代塔里木盆地东南的伊循城得名于希腊史料的伊塞顿。从希腊史料看,伊塞顿人乃游牧人,其牧地必在阿尔泰山以南及天山以北草原地带。所以法国学者韩百诗认为,伊塞顿当指公元前 2 世纪从天山东部迁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或大月氏人。[1]我们倾向于支持后一种可能性。

独目人部落是公元前 7 世纪或早些时候中亚草原的霸主。据马雍和王炳华考证,"他们似应居住在斋桑泊附近的额尔齐斯河流域,东至阿尔泰山麓"。[2]独目人称雄中亚草原的时间和阿尔泰深山巨石陵墓的年代相当接近,我们怀疑,这座巨石陵墓的墓主人很可能是独目人部落酋长。关于独目人,希罗多德(IV.27)引证阿利斯铁阿斯的叙事诗说:

> 伊塞顿人说过独目人和格里芬人的事情。这是斯基泰人讲的,而斯基泰人则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我们把斯基泰人那里听来的话信以为真,并给这些人起了一个斯基泰语的名字,即独目人。因为在斯基泰语当中 arima 是'一',而

---

[1] L. Hambis, *L'Asie Centrale*, Paris, 1977, p.11.

[2] 马雍、王炳华:《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收入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年,2 页。

spu 是'眼睛'的意思。[1]

希罗多德把中亚西部讲东伊朗语的游牧人称为 Scythian(斯基泰人),而将中亚东部讲东伊朗语的游牧人称作 Saka(塞克人)。后者就是《汉书·西域传》所述游牧于伊犁河的"塞人"。独目人的族名 Arimaspu 确为塞语名称。前一成分 arima(一)相当于阗塞语的 arma(孤独的),后一成分 spu(目)则相当于阗塞语的 spaśa(观察者),[2]那么斯基泰人对独目人的称谓意为"孤独的守望者"。

耐人寻味的是,独目人部落亦见于先秦文献,也即《山海经》提到的"一目国",《淮南子·坠形篇》则称"一目民"。[3]《海外北经》记载:"柔利国在一目东,为人一手一足,反祁,曲足居上。"《大荒北经》又载:"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威、鬼古音相近,而威姓当即鬼姓,指北方草原游牧人鬼方。《海内北经》明确说:"鬼国在贰负之尸(夷)北,为物人面而一目。"古希腊人说的中亚草原独目人部落或即先秦文献所记鬼姓"一目国"。

附记:本文完稿后,又见到南西伯利亚图瓦前斯基泰时期(约公元前8—前7世纪)安罗加古墓石冢内出土残鹿石。可证鹿石年代早于公元前7世纪。[4]

---

〔1〕王以铸,前揭书,276页。

〔2〕H.W.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8 and 436.

〔3〕袁柯:《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32页。

〔4〕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197~201页。

第 二 编

秦汉大型石雕艺术源流考

1

秦帝国大型石雕艺术的兴起*

夏商周三代，地面建筑大多以土木结构为主。究其原因，似受青铜时代生产力水平的局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地普遍进入铁器时代，大型石雕艺术随即在黄河、长江流域兴起。荀子曰："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墨子曰："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凡此皆为春秋战国哲人之语。[1]

秦统一六国后，征发150万人在秦都咸阳大造宫寝陵墓。"三十五年(前212年)……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郦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2]尽管秦宫有些建筑材料来自遥远的湖北和四川，但是大型石材主要采自渭河北岸。[3]80年代初，郦山陵西北郑家庄发现了一个秦代石料加工场，面积达75万平方米。遗址内遍布石料、半成品、残水道、铁锤等。单是打

*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俞伟超师和友人李零的热心帮助，我的学生郭物和王海城协助绘图及核查资料，谨致谢忱。

〔1〕《荀子·劝学》和《墨子·兼爱下》。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晋人潘岳《关中记》曰："始皇陵在骊山。泉本北流，障使东西流。有土无石，取大石于渭(山)[南]诸山。"晋张华《博物志》卷六亦曰："始皇陵在骊山之北，高数十丈，周迴六七里，今在阴盘县界。北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丈冰，背陵障使东西流。又此山名运取大石于渭水北渚。故歌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金陵余石大如坻。'其销功力皆如此类。"

石铁工具就发现175件。[1]这个发现可与文献相印证，说明秦代已经有了大规模石料加工业。在这个背景下，秦帝国凿刻了一大批纪念碑式石雕像。计有：郦山石麒麟、咸阳宫青石五枝灯、兰池石鲸鱼、渭桥秦力士像、石柱桥忖留神像等。秦始皇和秦二世多次巡游东方，到处封禅勒铭。秦始皇在山东胶南琅琊山用巨石（长2.37米，宽1.18米，厚0.44米）垒砌三级祭天坛，高达26.64米，将中国古代纪念碑式大型石雕艺术推向第一个高潮。

郦山秦始皇陵原来有一对石麒麟，西汉初移置青梧观（在今陕西周至）。《西京杂记》卷三说："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荫覆数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骐骥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2]由此可见，秦代已经能够雕凿高达3米的大型石兽。古代帝陵列石麒麟的制度定形于东汉。故有学者怀疑："这种石麒麟，未必真是'郦山墓上物'，可能也是东汉的制作。"[3]然而否定古书当慎之又慎。先秦文献多次提到麒麟，《礼记·礼运》写作"麒麟"，《商君书·画策》和《战国策·赵策四》则作"骐骥"。《商君书·画策》说："骐骥騄駬，每日走千里。"骐骥偏旁从马，指日行千里的神马。1986年陕西凤翔秦景公大墓发掘出土了一个石马头，用大理石雕琢，形态逼真。[4]这个发现说明，春秋晚期中

---

〔1〕秦俑考古队：《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场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39～43页。

〔2〕《三辅黄图》卷五所述略同。

〔3〕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6页。

〔4〕王学理等：《秦物质文化史》，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50页。

原已能雕琢大型石兽。除了青梧观石麒麟外,汉长安城的一些宫阁也以"麒麟"为名,比如,《三辅黄图》卷二提到的"麒麟殿"和"麒麟阁"。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汉代玉雕中有玉麒麟,四肢之间不雕透,和西汉石兽造型相近。[1] 汉袭秦制,汉代广泛使用麒麟显然源于秦文化。

秦咸阳宫内原有高达两米的石宫灯。《西京杂记》卷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盈盈焉。"古人对玉的概念分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特指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广义则是石之美者谓之"玉"。[2] 软玉成矿较小,不会高七尺五寸(约 1.73 米)。秦宫青玉五枝灯大概用质量上乘的青石雕成。汉代流行多枝灯,灯枝三至十三不等,一般高 1 米左右。[3] 汉代多枝灯似与秦咸阳宫青石五枝灯一脉相承。

秦始皇为求不死之药派徐市等方士入东海求仙,数年一无所获。徐市欺骗始皇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于是始皇三十七年派射手入海捕捉大鲛鱼,"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4] 后来秦始皇仿照这条大鲛鱼造了一条大石鱼,置于咸阳兰池宫。《括地志》卷一记载:"兰池陂即秦之兰池也。在雍州咸阳县界。"辛氏《三秦记》亦载:"始

---

[1]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中华五千年·汉代玉雕》,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1985 年。

[2] 闻广和荆志淳:《沣西西周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1993 年第 2 期,251~279 页。

[3]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352 页。

[4] 《史记·秦始皇本纪》。

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来、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1]汉景帝六年,"伐驰道树,植兰池"(《史记·景帝本纪》)。汉武帝欲令杨仆伐东越,而杨仆"受诏不至兰池宫"(《汉书·杨仆传》)。传世汉代瓦当中有"兰池宫当"。[2]凡此表明,秦兰池宫汉初仍在使用。秦汉兰池宫位于今天咸阳市渭城区韩家湾乡柏家嘴村东面低洼地带。[3]柏家嘴村西边高地秦兰池西岸有一座秦汉建筑遗址,有学者以为是秦汉兰池宫遗址。[4]大鲛鱼就是大鲨鱼,有袭击人类和船只的记录,一般长2—5米左右。最大的称"鲸鲨",长达20米。《三秦记》作者辛氏系晋人,晋代二百丈约合462米,最大的鲸鲨不过20米。所以辛氏的"二百丈"显然指兰池长度,而非石鱼尺寸。

兰池石鲸鱼的尺寸未见著录。汉武帝在太液池造过石鲸鱼,但他从未派人入海捕大鱼。这条汉代大石鱼可能是秦兰池旧物或仿制品。《三辅故事》说:"殿北海池(指太液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广五尺。"[5]那么,太液池石鲸鱼高1.155米,长约5.62米。1973年,西安市三桥北六村堡乡高堡子村太液池故址西北挖出一条大石鱼,同时出土的还有"与天无极"、"长乐未央"等汉代砖瓦。这条大石鱼用砂岩雕刻,呈橄榄形,雕琢极其简单,只刻了鱼眼。全长4.90米,最大直径1米左右,头径0.59米,尾径0.47米(参见彩版5)。这个尺寸与

---

[1]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注引。

[2] 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文物》1963年第11期,22页。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十年来陕西文物考古的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301页;刘庆柱:《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

[4] 王学理等,前揭书,111页。

[5] 《史记·孝武本纪》索隐引。

文献所记太液池石鱼的尺寸基本相同,必为太液池石鲸鱼无疑。[1] 如果这条石鱼是秦兰池旧物或仿制品,后者高约 1 米,长约 5 米。

秦都咸阳城渭桥附近有两尊秦力士石像。三国时代魏人张楫《广雅》说:"水自渭出……东北流经魏雍州刺史郭淮碑南,又东南合一水,迳两石人北。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能胜,故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以祭之,镦乃可移动也。"[2] 历史上,渭河上先后造过三座桥,自西而东为便门桥(西渭桥)、石柱桥(中渭桥)和木柱桥(东渭桥)。据近年调查,秦力士像可能在西渭桥,也即汉代便门桥。[3] 这座桥是汉唐通往西域及巴蜀的必经之地。至于便门桥的位置,目前学界尚有争议。[4] 就现有资料而言,便门桥故址很可能在今咸阳市西南 9 公里秦都区钓台乡西屯和资村交界的沙河古河道上,东北距市区 8 公里,北距现代渭河约 2.5 公里,今称"沙河桥遗址 1 号桥"。[5] 据调查,"至桥南端以至更南,此地已出桥址范围,砂层厚度达 7 米,此层内含有各代文物,计有战国云纹瓦当,大量的秦汉时期的瓦片,不同时代的铁质农具,以及后代瓷片。……在桥址南端附近,还发现八件巨型槽形铁板,每件由三块大小相近的矩形铸铁板相接铸成,呈槽形,厚度为 3 厘米,宽 1.00—1.10 米,长 6—7 米……它们的用

---

〔1〕 黑光:《西安汉太液池出土一件巨型石鱼》,《文物》1975 年第 6 期,91~92 页。

〔2〕 此系《水经·渭水注》所引,《三辅黄图》卷五所述略同。

〔3〕 《水经·渭水注》引《三辅黄图》说:"水上有梁,谓之渭桥,秦制也。亦曰便门桥。秦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象天汉。"《汉书·武帝本纪》载:建元三年初作便门桥,"跨渡渭水上,以趋茂陵,其道易直"。

〔4〕 李绥成:《渭河三桥寻踪》,《文物天地》1998 年第 4 期,43~48 页。

〔5〕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文物志》第 66 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年,44 页。

途还不十分清楚。"[1] 这些铁板疑即秦渭桥下的铁镦。既然秦力士像是为祭奠铁镦而设,那么它们应该在铁镦附近。

值得深究的是,渭桥秦力士像究竟是何许人?如果真是秦力士,那么《广雅》的"孟贲"似为孟说之讹。先秦诸子皆曰孟贲是秦勇士,而以孟说为秦力士。他们从不同国度投奔秦国,孟贲是卫人,孟说是齐人,常被混淆。[2] 渭桥两位秦力士中的无名氏疑为任鄙或乌获,而乌获名气更大。《史记·秦本纪》记载:"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孟子·告子下》和张衡的《西京赋》都提到乌获。渭桥秦力士之无名氏似为乌获。秦力士像的尺寸未见著录,估计和真人(约1.8米左右)相仿。齐刘绘《咏博山香炉诗》曰:"敞野千种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诗中的"秦王子"疑为秦力士乌获或孟说。西汉文物常见力士像。1968年,河北满城刘胜墓发现一个力士骑兽形博山炉。炉座上的力士一手擎炉身,一手按兽头,造型雄武。同墓出土的当户铜灯也是力士擎灯形,力士袒露胸肌,单手擎灯盘,和博山炉力士造型相似。[3] 秦力士像大概和刘胜墓所见力士像相仿。

秦代规模最大的石砌建筑是秦石柱桥,始建于秦始皇(一说秦昭襄王)时期。石柱桥是为连通渭北咸阳宫和渭南兴乐宫而建,[4]因在汉长安城横门外,故称"横门桥"或"横桥"。唐贞观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渭桥遗址》,《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29~32页。

[2]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522页。

[3] 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2页及图版说明。

[4] 《史记·孝文帝本纪》索隐注所引《三辅黄图》曰:"咸阳宫在渭北,兴乐宫在渭南,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间,作渭桥,长三百八十步。"

十年，中渭桥东移十华里左右，后者在今咸阳市正阳乡左所村和贵家花园一带。因在唐代东、西两渭桥之间，故称“中渭桥”，唐末尚在。[1]

《水经·渭水注》记载：“桥之北首，叠石水中，故谓之‘石柱桥’也，旧有忖留神像。此神尝与鲁班语，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狞丑，卿善图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与言曰：出头见我。忖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脚画地，忖留觉之，便还没于水，故置其像于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后董卓入关，遂焚此桥。魏武帝遂更修之，桥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马见之惊，又命下之。”由此可知，石柱桥原有秦代石神像，位于桥下垒砌的石柱之上，后被曹操弃之荒野。据近年调查，秦汉石柱桥故址在秦都咸阳宫南边，今咸阳市窑店镇东南的渭河上。[2]

1957 年，咸阳县石桥乡引王村三岔路口的一个石怪兽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这个石兽带角，面貌狰狞，长 1.10 米，高 0.68 米，相传是毕塬白起墓随葬的石羊。后经文物部门鉴定，认为是秦汉或六朝遗物，运到陕西省博物馆保存。[3] 这个石兽未作刻意雕琢，甚为古朴。发现地点今属咸阳市渭城区石桥乡烟王村，属于秦咸阳宫殿遗址范围。秦汉宫殿区一般立青铜铸像，不设石像。这个石怪兽大概不是秦宫附属雕塑。石怪兽所在地烟王村正南，恰好对着长安城横门。烟王村今属石桥乡，后者得名于秦石柱桥。那么，石桥乡的石怪兽大概就是将曹操惊

[1] 李绥成：前揭文，43～48 页。

[2] 李绥成，前揭文，47～48 页。不过，此前有学者认为，秦汉石柱桥在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小堡村附近。参见刘庆柱：《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90 年第 5 期，200 页。

[3] 田野：《你看毕塬下的石兽是什么时代的?》，《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5 期，80 页及照片。

于马下，尔后被弃之荒野的忖留神像。如果此说成立，这尊石怪兽是目前所知惟一一个流传至今的秦代地面石雕(参见插图 16)。



插图 16　秦石柱桥忖留神像

中国兴建大型永久性纪功碑始于秦始皇。他巡游东方时一共在八个地方封禅勒铭。二十八年在峄山(今山东邹城市)、泰山(今山东泰安市)和琅琊台(今山东胶南县夏河城琅玡山)三地勒铭；二十九年在之罘(今山东烟台市福山区芝罘岛)和东观(今山东烟台市福山区芝罘岛)两地勒铭；三十二年在碣石(今河北昌黎县碣石山)勒铭；三十五年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东西连岛)勒铭；三十七年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会稽山)勒铭。秦二世或在始皇刻石之后加刻诏文。《史记·秦本纪》抄录了泰山、琅琊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六石全部录文，但是未能著录朐山和峄山刻石。[1]《水经注》诸书均提到朐山有秦刻石，可惜也没有录文。峄山刻石现有宋人摹拓本传世。[2] 秦刻石陆续毁于六朝至唐宋之际，宋人只见到琅琊台和泰山的秦刻石。琅琊台的秦刻石一直传至清代，光绪年间遭雷雨击毁。

秦刻石尚无定制，一般多就地取材，分碣石和立石两类。碣石，指在悬崖峭壁修整出一个方形平面，然后在上面刻字，或称

〔1〕 关于秦刻石的地点，参见冯佐哲等：《秦刻石是秦始皇推行法家路线的历史见证》，《考古》1975 年第 1 期，1 页；陈公柔：《秦刻石》，《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393 页。

〔2〕 《史记·封禅书》引《述征记》云：峄山"北岩有秦始皇所勒铭"。宋代郑文宝据南唐小学家徐铉摹本翻刻的峄山碑，现存西安碑林。

"摩崖石刻";立石,则是在经过修整的自然石块上刻字。据马衡考证,除碣石山刻石可能是摩崖石刻外,秦刻石大多采用立石形式,类似于秦石鼓。[1]最大的秦刻石如琅琊台刻石(495字)和会稽刻石(289字),高达5米,单面刻字;小的如泰山刻石(147字),高约2米,四面刻字(一面为二世诏文)。史书仅对泰山、琅琊台、会稽山和朐山秦四石的形制略有所述。综合诸家研究,分述于下。[2]

1. 泰山刻石:文献对泰山刻石的尺寸记载不一。《晋太康地记》云:"树石太(泰)山之上,高三丈一尺,广三尺,秦之刻石云。"[3]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刘瑀登泰山考察秦刻石。他在《泰山秦篆谱》中介绍说:"其石埋植于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圆,四面广狭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盖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廿二行,行十字。字从西南起,以北东南为次,西南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每行字数同,而每面行数不同。其十二行是始皇辞,其十行是二世辞。"北宋董逌《广川书跋》则说:"今石南面为二世诏书,始皇帝刻诏书乃在北、西、东三面……视其石,高才八尺九尺,方面二尺余,以乱石培其下。昔所建立,盖凿石为穴,下寝其中。"从诸家对泰山刻石尺寸的著录看,《晋太康地记》的"高三丈一尺"恐系误记。刘瑀所记尺寸大概没算埋在土中部分,或

---

〔1〕 马衡:《石刻》,《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49页。

〔2〕 容庚:《秦始皇刻石考》,《燕京学报》第17期,1935年,收入《容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209~249页;G. L. Mattos, *The Stone Drums of Ch'in*,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IX, Nettetal : Steyler Verlag-Wort und Werk, 1988;吴福助:《秦始皇刻石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3〕《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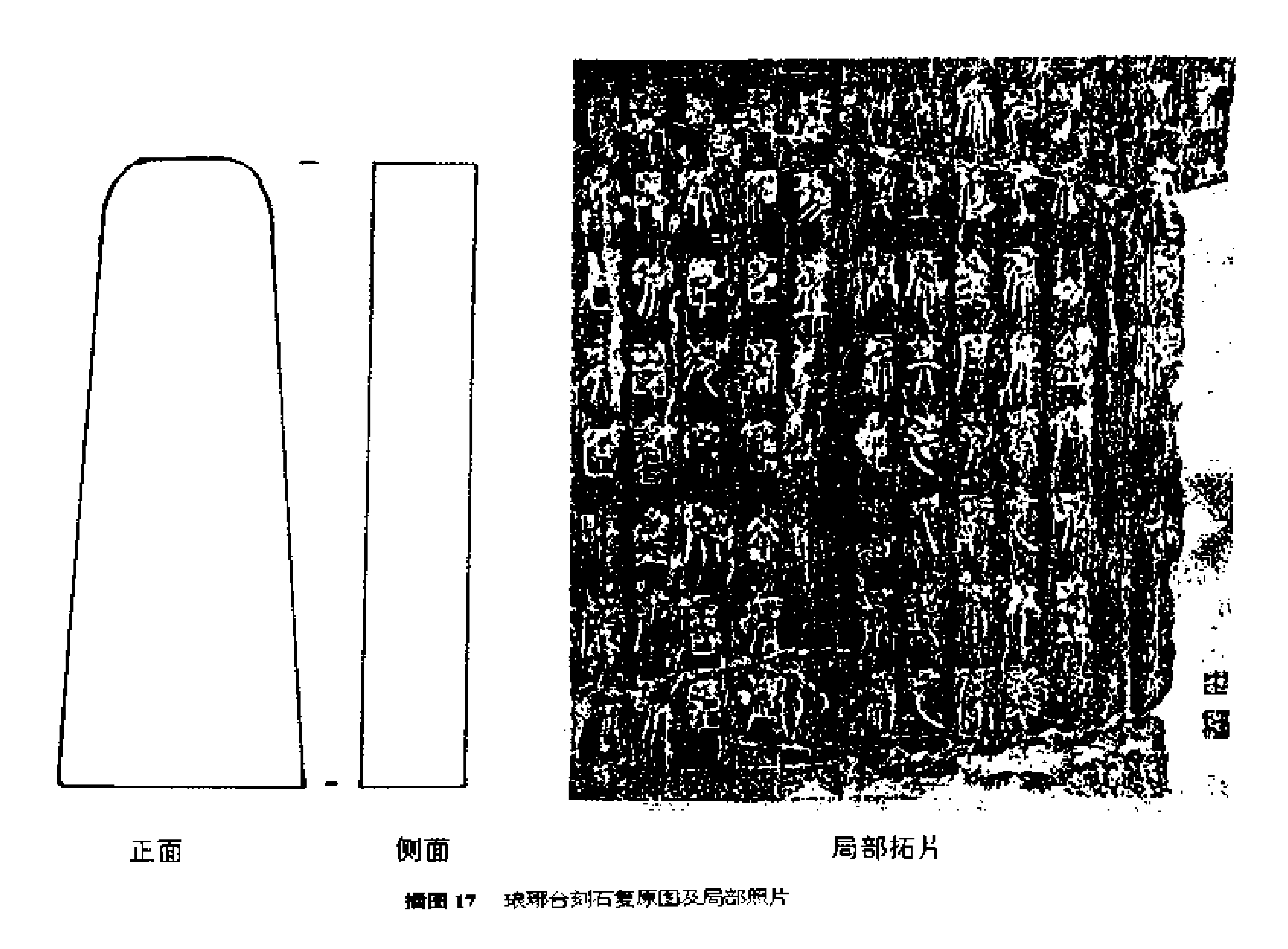


插图 17　琅琊台刻石复原图及局部照片

者仅指刻文所占面积。董逌所记泰山刻石尺寸较为可信。那么泰山刻石高约 2 米,0.5 米见方,凿石穴立石,下无石跗。据容庚研究,泰山刻石三面刻字,每行 8 字,东面 16 行,南面 32 行,西面 13 行,北面无字。明末有残石出土,尚存 29 字,皆二世诏文。清代仅存两残石,凡 10 字,现镶于泰山岱庙东御座院墙壁上。不过容庚疑此残石亦为后人覆刻。

2. 琅琊台石祭坛及刻石:琅琊台在今山东胶南县夏河城东南 5 公里。秦始皇在此建祭坛,刊石立碣。清光绪年间,秦琅琊台刻石被雷电击毁。据伏滔《地记》记载,秦始皇"作琅琊台,台亦孤山也,然高显出于众山之上。高五里,下周二十余里。山上垒石为台,石形如墫,长八尺,广四尺,厚尺半。三级而上,级高三丈。上级平敞,二百余步。刊石立碣,纪秦功德。"[1] 南北朝时 200 余步约合 240 余米;三级石台每级三丈,则通高 26.64 米。[2] 琅琊台秦祭坛的石块长约 2.37 米,宽 1.18 米,厚 0.44 米,比秦灵渠所用最大的石块(长 1.50 米,宽 1 米,厚 0.6 米)还要大。[3] 琅琊台刻石遭雷电击毁前,阮元作过实地调查。他在《山左金石志》中说:"台上旧有海神祠。礼日亭皆倾圮,祠垣内西南隅秦碑在焉。以工部营造尺计之,石高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中偏西。"那么琅琊台刻石高 4.8 米,下宽 1.92 米,中宽 1.6 米,上半宽 0.90 米,顶宽 0.736 米,南北厚 0.80 米。琅琊

---

〔1〕 此系《太平御览》卷一七七所引,并见《水经·潍水注》。

〔2〕 历代关于步的定制长短不一,但营造尺多以五尺为步。参见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亩制》,收入《皇清经解续编》(蜚英馆石印本)。

〔3〕 黄增庆:《广西兴安县灵渠陡堤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12 期,28 页。

台刻石目前仅剩小块残石，皆二世诏文（参见插图17），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3. 会稽刻石：秦代诸刻石中会稽刻石凿刻最晚。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正义云：“其碑见在会稽山上。其文字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宋代金石学家已不知会稽刻石的下落，估计毁于唐宋之际。关于会稽刻石的形制，东汉袁康《越绝书》卷八说：“取钱塘浙江岑石，石长丈四尺，南北面广六尺，西面广[二尺]六寸，刻文，立于越栋山上。其道九曲，去县二十一里。”会稽刻石应与琅琊台刻石长宽相仿，今本《越绝书》的“西面广六寸”疑为“西面广二尺六寸”之讹。那么会稽刻石通高3.32米，宽0.95米，厚0.61米。越栋山或称“越东山”，即今浙江绍兴县东南15公里会稽山。南宋姚宽曾访会稽刻石。他在《西溪丛话》卷下云：“予尝上会稽东山……复自小径别至一山，俗名‘鹅鼻山’……山顶有石如屋大，中开，插一碑于其中，文皆为风雨所剥，隐约就碑，可见缺画。如禹庙没字碑之类。”如果这个刻石就是会稽刻石，它的形制也采用凿石穴竖石。

4. 朐山刻石：《汉书·地理志》东海郡条记载：“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东汉熹平元年东海庙碑碑阴（《隶释》卷二引）曰：“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见《史记》。”关于秦帝国东门阙的位置，近年发现一条重要的考古线索。1984年，江苏连云港东西连岛东端发现西汉朐、柜两县分界石。[1]这个发现说明秦朐县东北界就在西汉朐、柜两县分界石处，今东

[1] 刘凤桂、丁义珍：《连云港市西汉界域刻石的发现》，《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232～236页。

西连岛东端。晋张华《博物记》说:“(朐)县东北海边植石,秦所立之东门。”[1]那么,秦帝国之东门阙在今东西连岛临海处西汉分界石所在地朐县一侧。《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载:“三十五年……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司马迁说的“立石”皆指刻石而言,朐山立石不应例外。《地道记》说:东海郡赣榆县“海中去岸百五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二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2]《水经·淮水注》则说:“游水又东北,迳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大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所见东北倾石,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一十二字。”如果按《地道记》,朐山刻石立于海中,西距离海岸线150步;若依《水经注》,朐山刻石则立于山上,东距离海岸线150步。两说之中似以后一说较为可信,否则无以名为“朐山刻石”。既然秦东门在今连云港东西连岛东端,那么朐山刻石必在秦东门阙遗址附近,这一点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调查。

据以上调查,秦帝国至少雕凿了十几件永久纪念性大型石刻。最大的如琅琊台刻石,高达4.8米;小的如忖留神像,亦有1.10米。主要用于宫殿(咸阳宫青石宫灯)、皇家园林(兰池石鲸鱼)、陵园(郦山石麒麟)、桥梁(秦力士像等)和帝王封禅勒铭(泰山刻石等)。尽管秦代大型石刻数量不多,但它们为中国后来大型石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1] 《续汉书·郡国志》东海郡朐县条刘昭注引。

[2] 《续汉书·地理志》东海郡赣榆县刘昭注引。

2

西汉帝国大型石雕艺术的发展

无论数量还是种类，西汉大型石雕艺术都远远超过前代。唐人封演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1] 事实上，汉代大型石雕并不限于帝王陵墓，还用于其他许多场合。归纳起来可分五类：第一类，皇家宫苑的石雕群；第二类，帝王和官僚陵墓前石雕群；第三类，封禅勒铭和地界石；第四类，其他大型石器具。

一、皇家宫苑石雕群

汉代大型石雕艺术首先用于皇家宫苑。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欲伐印度，摹仿云南滇池在长安开挖昆明池，以便操练水军；并在池边立牵牛织女石像，用以象征天河。昆明池故址在今天西安市之西约10公里的斗门镇。这个地方与东边1.5公里的常家庄各有一所小庙，庙内各供奉一尊石像（参见插

〔1〕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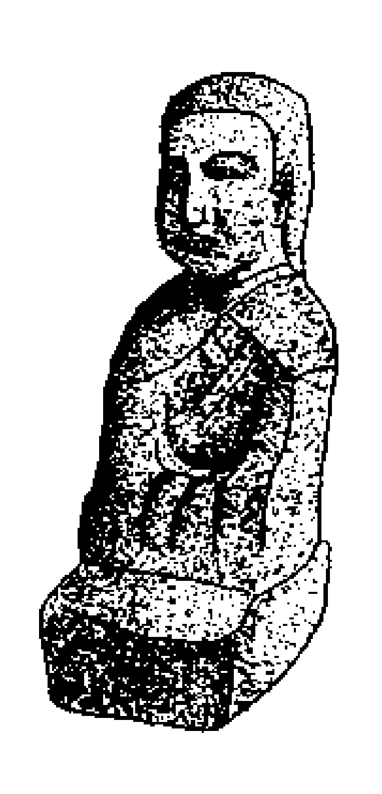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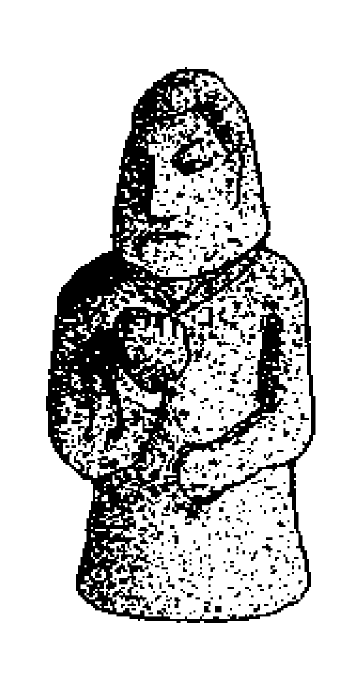



插图 18 昆明池的牵牛织女石像

图18)。调查者起初以为西小庙石像为牵牛像,东小庙石像为织女像。[1] 然而班固和张衡都说昆明池左牵牛右织女。古人常以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为正,和现代方向概念恰好相反。[2] 俞伟超认为,昆明池东小庙石像应是牵牛,而西小庙石像才是织女。[3] 织女像用花岗岩雕刻,现存斗门镇棉绒加工厂内。高约2.28米,呈端坐状,发髻后挽下垂,身着右衽长衣,脸部似被后人修整过。牵牛像也用花岗岩雕琢,现藏长安县草堂寺。高2.58米,稍向左斜,长方脸。交襟式深衣,右手半举,左手平放在腹前。[4] 牵牛织女故事始见于《诗经·小雅·大东》。《石氏星经》卷下和《古诗十九首》也有牵牛织女故事。湖北云梦出土睡虎地秦简《日书》两处(甲 884 和 893 背)提到牵牛织女。可

---

〔1〕 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西汉石雕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11 期,5 页。

〔2〕 关于古建筑方向问题的最新讨论,参见李零:《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九州》第一辑,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7 年,13 页。

〔3〕 俞伟超:《应当慎重引用古代文献》,《考古通讯》1957 年第 2 期,76 页。其说现为学界普遍接受,参见胡谦盈:《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考古》1963 年第 4 期,189～190 页;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文物》1979 年第 2 期,87～88 页。不过仍有学者没意识到 50 年代调查者的错误。如藤田国雄:《汉代の雕刻》,《世界美术全集》第 13 卷,东京:角川出版社,1962 年版;王子云:《陕西古代石雕刻(I)》,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图版 1～2。

〔4〕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 2》,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15 页。

见牵牛织女故事在秦汉时代业已广泛流传于民间。

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发掘出一对男女石俑,白石雕琢。男像高38.5厘米,女像高35厘米。[1] 这对石俑和昆明池牵牛织女像如出一辙。刘胜卒于昆明池牵牛织女像落成七年之后,我们怀疑,这对男女石俑很可能仿造昆明池牵牛织女像。如果这个推测不误,它们对复原昆明池牵牛织女像残缺部分将有重要参考价值。

汉武帝还在长安城建章宫附近大造蓬莱仙山等缩微景观,名曰"太液池",并于池旁设置石鱼、石龟等大型地面石雕。[2] 大石鱼已在太液池遗址北岸发现(参见插图19)。1973年西安市三桥北六村堡乡高堡子村太液池故址西北挖出一条大石鱼,同时出土的有"与天无极"、"长乐未央"等汉代砖瓦。这条大石鱼用砂岩雕刻,呈橄榄形,雕琢极其简单,仅刻鱼眼。全长4.90米,最大直径1米左右,头径0.59米,尾径0.47米。这个尺寸与文献所记太液池石鱼的尺寸基本相同,必为太液池石鲸鱼无疑。[3] 太液池石龟尚不知所在。《三辅故事》说:"殿北海池(指太液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广五尺;西岸有石龟二枚,各长六尺。"[4] 若换算成现代度量衡,太液池的两个石龟各长1.38米。霍去病墓石雕群中也有石龟,太液池石龟或许与其相似。蓬莱仙山和灵龟传说最早见于先秦文献。《楚辞·天问》说:"鳌戴山抃,何以安之。"西汉神

---

[1]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27页及图版说明。

[2] 《史记·孝武帝本纪》记建章宫,"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

[3] 黑光:《西安汉太液池出土一件巨型石鱼》,《文物》1975年第6期,91~92页。

[4] 《史记·孝武帝本纪》索隐引。

仙方士将其演绎为神话故事。刘向《列仙传》说："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苍海之中。"[1] 太液池设置石龟正是先秦时代以来神仙道术思想的反映。



插图 19 太液池石鱼

甘泉宫是西汉王室祭祀天神的场所，地位相当于明清北京城的天坛。自 70 年代起，有关甘泉宫遗址陆续见诸报道。[2] 这个遗址位于陕西淳化县古甘泉山（今称"好花疙瘩山"）脚下铁王乡凉武帝村。地面遗迹现存东西两大夯土台基。"西夯土台基西南处有两个小夯土台基，似应与西夯土台基相连。两个小夯土台基南侧，皆残留大量建筑物倒塌后的残砖瓦块、草泥墙面及烧渣块，后者最大的长达 1.4 米。"调查简报认为："从发现有大量烧渣块、红烧土、壁面烧焦痕迹来看，汉甘泉宫当毁于大火。"[3] 我们知道，古人祭天用燎祭。[4]汉武帝在甘泉宫燎祭天神盛况被描述为："其祠列火满坛，坛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

[1] 《楚辞·天问》王逸注引。

[2] 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文物》1975 年第 10 期，44～54 转 67 页。其余详见下注。

[3] 姚生民：《关于汉甘泉宫主体建筑位置问题》，《考古与文物》，1992 年，93～98 转 83 页。

[4] 《礼记·祭法》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

有光焉。"[1] 扬雄:《甘泉赋》"于是钦柴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一。"所以,甘泉宫遗址内 1.4 米长的火烧遗迹应是汉武帝燎祭天神的火坛。

据报道,甘泉宫遗址西夯土台基南约 250 米还有一处建筑遗址,内有两排方形棕色石,每排四块。每石 1 米见方,厚 0.45 米。中间有圆窝,窝边有刻槽,现被定名为"门枢石"。这处棕色石遗址疑为甘泉宫紫坛殿遗址,武帝太一坛设在紫坛殿。据成帝相匡衡介绍,"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以《尚书》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之义,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仟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于古"。他还说"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云云。[2] 关于甘泉宫紫坛的形制,文献失载。不过,类似的祭坛屡见于文献。东汉光武帝曾派有司考察武帝泰山坛的形制。《续汉书·祭祀上》说:"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可知汉武帝泰山祭坛上原有 1.18 米见方,0.237 米厚的方石。它与甘泉宫遗址的棕色方石是同类器物,也即祭天坛。甘泉宫紫坛显然得名于这种棕色方石垒砌的祭坛。

甘泉宫棕色石遗址还发现一个石熊(参见插图 20:1),通高 1.25 米,腰围 2.93 米(直径约 0.93 米),底面积 0.6×0.7 米。[3] 汉代文人常提到甘泉宫紫坛殿有石神石兽。扬雄《甘泉赋》有"翠玉树之青葱兮,璧马犀之瞵瑞"。匡衡则说:"紫

[1] 《史记·孝武帝本纪》。

[2] 《汉书·郊祀志下》引。

[3] 《陕西省志·文物志》第 66 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年,187 页。

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尽管扬雄和匡衡都没直接提到这个石熊，但它无疑在二人所言紫坛殿各类石神石兽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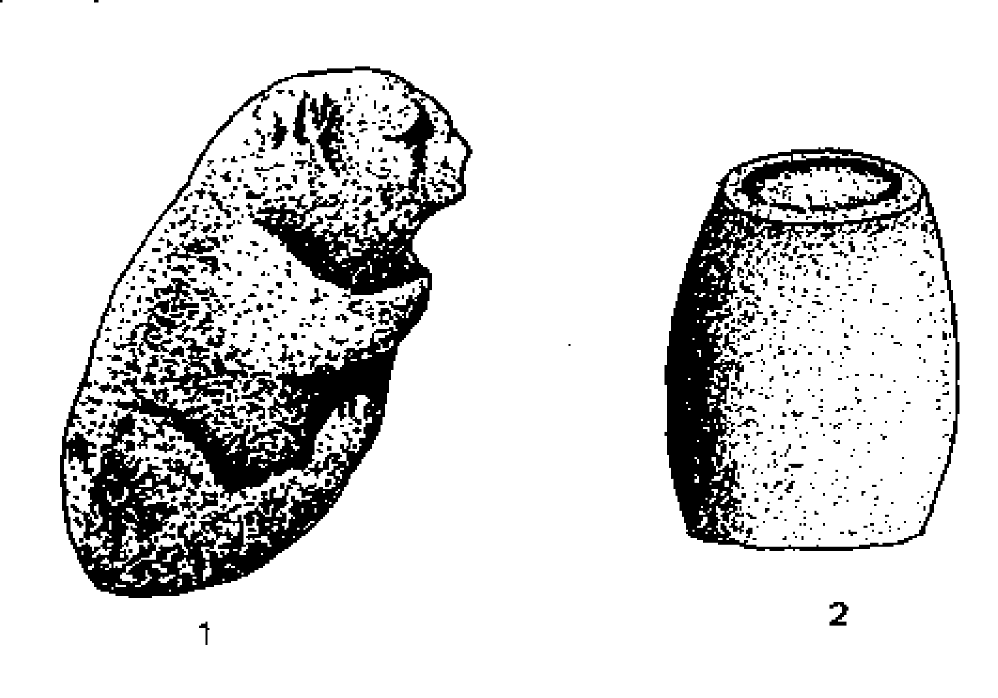


插图20 甘泉宫石熊和石鼓

除石熊外，甘泉宫棕色石遗址附近还有一个大石鼓（参见插图20:2）。唐人已注意到这个石鼓。《括地志》卷一说：“甘泉山，一名石鼓原。”据实测数据，这个石鼓高1.46米，腰围3.62米，直径1.1米，面径0.71米，状如腰鼓。它就是匡衡说的紫坛殿石坛。武帝泰山祭坛也有类似的石坛，谓之“石封”。《淮南子·泰族训》说：“（武帝）又况登泰山，覆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据应劭《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武帝泰山坛有“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那么武帝泰山坛上原有两石坛，每枚腰围约2米（直径约0.67米）。甘泉宫石坛的用途亦当如此。

西汉帝王好鬼神，在全国各地设祭坛供奉各地圣灵。这些祭祀场所有时也列置石兽。山西安邑县城附近杜村老坟地发现

过一个汉代石卧虎(参见插图21),1957年自安邑城关镇运至太原山西省博物馆陈列。石虎身长1.3米,前高0.71米,后高0.6米,用整块砂石雕成。风格与霍去病墓前石刻相近,故被视为西汉遗物。〔1〕安邑以前发现过一个汉代铜鼎,题铭曰:"安邑共厨宫鼎。"〔2〕共厨即"供厨",指祭祀场所祠供应牺牲祭品的庖厨。〔3〕安邑共厨宫或许是安邑所设专门供应祭牲用品的皇家庖厨。汉代祭祀场所常列石兽,安邑石虎原来大概是安邑供厨宫之物,后被移置安邑城关镇墓地当作镇墓兽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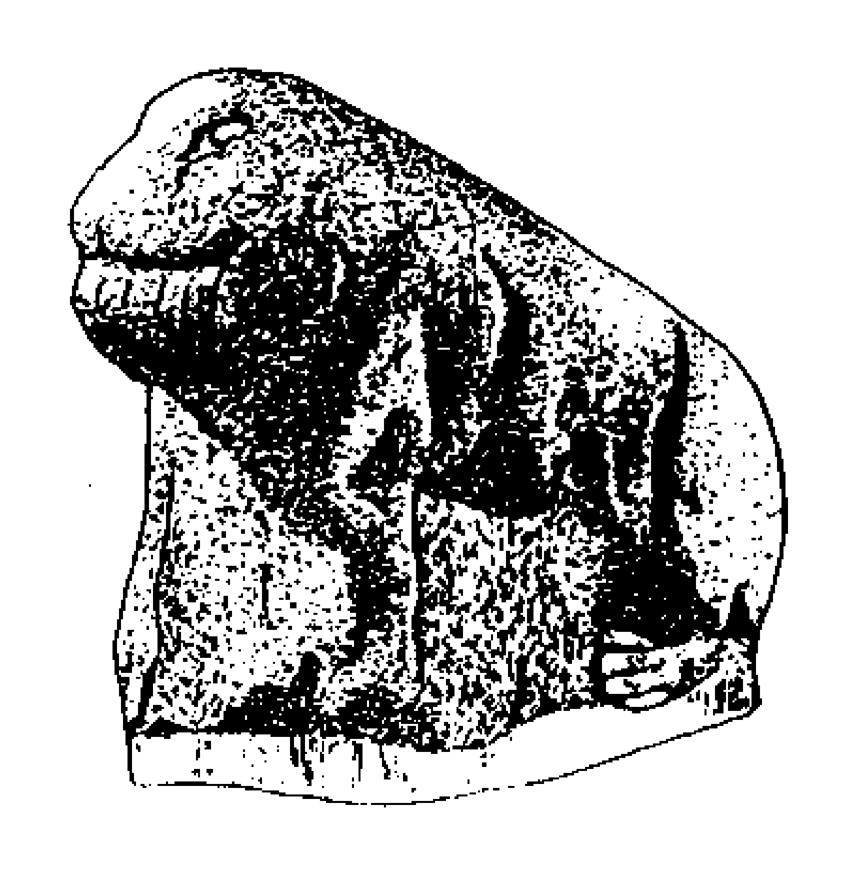


插图21 安邑石卧虎

〔1〕 山西省博物馆:《安邑县杜村出土的西汉石虎》,《文物》1961年第12期,48页附图版;《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12~15页。

〔2〕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页。

〔3〕 有关秦汉时期向祭祀场所供厨的制度,参看田亚岐:《秦汉置畤研究》,《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106页。

二、帝陵和权臣墓前石雕群

古代帝陵前列置大型石刻在西汉时代尚不普遍，不过在汉景帝阳陵德阳宫遗址曾发现一个大型石日晷。80年代初，咸阳市东北张家湾的景帝阳陵附近发现一处汉代建筑遗址。这个遗址位于阳陵正南400米处，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0米。地表散布铺地砖和瓦砾，并有一条古道和景帝阳陵相通。调查者将它定为阳陵寝殿德阳宫遗址无疑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心部分最高处有一方形石板，东西长1.7米，南北宽1.74米，厚0.4米。石板上部加工成直径1.35米的圆盘，圆盘中心刻有十字凹槽，槽宽3厘米，深2厘米，正南北方向，当地村民俗称“罗盘石”(参见插图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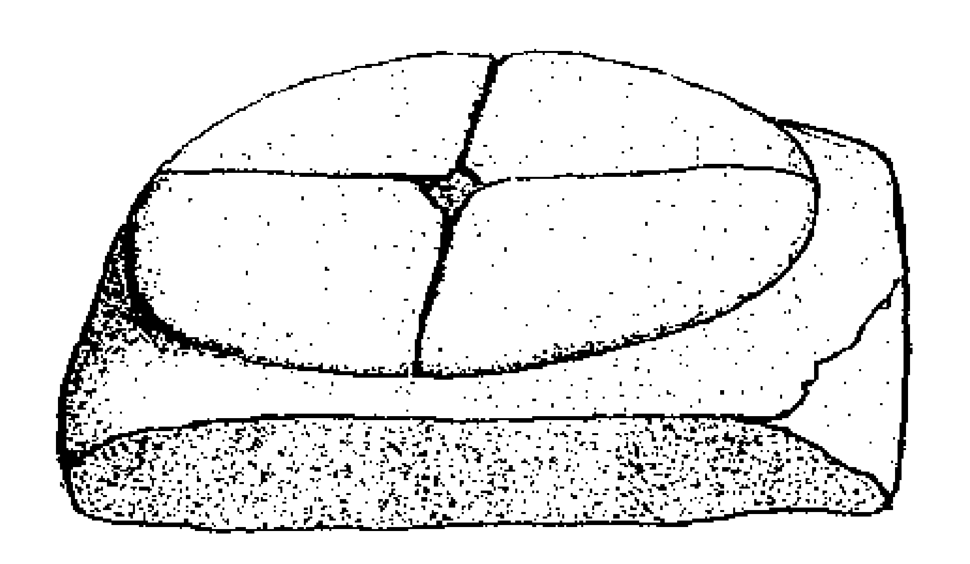


插图22　德阳殿石日晷

[1] 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34～37页及图四;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8～19页。

从器型看，这个罗盘石应该是个石日晷。据文献记载，碑有四种形式：一为墓前之碑，二为庭院前之碑，三为宗庙门前祭牲之碑，四为宫庙之碑。《仪礼·聘礼》说："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贾公颜疏："言所以识日景者，《周礼·匠人》云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者。自是正东西南北。此景识日景，唯可观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说文·日部》说："晷，日景也。"所以德阳殿的石日晷应是史书说的宫庙之碑。

汉代记时用日晷，或为石制。端方《陶斋藏石记》和周进《居贞草堂汉晋石影》两书著录有秦汉石日晷。清光绪年间内蒙古托克托（今呼和浩特市）出土过一件汉代日晷，泥质大理石制。[1] 托克托石日晷和德阳殿石日晷器型相似。后者系帝陵用器，故器型巨大。由于器型较大，德阳宫石日晷的工艺相对简单，似以墨线表示刻度。德阳殿石日晷上面原来应该有个投影用的木表或铜表，早已不复存在。晋郭缘生《述征记》云："长安灵台……又有铜表，高八尺，长一丈三尺，广尺二寸，题云'太初四年造'。"[2] 太初系景帝之子汉武帝年号。如果德阳殿石日晷用铜表，殆与西汉灵台八尺铜表相似，高 1.84 米，宽 0.27 米。[3]

西汉大型石雕集中列于霍去病墓前。霍去病墓是汉武帝茂陵陪葬墓之一，公元前 117 年建于今陕西兴平县窦马村茂陵东

---

〔1〕 孙机：《托克托日晷》，收入孙机、杨泓编：《文物丛谈》，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135～149 页；彩色图版，参见马自树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北京：朝华出版社，1997 年，15 页。

〔2〕《三辅黄图》卷五引。

〔3〕 林梅村：《说"宫庙之碑"》，《文物天地》1998 年第 4 期，40～42 页。

边 500 米处。[1]早在本世纪初，这个石雕群就引起中外学人的广泛关注。法国的色伽兰（V. G. Segalen）、美国的毕安祺（C. W. Bishop）、日本的足立喜六和水野清一先后来此调查。[2]这组石雕包括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伏虎、卧牛、野猪、残石人、怪兽食羊和力士搏熊。除马踏匈奴原在霍氏墓前外，其余石雕散落于霍氏冢上下各处。50 年代以来，霍氏墓附近又陆续找到 7 件石刻，遂使这个西汉石雕群的总数达到 16 件。新找到的石雕有残野人、幼象、石蟾蜍、石鳖、石羊各 1 件和石鱼 2 件。[3]据 1995 年的统计数字，霍氏墓前现存石刻 16 件，可辨识的象生 14 件，其中 3 件各雕两形，共有生物 17 体，不同物象 12 类。[4]

1. 马踏匈奴：花岗岩雕琢。长 1.90 米，高 1.68 米（参见插图 23:6）。《周礼·夏官·瘦人》说："乃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圉马。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战国一尺约合23.1厘米，7尺则是1.62米。马踏匈奴

---

〔1〕《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骠骑将军自四年军后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

〔2〕V.G. Segalen, et al., *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 Paris: Geuthner, 1914—1917; C. W. Bishop, "Notes on the Tombs of Ho Ch'uping", *AA*, No. 1, 1928;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の研究》，东京：东洋文库，1933 年；水野清一：《前汉代に於ける墓饰石雕の一群に就いて——霍去病墓の坟墓》，《东方学报》第三册，1933 年，324～350 页。

〔3〕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和王子云：《西汉霍去病墓前石刻》，两文并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11 期，3～11 页和 12～18 页；傅天仇：《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西汉石雕艺术》和王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记》，并见《文物》1964 年第 1 期，40～44 页和 45～46 页；陈直：《陕西兴平县茂陵镇霍去病墓新出土左司空石刻题字考释》，《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11 期，63 页。

〔4〕王丕忠：《霍去病墓》，《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北京 /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255 页；《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 2》，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12～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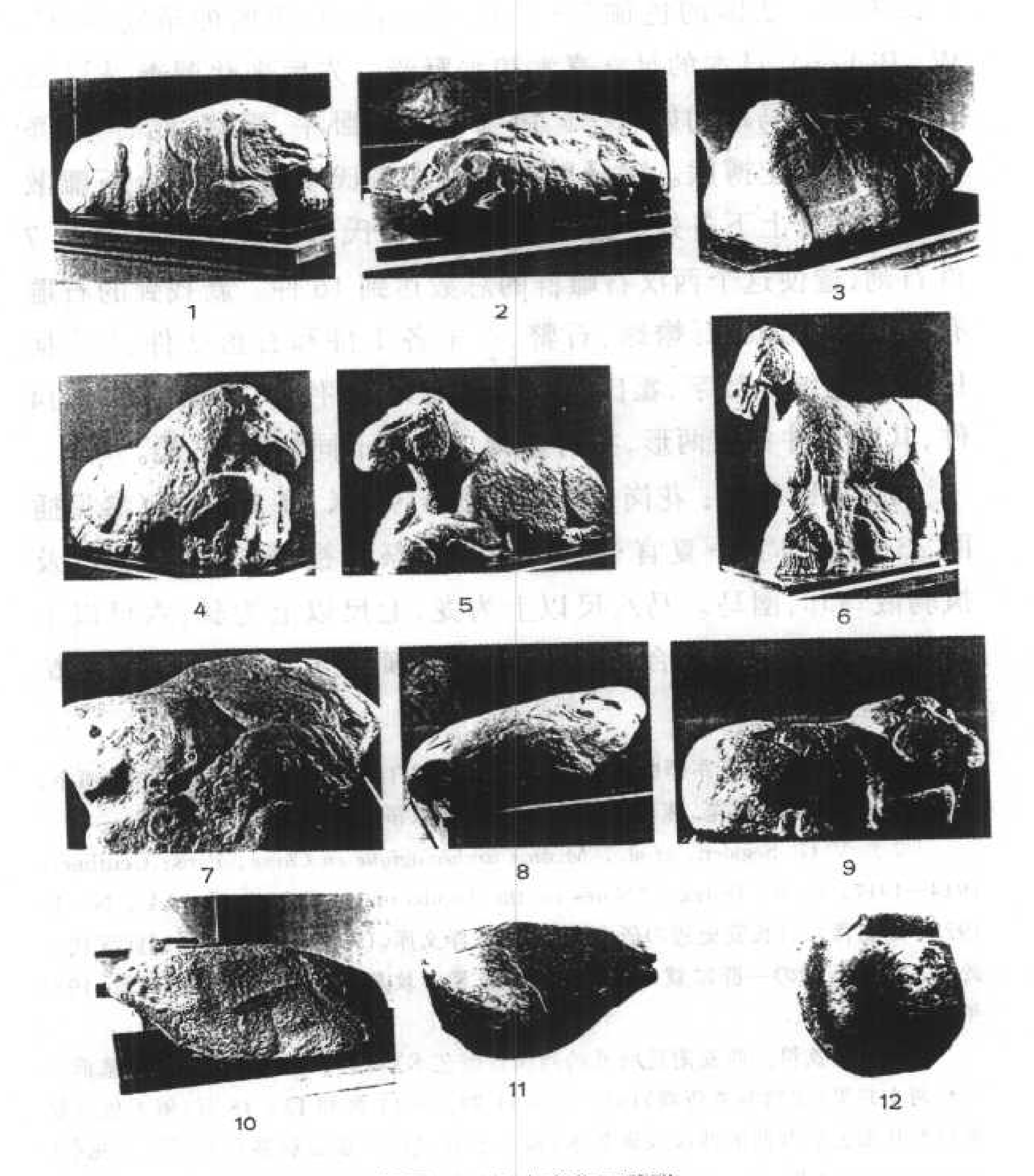


插图 23　霍去病墓石雕群

的马似为七尺以上的“駷”马，也就是蒙古马。马踏匈奴的匈奴俘虏仰卧于马身下，头从马的前腿探出，左手握弓，作挣扎状。匈奴俘虏短脸扁鼻，颇具蒙古人种特征。

2．卧马：伟晶岩雕凿。长约3.60米，头高1.44米。马腿屈卧，作伏地休息状。马头和全身肌肉分明，亦为蒙古马形象（插图23:5）。

3．跃马：伟晶岩雕凿。长约2.40米，头高1.50米。马头上昂，作初起状，头部和背部雕工很细，但是马身以下岩石未雕琢。这件石马和马踏匈奴的蒙古马相似，但是蒙古马不会如此高大，显然作了艺术夸张（插图23:4）。

4．幼象：雕于整块岩石之上，高0.58米，长1.89米，宽1.03米（插图23:3）。据说原在霍氏冢陵之上，60年代移置冢下西汉石雕艺术陈列室。《汉书·武帝本纪》记元狩二年，“南越王献训象、能言鸟”。霍去病卒于元狩六年，这时此象已来长安三载。陈直认为，此石幼象大概仿自南越驯象而造。[1]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大型石象亦属汉代遗存，这尊石象利用天然巨石通体浮雕而成，体长4.90米，宽3.45米，高2.20米，底座厚0.40米，四肢之间，未加透雕，充分显示了汉代圆雕早期特点。[2]

5．野猪：岩石雕刻。长1.63米，宽0.62米。头部较大，身上线条粗放，眼睛呈三角形。据说水野清一调查时，它被附近村民搬到家中当作榨油工具，后运回霍去病墓管理机构保存（插图23:2）。

---

〔1〕陈直：《陕西兴平县茂陵镇霍去病墓新出土左司空石刻题字考释》，《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63页。

〔2〕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文物》1981年第7期；李洪甫、武可荣：《海州石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8页。

6. 伏虎：岩石雕刻。长 2.00 米，高 0.84 米。形态凶猛，作潜伏状(插图 23:1)。虎身刻纹粗放。石虎亦列于西汉祭祀场所。东汉时期墓前列石虎成为制度。[1]

7. 卧牛：岩石雕刻。长 2.60 米，宽 1.6 米。石牛横卧，牛角不甚明显，背部有线雕鞍鞯和骑镫(插图 23:9)。这是欧亚大陆目前所见最早的骑镫之一。不过，有人怀疑上面的骑镫是后人所制。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贵霜铜壶。壶壁浮雕花纹上有两个手持长矛骑马骑士，马上均有绳索状脚镫。[2]金属马镫起源于中国[3]。1925 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畔一座贵族墓出土了金属马镫，年代约在公元 4—5 世纪，并被推测为柔然古墓。[4]公元 6 世纪金属马镫才在西方流行。据考证，金属马镫传入西方可能和柔然(或称"阿瓦尔")西迁有关。[5]

8. 力士搏熊：岩石雕刻。长 2.77 米，宽 1.72 米。石人披发，横卧地上，腰间束带，左手抱熊搏斗，石熊与人对咬。汉武帝好搏熊，在周至长杨宫建射熊观，司马相如随武帝到上林苑，作赋阻劝。[6]

9. 怪兽食羊：花岗岩雕刻。长 2.74 米，宽 2.20 米，前半部可看出是一只凶恶的双角兽的头部，嘴下伸出部分为一只小羊羔的身体和四肢，呈挣扎状(参见插图 23:7)。怪兽食羊是北方

---

〔1〕《水经·易水注》曰："其东谓之石虎冈，范晔《汉书》云：中山简王焉(指光武帝之子刘焉)之窆也，厚其葬，采涿山郡山石，以树坟茔，陵隧碑兽，并出此山。"

〔2〕E. Errington and J. Cribb, *The Crossroads of Asia*, London: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pp.163～164.

〔3〕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年，83 页。

〔4〕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151 页。

〔5〕关于马镫的最新研究，参见田边胜美：《ソグド美术にわけ东西文化交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 130 期，1997 年，248～277 页。

〔6〕陈直：《三辅黄图校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128 页。

草原动物纹青铜牌饰上常见题材。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发现过猛虎食鹿的错金银铜座(高 0.22 米,长 0.51 米)。[1] 类似的石雕还见于古波斯艺术,如猛狮扑牛石雕。一般认为,这个艺术主题来自斯基泰文化。

10. 石蟾蜍:岩石雕琢。长 1.54 米,高 0.70 米,宽 1.07 米。在一块向上翘起的天然石块上雕琢,翘起部分雕刻蟾蜍头部,刻有圆眼、阔嘴和一排牙齿,还刻出四肢。[2] 大型石蟾蜍在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亦有发现,长 2.40 米,宽 2.20 米,高 0.90 米,横卧于一个直径约 2.90 米的圆形石丘,属于汉代东海庙遗物。[3]

11—12. 石鱼:一共两件,原置于霍氏墓冢上两个明代小庙的门口。一件长 1.105 米,高 0.625 米,宽 0.41 米。雕刻粗放,呈扁方形,只将鱼首略加雕刻,嘴长并向上弯曲。另一件与前件大致相同,只是鱼嘴较小且直(参见插图 23:11—12)。《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墓"为冢像祁连山"。汉代祁连山并非甘肃祁连山,而是唐代祁罗漫山(今新疆巴里坤山)。[4] 巴里坤山顶有湖,汉代称"蒲类海",今称"巴里坤湖"。那么霍去病冢上列石鱼石蛙似乎寓意着祁连山蒲类海中鱼蛙。

13. 左司空题铭石兽:据报道,这个刻文石兽是 1957 年在霍去病墓附近发现,上面刻有篆书"左司空"三字(参见插图 24:

---

〔1〕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 1 期,1～2 页,图版贰·2。

〔2〕 王子云:《陕西古代石雕刻(I)》,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图版 10 及书后文字说明。

〔3〕 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文物》1981 年第 7 期;李洪甫、武可荣:《海州石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28 页。

〔4〕 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乌鲁木齐)1997 年第 1 期,11～20 页。

2)，刻在一块天然岩石上，尺寸不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左右司空”。所谓司空就是司工，乃负责土木工程的汉代官吏。[1] 1987 年以来，霍去病墓附近接连发现两块“左司空”题铭石，[2] 说明霍氏墓前石雕群均由汉少府左司空督造。

14．残石人：岩石雕刻，长约 2.22 米，宽 1.2 米，未作刻意雕琢。《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索隐引姚氏之说：“（霍去病）冢在茂陵东北，于卫青冢并；西者是青，东者去病。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3] 这个残石人似即其中之一。据说原在墓东路旁东侧，又称“矮人”或“残野人”。

15—16．石鳖和石羊：这两件石雕仅见傅天仇报道，尺寸不详。[4] 其中石鳖或与昆明池石龟大同小异。西汉石羊尚属罕见。1964 年陕西临潼康桥镇西义和村附近汉代墓地曾发现一对石羊，现藏陕西省博物馆。它们采用立体平雕，作蹲跪状，下有长方形石座，通高 1.02 米，底座长 0.72 米。[5] 调查简报将其年代定在西汉有误。西汉石兽一般无底座，这对带底座的石羊恐为东汉之物。

17．霍巨孟刻石：1957 年在霍去病墓附近发现，刻在不规

---

〔1〕 陈直：《陕西兴平县茂陵镇霍去病墓新出土左司空石刻题字考释》，《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11 期，63 页。

〔2〕 韩若春：《西汉霍去病墓侧新发现两块“左司空”题记石》，《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1 期，14 页。

〔3〕 《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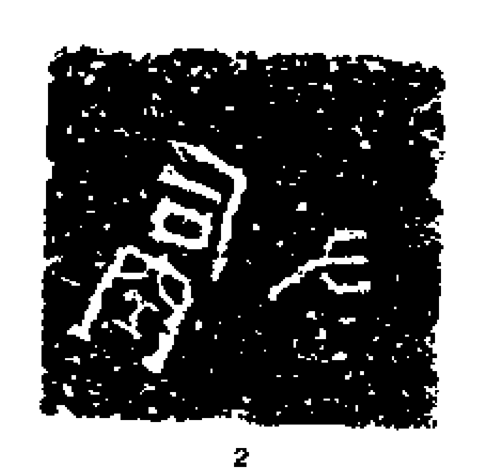
〔4〕 傅天仇：《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1964 年第 1 期，40～44 页。

〔5〕 李抑松：《临潼康桥石川河发现西汉石羊和仰韶文化遗址》，《文物》1964 年第 5 期，56 页。

则长条形岩石平面下端。铭文曰:“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该石刻采用隶书,直书一行凡七字,后三字横书,字框高 64 厘米,下宽 16.5 厘米,每字 7 厘米见方(参见插图 24:1)。[1] 这个



1



2

插图 24 霍去病墓刻石

发现说明汉武帝时中国书法仍是隶、篆并行。据徐森玉考证,平原乐陵系地名,也就《汉书·地理志》所记平原郡乐陵县。宿伯牙、霍巨孟皆为私名,身份不明。[2]

18. 霍去病墓竖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索隐引姚氏

---

〔1〕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文物志》第 66 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年,204 页。

〔2〕 徐森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文物》1964 年第 5 期,2~3 页。

说:“冢在茂陵东北,于卫青冢并;西者是青,东者去病。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1]《说文·石部》:“碑,竖石也。”霍去病冢上竖石大概类似于后世墓碑。汉代最早的墓前立石首推项羽墓前碣石。晋郭缘生《述征记》云:“项羽墓在谷城西北三里半许,毁坏,有碣石‘项王之墓’。”[2]《水经·济水注》亦云:“又西北入济水,城西北三里有项王羽之冢,半许毁坏,石碣尚存。”碣,指在天然石块上刻铭,汉代以前刻石大都采用碣石形式。[3]后世墓碑即从西汉墓前这类碣石发展而来。

19. 麃孝禹刻石: 清同治年间在山东费县平邑集发现,现存山东省博物馆。刻石略呈锥形,表面粗糙,圭首无穿,铭文最上部刻有立鸟。通高1.45米,上宽0.39米,下宽0.45米,厚0.25米。[4]其铭曰:“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里麃孝禹”。河平三年相当于公元前26年。一般认为,这个刻石是墓碑或神道碑之类。那么麃孝禹刻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汉墓碑(参见插图25)。

20—21. 石趺与龟趺: 秦刻石凿石穴以立石,汉代开始出现类似后世碑座的石趺。《续汉书·祭祀志上》记载:“上(指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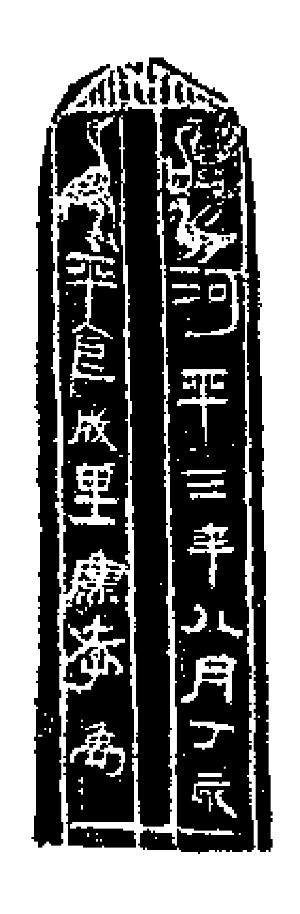
---

〔1〕《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略同。据顾铁符考证,姚氏大概是南北朝陈国的姚察(533—606年),著有《汉书训纂》三十卷,今已失传。《陈书·姚察传》说:他曾出使北周,到过关中渭水一带,著有《西聘道里记》。所以姚察所记霍去病墓的情况,当系实地考察资料。说见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4页。

〔2〕《史记·项羽本纪》正义引。

〔3〕关于碑与碣的区别,参见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6~7页。

〔4〕顾铁符:《泰山没字碑的性质与时代问题》,《文物》1964年第5期,30页;山东博物馆编:《山东省博物馆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96及180页图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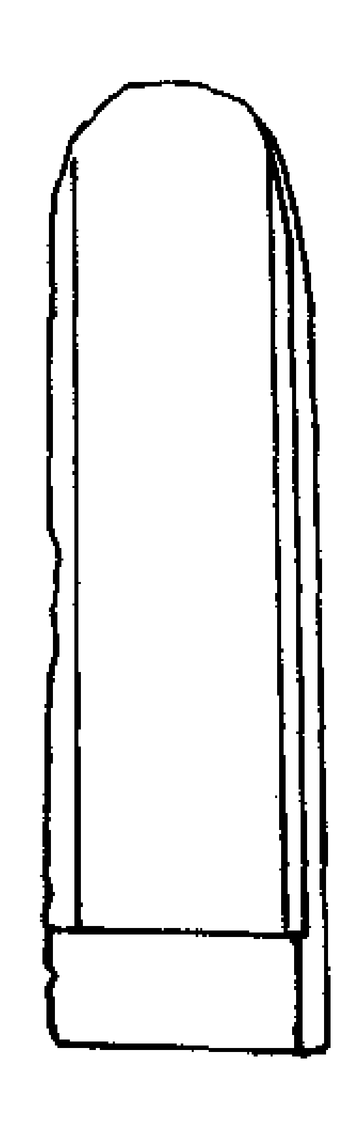


插图 25　麃孝禹刻石

帝)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故事……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故知汉武帝元封年间已出现石跗。后世皆以石龟代替石跗负碑,或称"龟趺"。最早使用龟趺的是博山炉座。山西和西安等地西汉墓中均有发现。[1] 龟趺负碑年代较晚。《汉书·王莽传中》云:"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书始命于皇帝……皇帝复谦让,未即位,故以三铁契,四以石龟。"这个记载似表明王莽时

〔1〕 西安市文管会:《西安市发现一批汉代铜器和铜羽人》,《文物》1966 年第 4 期,8 页图三;李学文:《山西襄汾县吴兴庄汉墓出土铜器》,《考古》1989 年第 11 期,981 页及图版壹·5。

已经有龟趺。目前所见西汉文物中尚无龟趺负碑，最早的实例为东汉之物。例如：山东平度侯家村的光和六年王舍人碑以及四川芦山建安十年樊敏碑等。[1]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发现过四个石龟，支垫在棺柩之下。山东安丘近年也发现类似的东汉石龟。[2]

三、封禅勒铭与地界石

西汉诸帝仿效秦始皇，巡游天下，到处封禅勒铭。此外，西汉还出现了一些前代没有的大型石刻，如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勒铭、群臣上醻石和西汉朐柜两县分界石等。

汉武帝屡次上泰山封禅勒铭，在泰山上下都有刻石。《汉书·郊祀志上》说："上因东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乃令人上石立泰山颠。"据应劭介绍，汉武帝泰山顶刻石在秦始皇泰山刻石之北。[3]应劭《风俗通义·封泰山禅梁父》说："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尺)，刻之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4] 应劭自中平六年起任泰山太守，兴平元年为曹操所迫，弃职奔冀州，在泰山郡任职六年。他对武帝泰山刻石的记录应出自本人实测。除在泰山顶刊石外，武帝

---

〔1〕 曹丹：《芦山县汉樊敏阙清理复原》，《文物》1963年第11期，65～66页。

〔2〕 参见《安丘发现汉代石龟》，《中国文物报》1994年9月25日，第1版。

〔3〕 《续汉书·祭祀志上》引《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曰："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武帝在其北。"

〔4〕 《后汉书·祭祀志》刘昭注所引《风俗通》作"石高二丈一尺"，疑有误。否则，长宽不成比例。

亦在泰山下刊石。据应劭《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1]那么武帝泰山下刻石高2.85米,宽0.71米,厚0.28米。[2]武帝泰山上刻石高度和山下刻石完全相同,其余尺寸未见记载。疑与山下刻石相仿。

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狩四年(前119年)冬"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3]颜师古注:"登山祭天,筑土为封,刻石纪事,以彰汉功。"[4]关于这次汉匈之战,《史记·匈奴列传》云:"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代,指今山西北部;翰海,即苏武牧羊之地"北海"(今贝加尔湖)。狼居胥山在两地之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东面。[5]东汉窦宪大败北匈奴后,命班固在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刊石勒铭。寻其渊源,当始于封狼居胥山铭。近年有报道说,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阿左旗腾格里苏木的通湖山发现了汉武帝时期的碑刻。[6]不过据北大考古学系孙危调查,此碑实乃东汉摩崖石刻,附近有汉代烽燧,碑文提到"[王]莽之乱"和东汉光武帝年号"建武"等,说明此碑立于东汉,而非汉武帝时。[7]

---

〔1〕《续汉书·祭祀志上》所引。

〔2〕西安碑林博物馆藏两件东汉黄肠石自题"广三尺",实测为77厘米。比一般东汉尺稍长。参见《陕西省志·文物志》第66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204页。

〔3〕《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所述略同。

〔4〕此事亦见《汉书·武帝本纪》。

〔5〕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第二册,北京: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39页。

〔6〕《中国文物报》(第37期)1994年9月18日第1版。

〔7〕孙危:《内蒙古阿拉善东汉边塞碑铭调查记》,《青年考古学家》第11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99年,98~100页。

西汉著名的封禅石刻还有群臣上醻石，清道光年间杨兆璜寻访发现，位于河北邯郸永年县永合乡吴庄村北约1公里外朱山（或称“娄山”）山顶。据报道，群臣上醻石实际上是个摩崖刻石（参见插图26），刻在朱山顶一块细红沙岩石斜面上，西向；[1]每字高三寸余（10厘米），若加上字间距，通高在2米左右。铭文曰：“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这个石刻使用小篆，金石学家原以为系赵武灵王立石或十六国后赵之物，均不确。正如马衡和徐森玉所考，赵廿二年应是赵王刘遂二十年，相当于汉文帝后元六年。[2]上醻旧释上寿，疑有误。此石刊于娄山，似为封山祭神刻石。《汉书·元帝纪》云：“建昭四年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人。”所谓“上寿”当即群臣上醻石的“上醻”。古文醻、酬通假，“上醻”意为用酒酬祭神灵。《汉书·郊祀志上》记载：“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诏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群



插图26　群臣上醻石

〔1〕石永士等：《河北金石辑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20、310页。

〔2〕马衡：《石刻》，《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49页；徐森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文物》1964年第5期，2页。据《史记·孝文帝本纪》，文帝二年三月，刘遂即赵王位。



插图 27　西汉朐、柜两县分界石

臣上醻石刻于文帝十三年诏之后，疑为刘遂奉文帝诏祝祭“名山大川在诸侯”之遗物。李零提醒我注意，“醻”字亦通作“酎”。《史记·平准书》记载：“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集解引《汉仪注》曰：“王子为侯，侯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以助祭。大祀日饮酎，饮酎受金。金少不如斤两，色黑，王削县，侯免国。”汉初许多诸侯王因不能如数交纳酎金而失侯除国。[1] 如果“醻”与“酎”字通假，那么“上醻”指向朝廷供奉祭祀用金。

1984 年，在连云港市港口东北 2 公里一座海岛上发现了西汉朐、柜两县分界石（参见插图 27）。这个海岛由东西两个小岛连接而成，今称“东西连岛”。汉代分界石位于东西连岛东端羊窝头峰北坡灯塔山西侧临海处，地理坐标东经 119°29′18″，北纬

〔1〕《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同书《惠景间侯者年表》。

34°45′。刻石临海而立，在海平面平均潮位之上8米。刻石系花岗片麻岩质，发现时已断为两截，一件高1.1米，宽0.7米，有文四行；另一件高1.1米，宽0.86米，有文四行。两石及刻文皆可拼合，通高2.2米。字体在篆、隶之间。铭文曰："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界与北界尽。郡因诸山山坡以北[界]柜，西，直诸□□，与柜分，高[山]为界；东，各分[诸]无极。"可知这个石刻是西汉东海郡朐县与琅琊郡柜县分界石。[1]

目前所见西汉地界石，还有山东邹县卧虎山出土始建国天凤三年莱子侯刻石以及地节二年巴州民杨氏买山记及画像石等。[2]因器型较小或为墓中之物，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四、其他大型石器具

50年代末，青海海晏县三角城遗址发现了一个西汉虎纽石匮，现藏海晏县文化馆(参见插图28)。以前研究者只关注这个石匮上的石卧虎，其实这件文物更重要的价值是为我们提供了汉代石匮的标本。它由器、盖两部分组成，花岗岩雕凿。通高2.03米。器高1.57米，长1.37米，宽1.15米，盖高0.65米；器内径未见报道，估计约0.6×0.7米，深度不详，当为存放物品之所。器身中心线两端各有一小凹槽，长13厘米，宽8.5厘米，估计是供封检用的封泥槽。匮盖也是1.37米长，1.15米宽，盖上

---

〔1〕刘凤桂、丁义珍：《连云港市西汉界域刻石的发现》，《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232～236页。

〔2〕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85～86页。





插图 28　西海郡石匮

雕了一只卧虎，虎身长1.32米，头高 0.46 米。[1] 虎头所在一侧，器壁阴刻 3 行篆字铭文。铭文曰："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七月癸巳，工河南郭戎造。"[2] 据《汉书·王莽传》，西海郡设于西汉元始四年王莽平西羌之后，始建国元年即公元 9 年。那么这个石匮应是王莽篡位后，专为新设不久的西海郡而作。

西汉大型石刻还有石床、石榻。《西京杂记》卷六说"魏襄王冢，皆以文石为椁……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说明先秦时代已出现石床。汉武帝曾赐予嬖臣董偃一个浮雕石床。《三辅黄图》卷三描述这个石床说："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文如锦。"服虔《通俗文》曰："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那么汉榻长 0.84 米，汉床长 1.92 米。武帝赏给董偃的浮雕石床

〔1〕 这个石匮的最初报道见赵生琛：《青海海晏的汉代石虎》，《文物》1959 年第 3 期，73 页；安志敏：《青海的古代文化》，《考古》1959 年第 7 期，380～381 页；卢耀光：《西海郡〈虎符石匮〉管见》，《青海文物》1995 年第 9 期，33～38 页。

〔2〕 李零：《说匮》，《文物天地》1996 年第 5 期，14～16 页。

至少有2米长，堪称西汉最大的浮雕艺术品。目前考古资料中未见西汉石床。河北望都所药村东汉墓发现过石床，长 1.59 米，宽 1 米，高 0.18 米。[1] 西汉石床的规格大致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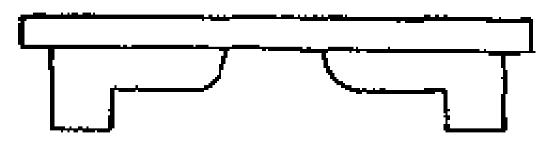


插图 29 河南郸城县出土西汉石榻拓片

50年代，河南郸城县竹凯店村南 1 里西汉砖室墓内出土了一个石坐榻（参见插图 29）。青色石灰岩制作，平面呈长方形，四角有足。通长0.875 米，宽 0.72 米，高 0.19 米。这和服虔记汉榻尺寸几乎完全相同。榻面有隶书一行。其铭曰："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据《续汉书·百官志》，"至汉成帝，省内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太傅曰傅。"王君称"大傅"，应是成帝以前常山国某诸侯王的太傅。[2]这个石榻为研究西汉大型石刻的类别提供了重要标本。

---

〔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望都二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 41。

〔2〕 曹桂岑：《河南郸城发现汉代石坐榻》，《考古》1965 年第 5 期，257～258 页。

据以上调查,目前所见西汉大型石刻已达40多件。最大的如太液池大石鱼,长达4.90米;小的如霍去病墓的石蟾蜍,亦有1.1米左右。霍去病墓大型石雕群表明,汉帝国纪念碑式石刻艺术已开始从单一雕像向组合式石雕群发展。

3

秦汉大型石雕艺术的起源

秦汉纪念碑式大型石雕艺术不仅工艺精湛，而且规模庞大，在其突兀兴起之前必然有个发展阶段。史书两次提到先秦刻石。其一，《穆天子传》记周穆王访西王母之邦，“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其)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其二，《史记·秦本纪》说：“蜚廉为纣石(拓)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那么，中国大型石雕艺术的兴起与帝王祭祀活动相关。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首推石鼓文、诅楚文，皆属古代祭祀刻石。

石鼓于唐贞观中在天兴县南二十余里处出土，凡 10 件，石呈鼓状，高 0.9 米，直径 0.6 米，周长 1.88 米，侧面环刻文字，内容为类似《诗经》的四言诗(参见插图 30)。唐天兴县在今凤翔县城关，其南二十余里，实际上已进入唐陈仓县。况且《元和郡县图志》并没说石鼓文一定出在天兴县境内。所谓“石鼓文在县南二十里许”，不过是说石鼓文出土地点与天兴县城之间的距离。在最初的报道中，诸家皆曰石鼓文出自陈仓县。李嗣真《书后品》说：“史籀堙灭，陈仓籍甚。”张怀瓘《书断》说：“‘石鼓文’盖叙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县。”杜甫《赠李潮八分小篆》云：“陈仓石鼓久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既然石鼓文出在陈仓县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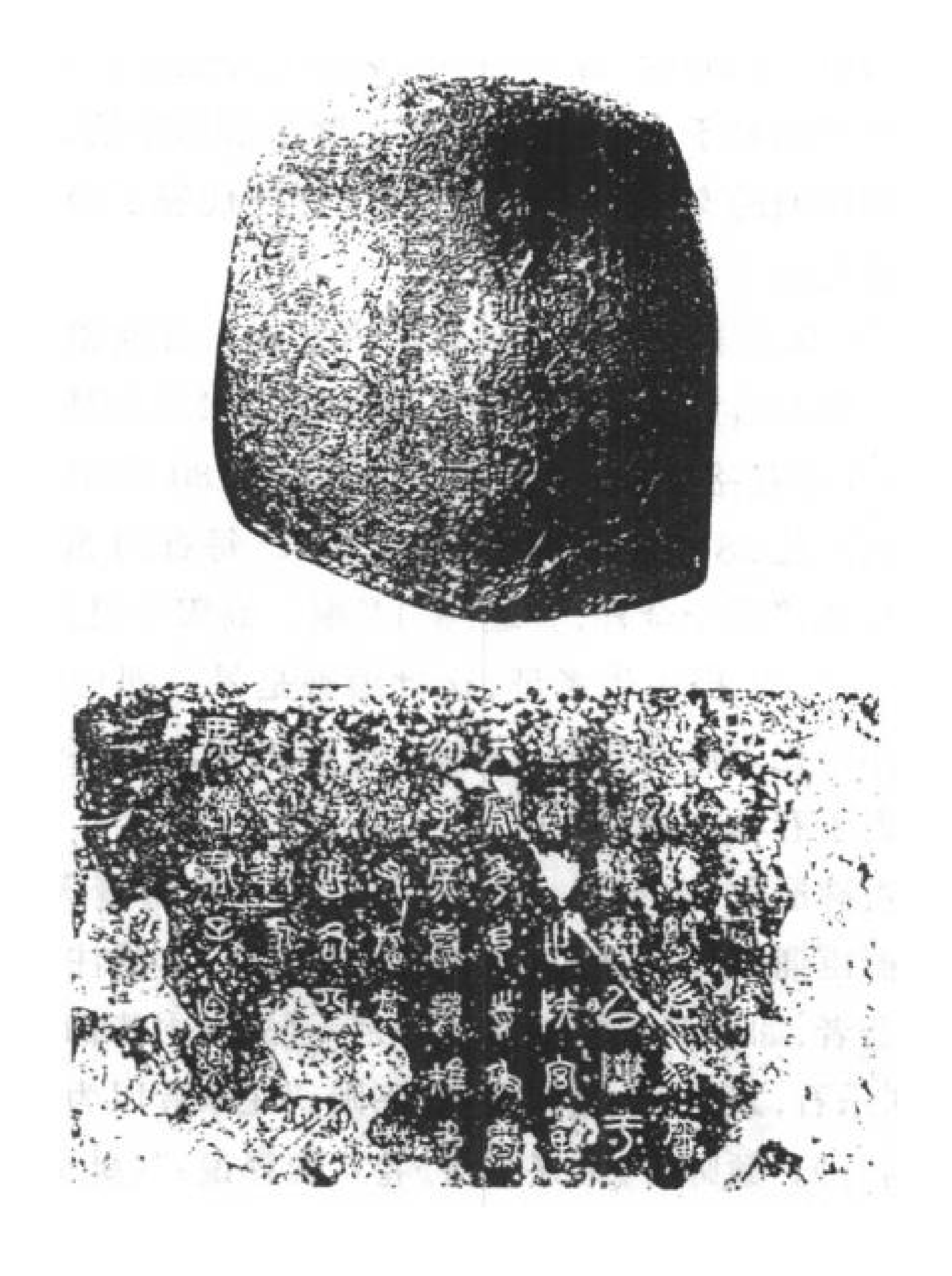


插图 30　秦石鼓

地,很可能在今天陕西宝鸡县贾村塬。据考古调查,“宝鸡县贾村公社(乡)所属贾村、上官村、灵陇村是一处面积较大的西周和春秋时期遗址,南北长 4 至 5 华里,东西宽约 2 华里。西北部高亢,发现窖穴、灰坑、陶窑以及建筑遗迹。”[1] 因此,石鼓文有可能在这一带出土。

〔1〕 卢连成:《西周矢国史迹考略及相关问题》,《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安:《人文杂志》编辑部,1984 年。

关于石鼓文的时代，古文字学家裘锡圭评述说："从字体看，石鼓文似乎不会早于春秋晚期，也不会晚于战国早期，大体可以看作春秋战国间的秦国文字。"[1] 这个评述代表了当今学术界对石鼓文断代的主流意见。

1986年，凤翔县秦景公大墓盗洞内发现一批勒铭石磬。这个发现使学界对石鼓文的年代有了新认识。景公大墓出土编磬大约30余片刻有铭文(参见插图31)，累计180多字。最大的一磬，经缀合，凡38字，已接近石鼓文字数(每石约50字)。磬铭最后几句是："天子㝨喜，龚桓(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鼏(宓)，平……"[2] 据王辉考证，这批编磬是景公即位第四年行冠礼时所作祭祀宗庙的乐器。同时，他还敏锐地观察到石鼓文的年代不迟于春秋晚期。[3]

中国古碑屡称"乐石"。绎山刻石曰："今皇帝壹天下，兵不复起……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4] 章樵注："石之精坚堪为乐器者，如泗滨浮磬之类。"柳宗元《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云："刊乐石，篆遗德，延休烈，垂宪则。"注家皆以为"乐石"典出《绎山刻石》。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八解释说："《禹贡》称徐州'绎阳孤桐，泗滨浮磬'，言泗水之滨有石可以为磬。盖秦之所刻即是磬石，近泗滨，故谓之'乐石'尔。所以独绎山之文称之，他刻石则无此语也。"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乐石条："世俗志铭之

〔1〕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55页；关于石鼓文年代讨论，详见裘锡圭：《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1期，40～48页。

〔2〕 王学理等，前揭书，271～272页、389～390页。

〔3〕 王辉：《由'天子''嗣王''公'三种称谓说到石鼓文的时代》，《中国文字》1995年新12期，135～166页。

〔4〕 参见《古文苑·李斯〈绎山刻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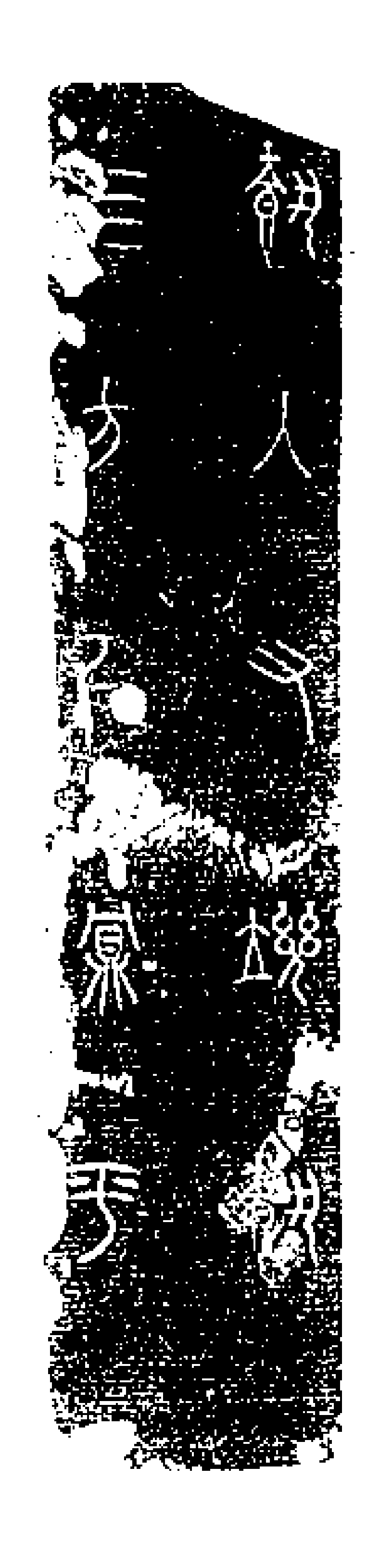




插圖 31 秦景公大墓出土勒銘石磬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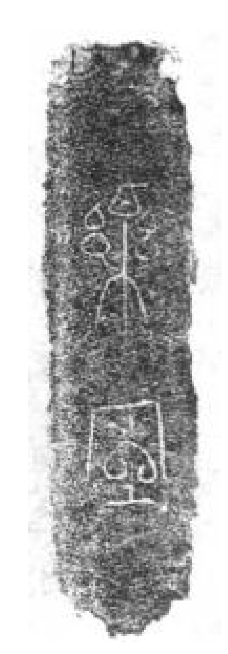


插图 32　山东临淄战国勒铭石磬

文，每云‘刻之乐石’，盖本绎山碑文有‘刻之乐石’之语而袭用之，不知引用误也。……文士通用于碑碣，误矣。”其说不尽然。秦景公大墓出土勒铭石磬残块 30 余件，累计数字多达 180 字。此外，山东临淄齐都镇的韶院村也发现过战国勒铭石磬(参见插图 32)。[1] 这些发现表明“刻此乐石”之语由来已久。这个成语说明先秦刻石源于石磬勒铭，而石鼓文则是中国“刻此乐石”之第一石。琅琊台刻石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

〔1〕 张龙海：《临淄韶院村出土铭文石磬》，《管子学刊》1988 年第 3 期，96 页及封底磬铭照片。该文推测石磬勒铭属于春秋时期。不过李零告诉我，这个石磬勒铭大概属于战国时期。

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

秦石鼓开创了中国纪念碑式大型石刻的历史先河，但是大型石刻并没有随秦石鼓立即在中原兴起。究其原因，显然受青铜时代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从世界文明史发展进程看，纪念碑式大型石雕艺术品都是铁器时代的产物。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朝（前2565—前2440年）法老胡夫的基泽金字塔内发现了铁器工具，说明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金字塔是靠铁器工具建造的。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II.125）提到造大金字塔时使用了铁器。胡夫的后继者凯夫伦法老所造斯芬克斯像也使用了铁器工具。[1] 埃及考古史上著名的三语碑铭—罗塞塔石碑刻于公元前7世纪，亚述石刻艺术流行于公元前9—前7世纪，皆为铁器时代的产物。

秦石鼓无疑是铁器时代的产物。秦景公大墓发现十余件铁铲和铁锸，说明春秋晚期秦人已开始用铁工具。尽管春秋初年黄河流域就出现了铁器，但是古今先进技术往往首先用于军事，中国亦不例外。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铁器都是铁兵器。例如：1990年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出土了春秋初期玉柄铁剑；甘肃灵台县景家庄春秋中期墓发现铜柄铁剑；1993年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中期墓出土了金柄铁剑。[2] 直到战国中晚期，铁工

---

[1] 林志纯等：《世界上古史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285、313页；关于埃及法老的编年，参见威廉·兰格著、刘绪贻等译：《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62页。

[2] 灵台铁剑，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321页；虢国墓地铁剑，参见《中国文物精华（199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图版104及书末文字说明，但是该书将其年代定在西周晚期，疑不确；宝鸡墓地的铁剑，参见宝鸡市考古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0期。

具才在中原普遍使用。正是这个时期，秦昭襄王在位（前 306—前 251 年），雕凿了一大批纪念碑式大型石刻，包括诅楚文、都江堰镇水三神石和蜀守李冰造五石犀等。

诅楚文系秦巫师诅咒楚国的碑形石刻，在三个地方出土。其一，巫咸文，宋嘉祐年间在凤翔县（今陕西凤翔旧城北街）唐开元寺出土；其二，大沈厥湫文，宋治平年间在朝那湫（今宁夏固原附近）出土；其三，亚驼文，北宋年间在真宁县要册湫（今甘肃泾川附近）出土。[1] 诅楚文类似于《楚辞·九歌》，系秦巫师实施咒术的祝词。郭沫若考其内容与楚怀王有关。问题是《史记·楚世家》记怀王名熊槐，与诅楚文中熊相不同。郭先生释为一名一字，疑不确。古文甶、鬼通用，小盂鼎中鬼方之“鬼”就写作“甶戈”。熊槐之“槐”原文疑作“柚”。后一字声旁从“甶”，和“相”字读音相近。如果熊相即怀王，那么诅楚文刻于秦昭襄王二十五年白起拔郢前夕。苏轼《凤翔八观诗》两次将诅楚文称为“碑”，宋姚宽《西溪丛语》将诅楚文称为“岐阳之石”、“朝那之石”和“亚驼之石”。元顺帝至正年间尚有诅楚文摹拓本传世。所以诅楚文系碑形石刻殆无疑问。从摹拓本看，巫咸文和大沈厥湫文每行 10 字。秦泰山刻石亦每行 10 字，或本自诅楚文之制。诅楚文每石 320 字左右，和秦刻石字数相近。如果诅楚文三面刻字，接近秦泰山刻石，石高 2 米；如果单面刻字，则接近秦会稽刻石或琅琊台刻石，石高 3 至 5 米。

秦蜀守李冰治水建都江堰，为了便于观测水位，“于玉女房

---

[1]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年。郭老以为亚驼文系赝品。最近有学者提出亚驼文系真品，参见陈昭容：《从秦系文字演变的观点论〈诅楚文〉的真伪及其相关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2 本第 4 分册，1993 年，574～576 转 602 页；袁锡圭：《诅楚文“亚驼”考》，《文物》1998 年第 4 期，15～18 转 27 页。

下白沙(原误作“自涉”)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1] 江神,或称“江水”,先秦蜀地神祇,汉代仍为江水神立祠。[2]白沙邮是秦人在蜀地设立的邮置,在今四川灌县西八里白沙街。1974年,白沙街附近鱼嘴外江一侧江底意外挖出一尊东汉灵帝年间造李冰石像,高2.9米,重4.5吨。题铭曰:“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二月十五日,都水掾伊龙、长陈壹造三神石,珍(镇)水万世焉。”[3] 1975年,鱼嘴附近外江河水中心又挖出一躯持锸石人像,东南距离李冰石像出土地约37米。两尊石像现存灌县都江堰离堆北端伏龙观大殿。持锸石人像由整块灰白色砂岩琢成,头像断缺,残高1.85米,肩宽0.75米,底宽0.9米,重达两吨多(参见插图33:1)。[4] 史载,李冰镇水三神石东汉时尚在,这个持锸石人也许是李冰镇水三神石的仿制品。50年代末,四川芦山县东汉墓出土了一个持锸石神像(参见插图33:2),高约1.26米,现存芦山县文化馆。[5] 这个石神像估计是摹仿李冰镇水三神石而造。相传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扬雄《蜀王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6] 这个说法不一定对,但它有助于说明蜀地确实有祭祀大禹的习

---

〔1〕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2〕《汉书·郊祀志上》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江水,祠蜀。”

〔3〕 四川省灌县文教局:《都江堰出土东汉李冰石像》,《文物》1974年第7期,27~28页;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文物》1974年第7期,29~32页。

〔4〕 四川省博物馆:《都江堰又出土一躯汉代石像》,《文物》1975年第8期,89~90、图2~3。

〔5〕 陶鸣宽、曹恒钧:《芦山县的东汉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41页图三。

〔6〕《太平御览》卷八二夏禹条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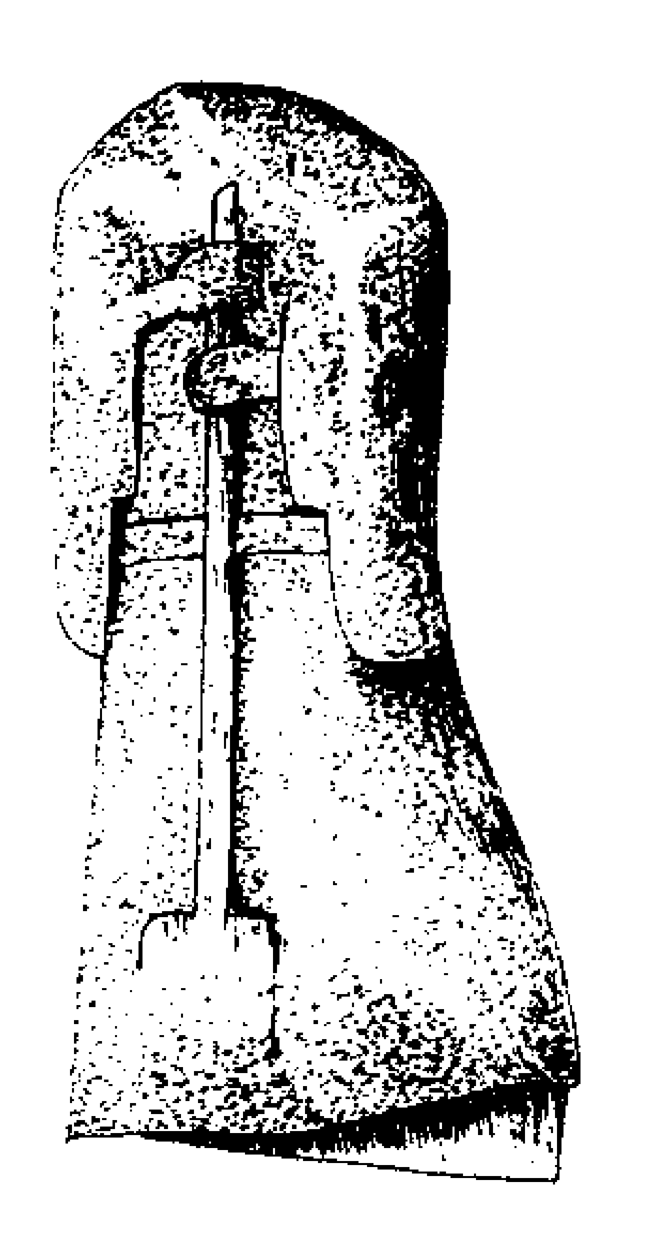



插图33　1. 都江堰镇水三神石　2. 芦山东汉墓出土大禹神像

俗。[1]我们甚至怀疑，都江堰镇水三神石中有大禹神，不知是否为这种持锸石神像。李冰还在蜀地造过五头石犀牛。[2]其中

〔1〕关于古代蜀国祭祀大禹的民俗，参见工藤元男著、徐世虹和郗仲平译：《禹形象的改观和五祀》，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1～26页。

〔2〕《蜀王本纪》记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牛五枚。二枚在府中，一在市南下，二在渊中，以压水精，因曰石犀里也。"《华阳国志·蜀志》亦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又曰："蜀郡……郡治少城……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也。"

一个后来移置晋代佛寺圣寿寺门前。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云:“石犀在庙之东阶下,亦粗似一犀……石犀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圣寿寺在今成都市新西门内将军衙门附近,但石犀牛早已不知所在。

尽管三神石和五石犀位于蜀地,但它们都是秦国官吏督造,属于秦文化。《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昭襄王曾赠与蜀王五头便金石牛,蜀王为把这五头石牛运回家,开山辟路,修成金牛道。[1] 金牛道从今陕西勉县西南行,越七盘岭,经朝天驿,趋剑门关,全长247公里,直抵成都。[2] 文献从未提到这五头便金石牛置于蜀地何处。我们怀疑,它们就是世传李冰造石犀牛。

秦人凿刻石人石兽由来已久。文献提到秦人祭祀场所列有大型泥塑。《史记·封禅书》记秦献公定都栎阳,“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索隐引《汉旧仪》曰:秦人“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秦汉西县即今甘肃礼县。西县人先祠“土人”似指大型泥塑人像。秦兵马俑和铜车马殆与秦神祠的大型泥塑人像一脉相承。[3] 1986年秦景公大墓发掘出一个石马头,形态逼真。近年凤翔秦公九号陵园又出土了三件小石俑。一件高22.8厘米,肩宽6.4厘米,躯体粗壮,面部丰满,眼嘴凿痕依稀可辨;另一件高21.4

---

〔1〕 扬雄《蜀王本纪》称秦惠王(前337—前311年)造五石牛。唐李泰《括地志》卷四将其称作“石牛道”。

〔2〕《陕西省志·文物志》第66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45~46页。

〔3〕 中国最早的泥塑人像始见于辽河凌原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参见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1期,1~11页;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并见《文物》1986年第8期,1~17、18~24页。

厘米，肩宽6.4厘米，体形较瘦，嘴眼清晰。[1] 所以关中地区可能是中国古代纪念碑式金石雕像发源地之一。秦文化大型石雕艺术从关中向巴蜀传播路线大概途经金牛道。

《庄子·达生篇》说："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犹惊鬼神。"意思说：梓庆为铸造编钟雕刻木模具，编钟造好后，就连鬼神见了都害怕。梓庆即"梓磬"，指制作钟磬的工匠。这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手工艺。在安阳殷墟发掘中，侯家庄、武官村一带的大墓发现过一批青白大理石雕刻，有的长达1米左右，如殷墟大墓出土的双兽石雕和虎纹石磬。那么，中国石雕艺术在晚商业已产生。《周礼·冬官·考工记》时代，梓庆有了进一步分工，分为专造编钟的"梓人"和专造石磬的"磬人"。刘敦愿认为："根据《梓人为笋虡》的这段记载来看，其内容所讲的不是如何制作笋虡的问题，而是如何装饰笋虡的问题，完全是一篇纯粹论述古代装饰艺术、雕刻艺术问题的理论文字。"[2] 先秦石刻艺术家大概从制作编钟编磬的梓庆或梓人分化而来。凡此表明，中国纪念碑式大型石雕首先在中原兴起。

---

[1] 王学理，前揭书，第262～265页。

[2] 刘敦愿：《〈考工记·梓人为笋虡〉条所见雕刻装饰理论》，《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2年第2期，76～81页。

4

欧亚草原文化对中国石雕艺术的影响

中国古代墓葬均无墓上标记。《吕氏春秋·安死》提到"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说明战国时代开始出现类似于后世墓碑的竖石。然而,中国古代墓前立石究竟如何起源,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一种意见认为,先秦墓碑源于先秦时代墓葬挽棺用的木碑。[1] 1986年在凤翔秦景公墓土圹南北两侧各发掘出一个残高1.7至2米的大型木柱。[2] 有学者认为,这些木柱就是文献说的挽棺用木碑,汉代墓前立碑从这种木碑发展而来。另一种意见主张,大型石刻在中原文化中找不到先源,似受外来文化影响产生的。[3] 这个建议得到考古资料的支持。30年代河北平山县七汲村中山王墓区发现过一个战国刻石,刻在未加修饰的河光石上,石高0.9米,宽0.5米,厚0.4米,凡19字,今称

〔1〕 此说根据《礼记·丧大礼》郑玄注"又树碑于圹之前后,以绯绕碑间之鹿卢,挽棺而下之"。

〔2〕 这两件木碑的照片,参见韩伟:《秦公大墓发掘记》,《人民画报》1987年第5期。

〔3〕 李零:《秦汉礼仪中的宗教——关于〈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的考古学思考》,the lecture notes for a workshop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7。

“监囿守丘刻石”。[1] 中山国属于白狄系统鲜虞族。[2] 那么中山王陵墓前立石传统有可能来自北方草原游牧人的丧葬习俗。

欧亚草原年代最早的地面石人像是 1973 年在黑海北岸克尔诺索伏卡地区颜那亚墓地发现的。这个石像高 1.2 米,上刻一束梅花、三把斧头和一把柳叶剑,下刻双马神图像(参见插图 1:3)。[3]颜那亚文化流行年代约在公元前 3600—前 2200 年。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地面石人像,是 60 年代在新疆阿尔泰山南麓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墓地发现的。类似的墓葬在阿尔泰山西麓和北麓亦有分布。克尔木齐墓地起初被误认作突厥石人墓。正式发掘后才知道这里多数古墓不属于突厥时期。[4] 近年有学者将其称作“克尔木齐文化”。[5] 这个命名尚存疑义,因为克尔木齐墓地的文化内涵相当复杂,至少包括石棺石垣墓和竖穴土坑墓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化,延续时间也很长,从金石并用时代直迄铁器时代。

从随葬器物看,克尔木齐墓地早期墓(M16、M17 和 M21)属于中亚奥库涅夫文化,晚期墓(M18)属于突厥文化。早期墓

---

〔1〕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 1 期,1~2 页,图版捌·1。

〔2〕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古族甄微》,成都:巴蜀出版社,1993 年,133~137 页。

〔3〕 J.P. Mallory,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Language, Archaeology and Myth*,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 p. 176, 204, pp. 210~221.

〔4〕 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文物》1962 年第 7—8 期合刊,103~108 页;蒙盖特著、潘孟陶等译:《苏联考古学》,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1963 年,115~117 页;易漫白:《新疆克尔木齐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23~32 页。

〔5〕 陈光祖著、张川译:《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1995 年第 1 期,86~8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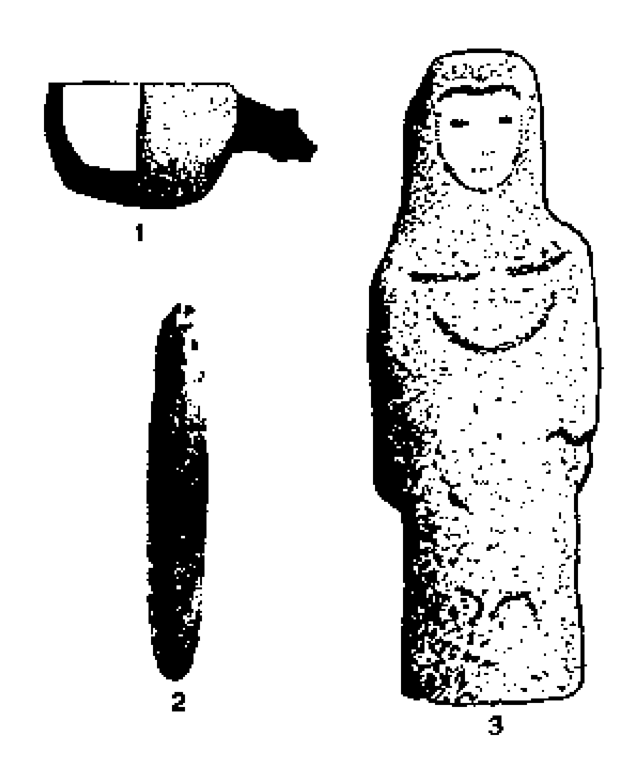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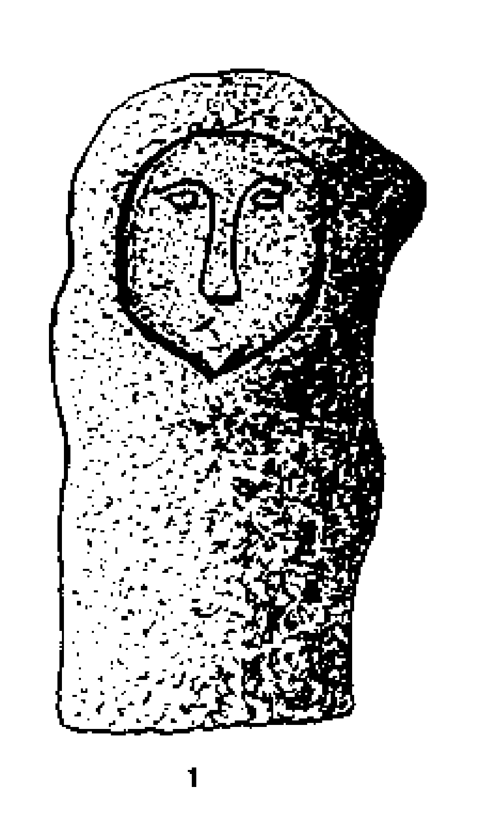
插图 34　奥库涅夫文化石雕艺术

又分为石垣群棺墓（M16、M17）和单棺墓（M21）两类，均无封土。随葬陶器、牛首把石臼和小石俑等大多与中亚奥库涅夫文化相同（参见插图 34：1 和 2）。这类古墓首先在南西伯利亚米奴辛斯克盆地发现，年代晚于中亚草原阿凡那羡文化，而早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约在公元前 2000—前 1700 年之间。人类学资料表明，奥库涅夫人属于蒙古人种，而阿凡纳羡人和安德罗诺沃人则属于高加索人种。[1] 所以奥库涅夫人可能是后来称雄北方草原的阿尔泰语系游牧人的祖先。他们在墓前立石的传统后来被匈奴、突厥等阿尔泰语系游牧人传承。

奥库涅夫文化晚期开始出现墓地石人，比如，新疆克尔木齐 M16 号石垣群棺墓的两尊石人。在此前后，阿凡纳羡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皆不见墓前立石。那么奥库涅夫人在墓前立石可能是自身发展的结果，中亚草原的卡拉苏克文化也在墓前立石，

---

〔1〕 马克西缅科夫著、林沄等译：《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参考资料》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年，81～103 页。


1


2

插图 35　哈密石人和李家崖文化石人

有鹿石和墓地石人两类。后者较晚才出现，与奥库涅夫石人的关系尚不清楚。

黄河流域的地面石人像最早出现在和北方草原文化关系密切的李家崖文化。1983 年发掘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时在城内一个灰坑(编号 HIC2)内发现了石人残像(参见插图 35:2)。这个石像用绿色砂岩雕琢，出土时下半部和右上角已残缺不全。残高 42 厘米，上宽 25 厘米，下宽 27 厘米，厚 12 厘米。石人像正面采用阴刻粗线条表现。可惜下半身残缺，无法窥知雕像全貌。[1] 李家崖古城建于殷墟二期至西周中期(约前 1200 年—前 900 年)，有学者以为这个文化和商代鬼方有关。青铜时代尚不能处理大型石材，李家崖石人像采用阴线雕刻，造型简单，体

〔1〕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1 期，图一·7；吕智荣:《李家崖文化的石雕骷髅人像》,《文物天地》1991 年第 6 期，19～20 页附照片。

型也较小。这和卡拉苏克晚期石雕人像如出一辙。[1]殷墟大墓发现过1米左右的双兽石雕，但是此类石雕在中原毕竟十分罕见，不一定属于商文化。考虑到商代北方草原文化流行大型石雕艺术，殷墟大墓的石雕也许是北方草原部落向商朝觐献的方物。

李家崖文化向南可达陕西淳化县古甘泉山，今称"好花疙瘩山"。这里出土的青铜管銎兵器、青铜马头弓形器和金珥饰等，均可在李家崖文化找到同类器物。[2]三国时孟康《汉书音义》说："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像，祭天主也。"[3]从史书所载匈奴语词汇看，匈奴人讲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介于突厥和蒙古语之间。[4]中原石人像或称"翁仲"，最早见于东汉文献。[5]从读音看，"翁仲"一词可能译自匈奴语。匈奴人赫连勃勃所造金人曰

---

〔1〕王林山、王博：《中国阿尔泰山草原文物》，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

〔2〕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吕智荣：《试论陕晋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及其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吕智荣：《鬼方文化及相关问题初探》，《中原文物》1990年第1期，32～37页；杜正胜：《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论关中出土的'北方式'青铜器》，《大陆杂志》第87卷第5期，1993年，1～25页。

〔3〕《史记·匈奴列传》集解引，并见《汉书·匈奴传》注引孟康《汉书音义》。

〔4〕E. G. Pulleyblank, "The Hsiung-nu Language," *AM*, n.s. 9, 1962, pp. 239～265.

〔5〕翁仲其名始见于东汉。汉末高诱《淮南子·氾论训》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兼天下，有长人见于临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也。"三国时东吴人谢承《后汉纪》亦曰："铜人，翁仲其名也。"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水经注》记载，东汉光武帝"坛（庙）之东，枕道有两石翁仲，南北相对焉。"

"翁仲"。[1] 据瑞典蒙古史家多桑(C. d'Ohsson)研究,"鞑靼民族之信仰与迷信,与亚洲北部之其他游牧民族或野蛮民族大都相类,皆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名之曰腾格里(Tängri)。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出帐南向,对日跪拜。奠酒于地,以酹天体五行,以木或毡制偶像,其名曰 ongon,悬于帐壁,对之礼拜。食时先以食献,以肉或乳抹其口。"[2]《汉书·匈奴传》曰:匈奴人"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匈奴所祭"鬼神",蒙古语作 ongon(偶像),突厥语作 oŋžin(鬼神)。[3] 我们怀疑,后者就是汉语"翁仲"之词源,自匈奴语借入汉语。

50 年代,南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发现过一批卡拉苏克文化时期(前 1400—前 1100 年)的石怪兽。这些石兽可分两类:一类是人兽合璧式石雕,即在石人像头上雕凿出牛角、牛耳或鹿角;另一类是在石人前棱下部刻出写实性浮雕人面,并在石人头顶凿刻圆雕动物头像。可分辨者皆为公羊头像,现藏米奴辛斯克博物馆。[4] 卡拉苏克墓前立石的文化传统后来被中亚铁器时代文化——塔加尔文化继承。塔加尔冢墓两侧和中央往往竖石,上刻人兽形象或符号。据报道,米奴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前 700—前 100 年)的"汉墓"附近发现了浮雕鹿石像和绵羊石雕(参见插图 36)。[5] 咸阳石柱桥付留神像就与塔加尔文

---

〔1〕《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2〕多桑(C. d'Ohsson)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30 页。

〔3〕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4, p.349. 葛玛丽认为这个突厥语词借自汉语,疑不确。

〔4〕吉谢列夫著、莫润先译:《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 年,81～83 页,210 页图版拾肆;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年,56－57 页。

〔5〕吉谢列夫,前揭书,114 页及 213 页图拾玖第 2—3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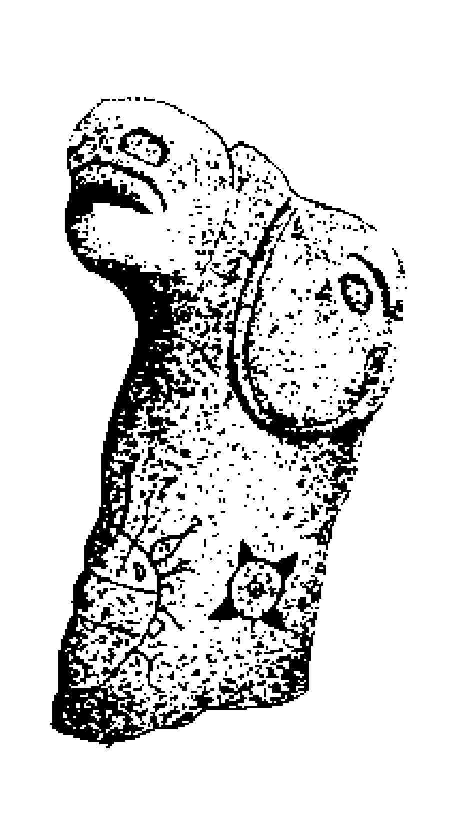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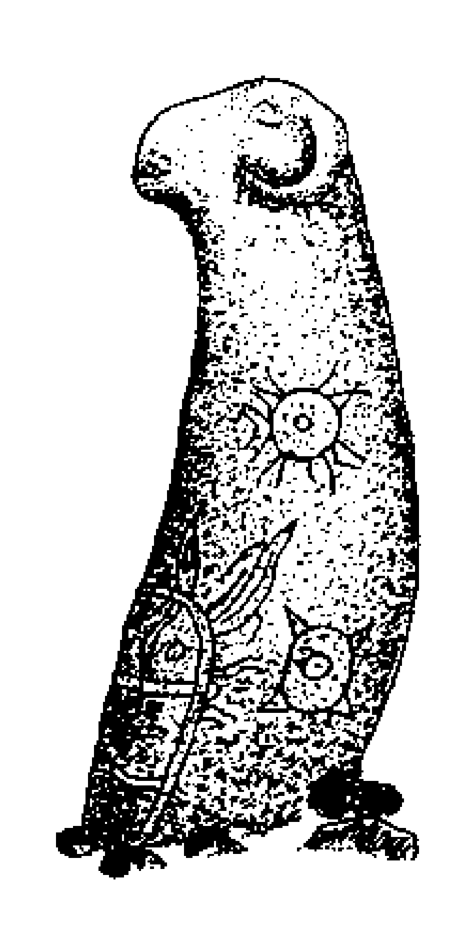



插图 36　蒙古草原塔加尔文化石兽

化的圆雕石兽颇为相近,恐非偶然。

鹿石(Olenniye kamni)是青铜时代欧亚草原游牧人实施狩猎或战争巫术的一种碑形石刻。据截面不同,分为圆形、三角形和板形三种形制。大的高达 3 米,小的也有 1 米左右。因为所刻图案以鸟首鹿身纹为主,又称"鹿石"。鹿石一般立于地表,也有葬于墓中之例。一米左右的圆柱形鹿石就和秦石鼓的器型非常接近。鹿石上半部往往画有一个大圆圈,大概是巫师施咒术时射箭用的靶心。除鹿纹外,鹿石上还刻其他动物、人物、车马、兵器乃至巫术符号。有些鹿石刻有管銎战斧和弓形器等卡拉苏克文化典型器物,说明早在公元前 13—前 10 世纪鹿石已流行于世。鹿石主要分布在蒙古草原,天山北麓与阿尔泰山亦有分布;向西经南俄草原,直抵欧洲保加利亚乃至德国。公元前 6 世

纪以后，鹿石逐渐被墓地石人(baba)取代。[1]

历史上秦人与戎狄杂处，他们之间必有频繁的文化交流。80年代以来秦雍城遗址不断发现北方草原游牧人习用的青铜镀和黄金饰件。从纹饰和造型看，年代似在春秋早期。[2] 1992年甘肃礼县公安部门从盗墓贼手中缴获了一个青铜镀。这个青铜镀赴京参加了199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从纹饰看，年代约在春秋早期。秦人祖先居地西犬丘就在甘肃礼县一带。这个铜镀为研究秦人与戎狄杂处提供了重要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诅楚文出土地点之一朝那湫渊祠曾是北方游牧人中心之一，汉代这里仍是中原与胡人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据《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条记载，"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水经·河水注》说，湫渊是高平川水(今宁夏清水河)的发源地，故址在今宁夏固原西南西海子。[3] 既然秦人与戎狄有频繁的文化交流，秦石鼓等先秦石刻艺术可能借鉴了北方草原游牧人实施狩猎或战争巫术用的鹿石，只是用文字替代了动物纹和巫术符号。

西汉石刻艺术仍受北方草原文化强烈影响，这在霍去病墓石雕群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霍氏墓大型石刻与关中汉墓出土陶

---

[1] 王博、祁小山，前揭书，271～272页；J. Davis-Kimball, et al.,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Zinat Press, 1995, pp. 319～332。

[2] 陕西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29页；刘莉：《铜镀考》，《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62页；郭物：《青铜镀起源初论》，《青年考古学家》第10期，1998年，39～41页。

[3] 湫渊于今何地有两说：一按《括地志》"平高县东南二十里"。考定为固原县东海子；一按《水经注》说湫水发源地在"县西南二十六里"，考订在固原县西海子。参见鲁人勇等：《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333页。两说之中当以第二说为是。

塑、石雕截然不同,内容多以森林、草原常见的动物为题材,表现动物嘶咬扭斗的场面,无不渗透着草原文化的气息。[1] 据统计,霍去病墓的"墓顶及墓下四周,有巨型花岗岩石一百五十余块。"[2]《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人"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大抵与匈奴同俗。"[3]霍氏墓前立石可能来自匈奴习俗。《汉书·霍去病传》记霍去病死后,"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属国玄甲指降汉的南匈奴将士。霍氏墓前这150多块巨型花岗岩大概是送葬的南匈奴将士按自己的风俗习惯为霍去病设置的,以示其生前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霍去病墓前带有浓郁草原艺术风格的石雕也许是匈奴工匠的作品。

无论如何,石人石兽在中原突兀兴起,与欧亚草原文化,尤其是阿尔泰语系游牧人古代艺术不无联系。我们相信,随着考古资料不断积累,秦汉大型石刻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关系将会日趋明朗。

---

〔1〕 阎文儒:《关中汉唐陵墓石刻题材及其风格》,《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91页。

〔2〕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322页。

〔3〕《北史·突厥传》略同,不俱引。

5

中原与西域大型石雕艺术的关系

中国与西域碑铭究竟什么关系，目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距离先秦大型铭刻地点最近、年代相当的西域铭刻是中亚大夏和犍陀罗两地(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阿育王碑铭、希腊碑铭和古波斯碑铭。

19世纪以来，阿育王碑铭不断在中亚各地出土，目前已经积累了九个标本。中亚的阿育王碑有摩崖石刻、碣石和白色大理石柱三种形式。例如：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出土的佉卢文犍陀罗语摩崖石刻，阿富汗南部兰帕卡出土的大夏阿拉美文印度俗语碣石和巴基斯坦北部咀叉始罗出土的阿拉美文印度俗语白色大理石柱。[1]

公元前329年，希腊雄主亚历山大远征粟特、大夏和北印度。希腊人在中亚设立了许多移民点，亦称“亚历山大城”。据文献记载，东方各地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有70余座，而考古发现的亚历山大城已达40多座。据法国考古团60年代以来的发掘，亚历山大城向东最远建到阿富汗的东北边境昆都士城东北，今称“阿伊哈努姆古城”。大夏的亚历山大城的古建

[1] F.R. Allchin and K. R. Norman, “Guide to the Aśokan Inscriptions.” *SAS*, 1, 1985, pp.43～50.

筑上发现过一些希腊文碑铭，也就是金石学家说的“物勒工铭”。[1]

古波斯碑铭和先秦石刻颇为相似，而波斯碑铭向东最远不超过大夏。70年代初，阿富汗西南塞斯坦的布斯特遗址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古波斯楔形文字石刻，出土地点靠近阿尔甘达布和赫尔曼德河交会处，是目前中亚所见年代最早的石刻文字。[2]

中亚阿育王碑铭刻于公元前273—前232年间，中亚希腊文碑铭不早于公元前329年。两者年代均晚于秦石鼓。和石鼓文年代相当的只有古波斯碑铭。60年代末，伊朗克尔曼南320公里的哈贾巴德附近特帕亚希亚都市遗址发现阿拉美文泥版文书。这个遗址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卡拉马尼亚省。阿富汗西南塞斯坦阿尔甘达布和赫尔曼德河交会处的布斯特遗址也发现过阿契美尼德时代的楔形文字石刻。中亚发现的波斯碑铭刻在泥版或小块河光石上，远不能和秦石鼓同日而语。真正能和石鼓文、诅楚文相匹敌的是古波斯帝国摩崖石刻和汉谟拉比法典，后者高约2.25米。这两种波斯碑铭类似秦始皇封禅勒铭，而石鼓文和诅楚文属于古代狩猎巫术刻石，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

南朝梁文士庾信《哀江南赋》说：“新野有生祠之庙，河

---

〔1〕 1963年以来，法国人一直在亚洲最东部的希腊古城阿伊哈努姆进行考古发掘。1963—1964年由施留姆伯格主持这项工作；1964年改由贝尔纳领导，直至苏军入侵阿富汗。考古报告见 *CRAI* (Comptes-rendu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丛刊。

〔2〕 W. Trousdale, "An Achaemenian Stone Weight from Afghanistan," *EW*, 18, 1968, pp. 277～280; *EW*, 23—1/2, 1973.

南有胡书之碣"。[1]这是中国文献首次提到西域碑铭传入黄河流域。周一良认为，这里的"胡书"应指粟特文。[2]《周书·突厥传》说突厥人"其书类胡"。《北齐书·斛律羌举传》又载："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这件事发生在突厥陀钵可汗在位时期（574—57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布古特地方出土了陀钵可汗时代的粟特文碑，可证北周至北齐突厥人使用粟特文。[3]

南北朝时的胡语碑铭以前在敦煌发现过，也即北凉石塔所刻婆罗谜文小乘佛典。[4]中国境内目前所见最早的西域胡语碑铭是洛阳汉魏故城发现的佉卢文井阑题记。[5]然而，东汉时期大型石雕艺术已经在中国流行了数百年。所以，我们目前只能认为中国与西方古代碑刻各有其源，不一定有直接联系。

匈奴兴起以前，讲吐火罗语的月氏人一度称霸中国北方草原。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E.G. Pulleyblank)注意到，麒麟之名与吐火罗人对"天"的称谓"祁连"有关，只是未能确定词源。[6]《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麟，仁兽也。"古文仁、夷字形相近。

---

[1] 周一良先生疑其为粟特碑铭。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179页。

[2] 周一良，前揭书，179～180页。

[3] 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344～358页。

[4] 向达：《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谜字因缘经经幢残石》，收入阎文儒等编：《向达先生纪念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12～19页。

[5] 林梅村：《洛阳所出东汉佉卢文井阑题记——兼论东汉洛阳的僧团与佛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合刊，240～249页；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715～755页。

[6] E.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RAS*, 1966, p.34.

史树青先生据以推测,《公羊传》的"仁兽"当释"夷兽"。[1] 这个辨识无疑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汉语"祁连"可能译自前吐火罗语 *kilyom(o),本义为"高贵的、神圣的",引申为"天"。[2] 那么骐驎当系吐火罗神祇,意为"天马"或"神马"。

先秦文献多次提到麒麟,月氏人西迁中亚以前麒麟已经传入中原。从中亚大月氏王陵出土的神兽看,麒麟是一种长有双角的翼马。麒麟和天禄都是带翼双角神兽,两者常被混淆。它们的区别在足部。麒麟系蹄足,而天禄为爪足。大月氏王陵所出麒麟均为蹄足。河南邓县汉墓出土麒麟画像砖的麒麟亦为蹄足,并有"麒麟"题铭可资佐证。[3] 而题铭为"天禄"的石兽系爪足。

50 年代末,四川芦山县石马坝东汉墓前发现了石麒麟,可惜简报误作"石羊"。据报道,这个"石羊两角下曲,肩上生翼,尾卷曲着地,作跨步前行状。石羊头早年断落。"[4] 这个东汉墓

---

〔1〕 史树青:《麟为夷兽说——兼论有关麒麟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405～416 页。

〔2〕 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 年第 4 期,113～116 页(英文稿见 Lin Meicun, "The Earliest Tokharian Loan-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in Vicotor H. Mair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7, pp. 1～7)。

〔3〕 V.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5, p. 93, pp. 98～103, p. 22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 年。

〔4〕 陶鸣宽、曹恒钧:《芦山县的东汉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10 期,41～42 页图 7。该调查简报提到芦山东汉墓地发现的石麒麟系独角神兽,疑是辟邪。关于天禄和辟邪的区别,参见林梅村:《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集林》卷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305～311 页(收入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地名曰"石马坝",其名似来自该墓地的石马。这件"石羊"似为带角石翼马,当系石麒麟。有学者认为,四川的东汉带翼石兽受西域艺术影响而产生。[1] 可是中亚并无此类石兽,这个说法值得怀疑。东汉年间郿山石麒麟尚在陕西周至的青梧观。《西京杂记》卷五说终南山(今秦岭)张丞相墓前有石马。据考古调查,陕西汉中张骞墓前有东汉补刻的石翼马,汉中东汉将军李固墓前也发现石马。[2] 这些实物资料可与文献相印证,说明四川东汉石麒麟的艺术源头在关中地区。传播路线是:周至—秦岭—汉中—芦山。

张骞通西域后,尤其是汉武帝在中亚设置西域都护之后,汉帝国版图直抵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从这时起,中亚希腊化艺术才开始对中国石刻产生影响。希腊化艺术(Hellenistic Art)指希腊文化和东方艺术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具有希腊文化特点的艺术,流行年代大约在亚历山大东征到中亚佛教艺术兴起,相当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3]

据《汉书·西域传》,汉武帝年间西域南海方物"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三辅黄图》卷三又载:"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狮)子、宛(原作"宫")马,

---

[1]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8页。

[2] 40年代何乐夫曾到陕西城固饶何村试掘张骞墓,发现五铢钱、"博望官造"封泥和绿釉陶残片等。据俞伟超鉴定,张骞墓所出皆为东汉之物。他认为张骞墓前这对石翼马当为东汉补雕。此为伟超师指教,谨致谢忱。何氏的张骞墓调查简报,参见《修理张骞墓报告》,《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

[3] 关于中亚希腊化艺术品的最新综述,参见 E. Errington and J. Cribb, *The Crossroads of Asia*, London: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充塞其中。"长安城皇家园林豢养的巨象、大雀、狮子和大宛马，则为西汉造型艺术提供了大量新鲜艺术题材。60年代初，汉元帝渭陵寝殿遗址发现一批西汉玉兽，其中有玉人骑翼马和带翼玉狮等。[1] 所以东汉石狮的艺术源头可能也在关中地区。

在中国史籍中，鸵鸟又称"大爵"或"大鸟"。郭义恭《广志》曰："大爵，颈及(长)，膺(鹰)身，蹄似骆驼，色苍。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2] 中国不产鸵鸟，这种动物来自西亚。汉武帝年间，安息使者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3] 除豢养活鸵鸟外，汉武帝还在太液池造石鸵鸟。《汉书·郊祀志下》记载，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鳖、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颜师古注："立大鸟像也。"《三辅黄图》卷四引《汉书》又载："建章宫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莱、方丈，刻金石为鱼、龙、奇禽异兽之属。"鸵鸟乃西方奇禽，或在太液池奇禽异兽雕像之属。太液池石鸵鸟尚不知所在。中国文物中最早出现鸵鸟的是东汉织锦，近年新疆尼雅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上就有鸵鸟形像。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近年发现一件鸵鸟纹银盘，大概从波斯或中亚粟特传入。[4] 目前所见最早的石鸵鸟皆系唐陵之物，每陵一对，成为制度。[5]

《汉书·西域传》说："罽宾……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

---

[1] 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40页及图版陆、柒；咸阳市博物馆：《近年来咸阳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考古》1973年第3期；张子波：《咸阳市新市出土的四件汉代玉雕》，《文物》1979年第2期。

[2] 《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引。

[3] 《史记·大宛列传》。

[4] 孙机：《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156～162页。

[5] 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51～53页。

室……自武帝始通罽宾。"罽宾,即汉代史官对犍陀罗的别称。该国"雕文刻镂"显然指中亚希腊化石雕艺术。《拾遗记》卷五也记载了这个故事,不过在"文如锦"后面加了"石体轻出郅支国"。匈奴分裂后,郅支单于西迁居康居,史称"北匈奴"。康居,唐代称"粟特",在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公元前38年,郅支单于被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在康居擒杀。[1]陈汤从匈奴军队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近年,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发现的西汉晚期简牍中有一部兵器簿,登录了从北匈奴缴获的兵器,如"泾(径)路匕首二万四千八百四"和"郅支单于兵九"等。[2]董偃浮雕石床似乎也是从北匈奴缴获的战利品。既然郅支国浮雕石床来自中亚撒马尔干,当为中亚希腊化石雕艺术品,可惜未能流传下来。1977年,新疆疏附县古遗址发现古代大理石浮雕残片,为我们了解中亚希腊化浮雕艺术提供了重要标本。这个石雕长约19厘米,宽10.5厘米,厚0.6厘米。浮雕人物手持列瓣纹银碗,器型与广州南越王墓以及山东齐王墓所出希腊—罗马风格的列瓣纹银盒颇为相似,[3]估计是公元前2世纪之物。这个发现提醒我们注意,张骞通西域不久,中亚希腊化浮雕艺术就开始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

和世界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国古代大型金石雕像的兴起较晚。埃及和巴比伦出现大型石雕和青铜铸像比中国早1000多年。在以往的研究中,汉代墓前石列兽和神道柱等均被认为源

---

〔1〕《汉书·陈汤传》。

〔2〕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09、117页。

〔3〕这两件西方艺术风格的银盒,参见孙机:《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139~155页。希腊艺术列瓣纹金碗,参见W.R. Biers, *The Archaeology of Gree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fig. 4。

于西方艺术。[1] 70年代始皇陵发现铜车马，首次揭示古代中国不乏大型金石雕像。1986年广汉三星堆晚商祭祀坑再次出土大型青铜神像，说明早在公元前11世纪纪念碑式青铜铸像已在四川盆地兴起。这些发现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国大型金石雕像的起源问题。[2]我们的调查表明，三种文化因素对中国大型金石雕像的起源起了关键作用。首先，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因素；第二，受欧亚草原文化，尤其是阿尔泰语系游牧人古代艺术的影响；第三，张骞通西域后，中国金石雕像艺术又得以和中亚希腊化艺术乃至波斯艺术进行交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族人民都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中国文明的发展不仅基于本民族文化，而且广泛学习外来文明中的优秀文化，从而使中国文明长期屹立于世界优秀文化之林。

---

〔1〕 水野清一：《前汉代に於ける墓饰石雕の一群に就いて——霍去病墓の坟墓》，《东方学报》第三册，1933年，第324～350页。文末附有1933年以前西方学者研究汉代石刻的目录。主张此说的还有藤田国雄：《汉代の雕刻》，《世界美术全集》第13卷，东京：角川出版社，1962；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9～13页；《漫步于石刻丛林》，《文物天地》1997年第6期，31～34页。

〔2〕 李零：《秦汉礼仪中的宗教——关于〈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的考古学思考》，the lecture notes for a workshop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7。

第 三 编

汉唐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1

西京新记

——汉长安城所见中西文化交流

张骞通西域之后，数以万计的外国使者、西域商贾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西域方物、奇禽异兽、珍花异木纷纷传入长安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汉书·西域传》)。关于长安城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张衡《西京赋》、《三辅黄图》和托名葛洪集《西京杂记》均有实录。近年考古发现又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大批新鲜史料。今作《西京新记》，试加阐述。

一、长安城的涉外机构

汉朝外交与民族事务主要由典客、典属国、黄门三个部门负责。《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

为大行令。"张骞因出使西域有功，官拜九卿，任大行令(《汉书·张骞传》)。

负责外交事务的汉朝官吏还有典属国。《百官公卿表上》说："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属官有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入大鸿胪。"后世外交与民族事务部通称"大鸿胪"，即源于此。

禁中少府属官黄门令也负责部分海外事务，他们主要为皇室搜罗天下宝物和奇禽异兽。《汉书·地理志下》记载：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在今天印度南部现代港口城市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市附近。[1] 据此，西汉海外交通向南最远已达印度洋海域。

长安城内设有专门接待海外来客的馆舍，史称"蛮夷邸"。《三辅黄图》卷六说"蛮夷邸，在长安城内藁街"。本注："藁街，街名。蛮夷邸在此街，若今鸿胪馆。"《汉书·陈汤传》记载：甘延寿、陈汤远征中亚都赖水(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的塔拉斯河)，擒杀北匈奴郅支单于。他俩随后上疏："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藁街蛮夷邸，以示万里，明犯疆汉者，虽远必诛。"可知蛮夷邸在长安城的藁街。《汉旧仪》(《长安志》引)和《三辅旧事》提到长安城有"八街九陌"。考古勘探证实长安城一共有纵街八条，横街十条。如果把横街的两段算作一陌，恰为八街九陌，藁街则为长安城八街之一。一种意见认为，藁街在

---

〔1〕 藤田丰八著、何建民译：《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 年；费琅著、冯承钧译：《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

长安城南门内;[1] 另一种意见主张,藁街指长安城的直城门大街。[2] 据考古资料,长安城南门内是未央宫和长乐宫,两宫间为武库、太仓等。[3] 蛮夷邸不太可能建在这里。我们倾向于支持后一种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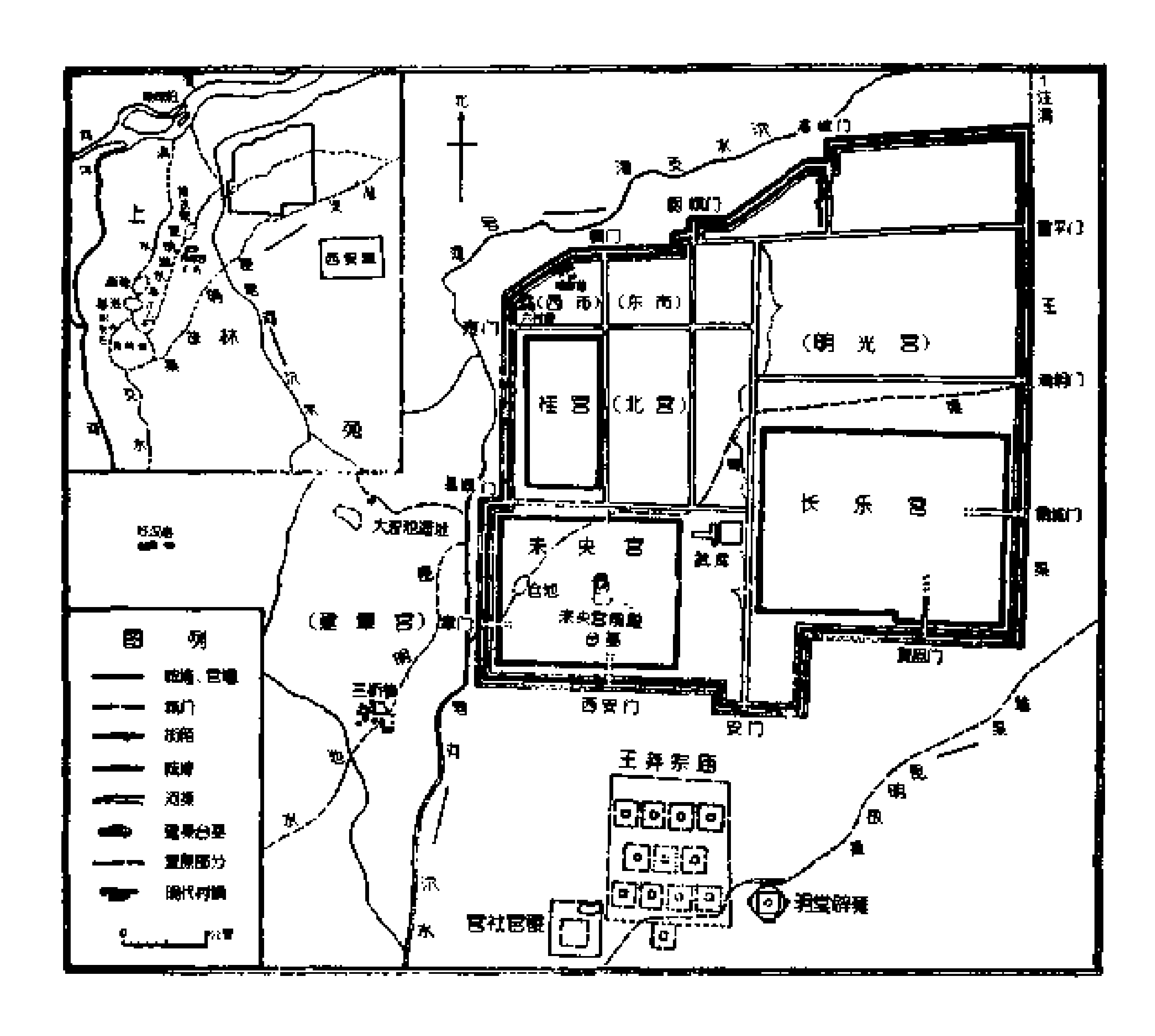


插图 37 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

---

〔1〕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 年,第 9 册,598 页。

〔2〕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5 页。

〔3〕 夏鼐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159 页。

公元前77年，大将军霍光派傅介子斩杀楼兰王安归，“驰传诣阙，悬首北阙”(《汉书·西域传》)。居延汉简第303.8号简也提到这件事。简文读作：“诏伊循侯章□卒曰：持楼兰王头诣敦煌，留卒十人，女译二人，留守□。”[1] 楼兰王首级悬于北阙，无非是向侨居藁街的西域王子和商胡示威。《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条“驰传诣阙，悬首北阙下”，王先谦补注引徐松曰：“北阙，未央宫之北门，在北司马门之北”。《匈奴传》‘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而《陈汤传》言斩郅支首，悬头蛮夷邸间。《黄图》以蛮夷邸在长安城内。或藁街，即北阙下之街。”《汉书·高帝纪下》说：“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颜师古注：“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可证北阙就在未央宫北门。从长安城建筑布局(参见插图37)看，未央宫北门所临大街是直城门大街。这条街南侧西面是未央宫，东面是武库；其北侧东面有长乐宫，中间为北宫，东面武库之南建筑布局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如果藁街真在直城门大街，蛮夷邸似在这条街东端北侧，这一点有待于今后的考古调查。

二、长安城的西域质子

汉武帝身边常有胡人随侍。“是时，上(指汉武帝)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

〔1〕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496页。

倾骇之"(《史记·大宛列传》)。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国的浮夸之风古已有之。《三辅黄图》卷四又载:"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问东方朔,曰:西域胡人知。乃问胡人,胡人曰:劫烧之余灰也。"汉武帝身边的胡人大多是以人质身份送到长安的西域王子,时称"西域质子"。

最早送王子到长安当人质的是楼兰王。《汉书·西域传》记载:元封二年(前108年),"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 ,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又载:"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前99年),危须、尉犁、楼兰六国王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使。"除了这六国质子外,长安城的西域质子还有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王子(《史记·大宛列传》)、新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王子和中亚撒马尔干城的康居王子、新疆叶尔羌河流域的莎车王子(《汉书·西域传》),蒙古草原的匈奴质子(《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记载:"王莽之篡位也,建国元年,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赍金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龟兹王姓帛氏,亦作"白"氏。随王骏出使匈奴的帛敞疑为龟兹质子。

随着汉帝国的扩张,长安城内的西域诸国质子与日俱增。甘露三年(前51年)春,宣帝在甘泉宫诏见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皆得列观,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汉书·宣帝纪》)。可见汉宣帝年间旅居长安的蛮夷数目之可观。

西域质子须遵守汉朝法律,而且没有外交豁免权。《汉书·西域传》记载:"征和元年(前92年),楼兰王死,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但汉朝对西域质子还是相当尊重。同书又载:楼兰质子尉屠耆归国时,汉廷"为刻

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

汉成帝年间（前32—前7年），康居国欲送质子到长安。汉代康居就是后世粟特，远在帕米尔以西，不在西域都护管辖范围。粟特王遣子入侍的意图十分明显，是要和中国通商。西域都护郭舜建议朝廷不要接纳，并指责粟特商人说："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汉成帝没采纳郭舜的建议，还是决定接纳康居王子。《汉书·西域传》解释说："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

三、长安城的西域使者与商胡

长安城第二类胡人是西域使者和商贾。当时，丝绸之路上"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史记·大宛列传》）。其实，早在张骞西使归国以前，就有西域使者访问长安。最早到长安的是中亚撒马尔干城的粟特人。粟特人素以擅长经商而著称于世，汉代称"康居"。司马相如告巴蜀民檄说"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董仲舒对策说"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汉书·董仲舒传》）。前者写于公元前130年，后者写于公元前

134 年。那么,张骞通西域以前,栗特人已经抵达长安。[1]

西域使者、商胡大批涌入长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他首次西使未能说服大月氏王与汉朝结盟,又向汉武帝献策联合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共攻匈奴。乌孙和月氏原来都在东部天山巴里坤草原一带游牧。[2] 公元前 2 世纪中叶,月氏人被匈奴击败,西奔伊犁河,在逃亡途中劫杀了乌孙王。乌孙王和月氏从此结下杀父之仇。乌孙后来借助匈奴的力量击败月氏,迫使他们从伊犁河再度西迁,而乌孙王就在伊犁河流域定居下来。

公元前 116 年,张骞率领一个三百人的使团出访乌孙。这时霍去病和卫青大败北方草原的匈奴人,通往西域之路已不存在匈奴的威胁。所以张骞第二次西使取道天山北麓,经伊犁河谷、昭苏草原,最后抵达乌孙都城赤谷城。他受到乌孙王热情款待,可是乌孙王惧怕匈奴,不敢和汉朝联盟。"(张)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及诸旁国",他本人则被乌孙使者护送回长安(《史记·大宛列传》)。随后,张骞派往西方的副使纷纷带西域诸国使节回访长安。《史记·大宛列传》说:"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并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在谈到安息国时,又说:"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

〔1〕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6 页。

〔2〕 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70～86 页。

东姑师、扜弥、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据以上记载，随张骞副使回访长安的西方使者不仅有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身毒、驩潜、大益、苏薤等中亚八国使者，还包括安息、奄蔡、犁轩、条枝等西亚四国使者。中国与西方诸国的官方往来由此拉开序幕。

公元前323年，希腊雄主亚历山大猝死巴比伦，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希腊化大帝国随即土崩瓦解，并被亚历山大的部将瓜分。埃及总督托勒密和巴比伦总督塞琉古自立为王，希腊本土则在安提帕特之子卡山德控制之下，从而奠定了希腊世界三分天下的格局。

托勒密王朝以亚历山大在埃及新建的希腊化城市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eria)为都，汉代史籍译作"黎轩"，指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巴比伦总督塞琉古将他的领地扩展到地中海东岸，并在叙利亚的奥龙特河上的安蒂奥克(Antioch)建立新都，汉代史籍译作"条枝"，指西亚塞琉古王朝。

张骞副使访问的安息和奄蔡是两个游牧人建立的国家。安息即伊朗高原北部的帕提亚王国，汉史称"安息"，译自帕提亚王国的创立者 Arsca 之名；奄蔡则是里海北岸的游牧王国，自称 Alani(阿兰人)，但是被希腊人称作 Arica。汉代史官所谓"奄蔡"译自后者。一般认为，奄蔡或阿兰就是今天北高加索奥塞提人的祖先。

《汉书·地理志》提到河西走廊有骊靬县。这个县名就是《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西域传》所说"黎靬"的别译。顾名思义，这个县大概是外国侨民黎靬人聚居地。公元前30年，罗马皇帝屋大维占领埃及，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从此沦为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所以《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一号犁靬"。有些研究者将骊靬与大秦完全等同起来，似不确。实际上，骊靬或黎靬原指

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而大秦原指欧洲的罗马共和国和后来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兼并托勒密王国之前，两者不可混为一谈。[1] 托勒密王国的统治者是希腊人，下层百姓则是埃及土著居民。《汉书·张骞传》颜师古注："犛靬即大秦国。张掖郦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这个说法不无根据。张骞副使是否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汉代骊靬县是否真有外国移民？有人对此深表怀疑。居延汉简的发现为揭开这个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居延汉简著录了许多汉代流寓中国的黑皮肤西域人。据统计，大约46枚汉简提到了黑皮肤的西域人，他们主要聚居于河西走廊。[2] 居延发现的一件过所文书(334.33)读作："骊靬万岁里公乘儿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已入，牛车一辆。"[3] 骊靬万岁里的黑皮肤的西域人疑即来自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的非洲人，也就是汉代史官说的"黎靬"或"骊靬"人。

除了骊靬县之外，居延汉简还提到张掖郡的居延、乐得、昭武三县乃至中原河南县亦有黑皮肤西域人杂居。居延汉简(157.24)曰："正月癸酉，河南都尉忠丞下郡大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实，字子功，年五十六，大状，黑色，长须。建昭二年(前37年)八月庚辰，亡过。客居长安当利里者，洛阳上商里范义。壬午，实买所乘车马，更乘梓牡马、白蜀车、漆布并涂栽布。"[4] 这枚汉简是河南都尉忠为黑皮肤的西域商人实某出具的通行证件，证明他乘坐的马车及贩运的布匹都是从客居长安

---

〔1〕 余太山，前揭书，13页。

〔2〕 张春树：《居延汉简中所见汉代人的身型与肤色》，《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下册，台北，1967年，1033～1045页。

〔3〕 谢桂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524页。

〔4〕 谢桂华等，前揭书，258～259页。

的洛阳人范义手中合法购买的，请居延边塞戍卒予以放行。

直到魏晋时期，河西走廊仍有骊靬人活动。《魏名臣奏》记雍州刺史张既表文云："张掖番合、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弃恶诣兴，兴皆安恤，使尽力田。"[1]《晋书·张祚传》提到张祚"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骊靬杂胡和骊靬戎当即汉以来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移居河西的非洲侨民。

中亚亦有骊靬人。新疆尼雅出土文书第 693 号曰："州，中人，黑色，大目，有髭须"；第 673 号曰："月支国胡支柱，年卌九，中人，黑色"。[2] 这两位黑色皮肤的西域人似为侨居中亚大月氏国的骊靬人。《崔氏易林》提到"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似说明伊犁河的乌孙部落也有骊靬侨民。《崔氏易林》还多次提到定居中原的黑色皮肤西域人。该书卷九《恒》说："蜗螺生子，深目黑丑，似类其母；虽或相就，众人莫取。"同书卷十《蛊》说："三斑六黑，同室共食，日月长息，我家有德。"据杨希枚考证，《崔氏易林》的作者崔篆和王莽是同时代人，出身经学世家，久居长安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素以商业发达而著称，该城商人的足迹遍及世界。骊靬商人到中国各地经商，并在中西交通孔道河西走廊形成聚落，则事在情理之中。张骞副使出访亚历山大里亚城，将骊靬使者带回长安；安息使者访华时，将骊靬眩人带到长安。这些交往促进了长安城与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经济文化交流。[3] 崔篆笔下的黑皮肤西域人显然指客居长安的骊靬人。

值得注意的是，居延汉简提到了流寓河西走廊的罗马人。

---

[1] 《三国志·魏书·毌丘俭传》裴松之注引。

[2]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86～87 页。

[3] 杨希枚：《论汉简及其他汉文献所载的黑色人》，《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78～979 页。

这是一份题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甲渠部吏毋作使秦胡册》的简牍。录文于下：

> 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障守候敢言之，府移大将军莫府书曰：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从兵起以来，□困愁苦，多流亡在郡县，吏……匿之。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不遣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敢言之。

意思说：自王莽末年发生兵乱以来，秦胡和卢水士民离开原来聚居的"属国"，逃亡到普通百姓居住的郡县。现在负责边疆事务的官吏向各地吏民申明：任何人不得继续藏匿、役使这些胡人，责令他们全部回归故里。属国，是汉朝专为外国或外族人划定的居住区。《续汉书·郡国志》张掖属国条本注说："武帝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两《汉书》只提到张掖郡有"张掖属国"和"张掖居延属国"，而居延汉简首揭张掖郡也有"属国秦胡"。另一枚居延汉简记"元凤五年尽本始元九月以来，秦属国胡骑兵马名籍"。秦属国胡即属国秦胡，其他汉简又作"秦虏"。[1]

关于秦胡的族属，有学者认为指久居汉地而业已汉化的胡人。若依此说，秦胡之"秦"指秦朝或秦国。另一些学者主张，既然秦胡指某类胡人，秦胡之"秦"应指大秦国之"秦"，也就是罗马人，犹如月支国胡人被称作"支胡"。[2]我们倾向于支持后一可能性。元凤五年相当于公元前79年。那么，公元前1世纪就有

---

〔1〕 初仕宾：《秦人、秦胡蠡测》，《考古》1983年第3期，260～263转281页。

〔2〕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详见初仕宾，前揭文，260～263页。

罗马人移居河西走廊了。

汉代西域都护郭舜注意到,有些打着"西域使者"旗号造访长安的西域胡人根本不是什么外交使节,而是些唯利是图的西域商胡。他们发现汉朝帝王并不真正需要外来物品,而是要营造一种四方来贡的热闹场面,常对四方来客厚加赏赐,其利往往数倍于贡物。结果假借使者名义来长安的西域商胡与日俱增。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最初就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东汉光武帝去世时,长安城"西域贾胡,供起帷帐设祭,(京兆)尹车过帐,贾牵牛令拜"(《东观汉记》卷一六)。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东汉初,其中无疑包括西汉以来旅居长安的西域人后裔。

四、西域胡书

《汉书·元帝纪》记载:"建昭四年(前 38 年)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酬)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注引服虔曰:"讨郅支之图书也。"颜师古推测:"郅支丧败之余,安能携图书而去,此必康居之物,西域胡所为也。"[1] 匈奴人无文字,所以颜师古认为陈汤缴获北匈奴的图书实乃粟特文书。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出了一部古老的粟特语祆教残经(Or. 8212/84)。据英国伊朗学家基舍维茨考证,这部祆经残卷用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粟特语写成,甚至早于敦煌汉长城遗址发现的粟特文古书信(约 3—4 世纪)的语言。[2] 所以,陈汤讨伐北匈奴缴

---

〔1〕 吕思勉:《匈奴文化索隐》,收入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176 页。

〔2〕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IIJ*, 1976, pp. 46～48 and its appendix by I. Gershevitch in *IIJ*, 1976, pp. 75～82.

获粟特文书是完全可能的。

除了粟特文书之外，中亚大夏王国还流行另一种中亚古文字，今称"大夏文"。这是一种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东伊朗语文书。6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的考古队在汉长安城遗址（今西安市西查寨）发现一批草体希腊文铅饼，凡 13 枚。据报道，这种铅饼直径约 5.5 厘米左右，最厚处 1.2 厘米，重约 14 克左右。正面凸出，上有类似龙的浮雕图案；背面凹入，印有一周草体希腊文。除长安外，这类希腊文铅饼在陕西扶风、甘肃灵台和天水等丝绸之路沿线古城遗址屡有发现。据统计，目前已发现了 300 余枚。全部出自汉代文化堆积中，有些装在汉代陶缸内，有些和汉代五铢钱及汉代陶片同出，大都出自遗址，不见于墓葬。据地层分析，"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1952 年，闵辰黑芬在《亚泰》杂志上撰文，声称他读通了铭文。他认为，这是一种草体希腊文拼写的帕提亚（安息）钱币铭文。[1]这位德国学者对铭文的解读没得到学界公认。我们怀疑，铅饼上的铭文可能是大夏文。它们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似与贵霜难民流寓中国有关。[2]

五、长安百戏之外来因素

汉代盛行百戏，内容包括角抵、杂耍、幻术、寻撞、乐舞、俳

---

〔1〕 O. Maenchen-Helfen, "A Parthian Coin Legend on a Chinese Bronze," *AM*, n.s., III-1, 1952, pp.1~6.

〔2〕 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收入《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43~65 页。

优、斗兽、马术等表演艺术。百戏以角抵为主，亦称“角抵百戏”。其中包含许多外来艺术。

角抵源于北方草原民族，先秦时期已传入中原。《史记·李斯列传》说：“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东汉应劭注：“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代角抵成了富于表演性的宫廷艺术。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宣帝元康二年，“天子自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60年代陕西长安县客省庄汉墓(K140)发现两件带角抵图案的青铜透雕牌饰，时代约在战国末年到西汉武帝以前。[1] 这两件牌饰大小和图案相同，长约13.8厘米，宽约7.1厘米，出自墓主人腰下两侧，似为腰带饰物。图案描绘两位赤裸上身，下着长裤的壮汉，正在树林中摔跤，每人身后各有一匹马，说明他们来自北方草原，很可能是匈奴人。有学者认为，今天蒙古草原那达慕大会的摔跤和日本的相扑肇源于先秦以来北方草原游牧人的角抵运动。[2]

汉代百戏中的幻术来自遥远的地中海沿岸。《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安息国以“大鸟卵及黎靬善眩人献于汉”。韦昭注：“眩人变化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小颜亦以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长安宫廷广场上演的百戏中常有幻术，而汉代画像石中发现过“吐火”的图象。

---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年，138～140页。

〔2〕 杨泓：《古文物图像中的相扑》，收入孙机、杨泓：《文物丛谈》，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406～413页。

汉代百戏中有来自南洋的杂技艺术,时称"寻撞"。从汉画像石图象看,寻撞系一人手持或头顶长竿,另有数人缘竿而上的杂技艺术。张衡《西京赋》曰:"乌获扛鼎,都卢寻撞。"都卢,国名,亦称"夫甘都卢"。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黄支国在印度南部现代港口城市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市附近,那么都卢国应该在南洋地区,也就是今天马来西亚或新加坡一带。由此可知,汉代百戏中的寻撞来自南洋。

汉代乐舞中不乏西域艺术。汉高祖刘邦的嫔妃戚夫人有个随身女仆,名叫贾佩兰,后来嫁给扶风人段儒为妻。她回忆宫中往事,"戚夫人侍高帝……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西京杂记》卷三)。这段史料虽然不见于正史,但是不会毫无根据。可知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乐舞早在汉初就传入长安。

印度乐舞也在汉初传入长安。据说张骞通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两首西域乐曲,汉武帝嬖臣李延年在其基础上创作出二十八种乐曲,并在宫内教坊演唱(晋崔豹《古今注》)。《摩诃》究竟是什么乐曲,史无明载,但无疑来自印度。因为其名译自印度梵语 mahā(伟大的),也就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之"摩诃"。

随着西域乐曲传入中原,西域乐器也在长安城出现。《汉书·郊祀志上》记载:汉武帝时"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空侯或作"箜篌",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起源于埃及,称作 Harp(哈卜);公元前2000

年,从埃及传入亚述,亚述人称作 Cank。汉语“箜篌”似与亚述人对这种古乐器的称谓相关。箜篌从亚述传入波斯,再从波斯传入中亚和印度。苏联考古学家马松曾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城北 18 公里发现一座公元 1 世纪左右的佛教寺院遗址,这座佛寺外壁石版浮雕上刻有演奏箜篌、琵琶或击鼓的乐队,明显带有贵霜艺术特点,说明公元前后箜篌已传入中亚。东汉应劭《风俗通》及《后汉书·五行志》对箜篌亦有所记述。《旧唐书·音乐志》说:“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置抱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臂箜篌’。”1948 年,南西伯利亚巴扎雷克 2 号墓出土了一件竖箜篌(公元前 5~前 4 世纪)。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且末县古墓地居然发掘出两件完整的古箜篌,时代相当于战国(约前 5—前 4 世纪)。[1] 这个发现为研究箜篌如何传入中原提供了重要标本。

六、长安城的西域动植物

汉武帝时,西域南海方物“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西域传》)。结合近年考古发现,择要讨论如下。

1. 西域狮子:中国不产狮子,这种猛兽产于非洲和西亚。狮子之所以能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归功于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据《大英百科全书》介绍,“狮子,猫科大型动物。俗呼之‘百兽之王’,自古就是人们熟知的野兽之一。从前分布在非洲、

---

[1] 邱磊:《可供游人参观的 24 号墓》,《中国旅游》1999 年第 1 期,32~35 页。

欧洲和亚洲，但现在仅仅生存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狮子肌肉发达，体强，身长，腿短，头大。个头大的雄狮连尾全长约3米，肩高约1米，体重约230公斤。雌狮较小。狮毛短，浅黄色至深褐色，尾尖有一丛毛，颜色深于其余部分。鬃毛为雄狮特有……"[1] 如今，狮子在亚洲已濒临绝迹。这里说狮子生活在亚洲，是指狮子过去生活于古代西域南海地区。狮子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文中说：

> 乌弋山离国，王[治乌弋山离城]，去长安万二千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扶）拔、师（狮）子、犀牛。……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

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故知"桃"为"扶"之误。师子即狮子。西汉文献中"狮子"一词也有现代写法，如荀悦《汉纪·武帝纪》卷三云："乌弋国去长安万五千里，出狮子、犀牛。"西汉时狮子尚不多见。《三辅黄图》卷三记长安城奇华宫附近的兽圈内豢养了"师子"和大鸟。这两种外来动物就是来自西域的狮子和鸵鸟。1976年苏州虎丘发掘出一件刻有河平元年（前28年）铭文的辟邪形铜座，有学者以为其上有带翼狮子。[2] 60年代初汉元帝

---

[1]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7，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242页。

[2]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8页。

渭陵寝殿遗址发现一批西汉玉雕，其中有玉人骑翼马和带翼玉狮等。[1] 凡此皆为研究狮子入华提供了重要标本。

2. 安息鸵鸟：在中国史籍中，鸵鸟最初称“大爵”或“大鸟”。郭义恭《广志》(《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引)曰：“大爵，颈及(长)，膺(鹰)身，蹄似骆驼，色苍。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中国不产鸵鸟，这种动物来自西亚。汉武帝年间，安息使者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史记·大宛列传》)。除豢养活鸵鸟外，汉武帝还在太液池造石鸵鸟。《汉书·郊祀志下》记载，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鳖、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颜师古注：“立大鸟像也。”《三辅黄图》卷四引《汉书》又载：“建章宫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莱、方丈，刻金石为鱼、龙、奇禽异兽之属。”鸵鸟乃西方奇禽，太液池石鸵鸟如今尚不知所在，[2] 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石鸵鸟是唐陵之物，每陵一对，成为制度。[3]

3. 马来貘：中国古书常提到貘，据说北方产黑(玄)貘，南方产白貘。前者似为美洲貘(T. americanus)，周身呈暗褐色；后者则为马来貘(T. indicus)，背部和两肋皆为灰白色，其余部分呈黑色。从《逸周书》和《尸子》有关记载看，早在先秦时代，黑貘和白貘业已传入中国，但毕竟是稀有动物，所以往往引起中国文人甚至帝王的特别关注。《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元年(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正因

---

〔1〕 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40页及图版陆和柒；咸阳市博物馆：《近年来咸阳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考古》1973年第3期；张子波：《咸阳市新市出土的四件汉代玉雕》，《文物》1979年第2期，60页，但被误称为“玉辟邪”。

〔2〕 孙机：《中国圣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156～162页。

〔3〕 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51～53页。

为猎获到这头白麟，汉武帝将年号改作“元狩”。汉武帝所获白麟似为马来貘。《尔雅·释兽》说：“貘，白豹。”郭璞注：“似熊，小头庳脚，黑白驳，能舔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或曰豹白色者别名貘。”《尸子》(《释文》引)曰：“程，中国谓之豹，越人谓之貘。”白居易《貘屏赞序》曰：“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尸子和白居易提到的“貘”当是从马来西亚传入中国南方的白貘。

4. 黄支犀牛：《汉书·地理志》记，“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黄支国在今天印度南部现代港口城市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市附近。那么，黄支国使臣献的犀牛当系印度犀牛。1975年西安市东郊白鹿原发现20座帝陵从葬坑，其中不仅发掘出马、牛、羊等普通三牲，而且发现犀牛、大熊猫等珍稀动物。这些从葬坑位于薄太后南陵西北200米处，故被定名为汉南陵从葬坑。[1] 据报道，“南陵第20号从葬坑所出犀牛骨骼，虽经出土压断裂，整体结构和大骨节保留得还较为清楚。犀牛体长2.4米，尾部宽1.6米”。据《汉书·韦玄成传》引大司马王莽奏文，平帝元始(公元1—5年)中“皇高祖考庙奉明园毁勿修，罢南陵、云陵为县”。薄太后为文帝之母，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崩，其从葬坑中所出犀牛不会晚至王莽时期。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邱占祥鉴定，南陵从葬坑的犀牛是生活在东南亚爪哇岛的独角犀。[2] 若以时间推算，南陵从葬坑的犀牛似即黄支国王所献活

---

〔1〕 王学理：《汉南陵从葬坑的初步清理》，《文物》1981年第11期，24～29页及图12～13。

〔2〕 孙机：《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收入孙机、杨泓编：《文物丛谈》，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285～286页及注14。

犀牛遗骸。1963年陕西兴平县曾发现一件错金银铜犀尊，也许模仿黄支国犀牛而造。

5. 大宛蒲梢马：太史公曾提到一种叫“蒲梢”的千里马。《史记·乐书》云：汉武帝“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汉书·西域传》将“蒲梢”列为西域四大骏马之一。有学者建议，蒲梢马就是突厥碑铭《阙特勤碑》东32行提到的boz at(白马)，并与周穆王八骏中的“奔霄”相联系。[1]这个说法颇有疑问。既然蒲梢马来自大宛，它的名字应来自古代印欧语，尤其是印欧语的东伊朗语方言。因为张骞说“自宛以西，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音”(《史记·大宛列传》)。也就是说，大宛人和伊朗高原的波斯语相近。高本汉将“蒲梢”的古音拟作b‘wošog。其音和突厥语的boz at相去甚远。我们发现“蒲梢”的古音和于阗人对马的称谓baji颇为相近。据英国语言学家贝利分析，这个于阗语词和北高加索的奥塞提语的böx(马)同源。[2]于阗人和奥塞提人(汉代称奄蔡人)都讲伊朗语，他们对马的称谓想必和大宛人相近。我们还注意到，楼兰人有时将马称作pursaka。该词在楼兰语中似为牲畜的泛称，既用来称呼马，亦可形容骆驼甚至绵羊。楼兰人讲印欧语系吐火罗方言，他们对马的称谓源于古印欧语，相当于阗语baji或奥塞提语的böx。以音求之，这个词和汉语“蒲梢”至为接近。这个词加后缀vara指“马夫”或“骑手”，如第586和590号文书的pursavara。汉语古音/n/和/r/不分，穆王八骏之一“奔霄”也许来自楼兰语词。

6. 西域葡萄：中国新疆地区很早就开始种植葡萄。1987

---

〔1〕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51页。

〔2〕H.W.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65.

年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1号墓地43号墓出土了一件绘有蔓藤葡萄纹的彩陶，时代约在公元前8—前5世纪。[1] 80年代初，塔里木盆地南缘和田县山普拉发现一批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古墓。其中M01号墓出土了一件毛织物，上有人首马身、带翼动物、对称花卉和葡萄纹图案。这件毛织物可能是丝绸之路传来的罗马纺织品，不能代表西汉纺织艺术。不过就在这个时期，葡萄开始传入中原。《史记·大宛列传》提到长安城"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汉书·匈奴传》说："元寿二年(前1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葡萄宫。"随着葡萄传入中原，葡萄纹成了中原人士喜闻乐见的装饰图案。《西京杂记》卷一说"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同书还提到"尉陀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蒲桃即葡萄，说明长安城不仅种植葡萄，而且以穿戴葡萄纹锦缎为时尚。

7. 西域苜蓿： 苜蓿学名 Medicago sativa，系豆科多年生植物，类似于三叶草。原产于欧洲，后来传入波斯和中亚，广泛栽培作为牲畜，尤其是马的饲料。希腊人将苜蓿称作 Mēdikē(米底的)，据说米底(今伊朗西部)盛产这种草料。[2] 张骞通西域后，苜蓿传入中原。《西京杂记》卷一记长安城有乐游苑，"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一曰怀风，时人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肖肖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为怀风。时人或谓之炎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中国古代将希腊人对苜蓿的称谓 Mēdikē 译作"苜蓿"可能受中亚犍陀罗语影响。因为在犍陀罗语中/d/或/dh/有

---

[1] 马承源、岳峰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224页。

[2]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31页。

时读作/s/。比如梵语madhu(酒)相当于犍陀罗语 masu(酒)。[1]

七、长安城其他西域方物

汉代传入长安城的西域方物种类繁多,考古证实的西域方物有波斯鍮石、身毒国宝镜、千涂国玉晶、径路宝刀和大秦国珊瑚。分述于下:

1. 波斯鍮石:鍮石是中国古代对黄铜的称谓。古代波斯盛产鍮石。《魏书·西域传》说:"波斯国……出金、银、鍮石。"《隋书·西域传》亦载,波斯盛产"金钢、金、银、鍮石、铜、镔铁、锡……波斯每遣使贡献"。1995 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楼兰西面墨山城(营盘古城)附近发掘了一个墨山贵族墓地,时代约在汉晋时期。从中发掘出土了汉晋时代的丝绸、铜镜、波斯玻璃器、古罗马风格的纺织品以及铜环、铜手镯和铜戒指。据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其中三件铜器的成分分析,皆为铜锌合金的黄铜。这是目前所见西方传入中国的最早鍮石艺术品。[2]《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武帝"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玫瑰为鞍,镂以金、银、鍮石"。据陈直先生调查,"小雁塔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藏有天汉二年五环铜铲文云:'奇华宫铜熗铲,容一斗二升,重十斤四两,天汉二年工赵博造。护守丞贤省。'"[3]铜熗铲就是鍮

---

[1]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 110.

[2] 李文瑛:《鍮石——丝绸之路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中国文物报》1997 年 12 月 28 日第 3 版。

[3] 陈直,前揭书,第 65 页。

石造的黄铜炉。《三辅黄图》卷三说:"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狮)子、宫(宛)马,充塞其中。"建章宫的奇华殿是收藏外国奇物珍宝之地,所以藏有波斯鍮石制作的工艺品。

2. 身毒国宝镜:《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见(现)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70 年代末,阿富汗大月氏贵族墓地的发掘为了解汉代身毒国宝镜提供了重要标本。这个墓地发现的两枚带柄铜镜被鉴定为印度文化遗存。其中 2 号墓的印度铜镜直径 14.5 厘米,厚 2.0 厘米;镜柄呈锥形,高 9.0 厘米,底径 8.0 厘米;配有象牙底座,通高 24.0 厘米。据说巴基斯坦北部坦叉始罗遗址以前发现过类似的铜镜。[1]

3. 千涂国玉晶:《三辅黄图》卷三著录"玉晶,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董)偃"。千涂国似即《魏略·西戎传》所谓"贤督国"之别译。该书说:"大秦国,一号犁靬……以水晶作宫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别枝封小国,曰泽散王,曰驴分王,曰贤督王……"又说:"贤督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汜复六百里。"大秦是中国史官对古罗马的称谓,那么,千涂国或贤督国当系罗马某城邦。古罗马盛产玻璃器,千涂国玉晶或大秦国水晶似指罗马玻璃器。50 年代以来,中国境内不断出土罗马玻璃器。江苏邗江甘泉二号东汉墓曾发现一件搅胎玻璃钵。据安家瑶研究,这种玻璃钵以前在英国 1 世纪遗址出土过相似的一件器皿,现藏伦

---

〔1〕 V.I. Sarianid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5, p.258.

敦大英博物馆。广州横枝西汉中期墓出土了三件深蓝色玻璃碗,无论化学成分还是制作工艺,都与地中海南岸罗马玻璃中心公元前1世纪的产品相似。[1] 1979年阿富汗大月氏王陵发掘出一批罗马玻璃器,时代约在西汉末至东汉初,是丝绸之路陆路交通线上所见年代最早的罗马玻璃器。如果千涂国指罗马某城邦,那么罗马玻璃器在汉武帝年间已经传入长安。

4. 径路宝刀: 近年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发现大批西汉晚期简牍。其中一部兵器簿登录了许多从北匈奴缴获的兵器。文中提到"泾(径)路匕首二万四千八百四"和"郅支单于兵九"。泾路是匈奴兵器,也称"径路"。《汉书·匈奴传》说:"(韩)昌、(张)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应劭注:"径路,匈奴宝刀也。"我们尚不清楚郅支单于兵究竟指何种兵器,但它们无疑和径路匕首一样,都是从北匈奴缴获的匈奴兵器。[2] 前文已介绍,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远征中亚塔拉斯河,擒杀北匈奴郅支单于。"斩其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尹湾汉墓兵器簿著录的匈奴兵器显然是从长安调配到江苏连云港附近的。

5. 大秦国珊瑚: 汉代文人常提到长安郊外的皇家园囿上林苑内种有珊瑚树。司马相如《上林赋》说上林苑"玫瑰碧林,珊瑚丛生,碧玉旁唐";班固《两都赋》提到长安宫廷内"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珊瑚是海洋生物,产自我国东南沿海海域、红海和地中海。上林苑的珊瑚来源不一,有些来自我国东南沿海。比如上林苑有颗巨大的珊瑚树,高一丈二尺,据说是南越王觐献的(《酉阳杂俎》卷十)。汉代输入长安的有些珊瑚来自西方。据考

[1] 安家瑶:《中国早期玻璃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418页。

[2]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09、117页。

证,汉语"珊瑚"译自古波斯语 sanga(石头)。[1] 那么,珊瑚最初可能从西方传入中原。波斯不产珊瑚,波斯珊瑚来自西方大秦国,因为大秦国"土多金银奇宝,有……珊瑚、琥珀"(《后汉书·西域传》)。《汉书·西域传》提到罽宾国出"珊瑚、虎魄、璧流离"。罽宾是汉代史官对犍陀罗地区的别称,泛指今天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北部广大地区。那么上林苑种植的珊瑚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大秦国,途经波斯、犍陀罗传入中国。

《说文》段注说:"珊瑚有青色的。或曰:赤为珊瑚,青为琅玕。"明朝李时珍也说:"昔人谓(珊瑚)碧者为琅玕",并以为"生于海者为珊瑚,生于山者为琅玕"(《本草纲目》卷八)。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珊瑚在先秦时代就已传入中原。《尚书·禹贡》记雍州"厥贡球、琳、琅玕"。关于琅玕产地,《尔雅·释地》说"西北之美昔有昆仑之璆琳、琅玕"。新疆尼雅遗址出土汉语文书中提到精绝王公贵族多以琅玕为赠物。[2] 近年尼雅遗址发掘出许多珊瑚,[3] 说明古代尼雅确实以佩戴珊瑚为时尚。从尼雅出土胡语文书看,琅玕似乎译自犍陀罗语 lote-mukeṣi(第 474、481 和 585 号文书),时常作为丈夫给妻子的赠物。这个犍陀罗语词相当于梵语 lohita-muktā-hāra(红珍珠、珊瑚)。那么琅玕也指红珊瑚,而非后人讹传的青珊瑚。

---

〔1〕 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523 页。

〔2〕 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3〕 吴勇:《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珊瑚及相关问题》,《西域研究》1998 年第 4 期,48—54 页。

2

墨山国贵族宝藏的重大发现

1997年，丝绸之路考古第一线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尉犁县孔雀河北岸营盘古城附近发现贵族墓地，随葬品中既有汉晋织锦、汉代铁镜，亦有中亚艺术风格的皮革面具、黄金冠饰，甚至发现了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金缕罽、波斯或罗马玻璃器以及黄铜戒指、黄铜手镯等鍮石艺术品，可谓尽收天下宝物。

《新疆文物》和《中国文物报》相继对这个重大发现作了长篇报道。[1] 在国家文物局召集的专家论证会上，墨山国贵族墓地被一致评选为1997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1998年初，墨山贵族的众多稀世珍宝作为丝绸之路文物珍品被选送上海博物馆，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展。这批墓葬及其出土文物在展览目录中作了更为详尽的报道。[2]

---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尉犁县营盘15号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11页、20页；《中国文物报》1998年3月15日第1版。

[2] 马承源、岳峰主编：《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一、墨山国史地沿革

墨山国得名于"墨山"，属于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又称"山国"或"山王国"。《汉书·西域传》说：

> 山国，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山出铁，民山居，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

尉犁这个古地名一直保留至今，也就是今天新疆库尔勒市南面的尉犁县。从尉犁县城东行120公里，则进入墨山国境域，今属尉犁县农二师35团，地处库鲁克塔格山与孔雀河之间，东与汉代楼兰国相邻。汉代的墨山显然指库鲁克塔格山（参见插图38）。

《水经·河水注》提到墨山国。文中说："河水又东，迳墨山国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这里的"河水"是指库鲁克塔格山南面的孔雀河。王先谦、杨守敬等清代学者早就注意到，前引《汉书·西域传》的"王"字后面有脱文。按班固修史通例，这段脱文疑是"王[治山城]"或"王[治墨山城]"。[1]那么，早在张骞通西域的时代，库鲁克塔格山南麓的墨山国业已创造了城市

---

〔1〕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曰："此山国亦当作墨山国，'王'下当有'治墨山城'四字。"杨守敬：《水经注疏》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117～118页。

文明。

东汉初年，墨山国一度被北方强邻焉耆国占领。公元 94 年，西域都护班超发兵讨伐焉耆，才使尉犁、危须、山国等西域小



插图 38　古代墨山——新疆东部库鲁克塔格山

国摆脱焉耆王的羁绊。[1] 东汉末，中原王朝腐败不堪，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东汉统治者再也无力顾及西域，不得不从西域撤军。于是塔里木盆地诸国相互攻伐，发生了一系列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丝绸之路中道的"尉犁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2] 墨山国此后一直在焉耆国统辖之下，未曾独立。楼兰出土魏晋文书提到"山城"，[3] 楼兰附近的山城就是原来墨山

〔1〕《后汉书·西域传》。

〔2〕《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3〕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28 页，第 2 号文书。

国都——墨山城，这时墨山国早就并入焉耆版图。那么楼兰文书说的“山城”属于焉耆国东境城镇之一。

公元5世纪，由于塔里木河下游改道，造成孔雀河及其终点湖罗布泊的枯竭。孔雀河北岸墨山城的荒废疑在此时。尽管《释迦方志》等唐代文献仍提到墨山城，但是相关文字明显抄袭前史。本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营盘古城及附近古墓发掘出四件残文书，有学者以为属于唐代。[1] 据我们观察，恐怕只有古墓出土的那件文书（编号 Y. III. 03）可能属于唐代；其余三件文书（Y. I. 028、029 和 300）皆出于古城，相当残碎，难以判断年代。从它们使用的草书看，似属魏晋文书。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境异》说：“鄯善之东，龙城之西南，地广千里，皆为盐田。”龙城即楼兰附近的白龙堆，鄯善指今车尔臣河流域的若羌县城一带，而两者之间的墨山城在唐代已盐碱化。这种灾难性的变化大概和楼兰一样，始于公元5世纪。那么，墨山城迄今业已荒废了一千四百余年。

二、墨山城寻踪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了许多古代城市。后来知道，它们就是《史记》、《汉书》提到的西域三十六国的废墟。汉代墨山国在今天什么地方呢？法国东方学家格瑞纳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1893—1895年间，格瑞纳随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德兰斯（旧译“吕推”）到新疆、

[1]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475～479页。

西藏和青海等地进行地理调查。这支法国探险队行至青海玉树考察时与当地藏民发生冲突，结果德兰斯在枪战中被当场击毙，然后被抛人长江上游的通天河。[1]法国探险队的考察报告后来改由格瑞纳完成。他在考察报告中首次提出，墨山国在今新疆库尔勒市东北约130公里的辛格尔绿洲。这个说法得到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法国汉学家沙畹等许多著名西方学者的支持。[2]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怀疑，辛格尔以东库鲁克塔格南麓的盖提布拉克山谷的夏尔托卡依古城，才是山国故城。[3]

我们的看法与上述意见不同。文献明确记载墨山城在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与焉耆(今新疆焉耆县)之间古代交通线上,而辛格尔绿洲或盖提布拉克山谷皆远离这条交通线。格瑞纳和新疆地方学者的说法颇令人生疑。东晋名僧法显西行印度,取道鄯善和焉耆。据法显介绍,敦煌西"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地崎岖薄瘠"(《法显传》)。法显访问的鄯善当即鄯善都城所在地—鄯善城,又称"扜泥城"。据黄文弼调查,扜泥城在新疆若羌县城附近,今称"且尔乞都克古城"。[4]法显就是从这座古城出发,"复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国"。法显基本上按日行百里来计算旅程,那么法显访问的焉耆国在今天若羌县城

---

〔1〕杨镰:《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遭际考实》,《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59~80页。

〔2〕沙畹著、冯承均译:《魏略西戎传地理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49页。

〔3〕羊毅勇:《论汉晋时期罗布淖尔地区与外界的交通》,《楼兰文化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300~315页;罗新:《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483~518页。

〔4〕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48~49页。

西北 1500 里处。

《水经·河水注》说“扜泥城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这是根据《汉书·西域传》说鄯善“西北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由于墨山国已併入焉耆版图,所以法显说从鄯善城西北 1500 里可达焉耆国,而未言及墨山国。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墨山城就是孔雀河北岸的营盘古城(参见插图 39)。这座古城位于尉犁县农二师 35 团甘草场西面偏北 2 公里孔雀河北岸,东距楼兰古城将近 200 公里。营盘古城四周是一片辽阔的淤积平原,覆盖着红柳、罗布麻、芦苇、胡杨树等干旱区植被。1893 年,俄国考古学家科兹洛夫在塔里木河下游考察古河道时,首次发现这座古城,随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0 年)、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1905 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1906 年)、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1934 年)先后调查发掘了营盘古城。斯坦因和伯格曼在古城附近汉代墓地大肆发掘,出土文物计有东汉四乳禽兽纹镜、汉代织锦、铜手镯、叙利亚艺术风格的椭圆纹玻璃器等。斯坦因在营盘古城附近佛塔内发掘出土了四件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说明这座佛寺的时代约在公元 3—4 世纪。[1]

如果说楼兰城的兴建主要受中原汉文化影响,那么营盘古城则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文明。营盘古城建造方式就与楼兰古城迥然不同。后者受中原城制影响,平面呈方形;前者则受西方和中亚城制影响,平面呈圆形。营盘古城直径约 180 米,周长约 565 米,现存城墙残高 3 至 7 米,夯土版筑,局部用土坯修补,似

---

[1] M.A. Stein, *Serindia*,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334;伯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253—256 页。



插图 39 鸟瞰墨山城

有城门四座，时代约在汉晋时期。[1]

这类圆形城堡的起源问题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公元前1500年，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在迈锡尼一座小山上大兴土木，营造宫殿、神庙、陵墓以及气势宏伟的狮子门。为安全起见，希腊人还在他们的建筑物四周建起了环形防护墙。据考古发掘，荷马史诗提到的希腊名城——特洛伊也采用圆形城垣。[2]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远征粟特、大夏和北印度，并派部将在东方各地建立希腊化王国，遂使地中海文明和中亚文明直接相遇。希腊人有个特点，每征服一个地方就修筑一座城池，好

---

〔1〕 李文瑛、周金铃：《营盘墓葬考古收获及相关问题》，收入马承源、岳峰，前揭书，63～74页。

〔2〕 J. Hawkes, *The Atlas of Early Man*, London: Macmilian London Limited, 1976, p.108.

像不住在石头造的城堡里他们就觉得不安全；然后他们在城内兴建体育场、希腊神庙、希腊式住宅和浴室等，以解思乡之愁。希腊人在中亚建造了许多希腊城市，史称“亚历山大城”。中国文献对此有许多译名，如乌弋山离、蓝市、犁轩等。据文献记载，东方各地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有70多座，目前考古发现的亚历山大城已达40余座。希腊移民就在这个时期大批移居中亚和北印度。据法国考古团60年代的调查，亚洲最东部的亚历山大城，一直建到了阿富汗东北边境的阿伊哈努姆。

亚历山大试图把希腊文化推向他所征服的东方各地，但是文化的征服可不像亚历山大远征军在东方攻城占地那样容易。相反，希腊文化在许多方面被东方文化征服，变成一种具有大量东方文化特色的希腊艺术。为和典型的希腊艺术相区别，西方艺术史家称作“希腊化艺术”。大夏的希腊贵族艺术与大夏本地文化艺术逐渐融合，形成所谓“大夏希腊化艺术”。

1938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中亚阿姆河畔发掘了一座圆形古城，今称“科伊·克雷尔干·卡拉城”。这座古城建于公元前4—前3世纪，以后长期荒废，公元前后又重新起用，一直沿用到公元3—4世纪。这座古城环以两重护城墙，城墙上有九座望楼，城外有深沟壕堑，城中心为圆形城堡。研究者对这座古城的文化渊源意见不一。俄国考古学家斯塔维斯基怀疑，这座圆城可能代表了中亚北部的一种建筑艺术。公元1—2世纪，中亚和西亚流行圆城，如大夏境内就发现过一座公元2世纪左右的圆城，今称“哈特拉古城”。这座古城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内建有寺院和佛塔。伦敦大学的艺术史家考勒治怀疑这些圆城的兴建或许和帕提亚人在中亚的兴起有关。[1]然而阿姆河畔的科伊·克雷尔干·卡拉城

---

[1] M.A.R. Colledge, *Parthian Art*, London: Paul Elek, 1977, pp.30–31.

内出土了大批希腊艺术品，建筑形式与迈锡尼和特洛伊圆城异曲同工，时代又在亚历山大东征时期。所以，中亚流行圆城很可能和亚历山大东征有关。

中亚最著名的圆城当属大夏都城，希腊作家斯特拉波谓之Bactra(巴克特拉)城，张骞称作“蓝氏城”。一般认为，“蓝氏”就是Alexander(亚历山大)的汉代译名。据法国和美国考古队在20—50年代的调查发掘，这座亚历山大城位于阿富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城西23公里的沃济拉巴德城附近，总面积达550公顷，分上下两城：上城在北，占地约150公顷，平面呈椭圆形，四周有城墙和护城沟。城内废墟的堆积分几个时期，最早属于公元前3—前2世纪，那么这座圆城也是亚历山大东征中亚后才兴建的(参见插图40)。中国史家早就注意到，蓝氏城与罗马城相似。三国时代东吴万震著《南州异物志》一书，其中提到大月氏“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1] 这个记载有助于说明蓝氏城模仿罗马城。

1994年10月，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察队在新疆和田以北沙漠腹地发现一座圆城，从中发现希腊罗马流行的带柄铜镜。[2] 据碳$_{14}$年代测定，圆沙古城的时代距今2135年左右，相当于西汉。这个发现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塔里木盆地流行圆城与希腊罗马建筑艺术的东渐有关。这类圆形古城向东最远分布到营盘、麦德克和且尔乞都克一线。

营盘古城和许多西域古城一样，附近原来建有佛塔，这座佛塔今已坍塌，仅存塔心。古城四周遍布夹砂红陶的陶器残片、碎铁滓等遗物，从而印证了《汉书·西域传》说墨山国“山有铁”的

---

〔1〕《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

〔2〕 苇青：《圆沙古城：待解的千古之谜》，《华声报》1997年11月，42～4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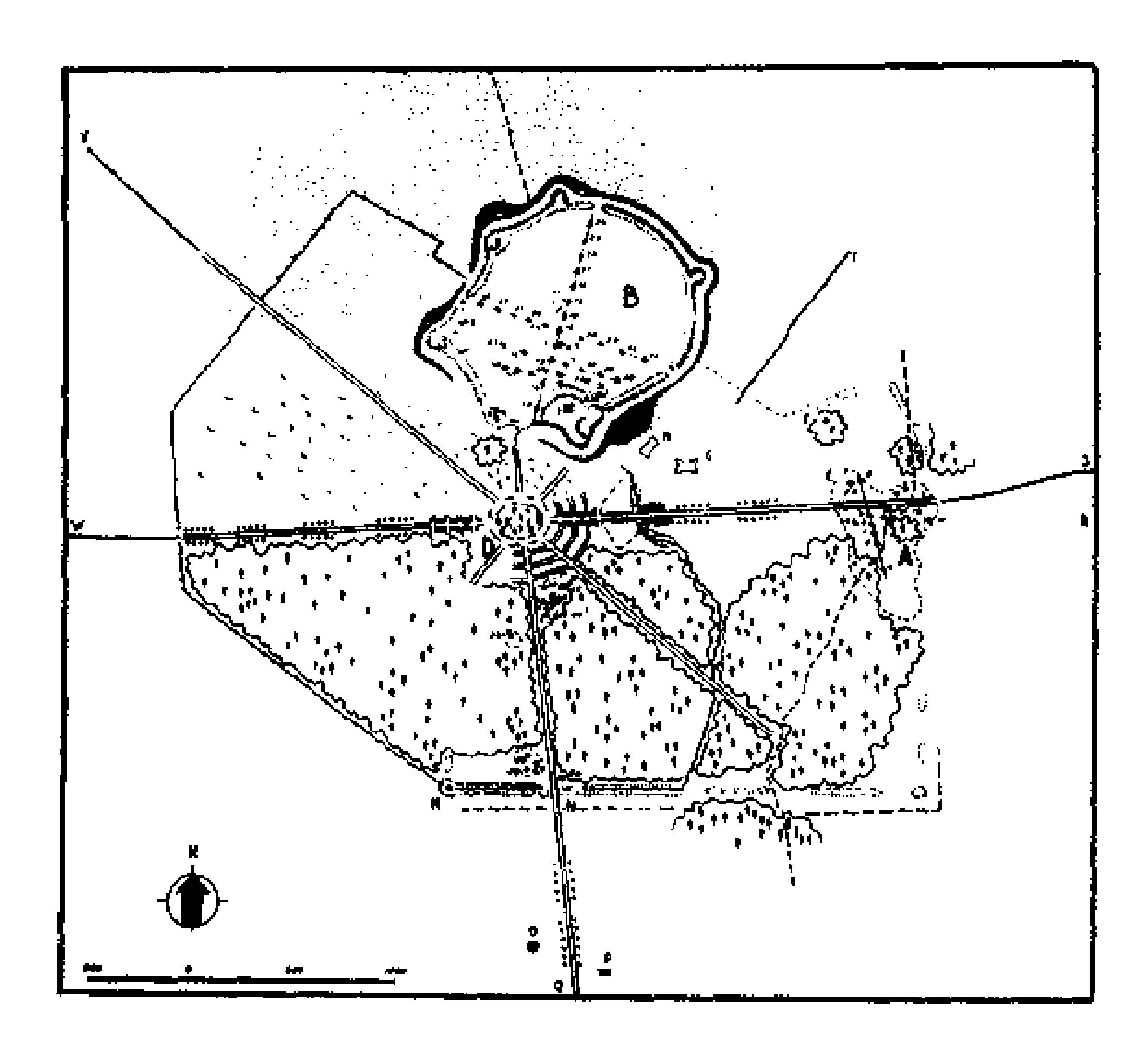


插图 40　张骞访问的大夏古都蓝氏城

史实。

墨山城西门外大约 45 米处，矗立着一座高达 10 余米的烽火台。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人终于知道帕米尔以西还有一个如此广大的西方世界。于是作为东西方民间贸易往来早已存在的丝绸之路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他决意把这条路变成汉帝国与西方诸国官方贸易往来之路。公元前 117 年，汉武帝不惜动用 60 万士卒在中国西部修筑长城。[1] 汉长城的西端究竟建

[1]《汉书·食货志》。

到什么地方呢？以前有人认为在敦煌西部的玉门关和阳关。其实不然。李广利西征大宛之后，西域诸国与汉帝国的往来日趋频繁。为此，汉武帝派重兵加强对丝绸之路的防卫。《汉书·西域传》说"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盐泽，指新疆罗布泊；亭，指汉长城烽火台。那么汉武帝时代，长城烽燧线已从敦煌向西一直修建到了孔雀河的终点湖罗布泊。

1994年冬，我们驾驶直升机在营盘古城及其附近遗址上空作航空考古调查。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墨山城附近的烽火台，向东可与罗布泊北岸的楼兰LE城一线的烽火台相联系，向西则与西域都护治所——仑头（在今新疆轮台县附近）一线的烽火台遥相呼应，墨山城的烽火台显然与汉武帝以来兴建的长城烽燧线有关，从而为研究汉晋丝绸之路的走向提供了地理坐标点。

墨山城附近另一处重要遗迹是佛教寺院遗址，它座落在营盘古城东北约1公里处，占地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以佛塔为中心，是一座用土坯砌筑平面呈长方形的佛教建筑。这座佛寺的建筑布局从航空照片上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在墨山国境域的古代遗存中，规模最大的首推营盘古城。这使我们确信，墨山国经济、宗教及文化中心不在辛格尔小绿洲或贫瘠的盖提布拉克山谷，而在孔雀河北岸的营盘古城，也即汉晋文献提到的墨山国都——墨山城。

三、墨山贵族宝藏的重大发现

墨山城地面遗迹遭到自然和人为的严重破坏，我们无从了解墨山国究竟将城市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因此墨山国贵族墓

地的发现显得格外重要，它首次拨开了笼罩在墨山国古文明之上的历史迷雾。

墨山国贵族墓地坐落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山前台地南缘，南距墨山城大约900米，距离孔雀河北岸大约4公里。古代墓葬分布在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数百米的范围内。据初步统计，这片墓地的墓葬总数大约在150座以上。墨山国墓地和楼兰古墓沟墓地颇为相似，每座古墓上都栽有胡杨木桩，少则2—3根，多则7—8根，目前大多为流沙掩埋，但是仍有不少木桩暴露地表，有的高达0.6米左右。

墨山贵族墓葬的规模不算大，但出土文物却相当惊人。成人墓一般长2.5米，宽约1米，深1.5米，儿童墓相对狭小。墓室内放置长方形木棺，规格较高的木棺通体还有彩绘图案，如营盘墓地第15号墓。这座墓随葬品十分惊人。墓主人头枕中原锦缎制成的"鸡鸣枕"，身着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罽袍(参见插图41)，头戴黄金装饰的面具。墓中还随葬了大批十分罕见的织金罽和织金锦。

在纺织品上织金线是罗马人对世界纺织艺术的一大贡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大秦是汉代文献对古罗马的称谓。罗马艺人制作的金缕罽以前只见于文献，即便在罗马帝国本土，也从未发现过实物，而墨山国墓地随葬的织金罽一展古罗马纺织艺术的风采。

营盘9号古墓内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玻璃酒杯，它的显著特点是外壁饰椭圆纹。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早年在楼兰LK城发现过这类玻璃器残片，以为是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叙利亚的玻璃器。新疆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近年也发现类似的玻璃器，但被认为属于萨珊波斯器。波斯玻璃器受到古罗马玻璃手工艺的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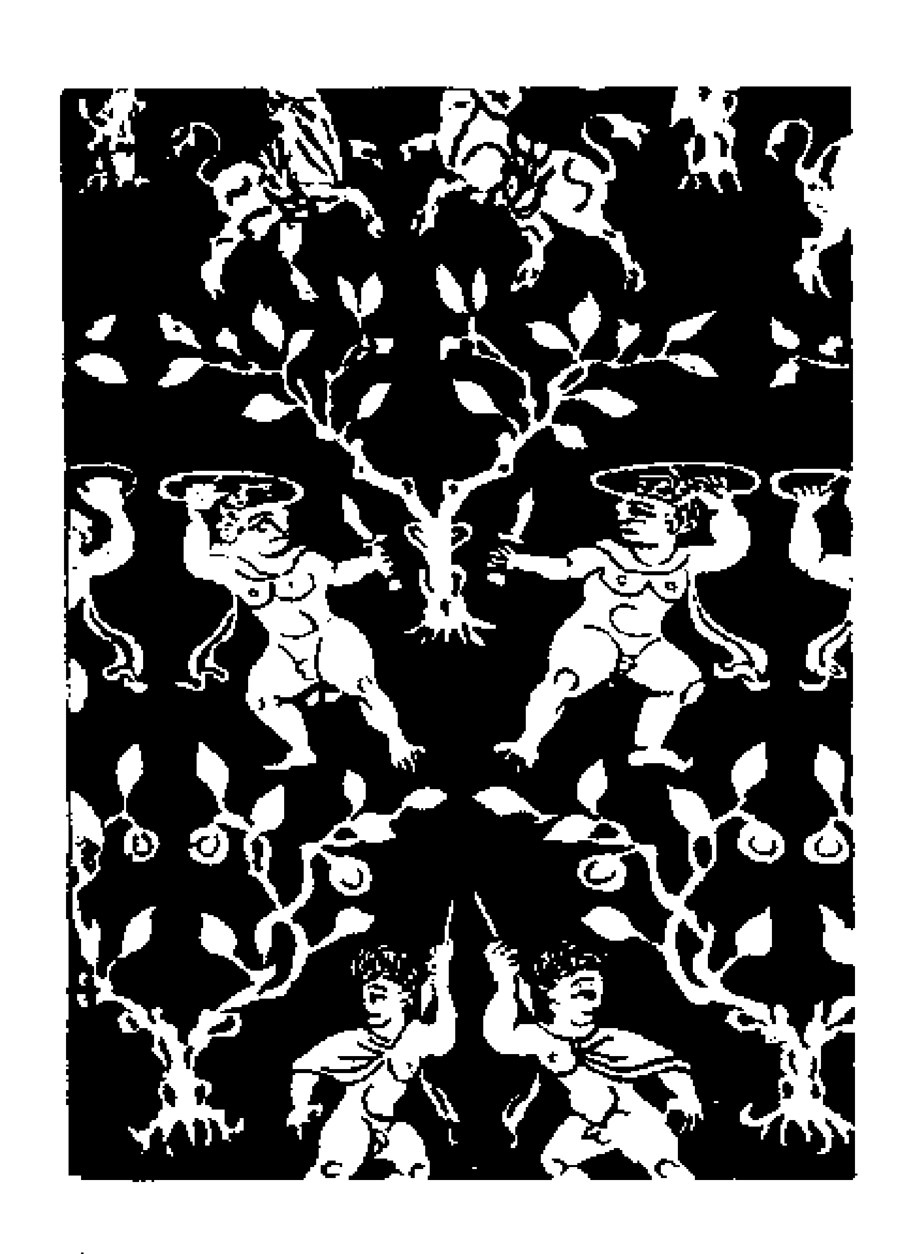


插图41　孔雀河流域出土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毛织物

烈影响，有时不易区别。如果这类玻璃的产地在波斯，那么营盘墓地出土的汉晋玻璃器似属波斯安息王朝（前248—前226年）工艺品，而非萨珊玻璃器。营盘墓地出土铜器中亦有舶来品，据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其中三件铜器成分鉴定，皆为铜锌合金的黄铜制品。

中国传统金属工艺以铸造青铜器而闻名于世，黄铜制品属于古代西亚，尤其是古代波斯传统工艺。《西京杂记》记汉武帝"得贰师天马，帝以玫瑰为鞍，镂以金、银、鍮石"。鍮石是中国古代对西方传入的黄铜制品的泛称。域外传入的鍮石艺术品毕竟

有限，只有汉代帝王才有资格享用。长安城奇华殿遗址出土过一件天汉二年(前99年)铸造的鍮石艺术品——五环铜炉，现藏于小雁塔西安市文物管理处。炉上有铭文自题曰："奇华宫铜鍮炉，容一斗二升，重十斤四两，天汉二年工赵博造。护守丞贤省。"[1] 铜鍮炉就是波斯鍮石铸造的黄铜炉。《三辅黄图》卷三说："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狮)子、宫(宛)马，充塞其中。"可知建章宫的奇华殿是西汉王室收藏外国奇物珍宝的地方，因而藏有波斯鍮石制作的工艺品。

墨山国地处东西交通孔道，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使墨山国王公贵族富可敌国，不仅享用中原织锦制成的鸡鸣枕，而且头戴中亚艺术风格的面具，身披罗马纺织品制成的罽袍，佩戴波斯传来的鍮石艺术品，使用叙利亚输入的玻璃器，生动反映了汉代丝绸之路国际贸易之盛况。

四、长安与罗马之间的古代交通

大约八年前，我们写过一篇题为《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的小文，试图利用中亚死语言研究成果，解读希腊罗马地理志著录的东方古地名，借以探讨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这本来是写给学界的，不料刊出后引起新闻界的极大兴趣，一时间大小报刊纷纷转载。当然学术界也有反映，比如北京大学朱龙华教授就及时将这项研究新成果编入了他关于罗

〔1〕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65页。

马文化的著作，他指出，公元100年来华的罗马商团只不过是其中之一。[1]这篇小文还引起一位台湾学者的注意，他似乎不相信汉代中国会和罗马帝国有什么联系。[2]由于汉代传入中国的罗马方物颇为罕见，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对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一般持审慎态度，如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的《汉代的贸易和扩张》、德国学者拉施克（M. Rashke）博士的《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皆如此。[3]就当时所见资料和研究水平而言，六七十年代持这种审慎态度无可厚非。然而，现在是90年代。无论考古发现还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都在逐渐改变以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5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不断出土罗马玻璃器。江苏邗江甘泉二号东汉墓发现了搅胎玻璃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家瑶女士研究，这种玻璃器以前在英国1世纪遗址内发现过，与此相似的一件器皿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广州横枝西汉中期墓出土了三件深蓝色玻璃碗，无论化学成分还是制作工艺，皆与地中海南岸罗马玻璃中心公元前1世纪的产品相似。她还指出，广西合浦县和贵县东汉墓多次发现的蓝色玻璃碗和托盏，化学成分与罗马玻璃相同，估计也是罗马工艺品。[4]1979年，

---

〔1〕 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370～378页。

〔2〕 邢义田：《汉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原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再刊《学术集林》卷十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3〕 Yu 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ian Economic Rel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M.G. Raschke, "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with the East," i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Geschichte und Kulture in der neueren Forschung*, II, Principat, vol. 9, pt. 2, Berlin: Gruyter, 1978, pp.665～673。

〔4〕 安家瑶：《中国早期玻璃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413～457页。

苏联和阿富汗联合考古队在大月氏王陵也发掘出一批罗马玻璃器和罗马金币,时代约在西汉末至东汉初。这是丝绸之路陆路交通线上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罗马玻璃器和罗马钱币。

汉代传入中国的罗马方物岂止玻璃器。本世纪初,山西灵石县曾出土16枚罗马古币,经英国汉学家卜士礼鉴定,属于罗马皇帝泰比里厄斯(14—37年)至安敦尼(138—161年)在位时期,相当于我国西汉末至东汉。[1]80年代初,新疆洛普县东汉于阗墓地发现一批西方技法织成的氍织物,其中一件织有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半人半马神怪。据报道,这种氍织物在巴比伦附近阿尔塔尔遗址亦有发现。从艺术风格和纺织技法看,于阗和巴比伦出土氍织物皆为丝绸之路传来的罗马方物。1987年,洛阳东郊发现了一个古罗马玻璃瓶,可能是个香水瓶,高约13.6厘米,黄绿色,半透明,造型精巧,用搅胎法吹制,是十分典型的罗马吹制玻璃器,时代约在公元2世纪。这是丝绸之路起点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罗马方物之一。上述考古发现使我们确信,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必有颇为发达的贸易往来,中国史籍与西方史料所说汉代中国与罗马之间的古代交通当为信史。

---

[1] S. W. Bushell, *Ancient Roman Coins from Shansi*, Peking: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191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重印本,27~28页。

3

输石入华考

输石是中国古代著名舶来品之一。丝绸之路开通后，输石从波斯、印度等地相继输入中国。输石工艺品很快成为汉唐达官贵人追求的时髦装饰。

托名葛洪集《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武帝"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玫瑰为鞍，镂以金、银、输石"。据陈直介绍，"小雁塔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藏有天汉二年五环铜铲文云：'奇华宫铜𪟝铲，容一斗二升，重十斤四两，天汉二年工赵博造。护守丞贤省。'"铜𪟝铲就是输石造的铜炉。《三辅黄图》卷三说："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宛）马，充塞其中"。故知建章宫的奇华殿是收藏外国奇物珍宝之地，而奇华殿就是"奇华宫"。天汉二年相当于公元前99年，那么奇华殿的输石炉大概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输石艺术品。唐代诗人元稹《估客乐》有诗曰："输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输石袍带甚至成了唐朝士大夫表示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汉唐朝野大行外丹黄白术，输石则是中国炼丹师点石成金的重要方剂。这种神奇的外来方物究竟是什么，如何影响了中国古代文明，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今缀集所见，草成是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鍮石产地及语源

既然鍮石是舶来品，它的名称自然和鍮石产地流行的语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先从鍮石产地谈起。

古代东方鍮石最为著名的产地首推波斯。《魏书·西域传》说："波斯国……出金、银、鍮石。"《隋书·西域传》也说：波斯盛产"金钢、金、银、鍮石、铜、镔铁、锡……波斯每遣使贡献"。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古代楼兰国西面墨山国古城（营盘古城）附近发现了一个墨山贵族墓地，时代约在汉晋时期。从中发掘出土了汉晋时代的丝绸、铜镜、波斯玻璃器、古罗马风格的纺织品以及铜环、铜手镯和铜戒指。据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其中三件铜器的成分分析，皆为铜锌合金的黄铜。这大概是目前发现的由西方传入的最早的鍮石制品。[1] 新疆吐鲁番出土了一件柔然永康十七年(481 年)残文书《高昌□归等买鍮石等物残帐》。其中罗列的物品有鍮石、地毯和钵(波)斯锦，三者皆为《隋书·西域传》所言波斯方物。明曹昭《格古要论》说："真鍮石生波斯国。"可知明代仍然从波斯进口鍮石。

唐代文献说印度也产鍮石。《大唐西域记》卷四提到印度有三个著名鍮石产地。它们是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方邦)以及婆罗吸摩补罗国(今印度北方邦)。《隋书·西域传》还提到今西藏青海交界地带的苏毗女国"出鍮石、朱砂、麝香、牦牛"。1983 年，青海都兰县热水吐蕃大墓出土了一批铜器，年代大约在唐代中晚期，计有：铜条、铜钩饰、铜牛

〔1〕 李文瑛：《鍮石——丝绸之路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中国文物报》1997 年 12 月 28 日第 3 版。

鼻圈、铜带环、铜带扣等。经成分分析，都兰吐蕃贵族墓出土的铜器均为黄铜，也就是鍮石艺术品。[1]

据以上调查，鍮石首先从波斯传入中国，唐以后又从古印度、吐蕃等地传入中原。总之，汉唐鍮石入华的主要路线是亚洲内陆。

关于鍮石之音义，唐代高僧慧琳编《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所论最详。为便于讨论，我们将有关记述理校于下。

1. 慧琳《音义》卷一五曰："鍮石，吐侯反。案：偷石者，金之类也。精于铜，次于金。上好者，与金相类，出外国也。"

2. 同书卷三九曰："鍮石，上汤楼反。《考声》云：鍮石似金。又云：西域以铜铁杂药合为之。古今正字，从金从偷省声。"

3. 同书卷四十曰："鍮石未(梅村案：此字当系衍文)，上汤侯反。《埤苍》云：鍮石似金也，从金(以下原文缺)……"

4. 同书卷六十曰："鍮石，上音偷。《埤苍》云：鍮石似金似而非金。西戎蕃国药，炼铜所成。有二种鍮石，善恶不等。恶者校白，名为灰折；善者校黄，名为金折。亦名为金折，亦名真鍮。俗云不博金是也。"

5. 同书卷八十曰："鍮石，上透楼反。《埤苍》云：鍮石似金而非金也。《说文》：从金从偷省声也。"

6. 同书卷八二曰："鍮石，上音偷。金之次者，白金也。"

7. 同书卷八九曰："鍮石，上透侯反。《埤苍》云：鍮石似金者。《考声》亦云：鍮石似金，西国以铜铁杂药合为之。或作鉐，音同上。古今正字义同。从金从偷省声也。"

慧琳对鍮石的解释主要根据三本汉唐字书，也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曹魏张楫的《埤苍》和唐人张戬的《考声》。今本

[1] 李秀辉、韩汝玢：《青海都兰吐蕃墓葬出土金属文物的研究》，《中国冶金史论文集》二，北京科技大学，1994年，38－48页。

《说文》无鍮字,不知慧琳《音义》第 5 条所引《说文》有何根据。由于不能肯定《说文》有鍮字,目前只能认为,鍮石在现存中国字书中最早见于《埤苍》。该书大约写于公元 3 世纪初,作者张揖是曹魏初年的博士,除《埤苍》外,还著有《广雅》和《古今字诂》。[1] 据慧琳《音义》,鍮石是一种类似于黄金的合金。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鍮石之"鍮"当系外来语,其音读若"偷"(古音作 t'o/ t'əu)或"钽"(古音作 do/ dəu)。[2]

19 世纪的欧洲汉学家已认识到,中国古代所谓鍮石就是现代工业的黄铜,只是不明鍮石这个名称究竟从何种外来语借入汉语。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现有两种不同意见。

其一,阿拉伯波斯语说:这个说法为美国伊朗学家劳费尔首先提出。他认为鍮石得名于阿拉伯波斯语 tūtiya(氧化锌)。托名亚里士多德著《阿拉伯石谱》(约 9 世纪成书)记载,阿拉伯人将菱锌矿称作 tūtiya。这个名字和汉语"鍮"的读音十分接近,所以劳费尔提出鍮石之"鍮"似即阿拉伯语 tūtiya 的音译。他还引征梵语 tuttha 和法语 tutie(氧化锌),据以说明鍮石就是氧化锌。[3]

其二,印度梵语说:这个说法由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首先倡导。他检索到鍮石在汉文古籍中首见东汉末三国初贵霜僧人支谦译《佛说阿难四事经》。文中说:"世人愚惑,心存颠倒,自欺自误,犹以金价买鍮、铜也。"因此,李约瑟力主鍮石之"鍮"译自梵语 tāmra(铜)。[4]

---

〔1〕 张揖正史无传,《魏书·江式传》附带提及此人及其著述。

〔2〕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176 页。

〔3〕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340～344 页。

〔4〕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1959, p.74.

我们不得不说，这两种假说都有很大的推测成分，有些说法无疑是错误的。例如：劳费尔所引梵文 tuttha 在《周书·异域传》和《隋书·西域传》译作"盐绿"，在 9 世纪吐蕃高僧编《翻译名义大集》第 5925 号译作"铜绿"，[1] 指硫酸铜（或称"胆矾"）而非氧化锌。此外，据英国语言学家巴罗研究，梵语 tuttha 可能属于印度土著语言达罗毗荼语。尽管它和阿拉伯波斯语 tūtiya（氧化锌）词形相近，但是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李约瑟所引 tāmra 确系梵语佛典经常出现的"铜"字，可是该字指红铜（自然铜）而非黄铜。这和中国古籍说的鍮石实乃黄铜（铜锌合金）不符。[2] 其实，解决鍮石词源问题有一条重要途径——梵汉双语文献，可惜迄今为研究者忽略。我们检索到，梵语佛典有两个字可与汉译佛经的鍮石对译。

其一，kāmsikā（黄铜）：这个字或写作 kāmsya，在后秦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花经》中作"鍮鉐"。[3] 这个字和汉语鍮石的读音相距甚远，而且不见波斯文献，大概不会是汉语鍮石

---

〔1〕 R.L. Turner, *A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o-Aryan Languag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68, p.620, no.5855; 榊亮三郎：《梵藏汉和四译对校翻译名义大集》，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三，1926 年版。本文所引《翻译名义大集》均据该书，恕不一一出注。

〔2〕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石三·炉甘石》集解引宋人崔昉《外丹本草》云："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亦曰："鍮石，自然铜之精也。今炉甘石炼成者，假鍮也。崔昉曰：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成鍮石。真鍮石生波斯国者，如黄金也，烧之赤色不退。"其中炉甘石就是菱锌矿（碳酸铜），它与铜矿合炼出的"假鍮"，今称菱锌矿黄铜（calamine brass）。所以鍮石必为铜锌合金，也就是黄铜。

〔3〕 H. Kern and B. Nanjio (ed.), *Saddharma-pundarika*, Bibliothec Buddhica X, St.-Pétersburg, 1908—1912, p.50; M.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1979, pp.266～267；荻原云来等编：《梵和大辞典》，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年，332 页。

的词源。

其二,rīti(黄铜):这个字或写作 raitya,在 9 世纪吐蕃僧人编《翻译名义大集》第 5987 号译为"黄铜",在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皮革事》和唐礼言编《梵语杂名》中译作"鍮"或"鍮石"。[1] 该字疑为梵语文献的伊朗语借词,相当于婆罗钵语 rōd、中古波斯语 rwy 或新波斯语 rōy,意为"黄铜"。据德国语言学家尼伯格研究,这个字源于阿维斯塔语 raoiδita(微红)。[2]那么这个字本来可能指红铜(自然铜),当波斯人掌握黄铜冶炼术后,又用来表示黄铜(铜锌合金)。此外,该词还借入粟特语,如基督教粟特语 rwd 和佛教粟特语 rwδ。[3]阿拉伯波斯语 tūtiya 似乎也来自这个婆罗钵语词。我们知道,闪含语系的/l/和印欧语系的/d/读音相近。例如:和阿拉伯文同属于闪含语系的阿拉美文的 lipi-(书写)借入波斯语后写作 dibīr(书写),借入梵语后写作 divira(书写)。[4]因此,婆罗钵语 rōd 在阿拉伯波斯语中拼作 tūtiya 是十分可能的。另一方面,古汉语有时用/t/翻译伊朗语的/l/,比如,婆罗钵语 pahlawīg(帕提亚)在《汉书·西域传》中译作"番兜"。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汉语鍮石当系伊朗语借词,借自婆罗钵语的 rōd(黄铜),或间接来自这个婆罗钵语词在其他古代西域语言中的衍生形式。这个问题我们在下节还要详细讨论。

---

〔1〕 获原云来等,前揭书,1129 页。

〔2〕 D.N. MacKenzie,前揭书,72 页;H.S. Nyberg, *A Manual of Pahlav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4, p.170.

〔3〕 I. Gershevitch, *A Grammar of Manichean Sogdi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1.

〔4〕 I. Taylor, *The Alphabet*, London, 1891; G. Bühler, *Indian Palaeography*, Leipzig, 1896 (New Delhi, reprinted, 1980).

二、丝绸之路上的鍮石贸易

汉唐丝绸之路为中亚粟特人所垄断，波斯和印度方物大多由粟特商胡间接传入中国。王嘉《拾遗记》记载："石虎为四时浴室台，皆用鍮石、䃁珐为陡岸。"[1]《资治通鉴》卷一一二记西晋隆安五年(401 年)武威王利鹿孤手下有"安国将军鍮勿仑"。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以为这位将军的姓氏乃鍮石之"鍮"。[2]《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开元六年(718 年)四月，米国王遣使献"拓辟、舞筵及鍮"。石虎、安国将军和米国使者均为粟特人。文献未言粟特产鍮石，所以粟特可能仅是东方鍮石贸易的一个集散地，粟特人贩运的鍮石来自波斯或印度等地。

于阗国(今新疆和田)是丝绸之路南道重镇，鍮石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先要在此地入境。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记长安城大同(通)坊有观音堂，"堂中有于阗鍮石立像，甚古"。据报道，近年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遗址出土了一个带底座的铜佛坐像，现藏和田市博物馆。这尊佛像底座上刻有婆罗谜文题记。报道者估计其年代约在 7—8 世纪。这尊铜佛未经材质鉴定，据说是红铜。[3] 然而，从彩色照片看，似为黄铜。本世纪初，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古代佛寺遗址采集到两个

---

〔1〕《太平御览》卷八一三所引。

〔2〕饶宗颐：《说鍮石——吐鲁番文书札记》，收入《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384 页。

〔3〕穆舜英等：《中国新疆古代艺术》，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年，图版 117、186 页图版说明。




插图 42　于阗鍮石(?)佛像

金铜佛头，分别高 17 和 13 厘米。两者当中较大的那个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参见插图 42)，据说年代约在 3—4 世纪左右。[1]这个金铜佛头的材质被说成 gilt bronze(鎏金青铜)，但是没有提供检测报告。1997 年夏访日期间，我特地到东京国立博物馆观摩这尊佛头。据我观察，它的材质不像青铜，有可能是黄铜。如果真是黄铜，则可印证《酉阳杂俎》所载于阗国流行鍮石佛像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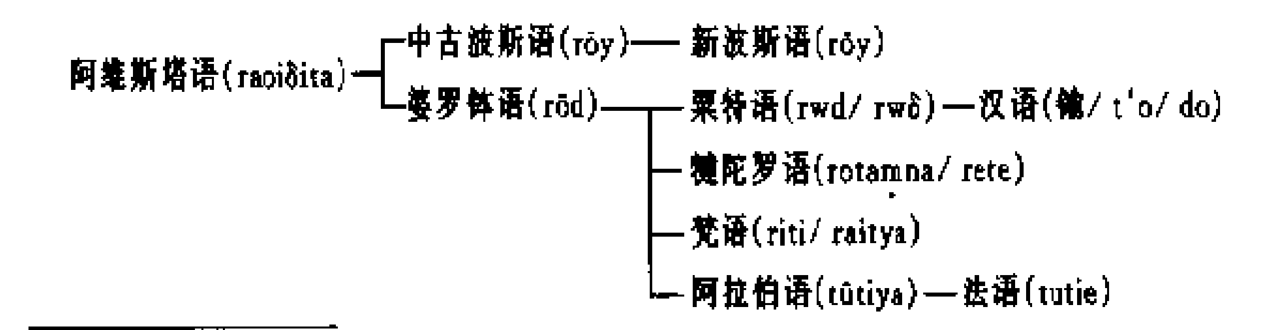
于阗使用鍮石的历史源远流长。2—4 世纪于阗和鄯善等丝绸之路南道诸国流行佉卢文犍陀罗语。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出土犍陀罗语文书屡次提到鍮石，可惜以前未能辨认。该词写作rotamna(见第 252、261、272、295、357、385、387 和 746 号文

〔1〕 Marylin M.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 1, Leinden: E.J. Brill, 1999, pp. 266～267.

书)，[1] 巴罗建议和新波斯语 royan/ royang(茜草)相联系。[2] 我们以前盲从其说。现在看来，这个词不是茜草而指鍮石。

如前文所述，鍮石得名于婆罗钵语 rōd(黄铜)。该词的形容词形式是 rōdēn，相当于中古波斯语的 r'wyn 和新波斯语的 rōyīn，意为"黄铜的"。[3] 那么第 272 号犍陀罗语文书第 8 行应该译作："无论如何，国事不得疏忽。紫苜蓿要在城内征收。月光石袍带(caṃdri-kamaṃta)、鍮石(rotaṃna)和珠宝(curoma)均应日夜兼程，从速呈献皇宫。"第 387 号犍陀罗语文书第 6 行应该译作："善生正在处理州中事务。当此谕令到达后，你要立即从骑都那里提取鍮石(rotaṃna)1 弥里码 10 硒。"犍陀罗语文书有时也采用梵语形式。例如：第 696 号犍陀罗语文书中出现的 rete uṭaṃca。前一字以前不识，疑为婆罗钵语 rōd(黄铜)借入梵语后的形式 rīti 或 raitya，在此处形容骆驼颜色。那么这个片语意为"鍮石色(黄色)骆驼"。古代东西方诸语言中鍮石各种称谓之间的关系当如下表所示：

表一　古代东西方诸语言中鍮石各种称谓关系



[1] A.M. Boyer et al.,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1920～1929。本文所引犍陀罗语文书均据该书，恕不一一出注。

[2]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 114.

[3] D.N. MacKenzie，前揭书，72 页。

综上所述，输石一词原为古波斯人对红铜的称谓，当他们掌握黄铜冶炼术后，又用该词表示黄铜。考虑到粟特人是早期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中介，所以波斯人对鍮石的称谓大概经粟特语间接借入汉语。

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是西域商品的另一个重要集散地。从吐鲁番出土文书可知，波斯锦、拂临（东罗马）银盏、印度香料大量充斥高昌城（今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城）市场。饶先生从吐鲁番文书中检索出三件涉及鍮石的文书。[1]

第一件拟名《高昌□归等买鍮石等物残帐》。其文曰："……///归买鍮石/……///[毯]百八十张，□诸将绵///……/……///[钵]斯锦系□昌应出///……"这件文书和柔然永康十七年（481年）残文书共出于哈拉和卓第90号墓，故知其年代约在5世纪末。文中提到的[钵]斯锦即波斯锦，而鍮石和地毯皆为《隋书·西域传》所列波斯方物。

第二件拟名《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这是一件曹迦钵、何卑尸屈、曹易婆、康炎毗、翟陀头、何阿陵遮、安婆等粟特商胡从事贸易活动的帐单。文末提到"翟萨畔买香五百七十二斤，鍮石叁拾[斤]"云云。翟氏不在粟特昭武九姓之列，应为丁零人，但是敦煌吐鲁番文书和隋唐墓志记载的许多翟姓人士均采用胡名。例如：洛阳出土隋大业十一年（615年）翟突娑墓志云："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日月以见勋效……春秋七十。"[2]翟突娑之父为祆官萨

[1] 饶宗颐，前揭书，381～385页。

[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90页。

宝,翟突娑的字“薄贺比多”疑来自粟特语 βγnpt(祆祠之主)。[1]《唐光启元年(885 年)沙州伊州地志》还提到伊州(今新疆吐鲁番)有祆庙,祆主名曰“翟槃陀”。槃陀其名译自粟特语 βntk(奴仆)。《资治通鉴》卷九十四记晋成帝咸和五年,“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北方草原的丁零人很早就和康居粟特人接触,改奉火祆教,并取胡语教名。

第三件拟名《唐残书牍》。其文曰:“……///贤信,即欲作银腰带……/……///且带偷(鍮)石腰带,待///……”《旧唐书·舆服志》记唐制曰:文官三品以上服紫金或玉带,四品佩金带,六至七品饰银带,八至九品饰鍮石带,庶民百姓只能用铜铁带。《新唐书·舆服志》亦载:“八品、九品服用青,饰以鍮石。”可见,颇具异国风情的鍮石在唐朝竟然影响到官僚阶层的舆服制度。

饶先生还征引王明清《挥尘录》所云“高昌即西州也。……以银或鍮石为筒贮水”,以说明宋代高昌仍然流行鍮石制品。吐鲁番至今未闻有鍮石筒出土,不过近年发现一尊唐宋时期(约 7—9 世纪)的黄铜造像。据报道,这尊造像高约 8 厘米,下面是铜佛造像常见的莲花底座,但不知何故莲花座上身披袈裟的人物被认为是“摩尼神像”。[2] 这件“摩尼神像”的艺术造型和犍陀罗所出 6—7 世纪黄铜龙王像颇为相像。[3] 故疑吐鲁番的这尊黄铜造像亦为龙王造像。无论如何,它为我们研究中世纪吐鲁番盆地流行的鍮石造像提供了重要实物标本。

---

〔1〕 这个粟特语词见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 1 号书信及中亚慕格山所出粟特文书。

〔2〕 穆舜英等,前揭书,图版 119、186 页图版说明。

〔3〕 E. Errington and J. Cribb, *The Crossroads of Asia*, Cambridge: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pp. 237—238.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鍮石贸易自然亦在其中。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从敦煌文书中检索出以下几件涉及鍮石的文书。[1]

1. “鍮石香宝子贰”(P. 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 年)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

2. “新造鍮石莲花贰[柄]并座具全，计大小捌拾肆叶。新造鍮石金渡香炉壹柄，内有裂，并师(狮)子座具全”(P. 4004《庚子(940 或 1000 年)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

3. “又细鍮石越一柄。鍮石大骨卓一个，小鍮石骨卓一个”(S. 2009《官衙交割什物点检历》)。

4. “瑠璃瓶一[只]，鍮石瓶子一只”和“鍮石瓶子一双，鍮石钗子六十四只”(P. 2596《癸酉年(793 年)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

第 3 件文书的大小鍮石骨卓颇费解，“骨卓”疑为波斯语借词，音译自婆罗钵语或新波斯语 gōšwār(耳环)。[2] 那么鍮石骨卓意为“黄铜耳环”。

古籍有时把鍮石当作水晶、玻璃或琉璃的代名词，如 9 世纪初吐蕃僧人所编《翻译名义大集》第 5971 号将梵语 kācaka 译作“鍮石”。其实，梵语 kācaka 的本义是“硝石”，指硫酸钾，不知何故亦被称作“鍮石”。因此，第 4 条敦煌文书的“鍮石瓶子”大概指玻璃瓶。王嘉《拾遗记》曰：“石虎为四时浴室台，皆用鍮石、䃥玞为陡岸。”[3] 这里提到的鍮石大概指琉璃。犍陀罗语文书第

[1]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67～68 页。

[2] D. N. MacKenzie，前揭书，37 页。

[3] 《太平御览》卷八一三所引。

524号文书有 kayavatra 一词，巴罗建议和梵语 kācapātra（玻璃瓶）相联系。[1] 那么这个词大概就是吐鲁番文书所言“鍮石瓶”的胡语原文。如所周知，铜的氧化物是制造玻璃或陶瓷的重要原料。以赤铜矿形式存在于自然界的氧化亚铜可以作为玻璃或瓷釉的红色颜料；以黑铜矿形式存在于自然界的氧化铜可用作玻璃或人造宝石的颜料（蓝—绿）。[2]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珠玉》曰：“合化硝铅写（泻）珠铜线穿合者为琉璃灯，捏片为琉璃瓶袋。”宋代李诫编修《营造法式》曰：“凡造琉璃等之制，药以黄丹，洛河石和铜末。”不知敦煌文书的“鍮石瓶子”是否指用黄铜末加色的玻璃瓶。

三、鍮石与金铜造像

印度和中亚佛教徒喜用鍮石铸造佛像。据《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梵衍那国王城“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同书卷七记载：婆罗痆斯国“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层台祠宇，雕石文木。茂林相荫，清流交带。鍮石天像，量减百尺，威严肃然，懔懔如在”。下文又载：“婆罗痆河东北行十余里，至鹿野伽蓝……精舍之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转法轮势。”梵衍那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西巴米扬城；婆罗痆斯在印度恒河流域的贝拿勒斯城。“鍮石天像”一词大概译自佛教粟特语 rwônyt βγyšt，意为“黄铜天

---

[1] 参见 T. Burrow，前揭书，81页。

[2]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27～829页。

神像”。据《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介绍，长安城大同(通)坊观音堂有“于阗鍮石立像”。《寺塔记》下文还说，长安城常乐坊赵景公寺的“华严院中，鍮石庐舍立像，高六尺，古祥精巧”。看来印度和中亚佛教徒供养鍮石佛造像之胡风对唐代长安城亦有影响。

据考古资料，铜佛造像起源于古代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和斯瓦特)及其毗邻地区大夏(今阿富汗)等地。据光谱和金相测试，中亚铜佛造像的材质如下表所示：[1]

表二： 中亚铜佛造像的材质统计表

序号	名称	出土地点	年代	材质	尺寸
1	菩萨坐像	阿富汗或斯瓦特	1世纪或稍晚	铅、铜、锡、锌合金	高6.4厘米
2	三佛铜舍利盒	白沙瓦	2世纪	红铜	高18厘米
3	坐佛残像	犍陀罗	2世纪	红铜	高9.9厘米
4	立佛	阿富汗	4世纪	铅青铜	高10.2厘米
5	立佛	阿富汗	5—6世纪	铅、铜、锌、锡合金	高10.2厘米
6	带座铜立佛	阿富汗	5—7世纪	铜锌合金(黄铜)	通高28.6厘米
7	青光铜立佛	阿富汗	5—7世纪	铜、锌、锡合金	高30厘米
8	青光带座铜立佛	阿富汗	5—7世纪	铅、铜、锌、锡合金	高38.1厘米
9	立佛	犍陀罗	5—7世纪	铅、铜、锌合金	高41厘米
10	菩萨立像	阿富汗	5—6世纪	铅、铜、锌合金	高10.8厘米
11	密宗毗昙奴立像	斯瓦特	5—7世纪	铜锌合金(黄铜)	高48.5厘米
12	龙王头部造像	白沙瓦	6—7世纪	铜锌合金(黄铜)	高46厘米

据以上数据，第6、7、11和12号标本均为铜锌合金，当即鍮

[1] E. Errington and J. Cribb，前揭书，169、194、207、211、213、215、218、222、233、234、237和251页。

石造像。第 1、5、8、9 和 10 号标本虽然含铅，但是主要材质系铜锌合金，仍然可以算作鍮石造像。第 2、3 和 4 号标本的材质为红铜或铅青铜，自然不是鍮石造像。第 12 号标本值得注意，这是一尊高近半米的龙王头像面部构件。若是立像，这尊龙王像的通高至少有 4 米左右，从而印证了《大唐西域记》卷一所云鍮石大佛须“分身别铸，总合成立”。

上引敦煌文书提到“新造鍮石金渡香炉”，故知鍮石可以镀金。那么古代佛堂供养的金铜佛造像或有镀金鍮石造像。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大造可容纳三千人的佛寺，寺中“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三国志·吴志·刘繇传》)。一般认为，笮融所造铜佛是中国最早的金铜佛造像。不过中国现存金铜造像没有那么早的，最早的标本大都属于三国至十六国时期。例如：1956 年武昌市莲溪寺一座砖墓出土的鎏金铜带上镂刻的佛像。后赵石虎建武四年(338 年)题名金铜佛造像以及夏赫连定胜光二年(429)题名的金铜佛造像。中国供养金铜佛造像的习俗直到唐宋时期仍然兴盛不衰。[1] 近年陕西临潼、扶风和千阳等地相继发现几批唐代铜佛造像。[2] 可惜缺乏材质鉴定，不知其中是否有镀金鍮石造像。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列有“林邑国献无量寿鍮石像记”。林邑在《大唐西域记》中称“瞻婆”，即今越南占城。故知南北朝时鍮石佛造像又经海路传入中国。由于缺乏材质测定，只有新疆吐鲁番所出

---

〔1〕 丁明夷：《中国金铜佛造像》，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74～676 页；李静杰：《中国金铜造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年。

〔2〕 参见《陕西临潼邢家村发现唐代鎏金铜造像》，《文物》1985 年第 4 期；《扶风县贤官村唐鎏金铜造像窖藏》，《文博》1987 年第 5 期；高次若、刘明科：《陕西千阳县上店发现唐代铜佛造像窖藏》，《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 1 期。

黄铜龙王造像是目前惟一能够确定的鍮石造像。

中国传统制铜工业素以青铜(铜锡或铜铅合金)冶铸为主,黄铜(铜锌合金)制造技术起源于小亚细亚,后来传入希腊、罗马和波斯。因此,中国黄铜冶炼术完全可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这种技术的传播媒介则是鍮石佛造像。当然,这个推测尚有待中国出土金铜造像的材质鉴定数据来验证。

四、鍮石与汉唐外丹黄白术

据考古发现,黄铜冶炼术最先在小亚细亚发明成功。小亚人把碎铜片、木炭和菱锌矿放在密封的坩埚中加热,当温度达到赤热状态(约1300℃)时,菱锌矿即可还原成锌蒸汽并扩散到铜液中,从而冶炼成黄铜。公元前10世纪这项技术就被小亚人普遍应用于黄铜生产。罗马时代的黄铜制造业就采用小亚人冶炼黄铜的方法。公元前1世纪起德国的菱锌矿就被用于黄铜生产。罗马人用黄铜铸造容器、盔甲、首饰、胸针、别针和钱币等。[1] 16世纪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欧洲以前,欧洲中产阶级喜用黄铜工艺品,并以黄铜盆、盘等装饰居室。

波斯人冶炼黄铜的技术是否来自小亚,史无明载。不过小亚和波斯自古以来就有频繁的文化交流。公元前10世纪爱奥尼亚人从希腊半岛迁入小亚西部,并不断向东方移民。于是爱奥尼亚成了波斯人对希腊的泛称,古波斯碑铭写作Iauna,源于希腊语Ioniana(爱奥尼亚)。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中亚

---

[1]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341页;同书,第4卷,66页。

时以及后来希腊雄主亚历山大东征时，大批希腊移民相继迁人中亚和北印度。印度人按波斯人习惯将他们称为 Yavana 人。这个名字在汉译佛经中译作“耶槃那”(即爱奥尼亚人)，指侨居中亚的希腊人而言。[1]

中亚最早的黄铜标本出自古代犍陀罗地区。最早的标本是在巴基斯坦西北呾叉始罗附近的比尔土丘遗址发现的，是一铜瓶，时代为公元前 3 世纪。犍陀罗及其毗邻地区还出土过属于公元前 3—前 2 世纪的零星黄铜工艺品。其中一件颇具希腊化艺术特点的黄铜雕像可证这些黄铜工艺品当系中亚的希腊侨民所造。[2]那么，波斯和中亚冶炼输石的技术也可能学自侨居东方的希腊工匠。

鍮石何时传入中国，史无明载。据上节讨论，鍮石人华与佛教传入中国有直接联系，鍮石佛造像可能是黄铜制造技术东渐之媒介。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依附于道教，同时道教也利用佛教扩大影响。早期汉译佛经的许多词汇采用道教术语，说明道教对佛教的影响。道教本无偶像崇拜，道家后来为黄老立像是受佛教影响。东汉末三国初高僧支谦所译《佛说阿难四事经》最早提到鍮石，道家外丹黄白术也在这个时期突然问世。[3] 东汉桓谭《新论》记载，西汉末年史子心造作黄金，以作延年药。据陈国符考证，中国最早的炼丹术文献《黄帝九鼎神丹经》约在后汉顺帝时成书。[4]

---

〔1〕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87 页。

〔2〕 P. T. Craddock, "Zinc in India," in P. T. Craddock, *2000 Years of Zinc and Brass*, British Museum Occasional Paper No. 50, London, 1990, pp. 27～72.

〔3〕 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收入《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219 页。

〔4〕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375 页。

所谓外丹黄白术就是点石成金和点石成银术。战国秦汉以来，中国方士们大事炼丹求仙，并派方士人海求仙，寻找"不死之药"。[1] 按西晋炼丹大师葛洪《抱朴子·仙药》的理论，仙药以丹砂、金银为关键要素，而人工炼制的"还丹"和"金银"又远胜于自然状态的丹砂和金银。据考证，葛洪推崇的药金药银无非是一些色泽类似于黄金白银的铜合金。[2] 西域传来的鍮石恰恰具有这样的特性。

三国魏初张揖《埤苍》云："鍮石似金似而非金。西戎蕃国药，炼铜所成。有二种鍮石，善恶不等。恶者校白，名为灰折；善者校黄，名为金折。亦名为金折，亦名真鍮。俗云不博金是也。"[3] 善鍮疑为汉唐方士之药金，指黄铜(铜锌合金)；恶鍮疑为汉唐方士之药银，指砷白铜(铜砷合金)。

我国古代冶金术历来以青铜冶铸(铜锡或铜铅合金)为主。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虽然发现过几例黄铜标本，但它们都是用共生铜矿冶炼的铜合金，不能作为中国早已掌握黄铜冶炼术的例证。[4] 否则，汉唐方士不会把波斯鍮石当作稀世之宝。

《埤苍》的"恶鍮"在《一切经音义》卷八二中或称"白金"，疑指砷铜合金。唐代炼丹大师金陵子《龙虎还丹诀》对制造银白色铜砷合金有详细记述。[5] 砷白铜常被古今骗子用来冒充白银，但铜砷合金的稳定性不如铜锌合金，所含砷元素会逐渐挥发，导

---

[1] 《史记·封禅书》。

[2] 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284页。

[3] 《一切经音义》卷六〇引。

[4] 孙淑云和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8期，81页。

[5] 王奎克等：《砷的历史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2期，1982年。

致颜色泛黄，只能暂时欺人。[1] 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古代炼丹师称砷白铜为"恶输"或"灰折"。

据考古发现，砷铜合金首先在中亚和近东冶炼成功，出现年代甚至早于青铜。中国内地早期青铜文化遗址不见砷白铜。据报道，甘肃河西走廊西部干骨崖和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发现过一批砷铜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砷铜器的制造也和中原青铜冶铸技术不同，均采用热锻。所以这批砷铜器有可能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2] 南朝齐梁炼丹大师陶弘景《名医别录》载："炼服之法皆在仙经中，以铜为金亦出黄白术中。晋末以来，氐羌中纷扰，此物绝不复通人间，时有三五两，其价如金。"这条记载似说明河西氐羌地区冶炼砷白铜的古老工艺传统仍为后世炼丹师所传承。

中国古代炼丹术著作屡次提到输石点金。南北朝无名氏著《太极真人九转还丹经要诀》提到以金、银、铜、鍮为釜炼丹。唐代无名氏编《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八和卷一九有"炼鍮石法"。宋代炼丹书《十八转黄白法》谓"五金：铜、锡、鍮、铁、铅"。[3] 金代无名氏《本草金石论》曰："金二十种论：雄黄金、雌黄金、曾青金、硫黄金、汞中金、生铁金、鍮石金……以上二十件唯只有还丹金、水中金、瓜子金、青麸金、草砂金等五件是真，余外并皆是假。"[4] 据陈国符考证，《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实际是历代炼丹术的汇抄。

---

〔1〕 赵匡华等：《我国金丹术中砷白铜的流源与验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1期，1983年；收入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63～79页。

〔2〕 H.H. Coghlan, *Notes on the Pre-historic Metallurgy of Copper and Bronze in the Old World*, 1972；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75～84页。

〔3〕 《古今图书集成》卷五所引。

〔4〕 金代无名氏《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四所引。

该书第一卷即抄自汉代《黄帝九鼎神丹经》。所以不能排除汉代方士入海求仙所得“不死之药”中有药金鍮石。

《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提到印度东海岸的乌荼国北方阿罗伊罗出产鍮石。乌荼国在今印度东海岸的奥里萨邦北部。玄奘曾访问此地。《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说：“若其金、银、鍮石、白玉、火珠，风土所产。弥复盈积。奇珍杂宝，异类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贸。”据《汉书·地理志》，汉代中国和印度就有海上交通。汉武帝年间中国船队已达印度东海岸的黄支港（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康契维腊姆附近）。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列有“林邑国献无量寿佛鍮石像记”。这条记载说明确有鍮石从海路传入中国。所以鍮石大概在汉初就由入海求仙药的中国方士从印度带入中国，后来成为汉唐外丹黄白术的药金之一。

外丹黄白术在唐代达到鼎盛。据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记载，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朝野行外丹黄白术者多达数千人。[1] 如前文所述，鍮石分善鍮和恶鍮两种，恶鍮的化学成分是铜砷合金。众所周知，砷是剧毒物质，文献或称“砒霜”。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九《唐诸帝多饵丹药》统计，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因服食过量丹药中毒致死。唐朝臣民杜伏威和李道古以及流寓中国的波斯侨民李抱真，亦因服食过量丹药中毒身亡。[2] 这是其消极的一面。

---

〔1〕 向达：《唐代刊书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6 年，124～125 页。

〔2〕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 Ho Ping-yu and J. Needham, “Exlixir Poisoning in Mediaeval China,” *Janus*, 48, 1959, pp.221～254；陈国符：《道藏经中若干可供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之史料》。《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2 卷第 3 期，1983 年，269～272 页。

另一方面，汉唐外丹黄白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冶金术的发展。宋戴君孚《广异记》记成弼用赤铜造黄金之事。其文曰："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炼丹砂，合成大还丹，化赤铜为黄金。有成弼者给侍之，持白刃杀道者，而得其丹。唐太宗召成弼，授以五品官，敕令以铜造黄金，凡数万斤。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1] 黄铜之优劣取决于含锌量。据报道，中亚发现的古代黄铜工艺品的锌含量不超过22‰。所以"大唐金"的含锌量肯定高于22‰，所以产生了"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的轰动效应。《广异记》的记载说明，唐代炼丹大师冶炼黄铜的技术似乎已经大大超过波斯和印度，并开始向西域出口。阿拉伯波斯语文献对黄铜有个新称谓，写作 xār-čīnī（中国石），据说这种黄铜的含锌量可达25.4‰。[2] 所谓"中国石"大概就是"大唐金"。高加索巴尔卡墓（8—9世纪）有33件鍮石制品，有的含锌量达40—50‰，[3] 可能也是中国输出的"大唐金"。

中国文明有其独立的起源，但中国文明从未脱离世界文明而孤立发展。中国在积极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又对其加以改造，从而产生新的发明创造，并反过来对外来文明产生影响。本文对中国古代著名舶来品鍮石的讨论似可说明这一点。

（原载《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收入本书时改正了一些错误）

---

〔1〕《太平广记》卷四〇〇所引。

〔2〕劳费尔，前揭书，388页。

〔3〕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9年，62页。

4

于阗乐舞与梵剧东渐

在中国音乐史上，于阗乐舞颇负盛名。汉高祖刘邦的嫔妃戚夫人有个随身侍女，名叫贾佩兰，后来嫁给扶风人段儒为妻。她回忆宫中之事说："戚夫人侍高帝……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1] 这段史料虽然不见于正史，但想必有一定根据。可知于阗乐舞在汉代初年业已传入长安城。

印度乐舞也在汉初传入长安。据说张骞通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两首西域乐曲，汉武帝嬖臣李延年在其基础上创作出28种乐曲，并在宫内教坊演唱（汉崔豹《古今注》）。《摩诃》究竟是什么乐曲，史无明载，但无疑来自印度。因为其名译自印度梵语 mahā（伟大的），也即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之"摩诃"。

公元399年，东晋高僧法显从长安赴印度求法，道经于阗，只见"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2] 既然于阗人以佛教立国，于阗僧人演奏的"法乐"必指佛教戏曲而言。

---

〔1〕葛洪集：《西京杂记》卷三，收入明程荣纂辑：《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307页。

〔2〕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3页。

本世纪初，德国考察队的勒柯克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参见插图43)。1911年，柏林大学吕德斯教授研究出版了这批梵文佛经。这批梵文写经中有三部佛教戏曲剧本残卷，其中《舍利弗剧》(Śariputraprakaraṇa)较为完整，凡9幕，现存150个残片(编号MIK.III.26)(参见插图43)。该剧本主要讲述佛陀大弟子舍利弗和目犍连如何放弃婆罗门教，改信佛教的故事，卷尾注明是"金臆之子马鸣所著《舍利弗剧》"。吕德斯认为，这个剧本大约抄写于贵霜王迦腻色伽或胡维色伽时期，也即公元2世纪左右。克孜尔千佛洞发现的另外两个梵剧残卷尚不知剧名，估计也是马鸣的作品。[1]有学者认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本当属晚唐敦煌写本《释迦因缘剧》。[2]克孜尔千佛洞发现的《舍利弗剧》要比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早800年左右。[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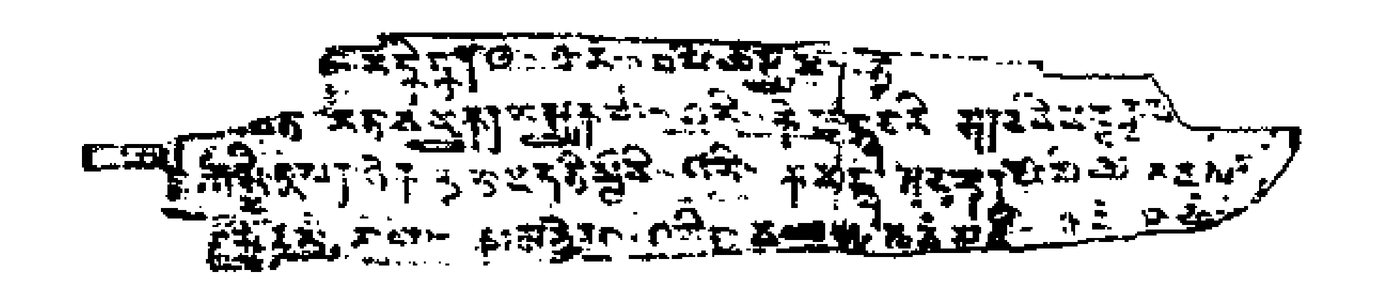
马鸣是印度著名诗人和戏剧家，大乘佛教创始人之一，生于北拘舍罗首府沙祇城，他的生活时代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相传马鸣出身于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婆罗门家庭，后来改奉佛教。据鸠摩罗什译《马鸣菩萨传》记载，贵霜王讨伐中印度时，将马鸣俘获到中亚。马鸣在中亚到处讲演，据说他讲故事很引人入胜，

---

〔1〕 H. Lüders, *Bruchstücke buddhistisher Dramen*, Kleinere Sanskrit-Texte 1, Berlin, 1911 (repri. in Monographien zur indischen Archäologie, Kunst und Philologie, hrsg v. H. Härtel Bd. 1, Wiesbaden, 1979).

〔2〕 李正宇：《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试探》，《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64～82页；《再谈S.2440〈释迦因缘〉的性质——答金良同志》，《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86～90页。

〔3〕 杨富学：《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回顾》，《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127～138页(收入杨氏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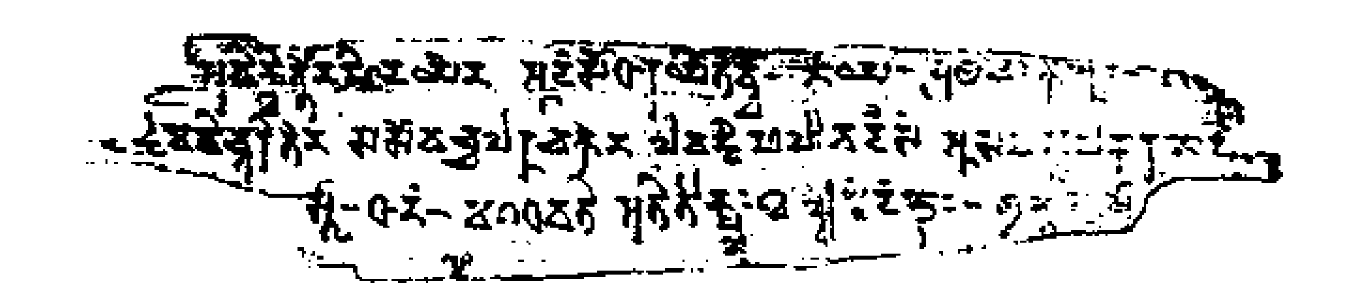


插图 43 新疆库车出土公元 2 世纪印度戏曲《舍利弗剧》残卷

竟使得马听他讲演时，饿了连草料都顾不上吃。因而“以马解其音故，遂号为马鸣菩萨”。[1] 唐代高僧义净对马鸣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写道：“又尊者马鸣亦造歌词及《庄严论》，并作《佛本行诗》，《大般若》译有十余卷，意述如来始自王宫，终于双树，一代佛法，并辑为诗。五天南海，无不讽诵。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诵者，心悦忘倦，又复纂持圣教，能生福利。”

马鸣创作的《舍利弗剧》是著名梵剧之一，曾在印度和中亚广为流行。法显出访中印度的摩头罗国时，遇到“众僧大会说法，说法已，供养舍利佛塔。种种香华，通夜然灯，使彼人作（乐）《舍利弗本婆罗门时诣佛求出家》”。[2] 中印度流行的这部法乐似即克孜尔千佛洞发现的梵剧《舍利弗剧》。郑樵《通志》著录的

[1]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北京：文学出版社，1964 年，262 页；钱文忠：《试论马鸣〈佛本行经〉》，《中国社会科学》1990 年第 1 期，135～146 页。

[2] 章巽，前揭书，55 页。

唐代佛曲中有梵竺四曲，分别题为《舍利弗》、《法寿乐》、《阿那环》和《摩多楼子》。其中两首佛曲亦见于《乐府诗集》卷七八《杂曲歌词》。据许地山研究，这些梵剧中有些诗句取材于马鸣的《佛所行赞》，剧情讲述的佛陀弟子舍利弗和摩多楼子（即目犍连）事迹，或与马鸣创作的梵剧《舍利弗剧》有关。他还推测说："这曲什么时候人中国虽不可知，但总不能后于《佛所行赞》（北凉昙无谶译）许久。"[1] 于阗地处印度与龟兹之间，梵剧从印度向龟兹的传播必然经过于阗。法显时代于阗僧人娱乐的"法乐"无疑指佛教戏剧。

印度戏剧源于婆罗门教祭神仪典，由颂神歌曲和模拟神的行为逐渐演变为梵剧。公元前后梵剧在印度逐渐兴起，不断出现马鸣、首陀罗迦等梵剧作家，并产生了世界戏剧理论史上的巨著《舞论》（Nāṭyaśāstra），继而在 3—5 世纪产生了梵剧大师迦梨陀娑和他的名著《沙恭达罗》（Abhijñānaśākuntala），从而将梵剧的发展推向高潮。[2] 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曾发现梵文剧本《沙恭达罗》。郑振铎先生早年据以考证中国戏曲起源于南戏。[3] 国清寺系隋代敕建，这里发现的梵文剧本当不早于隋代。在此之前，印度戏剧早就从西域传入中原。

十六国时，后凉吕光伐龟兹，再次将西域戏曲引入中原。《隋书·音乐志下》说：

---

〔1〕 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原载《小说月报》第 7 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收入郁龙余：《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年，12～56 页。

〔2〕 金克木，前揭书，253～370 页；廖奔：《西域戏剧文化东向探述》，《西域研究》1995 年第 4 期，1～16 页。

〔3〕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戏文的起来》，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重印本，574 页。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

关于《于阗佛曲》，沈括《梦溪笔谈》卷五称作"于阗舞曲"，归入西凉五曲之一。向达先生早年著《唐代佛曲》。他分析说：

于阗佛曲一定也受有龟兹的影响。观之唐代太乐署有《龟兹佛曲》、《急龟兹佛曲》，可见龟兹乐中实有佛曲一种。所谓于阗佛曲者或是于阗人所创，而其乐调却不离龟兹部。[1]

我们认为，龟兹和于阗佛曲显然有共同的渊源——印度梵剧，但是两者各有其名，乐调未必相同。于阗佛曲产生之后，首先传入邻国龟兹。吕光伐龟兹后，又从龟兹引入河西，后来居然成了西凉乐主要舞曲之一。

南北朝时西域戏曲传入江南。梁武帝好佛事，下诏将佛曲定为"正乐"。《隋书·音乐志》记载：

---

[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280页。

> (梁武)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论》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拦大会。

《佛祖统纪》卷三七将此事系于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9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无遮大会始于梁武帝。[1] 然而，法显时代(约4世纪末)于阗国已开始举行这类佛教法会。无遮拦大会译自梵语 Pañcavārṣikapariṣad，旧译"般遮于瑟"。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贤愚经记》记载：

> 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遇般遮于瑟大会。般遮于瑟者，汉言五年一切大众集也，三藏诸学各弘法宝，说经讲律，依业而教。学等八僧随缘分听，于是竞习胡言，折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

昙学等八位高僧"始集此经"的时间约在445年，而于阗王召开般遮于瑟大会要比梁武帝早80余年。无遮拦大会一般都有歌舞助兴。玄奘出访印度时，接受戒日王之邀，到曲女城参加无遮拦大会，法会期间"佛像前后各百大象，乐人以乘，鼓奏音乐"。[2] 梁武帝举行的无遮拦法会"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助兴。于阗王举行的般遮于瑟大会自然也有乐舞助兴。

讫至唐代，西凉乐依然兴盛不衰，列为唐朝十部大乐之一。

---

〔1〕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43页。

〔2〕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440～441页。

白居易《西凉伎》有生动的描述。他说：

> 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
> 刻木为首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
> 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
> 紫须深目两胡儿，鼓舞跳粱前致辞。[1]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再次提到于阗"国尚乐音，人好歌舞"，可惜未能详述其事，他书亦无记载，于阗乐舞究竟如何，至今还是个谜。19世纪末以来，于阗考古提供了许多关于于阗音乐史的实物资料。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于阗古都约特干城址（今和田市附近）收集到一件残陶罐（编号03.11.335），上面用浮雕塑造了一个于阗乐队，这个乐队由十二人组成，其中包括三位演箜篌琴师，两位排箫手，两位鼓手和一位长笛演奏者。可惜这组浮雕残缺不全，其余乐器不可辨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方团员安博特在和田收集了许多人物和动物陶塑，其一塑造了一位于阗女琴师演奏琵琶（参见插图44）。[2]凡此皆为研究



插图44　新疆和田出土弹琵琶俑

[1] 收入《全唐诗》七函一册。

[2] G. Montell, "Sven Hedin's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from Khotan," *BMFEA*, VII, 1935, pp.167~168 and 180.

于阗戏曲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于阗与疏勒相邻，两国同操东伊朗语，在音乐方面想必有频繁的文化交流。《隋书·音乐志下》记载：

> 疏勒乐……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觱篥（读作 bili）、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和田出土陶塑表明，于阗乐队和疏勒乐队使用的人员相同，也由十二人组成。无独有偶，《隋书·音乐志下》记天竺乐队亦由十二人组成。有趣的是，于阗人将戏剧表演艺术称作 nalia（E. 5.98 号文书），该词后来借入古藏语，写作 no-le（戏剧）。据英国语言学家贝利考证，于阗语的 nalia 源于梵语 nataka（戏剧）的俗语形式 nataga，[1]说明于阗乐舞来自印度梵剧。

白居易《长恨歌》曰："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缦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鱼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又名"婆罗门曲"，意即"梵曲"，原系印度婆罗门教乐舞，传入中原后，不断创新改造，逐渐演变成具有道教色彩的乐舞。[2]

唐代有三位于阗艺术家显示了非凡的音乐天才，他们是唐初的尉迟敬德、代宗朝的尉迟青和文宗时的尉迟璋。尉迟敬德名恭，以字行，是位世居中原的华化于阗人，他早年助高祖李渊打天下，以唐朝开国元勋而名显天下；晚年退出官场，沉湎于炼

〔1〕 H. W. Bailey, *Khotan Texts*, IV, Cambridge, 1961.

〔2〕 阴法鲁：《唐代乐舞文化》，《中华文明之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221 页。

丹求仙，"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卒于长安城私邸。[1]清商乐本属于中原五大古乐之一。韩非子有文曰："清商固最悲乎？"[2]由于这首古乐曲调凄清悲凉，故名曰"清商"。隋开皇初年，清商乐被定为七部大乐之一。《隋书·音乐志下》说：

>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

这七部大乐中的前两部属于中原古乐；第三部来自朝鲜半岛，后四部皆为西域音乐。关于隋代清商乐及其源流，《隋书·音乐志下》记载：

> 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虽赏逐时迁，而古致犹在。可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

---

[1]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2] 《韩非子·十过》。

《新唐书·礼乐志》说："清商伎者，隋清乐也。"可知隋唐时代的清商乐出自凉州，而且多有损益，恐非中原正声。凉州即今甘肃武威，汉代以来就是西域胡人的聚居之地。清商乐采用琵琶、箜篌等西域乐器，说明清商乐发展到隋代，业已融入许多西域因素。这大概就是于阗人尉迟敬德对清商乐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

唐人野史盛传尉迟敬德本来是位"锻铁汉"。[1] 这个说法经民间说唱文学演绎，流传甚广。尉迟敬德死后陪葬昭陵，葬地在今陕西礼泉县昭陵东南约 20 公里处，早年被盗一空。1972 年考古工作者清理尉迟敬德墓时，发掘出他和妻子苏氏的两方墓志。据志文记载，尉迟敬德原居"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县)，后举家迁往洛阳，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世宦中原王朝，其妻苏氏也是三代高官，两人婚姻想必门当户对。[2] 尉迟敬德系铁匠之说纯属野史演绎，不足为信。

唐长安城常乐坊有位于阗音乐大师，名叫"尉迟青"。唐德宗大历年间，他以吹奏觱篥的高超技艺折服河北第一觱篥高手王麻奴而名显天下。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讲述了这个故事：

> 尉迟青，官至将军。大历中，幽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为第一手，持其艺倨傲自负，戎帅外莫敢易请者。时有从事姓卢，不记名，入京，临岐把酒，请吹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为不可。从事怒曰："汝艺亦不足称，殊不知上国有尉迟将军，冠绝古今！"麻奴曰："某此艺海内岂有及者耶？

〔1〕《太平广记》卷一四六引万均《唐太宗》。

〔2〕昭陵文物管理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 5 期，20 页。

今即往彼，定其优劣。"不数月到京，访尉迟青所居在常乐坊，乃侧还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迟每经其门如不闻。麻奴不平，乃求谒见，阍者不纳，厚赂之，方得见通。青即席地令坐，因于高般涉调中吹一曲，勒部羝曲，曲终，汗浃其背，尉迟领颐而已。谓曰："何必高般涉调也！"即自取银字管，于平般涉调吹之。麻奴涕泣愧谢曰："边鄙微人，偶学此艺，实谓无敌，今日幸闻天乐，方悟前非！"乃碎其器，自是不复言音律也。

觱篥是一种簧管乐器，以骨或竹为管，上开八孔，前七后一，管口插有芦苇制作的哨子。唐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有诗曰："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1] 故知觱篥本为西域乐器，起源于龟兹（今新疆库车），新疆库车的库木吐拉佛教石窟的不少壁画绘有觱篥（第13、16和24窟），如第13窟壁画绘有两个觱篥，上系彩绸，指孔未加描绘，但吹口哨片表现得很清楚。第24窟壁画所绘觱篥也没画指孔，但是吹口处的哨片用两个苇片相夹，加以固定。《文献通考·乐十一》说："胡笳似觱篥而无孔。"又说："卷芦叶为笳吹之作乐。"胡笳于汉末从北方草原传入中原，多用来演奏悲欢离合的歌曲。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以抒发自己遭到匈奴劫掠的悲愤之情。觱篥或称"筚篥"。《旧唐书·音乐二》记曰："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唐代觱篥疑与汉代胡笳源于同类西域乐器。西域不产竹，觱篥或胡笳原来可能是骨制品。据考证，觱篥也有双管型，双管并列，各有五个指孔，见于新疆吐鲁番

[1] 收入《全唐诗》二函九册。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29窟壁画。[1]

觱篥传入中原后颇受中原士大夫的喜爱,成了汉唐时代燕乐及唐宋教坊音乐使用的重要乐器。尉迟青技压王麻奴的故事成为中国与西域音乐交流史上一段佳话,生动反映了西域胡乐在长安城及河北等地流行的盛况。中国民间至今流行觱篥,俗称"�管"或"管子"。有学者认为,现代维吾尔人吹奏的"巴拉曼"(Baraman)也源于西域古乐器觱篥。[2]

唐代于阗籍著名音乐家还有尉迟璋,以擅长吹笙和演唱歌曲闻名于世。唐文宗时尉迟璋任宫廷乐师,官至太常寺仙韶院副使。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乐工尉迟璋左能啭喉为新声,京师屠沽效呼为拍弹。"尉迟璋的艺术天才颇受文宗赏识,下诏给他加官晋爵。丞相郑覃建议授予他"王府率"一职,但是右拾遗窦洵上疏反对。他说:"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郑覃不以为然,他反驳说:"此小事,何足当衙论列!王府率是六品杂官,谓之清秩,与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大臣杨嗣也对窦洵进行驳斥。后来文宗听从郑覃等人的建议,下诏"别与一官",授予尉迟璋光州刺史。[3]唐开成五年正月二日,文宗突患暴病,穆宗第五子颍王与皇太子陈王争夺王位。在这场宫廷政变中,两军中尉"仇士良收捕仙韶院副使尉迟璋杀之,屠其家"。[4]一代名伶竟然死于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之中。

〔1〕周菁葆:《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91页。

〔2〕周菁葆,前揭书,248页。

〔3〕《旧唐书·陈夷行传》。

〔4〕《旧唐书·武宗纪》。

5

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墓表考证

新疆和田地处古代中西交通孔道，古称“于阗”。本世纪初，欧美和日本探险队上演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于阗古物和古代手稿争夺战，在此发掘出数以万计的精美文物。这些文物再现了于阗古国昔日的辉煌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近年于阗考古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大唐于阗将军叶和墓表的发现。据说这个墓表发现于30年代，历经周折，迟至1996年才公诸于世。[1]从表文看，墓主人即便不是于阗王，也是唐初于阗国的显赫人物。于阗出土唐代纪年文物原以策勒县达玛沟遗址出土开元十八年于阗语佛教律部残文书(Hedin 22)年代最早，[2]而大唐于阗将军叶和墓表的发现，则将唐文化西传于阗提前到贞观十年。不仅如此，这个发现还有助于探讨隋末唐初于阗史上许多关键问题。

众所周知，隋末唐初于阗国相继产生过两位艺术大师，时称大小尉迟氏(于阗语 viśa / 梵语 vijiya)。大尉迟名叫尉迟跋质

[1] 薛宗正：《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之墓考释》，《新疆文物》1996年第3期，1～2页。

[2] H.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ol. IV, 1961, p.129.

那，小尉迟名叫尉迟乙僧。[1] 他们将西域绘画新技法传入长安，不仅改变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风格，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海东日本美术的发展也有影响。[2] 可惜史籍失载，这个时期于阗与中原关系一直不清楚，以致大小尉迟氏的众多名作究竟是隋画抑或唐画，迄今仍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疑案。所以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在前人与时贤研究基础上，对隋末唐初于阗与中原的关系作初步探讨，求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碑文讨论

于阗将军叶和墓表只有拓本传世，我们的考释据山东高唐县侯立中先生藏拓。这个拓本最初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薛宗正先生刊于《新疆文物》1996 年第 3 期（以下简称“薛文”）。拓本题跋曰：“碑高 90 厘米，碑宽 40 厘米，碑字 8 厘米平方”。关于此碑若干细节，薛文语焉不详。为此，我们写信直接向侯立中先生请教。不久收到他的热情来信，随信寄赠此碑拓本彩色照片一张（参见彩版 14）。我们从这张照片意外发现，拓本题跋的“阿克苏河下游发见二倒唐代墓碑”被薛文误录为“阿

---

〔1〕 有学者以为乙僧其名译自于阗语 īrasaṃga-（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54 页），疑不确。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载：“又云其国尚有兄甲僧，未见其画踪也。”故知乙僧和甲僧之名皆非音译。尉迟乙僧之名或来自于阗语 viśa śe-saṃga（尉迟第二僧），其兄尉迟甲僧之名疑来自于阗语 viśa paḍa-saṃga（尉迟第一僧）。

〔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57～60 页；T. Nagahiro（长广敏雄），“On Wei-ch'ih I-seng, a Painter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Oriental Art*, n. s. 1—2, 1955, pp. 70～74; O. Sirén, *Chinese Paintings*, vol. 1, 1956, pp. 73～74；金维诺：《阎立本与尉迟乙僧》，《中国美术史论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年，129～130 页；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228～243 页。

克苏河下游发见已倒唐代墓碑"。这个记录相当重要,说明当年在新疆阿克苏河下游一共发现两块唐碑。我们从拓本所见唐碑是块残碑,这两块扑倒在地的唐碑疑是一碑断为两段,现存墓碑拓本大概是原碑上半段,下半段或即跋文所言"二倒唐碑"中第二块。发现者马君所拓"十数份"拓本中想必有第二块唐碑。如果这块唐碑拓本仍在世间流传,并能与我们讨论的这块珠联璧合,将是于阗古代文明史研究之幸事。

从形制和内容看,这块残碑似为墓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发现过许多类似的墓表。[1]表文直书3行,现存21字,薛先生释出前19字,第三行第四字照录原文,后面用括号注"年"字,并加问号以示存疑。[2]这个有疑问的字当释"年"字。《正字通》曰:"秊,本'年'字也。"西藏吉隆县近年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亦用该字表示"年"。[3]这个唐碑特殊用字可证此墓表必为唐代真品无疑。侯先生在信中建议,碑文第三行"日"字后面的两个字当释"立石"。从拓本照片(参见插图45)看,"石"字相当清楚,立字仅存上面一点。侯先生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墓表残文读作:

1. 大唐毗沙郡将军 ///……
2. 叶和之墓
3. 贞观十年九月三日(立)石 ///……[4]

---

[1] 黄文弼:《高昌砖集》(考古学特刊第2号),北京:中国科学院,1951年,41~71页。

[2] 薛宗正,前揭文,1页。

[3]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境内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619~623页;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270~253页。

[4] 阿拉伯数字表示行数;/表示换行;///…… 表示下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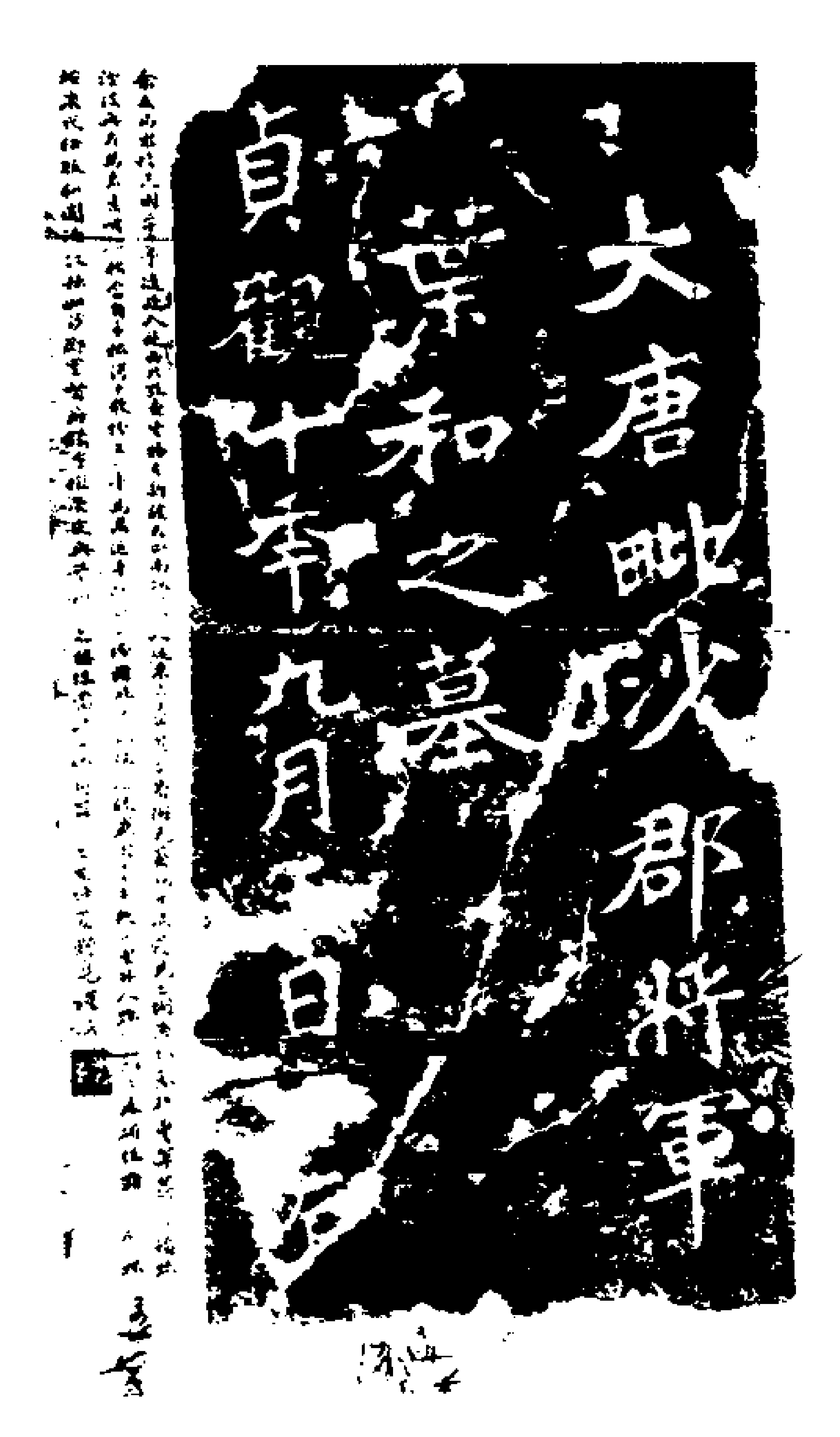


插图 45　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墓表拓片

正如法国汉学家沙畹所考,"毗沙"一词系古代印度神祇"毗沙门"的省译。[1]两词皆译自于阗语 vaiśramaṇa,相当于梵文 vaiśravaṇa,印度俗语作 vesamana,意为"多闻"。毗沙门本来是印度古代宗教中守护北方之神,后被佛教徒奉为四大天王之一,汉译佛教译作"毗沙门天"或"多闻天"。[2]佛教传入于阗后,毗沙门被尊为于阗国的创世主和保护神,因此唐朝在于阗设立行政机构皆以"毗沙"为名。那么,大唐毗沙郡将军就是唐朝于阗郡将军。

二、唐太宗设毗沙郡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唐朝正式用兵西域始于贞观十四年太宗平高昌。唐朝经营于阗较晚,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初设毗沙州,上元二年(675年)改置毗沙都督府。[3]于阗将军叶和墓表首次披露,早在贞观十年(636年)唐朝已在于阗设毗沙郡。这个发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隋末唐初中原与于阗关系史。

其实,文献对唐初设毗沙郡之事并非一无所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下简称《名画记》)卷八云:"尉迟乙僧,于阗国人。父跋质那。乙僧,国初授宿卫官,袭封郡公,善画外国及佛像。"乙僧姓于阗王族姓氏,并"授宿卫,袭封郡公"等,说明其地位显赫。所以向达先生早年疑其为于阗质子。他说:"跋质那,《名画记》列之隋代,则跋质那及乙僧乃父子同

[1]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年,95页注二。

[2]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006页;荻原云来等:《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公司,1979年,1285页。

[3]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为质子而久居长安者也。"[1] 若依此说，跋质那父子是以于阗国质子身份入侍隋朝，由隋入唐，继为唐朝于阗国质子。这个问题事关隋末唐初于阗国史之大事，不可不辨。

据张彦远自序，《名画记》写于唐宣宗大中元年。他所谓"国初"自然指唐朝初年。与张彦远同时代的朱景玄也提到尉迟乙僧。他在《唐朝名画记·神品下》说："尉迟乙僧者……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2] 凡此表明，尉迟乙僧入侍长安在唐贞观初年而非隋代。

于阗王在贞观初年遣使朝唐有如下背景：贞观二年，西域霸主统叶护可汗被伯父莫贺咄谋杀，国内大乱，西突厥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骤然削弱。贞观四年，唐军大破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在伊吾设西伊州，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门户。[3] 于是西域诸国纷纷遣使者到长安，太宗随即在西域列置州县。《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条详述此事曰："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唐太宗在西域初置州县似乎包括于阗将军叶和墓表提到的"毗沙郡"。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焯先生研究，唐朝的宿卫制度始于贞观四年。[4]《新唐书·魏徵传》记载："至是，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宿卫。东薄海，南逾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这段文字系于贞观四至七年间，故疑尉迟乙僧到长安"授宿卫"就在这个时间。《新唐书·于阗传》又载：

---

〔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2〕 据《全唐文》卷五四七，朱景玄为唐武宗会昌时(841—846年)人，生平时代早于《历代名画记》成书年代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

〔3〕 参见《旧唐书·铁勒传》及同书《突厥传》。

〔4〕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230～231页。

“于阗国……先臣于西突厥。其王姓尉迟氏，名屈密。贞观六年，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后三年，遣子入侍”。于阗国两次朝献与尉迟乙僧入侍长安的时间相近。尽管乙僧姓于阗王族姓氏，但他毕竟不是于阗王子，而入质唐廷者非于阗王子所不能。所以贞观九年到长安的于阗王子当为唐初于阗王尉迟屈密之子。既然乙僧在“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他大概是贞观六年随于阗使团献玉带而入侍长安的。估计太宗在于阗设毗沙郡以及授于阗王公贵族将军衔位均在贞观六年，而尉迟乙僧“袭封郡公”之“郡”似即毗沙郡。

唐初许多制度沿袭隋制，太宗在西域初置郡县亦然。《隋书·炀帝纪》记大业五年六月“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同书《地理志》和敦煌写本《沙州图经》卷五提到隋朝西域四郡的若干镇县名称。[1] 然而，文献既未提到隋朝在于阗设郡，亦未载于阗王向隋朝遣子入侍。相反，《新唐书·于阗传》却说：“于阗国……先臣于西突厥。其王姓尉迟氏，名屈密。贞观六年，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可见贞观六年以前于阗国一直在西突厥统治之下。慑于西突厥的威胁，于阗王未必能向隋朝遣子入侍。《隋书·于阗传》记当朝于阗王名曰卑示闭练，“大业(605—618年)中，频遣使朝贡”。仅此而已，未曾遣子入侍。所以，就现有资料而言，我们只能认为尉迟跋质那以于阗使臣身份朝隋，尔后滞留长安。张彦远说尉迟乙僧“授宿卫，袭封郡公”，恐怕仅指尉迟乙僧一人而言，只能理解为尉迟乙僧本人及其后人世代相袭毗沙郡公爵位。

关于贞观初年塔里木盆地的归属问题，文献记载不一。《新

---

〔1〕 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暦纪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5年，90～91页。

唐书·突厥下》记贞观二十年西突厥可汗乙毗射匮遣使向唐朝请婚,"帝令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由于西突厥可汗拒绝了唐朝的附加条件,这次联姻最终没有成功。研究者对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深表怀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瑞德(D. Twitchett)主编的《剑桥隋唐史》就认为:"其中龟兹(库车)、于阗(和田)和疏勒(喀什噶尔)大概不是可汗给的。"[1] 因为贞观初年于阗国很可能已在唐朝管辖之下。例如:玄奘西行求法归国,贞观十八年抵达于阗。他一边上书太宗,一边在于阗讲经,"时间经七八月,使还,蒙恩敕降使迎劳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法师奉敕已,即进发,于阗王资饯甚丰"。[2] 这件事说明唐朝设毗沙州以前已在于阗设有行政管理机构。这个机构不仅帮助玄奘遣使上书太宗,而且奉太宗之令护送玄奘回长安。于阗将军叶和墓表再次证明,贞观十年唐朝已在于阗设置行政机构,名曰"毗沙郡"。这个机构绝非虚设,而是唐朝经营于阗的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

三、大唐于阗将军叶和之谜

大唐于阗将军叶和究竟是何许人?薛宗正就此问题作过深入讨论。他说:"叶和非人名而是爵号,叶和即叶护,乃古突厥语

---

〔1〕崔瑞德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223页。

〔2〕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年,124页。

yabγu 的译音……于阗归唐前本西突厥蕃属，故其王族要员授予西突厥爵号。"我们的意见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汉语"叶"字有两个读音，古音或读"涉"。叶公好龙之"叶"即读此音，河南叶县之"叶"也保存了这个古音。我们怀疑"叶和"其名译自于阗语 ṣṣau（于阗王公爵号）。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印欧语官号。据英国语言学家贝利考证，这个官号相当于古代伊朗语 šāha-（统治者或郡守），犍陀罗语的 cojhbo（州长），贵霜碑铭的 yava-（翕侯）、大夏语碑铭的 šao（国王）。[1]讲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匈奴和突厥人也有这个官号，汉代文献译作"翕侯"（《后汉书·西域传》），唐代文献译作"酒"（《旧唐书·罽宾传》）。匈奴官号"翕侯"后来被突厥人继承，也即薛先生说的 yabγu（叶护）。这个突厥语官号似从中亚塞人所操东伊朗语借人，因为塞人有时将/sa/或/za/读作/ya/，如中亚塞王 Azes（阿泽斯）在贵霜碑铭中写作 Ayasa（阿耶斯）。由此可见，于阗官号 ṣṣau 或"叶和"由来已久，未必是西突厥所封。

关于贞观初年的于阗史，《旧唐书·于阗传》记载：

> 于阗国……先臣于西突厥。其王姓尉迟氏，名屈密。贞观六年，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

同书《西突厥传》又载：

>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乌孙之

[1] H.W.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412～413.

地，又移庭于石国之千泉。其西域诸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

所谓"颉利发"译自突厥语 Eltäbär，或作"希利发"。[1]吐鲁番文书和碑铭所见高昌王麴宝茂和麴乾固的一连串封号中就有"希利发"。正如马雍先生指出的，高昌王的这个封号应是突厥可汗授予之官称。[2]贞观初年于阗在西突厥统叶护可汗(619—628年)统治下，如果西突厥授予于阗王封号，那么这个称号当为"颉利发"而非"叶护"。薛先生以"叶和"为于阗王族爵号是正确的，只是该词既非突厥语词，亦非西突厥所封。

东汉末年，贵霜帝国一度控制塔里木盆地。于阗王公称"叶护"或 ṣṣau 最初可能是贵霜王所封，后来逐渐演变为于阗王族世袭的爵号。唐代文献屡次提到塔里木盆地诸国王子或王兄以"叶护"为号。例如：于阗王伏阇信之子名曰"叶护玷"，于阗王尉迟胜之弟名叫"叶护曜"，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之弟名为"叶护"，焉耆王突骑支之弟名叫"颉鼻叶护"。[3]那么于阗将军叶和有可能是于阗王尉迟屈密之子或兄弟。据于阗语文书记载，于阗王本人也以 ṣṣau(叶护)为号。既然如此，于阗将军叶和的身份当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当朝于阗王之子；其二，当朝于阗王之弟；其三，当朝于阗王本人。

---

〔1〕 A. Bombachi, "On the Ancient Turkic title Eltäbär," *Proceedings of the Ixth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Naples, 1970, pp.1～66.

〔2〕 马雍：《突厥与高昌王朝始建交考》，原载《向达先生纪念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收入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149页。

〔3〕 参见《旧唐书·西域传》诸国本传。

薛先生主张第一种可能性。他认为："贞观十年死葬故里之叶和应即贞观九年入唐为侍子的于阗王尉迟屈密之子，后王尉迟伏阇信之弟。"然而，贞观九年入侍唐廷的于阗质子一直在长安城安居乐业，此人就是《宋高僧传·智严传》提到的智严法师。其文曰：

> 释智严姓尉迟氏，本于阗国质子也，名乐。受性聪利，隶鸿胪寺，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上柱国，封金满郡公……神龙二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为寺……景龙元年十一月五日，孝和帝诞节剃染。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智严传》亦载：智严"自惟生居异域，长自中华，幸得侍奉四朝，班荣宠极"。可知智严法师本为于阗国质子，生于西域，长于长安，历经唐初四朝。唐中宗景龙年间智严尚在世。上溯四朝，适为中宗、武则天、高宗和太宗四朝。[1] 从时间推算，智严法师尉迟乐似即贞观九年入朝的于阗国质子。既然毗沙郡公许给了贞观六年"以丹青奇妙"入侍长安的尉迟乙僧，那么贞观九年入朝为质的尉迟乐只能许以他地。尉迟乐受封的"金满郡"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 20 公里的护堡子古城，当时尚在麴氏高昌王朝统治下。贞观十四年太宗平高昌，始于高昌国北设庭州，下设金满诸县。[2] 因此，尉迟乐的"金满郡公"和尉迟乙僧的"(毗沙)郡公"一样，不过是个虚衔。于阗将军叶和于贞观十年身亡，自然不是景龙年间仍在世的尉迟乐。所

---

〔1〕 关于智严法师的考证，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8～9 页。

〔2〕 参见《旧唐书·地理志》。

以，第一种可能性似应排除。

我们再看第二种可能性，于阗将军叶和是否为当朝于阗王之弟。据《新唐书·于阗传》，贞观六至九年尉迟屈密执掌于阗大权，《旧唐书·于阗传》称之为“尉迟屈密”。两名之中似以《旧唐书》所记为是。汉语“密”字是个以/t/收尾的入声字。故疑“屈密”译自于阗语 viśa gūmatīrrä，相当于梵语 gomatī（多牛的），或译“瞿摩帝”。于阗名刹瞿摩帝寺就以此为名。[1] 敦煌写本 Ch00296 和 P.2958 两份于阗语使臣报告分别提到了于阗王瞿摩帝太子和太师。[2] 从时间看，尉迟跋质那似为于阗王尉迟屈密之弟，兄弟二人皆为隋代于阗王卑示闭练之子。《名画记》卷八云：洛阳毓材坊“大云寺东门两壁《鬼神》、佛殿上《菩萨》六躯、《净土经变》、阁上《婆叟仙》并尉迟画，《黄犬》及《鹰》最妙。”有学者认为，这几幅尉迟画出自尉迟跋质那的手笔。[3] 然而，大云寺乃武周天授元年所置，至开元二十六年易名开元寺，大云寺的尉迟画只能作于 690—738 年间。这时尉迟跋质那恐怕早已不食人间烟火。跋质那的艺海生涯主要在隋代，所以《名画记》卷二说“尉迟跋质那在隋朝”。同书卷八跋质那本传又云：“尉迟跋质那，西国人。善画外国及佛像，当时擅名，今谓之大尉迟（其《六番图》、《外国宝树

〔1〕 H. W.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ese Sa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86；荻原云来等：《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年，438 页；段晴、王炳华：《新疆新出土于阗文木牍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1996 年，1～12 页。

〔2〕 H.W. Bailey, "The Seven Princes," *BSOAS*, VII. 3—4, 1948, p. 621; H. W. Bailey,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London, 1968, pp. 110～111；张广达和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 年，284 页。

〔3〕 李吟屏：《佛国于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年，116 页。

图》，又有《婆罗门图》，传于代）。”这几幅画才是跋质那的作品。《名画记》卷八尉迟乙僧本传说“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1] 既然唐初跋质那仍有画作问世，人们不禁要问，贞观十年身亡的于阗将军叶和是否为这位于阗画师。我们以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大唐毗沙郡将军一职是个实衔，和尉迟乙僧及智严法师所封“（毗沙）郡公”或“金满郡公”等虚衔不同。尉迟跋质那不爱江山好丹青，因而登上隋唐绘画艺术巅峰。他未必愿意担任一种具体职务而把人生消磨在官场上。所以，第二种可能性似乎也要排除。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第三种可能性。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即当朝于阗王。据《新唐书·于阗传》，贞观六至九年于阗王尉迟屈密当朝，贞观九年遣子入侍。如果说贞观六年尉迟屈密被授予毗沙郡将军仅是名义上归顺唐朝，那么贞观九年尉迟屈密遣子入侍无疑标志着唐朝与于阗正式确立了君臣关系。毗沙郡将军是唐朝专为外族首领设置的职官，可能相当于后来所谓“归化将军”。唐显庆三年，高宗“置怀化大将军，正三品；归化将军，从三品；以授初附首领，仍分隶诸卫”。[2] 究其渊源，这个制度始于贞观初太宗向外族首领授毗沙将军之类的衔位。唐朝归化制度正式建立后，使归化将军地位降低。在此之前，归化将军必为高官，很可能专门授予外族首领。我们甚至怀疑，大唐毗沙郡将军相当于后来毗沙都督府最高行政长官——都督，当由于阗王本人亲自出任。

于阗王首次遣子入侍唐廷事出有因，似与唐太宗平定吐谷浑有一定关系。贞观九年，太宗命李靖和侯君集兴兵讨伐吐谷浑。

---

〔1〕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大尉迟本注。

〔2〕《旧唐书·高宗纪》。

吐谷浑可汗伏允亡走西域。唐军追击伏允"至沮沫西境。或传伏允西走,渡图伦碛,欲入于阗。将军薛万钧率轻锐追奔,入碛数百里,及其余党,破之。碛中乏水,将士皆刺马血而饮之……伏允大惧,与千余骑遁于碛中,众稍亡散,能属之者才百余骑,乃自缢而死。"[1]《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将此事系于贞观九年五月。沮沫在今新疆且末县,其西"数百里"显然已进入于阗境域。对于唐军追击吐谷浑可汗是否远及于阗,《通鉴》注家胡三省表示怀疑。不过有迹象表明,薛万钧追击吐谷浑可汗确实远及于阗,并极大地震慑了塔里木盆地诸国。正因为如此,西域诸国纷纷于贞观九年来朝。疏勒国遣子入侍,西突厥两次遣使来朝;大秦景教僧阿罗本来长安均在是年。[2]于阗王选择这年遣子入侍想必与唐太宗平定吐谷浑,西域门户进一步开放有一定联系。

《旧唐书·于阗传》记贞观十三年,于阗王"又遣子入侍。及阿史那社尔伐龟兹,其王伏阇信大惧……伏阇信于是随万备来朝。高宗嗣位,拜右骁骑大将军,又授其子叶护玷为右骁卫将军"。以前读唐史一直不明贞观十三年遣子入侍的究竟是哪一位于阗王?如果是尉迟屈密,他为什么时隔四年再次遣子入侍。如今见到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墓表,恍然醒悟,于阗国再次遣子入侍可能意味着于阗国的改朝换代。这次遣子入侍的于阗王大概不再是老王尉迟屈密,而是新王伏阇信。那么贞观十三年入朝的于阗质子应是新王伏阇信之子叶护玷。[3]"玷"字中古音读作 tiəm。[4]这位于阗王子的名讳疑为于阗语 tuṃna(强大

---

〔1〕《旧唐书·吐谷浑传》。

〔2〕《新唐书·西域传》和《册府元龟·外臣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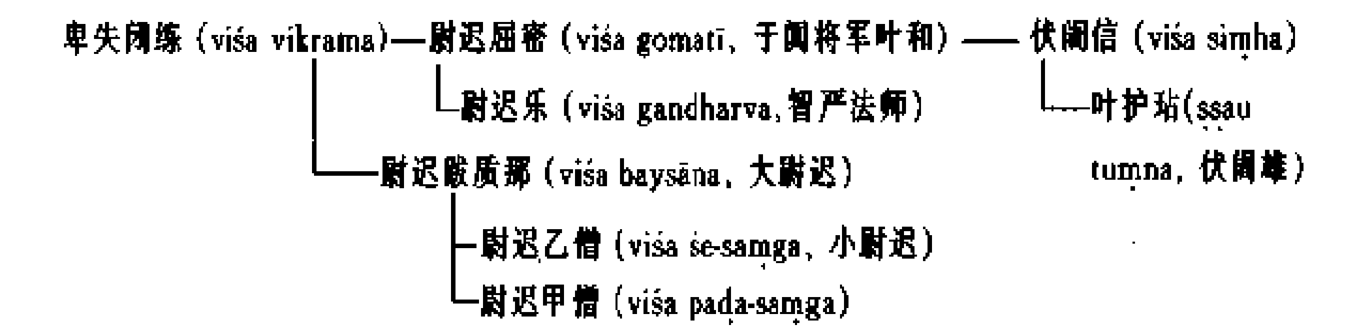
〔3〕《旧唐书·于阗传》。

〔4〕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209页。

的)的音译。叶护玷就是后来继承伏阇信王位的伏阇雄。伏阇雄之“雄”似为前引于阗语词的意译。

关于唐代于阗王的各种称号,于阗语文献有所记述。于阗文献(V.2.6392.2.1)记有“于阗王、尉迟曜(väśa vāhaṃ)、沙尼罗叶护(ṣṣau ṣanīrä)在位第……年”;于阗文献(II.7.8.1-2)还提到“于阗王、尉迟说(viśa kīrtti)、刺史、阿摩支、尉迟罗叶护(ṣṣau viśaraka)在位第17年”。[1]由此推测,于阗将军叶护墓表残缺部分大概是“于阗王、尉迟屈密、阿摩支”之类的称号。为便于今后的研究,我们将隋末唐初于阗王世系列表于下(参见表一),并提出胡语名称复原方案,供研究者参考。[2]

表一　隋末唐初于阗王尉迟氏族系表



四、大唐于阗将军叶和墓表与于阗王陵

如果大唐于阗将军叶和墓表的主人真是于阗王尉迟屈密,

---

〔1〕 H.W.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413.

〔2〕 “——”表示王位继承关系;“└”表示父子关系。

这个墓表原来应在于阗王陵园。这个墓表究竟如何发现,值得深究。

侯立中藏拓写有题跋,对墓表来龙去脉作了简述。文中说:

> 余友马君于民国二十二年随欧人赴西北考查生物,在新疆天山南路葱岭迤东,与土耳其交界阿克苏河下游发现二倒唐代墓碑,丰草蓊翳,坟迹湮没无存。马君素嗜碑帖,当自手拓得十数份。又二年,马君返平,赠余二份,虽非珍品,殊堪欣慰,远在数千里外,人迹罕到之处确系难碑拓。按唐代征服和阗后改称毗沙君,置督府镇守,惟唐史无叶和之名,想系时一裨将耳。乙亥仲夏野凫谨识□(阴刻朱印)。

侯立中还介绍说:野凫原名王瀛,清光绪年间翰林王景禧(?—1922年)的次子。山东费县人。当年住在北京,60年代末去世。[1] 据此,马君于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随某个欧洲西北考察团从北京到新疆考察生物,在阿克苏河下游发现这个墓表。1935年马君返京,将拓片分赠友人。同年(即乙亥年),马君友人野凫为这个墓表作跋。

据我们调查,1933至1935年在新疆进行科学考察的西方学者只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A. Hedin)。他被南京政府聘为铁道部顾问,乘汽车到新疆勘察道路交通。可是斯文赫定此行向西最远到焉耆和库尔勒一线,没有去阿克苏。随同斯文赫定考察的中国学者有尤寅照、陈宗器、杨钟健、龚继成、黄文弼和

---

〔1〕 薛宗正,前揭文,1~2页。

两名蒙古族司机，并无马君其人。[1]

这个时期的中亚探险史还发生过一件事，似与马君西行有关。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天文学家安博特(N. Ambolt)本来定于1932年末返回北京，但他却长达8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为此，斯文赫定派瑞典地质学家那林(E. Norin)等人到新疆寻找安博特。不久斯文赫定接到安博特从和田打来的电报，说他正准备取道印度返回北京。赫定电令寻找安博特的人员立即返京。这时那林已从北京乘飞机到肃州，然后西行新疆寻找安博特。[2]马君也许是1933年5至10月随那林到新疆寻找安博特的中国随员。那么马君的新疆之行应遵循安博特考察路线，也即阿克苏——和田——昆仑山一线。这将有助于解释马君为什么在阿克苏河下游发现了这个墓表。令人不解的是，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下半年，马君为什么拖延到1935年才从新疆返京？切望知情者能向学界释疑。

这个墓表的发现地点也令人扑朔迷离。阿克苏河发源于西部天山，今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交界处。这条河的上游称“托什干河”，下游称“阿克苏河”，最后与西来的叶尔羌河，南来的和田河，共同汇入塔里木河。阿克苏于唐代属龟兹国领地，时称“拔换”。我们很难想象于阗王会把自己的陵园建在邻国龟

[1] 关于斯文赫定的最后一次新疆考察，参见 Jack A. Dabbs,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 the Hague, 1963；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429～430页。

[2] 王忱：《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大事记》，中国地质学会编：《开创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102～103页；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426页。

兹境内，马君之说颇有疑问。所以，这个于阗王室的墓表未必是在阿克苏河下游发现的。即便真在这里发现，也是后人从于阗王陵园盗运此地。无论如何，于阗将军叶和墓表原来不会在阿克苏河下游。

关于于阗王陵，60年代以来不断发现重要线索。和田有个叫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的地方，位于和田市附近约特干遗址东南的阿拉勒巴格以南15里处，今属和田县布扎克乡阿孜那巴扎尔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镰调查，60年代末有人在此地挖出一具古尸，身裹绫罗绸缎，是个10岁左右的女童。[1] 据考古发现，于阗人本来实行土葬，和田洛普县山普拉发现的先秦两汉于阗人墓地即为土葬墓。佛教传入于阗之后，于阗人开始实行火葬。3世纪中叶，中原高僧朱士行在于阗去世，“依西方法阇维之，薪尽火灭，尸犹能全……因敛骨起塔焉”。[2] 北魏高僧宋云西行求法途中曾访问于阗。他在游记中说：于阗人“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3] 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附近发现的于阗女童死后未焚，若按于阗葬俗，或为于阗公主。1984年，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附近相继出土三具大型彩棺灵柩。一具绘有精美的菱格纹图案；另外两具用赭色和黑色线条在彩棺四面绘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灵和对鸭图案。其中一位墓主人头裹白绫，墨书“夫人信附宰相李枉儿”。于阗王本姓尉迟氏，后

〔1〕这具古尸原在于阗地区群众艺术馆库房内，今已下落不明。参见杨镰：《荒漠独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264页。

〔2〕梁慧皎：《高僧传·朱士行传》。

〔3〕《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行记》。

得李唐王朝颁赐，改姓李氏。和田博物馆的李吟屏先生据此提出，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一带应是于阗王陵园所在地。[1]其说颇有见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新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96年5—6月间，新疆文物考古所考古队发掘了这个墓地中的12座墓，据说"均为竖穴墓，出土箱式木棺和木槽棺，部分绘有精美的纹饰。单人葬，尸体、服饰保存较好，随葬唐代钱币、木器等。其时代约在唐代"。[2]考虑到唐以后于阗王室仍袭用李唐姓氏，这座于阗王陵园或许要沿用到五代时期。于阗将军叶和墓表本该在于阗王陵园内，不知何时被人盗运到阿克苏河下游。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 Stein)多次到于阗考察。据他调查，于阗故都在今和田市西南约特干古城。该城东南13英里(约41华里)有座佛教塔庙遗址，当地人俗称chalma-kazan。研究者注意到，其名当即于阗语tcarma之音译，也即于阗名刹——赞摩寺。[3]《魏书·西域传》说于阗"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当为信史。在斯坦因的考古报告中，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被称作Imam Musa Kasim圣地，约在约特干古城与赞摩寺遗址之间。[4]斯坦因据《大唐西域记》卷一二有关记载，认为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札就是于阗都城南十余里大伽蓝所在地。《水

---

[1] 李吟屏：《古代于阗国都再研究》，《西北史地》1990年第3期第23～36页；《佛国于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129～130页及图版10。

[2] 王炳华和杜根成主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753页。

[3] G. Gropp,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sesich-Ostturkestan*, *Die Trinkler-Sammlung im Übersee-Museum*, Bremen: Verlag Friedrich Röver, 1974, pp.28,32 und 36；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281～283页。

[4] M.A. Stein, *Serindia*, vol.1, Oxford, 1921, p.94.

经·河水注》记于阗国"城南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靴,石上有足迹,彼俗云是辟支佛迹"。据此,唐代于阗都城南十余里的大伽蓝疑为北魏时期于阗国的利刹寺。据北魏高僧宋云介绍,于阗王自有一套陵寝制度。国王安葬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1] 受印度和中亚佛教建筑艺术影响,于阗王祖庙完全可能采用塔庙形式,而辟支佛寺即为塔庙形式。[2]那么北魏于阗国利刹寺和玄奘所见大伽蓝完全可能是于阗国太庙所在地,我们应立即采取保护措施。

综上所述,单凭现有资料尚难以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得出确切结论,但是本文的讨论似可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其一,30年代在新疆发现的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墓表相当重要,似为唐初于阗王尉迟屈密陵墓前标记物。发现地点阿克苏下游不是这个墓表的原址,它原来应在于阗王祖庙或陵园,很可能在新疆和田县布扎克乡阿孜那巴扎尔村的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一带。其二,从时间看,墓主人大概是唐初于阗质子尉迟乐之父王以及于阗大画师尉迟跋质那之王兄,他和跋质那兄弟二人皆为隋代于阗王卑失闭练之子。其三,墓表首次揭示唐朝设毗沙州之前唐太宗曾在于阗设置过毗沙郡。其四,墓表有助于说明于阗王伏阇信继前王之位或在贞观十年。

1999年1月7日

---

〔1〕《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行记》。

〔2〕李崇峰:《塔与支提窟》,《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697~698页。

6

西域地理札记

昔日读史常遇陌生地名，即便是较为熟悉的地名，有些也茫然不知所在，于是引起特别注意，一旦有解，便做札记，日积月累，竟得十余地。计有敕勒川、特罗斯山、狐媚碛、谋落、大漠等，皆在西域。今草成《西域地理札记》一文，讨论其中五地，求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敕勒川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北齐斛律金《敕勒歌》

这首脍炙人口的北方草原牧歌使作者斛律金故乡的敕勒川闻名天下，然而敕勒川于今何地却一直是个历史疑案。《敕勒歌》最初被宋人郭茂倩编入《乐府诗集》卷八六。该书援引《乐府

广题》说：此歌乃北齐敕勒人斛律金奉高欢之命演唱，高欢本人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长短不齐"。《北齐书·斛律金传》却说斛律金原为敕勒族斛律部人。[1] 西北大学周伟洲教授就此分析，既然斛律金是敕勒人，"故此歌最早应为敕勒语，即为突厥语，于属蒙古语族之鲜卑语不同。从当时北齐流行鲜卑语的情况看，或此歌早有鲜卑语译文。斛律金、高欢唱和之敕勒歌，可能是鲜卑语。后又译作齐言，也即汉语。"[2] 这个分析无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要从敕勒族斛律部的原始故乡来追寻敕勒川之所在。

敕勒始见于《晋书》。该书《北狄传》记太康年间（280—289年），漠北十九种部落迁入塞内定居，其中有"赤勒种"。一般认为，赤勒就是敕勒，是北方讲突厥语的游牧人对这个部族的称谓，亦称"特勒"或"铁勒"，中原人士则谓之"高车"。《魏书·高车传》记载：

>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氏……后徙于鹿浑海西北百余里，部落强大，常与蠕蠕为敌，亦每侵盗于国家。

《隋书·铁勒传》又载：

>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

[1] 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辅仁学志》第11—12期连载，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37页。

[2]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43页。

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跋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即斛律）等诸姓，胜兵可二万。

文中提到的“西海”和“独洛河”两个地名相当关键。

其一，西海：并非某些学者建议的俄罗斯的里海，而指今内蒙古西部居延海。其二，独洛河：即今蒙古中部土拉（Tula）河。[1]《魏书·袁翻传》的一条记载值得注意。文中说：“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车（即铁勒）所住金山一千余里。”《隋书·西域传》又载：“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者……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贪汗山，夏有积雪。此山之北，铁勒界也。”凡此表明，铁勒诸部居地独洛河、西海、金山之阳（南），在今天蒙古国土拉河、甘肃居延和新疆准噶尔盆地。此外，文献还提到铁勒主要居地为多罗斯川。

关于多罗斯川，《旧唐书·回纥传》曰：“贞观二十二年……诏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统五啜、五俟斤二十余部，居于多罗斯水南，去西州马行十五日程。”《旧唐书·突厥传下》亦曰：“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统处密、处月、姑苏、歌罗禄、弩失毕五姓之众。”[2]法国汉学家沙畹（Ed. Chavannes）详考其地说：“此多罗斯川初视之似即怛罗斯（Talas），其实非然。盖 Talas 习用译写之字作‘怛’，而不作‘多’。怛罗斯川与城在西州（吐鲁番）之西，而不在其北。复次，处月、处密、歌逻禄等部在吐鲁番之北，

〔1〕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9 年，80 页。

〔2〕《旧唐书·突厥传下》所述相同。

则应在吐鲁番之北寻求之多逻斯川。所以《西域图志》卷三地图即考订其为喀喇额尔齐斯（Kara Irtych）。此种考订颇有理由，可以《新唐书》卷一三〇《王忠嗣传》证之。忠嗣于744年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攻多罗斯城，涉昆水，斩米施可汗。若以多逻斯位置于哈喇额尔齐斯，此役始完全可解。"[1]其说有两误。

其一，多罗斯城不在多罗斯川。天宝年间，王嗣忠"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攻多罗斯城，涉昆水，斩米施可汗"。[2]昆水，贾耽《皇华四达记》称"嗢昆水"，《汉书·匈奴传》作"安侯水"，今蒙古中部鄂尔浑河。因此，多罗斯城距鄂尔浑河不会太远。贾耽《皇华四达记》记回鹘道说："又别道自鸊鹈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怛罗斯山、赤崖、盐泊、浑义河、炉门山、木烛岭，千五百里亦至回鹘衙帐。东有平野，西据乌德犍山，南依嗢昆水"云云。[3]《王忠嗣碑》则曰：王忠嗣"引军度碛，定计乘虚至多罗斯，壞巢焚聚，涉汨昆水……斩白眉可汗之首，传置藁街"。[4]贾耽的"嗢昆水"即碑文的"汨昆水"，贾耽的"怛罗斯山"则为碑文的"多罗斯"及《王忠嗣传》的"多罗斯城"。后者因怛罗斯山而得名，必在此山附近。据严耕望考证，此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赛尔乌苏(E107°,N44°35')一带。"[5]显然，多罗斯城在今蒙古赛尔乌苏附近，不在阿尔泰山南麓的多罗斯河畔。

---

〔1〕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年，30页。
〔2〕《新唐书·王嗣忠传》。
〔3〕《新唐书·地理志》引。
〔4〕王昶：《金石萃编》卷一〇〇，嘉庆十年(1805年)。
〔5〕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台北，1985年，616～617页。

其二,多罗斯川不是额尔齐斯河。《旧唐书·突厥传》下文和《新唐书·苏定方传》都提到额尔齐斯河,时称"曳咥河"。那么多罗斯川想必不是额尔齐斯河。我们认为,多罗斯川实指额尔齐斯河南面的乌伦古河。这条河位于西州治所(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古城)以北约1500华里处,正与《旧唐书·突厥传下》所说"多罗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相合。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多罗斯、敕勒、铁勒实乃一音之转,皆本自铁勒人所操突厥语。但是研究者对该词究竟源于哪个突厥语词意见不一。日本东方学家白鸟库吉建议:"丁灵、丁零与狄历、敕勒、铁勒为同名异译,皆系蒙古语 tegre、terege、turuga 之音译,译义曰车。魏人称此民族为高车部,不过将胡语之丁令、敕勒译成汉语耳。"[1]《晋书·慕容儁载记》记前燕光寿元年(357年)慕容儁等兴兵北"讨丁零、敕勒于塞北"。这里将丁零和敕勒相提并论,可见两者绝非一族。[2] 这位日本学者找出的蒙古语词或许能解释丁零的词源,但是它们绝非敕勒或铁勒的词源,因为后者或称"多罗斯"。台湾学者刘义棠认为:"丁零一称,与敕勒、勑勒、狄历、特勒、铁勒等名,似皆同出一语原,为 Til 之音传,Til 之义为河。"[3] 可是突厥语中并无 Til 一词,突厥人或谓伏尔加河为 ätil/ itil,《隋书·铁勒传》译作"疑得水"。故刘说亦不能成立。

我们倾向于支持沙畹早年的一个建议,"铁勒"一词来自突

〔1〕 白鸟库吉:《蒙古民族起源考》,《史学杂志》1923年第18编2—5号。何健民译文作《匈奴民族考》,收入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84～216页。本文所引见214页。

〔2〕 周连宽:《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55页。

〔3〕 刘义棠,前揭书,87页。

厥鲁尼文的 tölis。[1] 阙特勤碑东面第 13 行(KT.E13)说:"他(指突厥可汗)还将那里的铁勒(tölis)人和延陀(tarduš)人组织起来,授予他们官位——叶护和设。"毗伽可汗碑南面第 13 行(BK.S13)说:"我的父亲,突厥毗伽可汗继承了汗位。表示效忠的突厥贵族,向西以延陀贵族和众阙啜为首,还有诸设;向东则为铁勒贵族(tölis bäglär)和阿波达官。"[2]德国东方学家夏德(F. Hirth)认为,延陀当指阿尔泰山南麓的薛延陀,其名来自突厥语 sir-tarduš。[3]《隋书·铁勒传》记薛延陀在"金山(阿尔泰山)西南",即今阿尔泰山南麓的额尔齐斯河流域,东与多罗斯川沿岸的铁勒诸部落为邻。那么毗伽可汗碑说(薛)延陀在西,铁勒在东,是指这两个北方民族在金山之阳的分布情况。钢和泰藏卷第 28 行也提到铁勒,谓之 ttūlīsä,其他于阗塞语文献或作 ttūdiś。据剑桥大学贝利(H.W. Bailey)教授考证,其名当来自突厥鲁尼文的 tölis。所以,多罗斯川当即敕勒川,也就是今天阿尔泰山南麓的乌伦古河。乌伦古湖,汉代称作"秦海";乌伦古

[1] H.W. Bailey, "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 *AM*, II-1, 1951, p.19; 沙畹,前揭书,71 页。近年法国突厥学家哈密顿对此提出质疑(哈密顿著、耿昇译:《五代回鹘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218 页的译后附记)。我们尚未检索到他立论的根据。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早年认为,突厥"有两设(shad),一居帝国东部,曰 Töliš;一居帝国西部,曰达头(Tardus)",说见 V. Thomsen, "Inscription de l'Orkhon, Déchiffrées", *MSFOu*. V, Helsingfors, 1896。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岑仲勉和耿世民都将该词译作"突利失"(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译文》,收入林幹《突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我们对其说深表怀疑。

[2] 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3] F. Hirth,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ujukuk,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 im 7. und 8. Jahrhundert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 *ATIM*, 2, 1899, p. 168; 沙畹,前揭书,76 页。

河，汉代称“枯梧河”。这个地区本为匈奴呼衍王牧地。[1] 由于铁勒后来在此兴起，故易名“多罗斯川”，又名“敕勒川”。

二、特罗斯山

史载多罗斯川东南有一山，名曰“多怛岭”，亦称“特罗斯山”。《新唐书·回鹘传下》说：“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沙畹认为，仆固振水的位置只能在今新疆阿尔泰山南麓的乌伦古河追寻。[2] 其说甚是。仆固振水之“仆固”当指游牧于独洛河北岸的仆骨。[3] 那么仆固振水可能得名于仆骨，实乃多罗斯川之别称。沙畹和岑仲勉早年建议多怛岭指新疆塔城（塔尔巴哈台）某山，疑不确。[4] 多怛、铁勒实乃一音之转，那么多怛岭意为“铁勒山”。此山地近铁勒诸部发祥地多罗斯川，故名铁勒山。这个问题我们从下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旧唐书·浑瑊传》再次提到多怛岭，只是写作“特罗斯山”。传文记朔方节度副使李献忠（原属突厥阿布思部）叛唐，亡命西域。“后，节度使安思顺遣（浑）瑊提偏师深入葛禄部，经狐媚碛，略特罗斯山，大破阿布思部”。《旧唐书·程千里传》将此事系于

---

〔1〕参见《后汉书·西域传》。关于汉代秦海和枯梧河的讨论，参见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74～75 页。

〔2〕沙畹，前揭书，30 页注 44。

〔3〕《隋书·铁勒传》。

〔4〕Ed.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ourg, 1903, 33, n. 4；岑仲勉：《突厥集史》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758～759 页。

天宝十三载十二月，并说："献忠素与(安)禄山有隙，惧不奉诏，乃叛归碛北。"故知狐媚碛在碛北，也即天山以北某沙漠。

严耕望先生也注意到特罗斯山。他在《唐代交通图考》中写道："东道所经之但罗斯山，殆即《浑瑊传》之特罗斯山、《王忠嗣传》之多罗斯城处，其路线殆经今赛尔乌苏(Sair Usu，E107°；N44°35')地区。"又说：

> 按此山当即《贾记》之怛罗斯山。据《旧传》，狐媚碛去唐界可能较此山去唐界近。颇疑即《贾记》之眉间城处。又《王忠嗣碑》(《金石萃编》卷一〇〇)，"引军度碛，定计乘虚至多罗斯，壕巢焚聚，涉汨昆水……斩白眉可汗之首，传置藁街"。此多罗斯城亦疑即在特罗斯山处，非《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传》"居于多罗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者。然则所谓"度碛"者即狐媚碛也。至于汨昆水，即嗢昆河，今鄂尔浑河。[1]

其说不尽然。《浑瑊传》明载特罗斯山地近葛逻禄，而葛逻禄本"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游牧。"后稍南徙，自号'三姓叶护'，兵强，甘于斗，廷(庭)州以西诸突厥皆畏之"。天宝年间，葛逻禄先与回鹘和拔悉密共灭突厥，后助回鹘灭拔悉密。"于是葛逻禄之处乌德鞬山者臣回鹘，在金山、北庭者自立叶护，岁来朝。久之，叶护顿毗伽缚突厥叛酋阿布思，进封金山郡王"。[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天宝十一载"李献忠叛"。又记天宝十二载(753)：

---

〔1〕严耕望，前揭书，616～617页。

〔2〕《新唐书·回鹘传下》。

> 九月……北庭都护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碛西，以书谕葛逻禄，使相应。阿布思穷迫，归葛逻禄，葛逻禄叶护执之，并其妻子、麾下数千人送之。甲寅，加葛逻禄叶护顿毗伽开府仪同三司，赐爵金山王。

由此可见，阿布思所入葛逻禄是指游牧于北庭附近的葛逻禄部。

据《元和郡县志》卷四〇北庭大都护府条，蒲类县东北四十里有郝遮镇；东北二百里有盐泉镇。盐泉镇东北又有"特罗堡子，在蒲类县东北二百余里。四面有碛，置堡子处周回约二十里，有好水草，即往回鹘之东路"。[1]《新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亦曰："后庭，下，本蒲类，隶西州，后来属。宝应元年更名。有蒲类、郝遮、咸泉三镇、特罗堡。"特罗堡子显然因特罗斯山得名，所以狐媚碛当指特罗堡子附近的沙碛。据 80 年代末考古调查资料，唐代蒲类县城在今新疆东部奇台县北门外，今称"唐朝墩古城"。郝遮镇在奇台县城东北约 20 公里处，今称"北道桥古城"。[2] 从现代地图看，奇台县东北 200 余华里是中蒙边境中国一侧的北塔山，今属奇台县。

北塔山呈西北—东南走向，海拔在 1200—3287.2 米左右，位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乌伦古河(唐代多罗斯川)东南，今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牧场。北塔山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自古以来就是蒙古草原自杭爱山通往准噶尔盆地的必经之路，同时

---

[1] 此条亦见《太平寰宇记》一五六卷。

[2] 薛宗正：《新疆奇台境内的汉唐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210～214 页。

也是阿尔泰山南下天山东部奇台绿洲和巴里坤草原的重要通道。1988年北塔山发现了大批古代岩画群,岩画上刻有藏文和回鹘文题记。[1]《元和郡县志》卷四〇记北庭有路通北方坚昆(或称"黠戛斯"),"北至坚昆衙帐约四千里"。《新疆图志·道路志一》奇台条详述此路曰:"城北十里头屯,十里二屯,二十里北道桥,一百二十里黄草湖,八十里将军戈壁,折东北八十里苏吉,八十里元湖驿皆科布多南境台路。"凡此表明,这个地方不仅是古代游牧人的重要牧场,还是东西与南北交通交汇点。

据以上讨论,多怛岭就是特罗斯山,今中蒙边境的北塔山。此山座落于铁勒诸部发祥地多罗斯川东南,名称又与多罗斯川的读音如此相近,不能不使人怀疑其名亦来自铁勒的胡语名称Töliš,意为"铁勒山"。

三、狐媚碛

前文的讨论中已涉及到狐媚碛。除《旧唐书·浑瑊传》外,蒙古鄂尔浑河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三语碑铭也提到"狐媚碛"。汉碑第XV行云:"……(上残)[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天可汗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土黎庶,含气之类。纯善者抚育,悖戾者屏除。遂□□□[狐]媚碛。凡诸行人及于畜乘(下残)……"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古德(G. Schlegel)早年将狐媚碛

---

〔1〕 苏北海:《新疆岩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234~245页;薛宗正:《奇台县北塔山岩画踏勘记》,《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95~98页及封底照片。这两个题记均未解读。单从文字看,所谓回鹘文题记也可能是粟特文。

复原作“姺媚碛”。[1]王延德《使高昌记》曰：“次历伊州……次历益都，次历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纳职城在今新疆哈密市西南四堡(旧称“拉布楚喀”)。王国维援引这条文献推测“姺媚碛”就是纳职城以西的“大患鬼魅碛”。[2]

近年南京大学的华涛和陈得芝先生对王国维之说提出质疑。他们认为：

> 据《旧唐书·浑瑊传》记，阿布思反叛后，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天宝十一载由河西迁朔方)派浑瑊“提偏师深入葛逻禄部，经狐媚碛，略特罗斯山，大破阿布思部”。“狐媚”应为突厥语 Qum(沙)的音译。九姓回鹘可汗碑第十五行(49—51字)的“□媚碛”应即狐媚碛。它应指天山东端的沙碛。特罗斯山应与唐代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的多罗斯川有关。《世界境域志》中有一山名：Tulas。米诺尔斯基根据《胜利之书》(Zafar-nama)中 Tulas 山在额尔齐斯河以东的记载，确定此山即金山(阿尔泰山)。[3]

南大两学者将“□媚碛”复原作“狐媚碛”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以为其名来自突厥语 Qum，并与《浑瑊传》的“狐媚碛”相联系，则颇有疑问。

---

〔1〕 G. Schlegel, "*Die Chinesische Inschrift auf den Uigurischen Denkmal in Kara Balgasun*," *MSFOu*, IX, 1896, pp. 126～135.

〔2〕 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观堂集林》卷二〇；收入《观堂集林附别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1974年重印本)，994～995页。

〔3〕 华涛、陈得芝：《八至十世纪西部天山地区的葛逻禄部》，《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71页。

据前文讨论，浑瑊讨伐阿布思所经狐媚碛在今新疆北塔山南麓。据80年代末考古调查资料，“由奇台县城至北塔山牧场，沿途皆大戈壁，黄云漫漫，渺无际涯，经吉星疙瘩、一棵树、小魔鬼城、金矿、北塔山煤田，车行颠簸，路极难行”。[1] 这片大戈壁当即浑瑊所经狐媚碛。仔细推敲九姓回鹘可汗碑不难发现，碑文所言“□媚碛”不可能在北塔山南麓。因为回鹘可汗进军狐媚碛发生在收复北庭和西州(高昌)诸城以后。尔后，回鹘可汗从狐媚碛救援龟兹，并在龟兹东面于术城大败吐蕃。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狐媚碛显然要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以西追寻。换言之，浑瑊和回鹘可汗所经狐媚碛同名，但是不在一地。就像《浑瑊传》的“特罗斯山”与《王嗣忠传》的“怛罗斯山”同名而非一地一样。

《新唐书·浑瑊传》记载：“浑瑊，皋兰州人也。本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也”。那么“狐媚碛”应来自铁勒人浑瑊所操突厥语。我们认为，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狐媚碛”就是《新唐书·地理志》所谓“银山碛”，突厥语作 kümüš taγ qum(银山沙漠)。既然这座沙漠和浑瑊所经狐媚碛同名，后者亦应来自突厥语 kümüš(银山)，而非南大两学者推测的突厥语 qum(沙漠)。

波斯文地理志《世界境域志》提到过这两个地名。该书(XII.8)介绍说，九姓古斯国(指九姓回鹘)有一城，名曰“kum. s (kumis ?)，是个村庄，位于一个山上。其居民是猎户”。王治来注曰：“此地方位不详。伽尔迪兹曾提到过在从九姓古斯到黠戛斯的途中，有一 k. miz-art 在塔城之南的某个地方，而喀什噶里提到在伊犁河上游和额尔齐斯河上游之间，回纥的边界上有一

[1] 薛宗正：《奇台县北塔山岩画踏勘记》，《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95页。

kumi-talas。"[1] 突厥大学者喀什噶里的 kumi-talas 殆为突厥语 kümüš- tölis 之讹。其中 kumis(即突厥语 kümüš"银")当即狐媚碛之"狐媚",而 tölis 殆指特罗斯山。据考古调查,唐代郝遮镇遗址北道桥古城"北临沙漠,逾沙漠可通蒙古人民共和国"。[2] 如前所述,这片沙漠当即浑瑊所谓"狐媚碛"。贞元年间,塔里木盆地陷蕃后,西方商旅和僧人皆从这条路经鄂尔浑河的回鹘首都,然后南下长安或洛阳,史称"回鹘道"。

关于唐代银山碛。《新唐书·地理志》载:"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唐代诗人岑参有诗曰:

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
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并入面。
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岑参《银山碛西馆》[3]

玄奘从高昌西行焉耆途经此地,谓之"银山"。《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曰:"从此西行至阿耆尼(即焉耆)国阿父师泉……法师与众宿于泉侧。明发,又经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大唐西域记》没有提到银山或银山碛,而把相当于银山碛

[1] 米诺尔斯基英译、王治来汉译:《世界境域志》,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3年,85页注99。

[2] 薛宗正,前揭文,214页。

[3] 收入《全唐诗·岑参集二》;吴蔼宸编:《历代西域诗抄》,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23页。

地方称作"笃进"。正如冯承均先生指出的,笃进是今新疆托克逊县的古称。[1] 那么银山碛约在今托克逊县城之西。据考古调查资料,托克逊县城西约 56 公里处有一唐代烽火台,其内出土过唐代文书。"烽火台所处的地势为由北向南倾斜的山前洪积扇,无植被,只是砂砾状的戈壁"。[2] 唐代礌石馆疑在此地。既然《新唐书·地理志》说银山碛在礌石碛之西约"二百二十里",那么银山碛似在阿拉沟唐代烽火台西南 110 公里处,也即今阿拉沟与焉耆之间的库米什。

晚清学者对银山碛作过详细调查。《西域图志》卷二三曰:

> 库木什阿克玛塔克在苏巴什北谷口南一百四十里。自苏巴什北谷迤逦西南行十里,渐闻水声,遍谷皆浅水,山势渐狭,两崖壁立,人行其间如一线天。又里许即沙滩。又二十里有大石崎岖者二处,车不能行,为古车师西境关隘。又二十里至艾噶尔布拉克(布拉克,泉也)。又五十里出南谷口。山脉自苏巴什塔克分支,西南行至此。按回语,库木什,银也,即《唐书》所谓银山碛也。

据现代地图,库米什约在今新疆托克逊县城西南 96 公里处。[3]

玄奘经银山到焉耆之路,时称"银山道"。《新唐书·西域传上》云:"帝即命(郭)孝恪为西州道总管,率兵出银山道,以栗婆

---

〔1〕 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96 页。

〔2〕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吐鲁番文物普查队:《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88 年第 3 期,51 页。

〔3〕 中国地图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8 年版,129~130 页。

准等为向导。"[1] 法藏敦煌唐写本《西州图经》残卷(P.2009)记"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滷。唯近峰足水草,通车马行"。罗振玉以为"银山道殆以碛得名"。[2] 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中亚,讲突厥语的维吾尔人大批迁居塔里木盆地。于是银山碛更多地称作狐媚碛,只是译名略有改变,旧称"库木什"(《西域图志》)或作"库穆什"(《西域水道记》),今称"库米什"。这些不同的译名皆本自突厥语 kümüš(银)。[3]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不断提到"银山"、"银山戍"和"银山馆"等,[4] 说明银山碛确为天山南麓古代交通要冲。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F. Bergman)在库米什东南发现一处古代戍堡遗址,距焉耆约520里。[5] 唐代银山戍或在此地。

波斯文地理志《世界境域志》(XII.3)提到北庭和焉耆之间有一地,名曰"k.msighiya,是个村子,在两山之间"。[6] 这个地名似由突厥语的 kümüš(银)和伊朗语的 gar(山)构成。西域突厥人与东伊朗人(如于阗人、疏勒人或粟特人)长期杂处,故西域的突厥语言混杂有伊朗语因素。如喀什噶尔之"噶尔"即来自伊朗语 gar(山)。无论如何,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狐媚碛应指天山南

---

〔1〕《旧唐书·西戎传》所述略同。

〔2〕罗振玉:《西州志残卷》,收入蒋斧编:《敦煌石室遗书》第6册,1909年铅印本;又见黄永武编:《敦煌丛刊初集》卷六。

〔3〕A. v. Gabain, *Alttürkishs Grammatik mit Bibliographie, Lesestücken und Wörterverzcichins, auch Neutürkisch*, 2, Auf 1, Porta Linguarum Orientaliuzm, XXIII, Leipzig, 1950 (Wiesbaden, 3rd ed., 1974), p.345.

〔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和第十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991年。

〔5〕伯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287页。

〔6〕王治来,前揭书,65页。

麓丝绸之路北道的银山碛。

四、谋 落

谋落是三姓葛逻禄之一，唐朝在其牧地置阴山州都督府。西北史上有两座阴山，一为内蒙古的狼山，另一在新疆西部天山。谋落部牧地当在后一山脉。《新唐书·地理志下》记载："开元中又有火拔州、葛禄州，后不复见"；后设"阴山州都督府，显庆三年分葛逻禄三部置三府，以谋落部置；大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炽俟部置……玄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踏实力部置"；又设"金附州都督府，析大漠州置"。后四州皆属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昌吉自治州吉木萨尔县护堡子古城）。[1] 新疆大学的苏北海先生认为，阴山都督府在今新疆博尔塔拉以北阿拉套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玉贵先生认为，阴山州都督府在今新疆塔城西南至阿拉湖之间，但两学者均未详明立论根据。[2] 据我们研究，这座阴山当在今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的婆罗科努山。

《旧唐书·回纥传》记西部天山北麓有一山，名曰"阴山"。文中说："显庆元年，贺鲁又犯边，诏程知节、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金牙山，尽收所据之地，西逐至耶罗川。"《新唐书·突厥传下》复述此事曰：苏定方讨伐贺鲁，"至双河，与弥射、步真会，军饱气张，距贺鲁牙二百里，阵而

---

〔1〕 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2〕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150页；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62页。

行，抵金牙山。贺鲁众适猎，定方兵纵破其牙。"既然如此，《旧唐书》的"阴山"应在《新唐书》的"双河"附近。据《新唐书·地理志》，双河系西突厥摄舍提墩领地。据考古调查资料，双河故城在今新疆博乐市东南约27公里达勒特乡的达勒特古城。金牙山在双河故城西南直线距离约160公里处，北临赛里木湖，今称"科克喀尔木山"。从文献记载看，阴山似在双河与金牙山之间。从双河故城到金牙山需要绕山口而行。这个山口是从天山北麓进入伊犁河谷的重要关隘，今称"果子沟"。[1]元代仍称这一带的山脉为"阴山"。

1218年耶律楚材随成吉斯汗西征，曾作《西游录》一书。他在该书中介绍说：

> 过瀚海千余里，有不剌城。不剌南有阴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顶有池，周围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擒，树阴蓊郁，不露日色。出阴山，有阿里麻里城。

张星烺注曰：

> 不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普剌，《经世大典图》，普剌在阿力麻里之东。拉施特《史记》作普剌特(Pulad)，《海敦纪行》作福剌特(Phulad)，距赛蓝湖(Sairam Lake)不远。卢白鲁克(Rubruck)纪行作波拉忒(Bolat)。不剌城南之阴山，亦见上方《北使记》。白莱脱哥乃窦谓即今固尔札(即宁远城)西北之蒲罗火鲁山(Borokhoro)，又名

[1] 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365页。

塔尔启山(Talki)。此山亦天山之一支。山顶之池,即赛蓝湖也。[1]

据考古调查,不剌城即今新疆博乐市之西约5公里青得里乡阿里翁白新村西南的青得里古城,年代约在唐至宋元时期。[2]

1259年常德率使团出访伊儿汗国,途经不剌城。随常德西使的侍者刘郁曾作《西使记》。他在该书介绍说:

> 行渐西,有城曰业瞒(今新疆额敏县),又西南行,过孛罗城(即不剌城),所种皆稻麦,山多柏不能株,城居肆囿间错,土屋窗户皆琉璃……孛罗城迤西,金、银、铜为钱,有文而无孔方。[3]

据古钱学资料,刘郁说的"有文而无孔方"的金、银、铜钱皆指察合台汗国钱币,有金、银和铜三种。80年代以来,青得里古城、达勒特古城和昌吉古城陆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察合台汗国钱币。其中许多钱币写明是在"布拉特"(bulat)打制的。[4]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不剌、孛罗乃一音之转,皆来自察合台钱币阿拉伯语地名"布拉特"。需要补充的是,该词当源于此地更古老

---

〔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57页。

〔2〕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博乐自治州文物普查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93~94页。

〔3〕张星烺,前揭书,69页。

〔4〕韩雪昆:《察合台汗国铜币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9~12转25页。

的部落之名“谋落”。在拉施特《史集》中，不剌的规范拼法是būlāt。[1] 该词相当于突厥语 bulït/ bulut(云彩)。[2] 以前西方突厥学家一直以为“谋落”一词来自突厥语 bulaq(水渠、海峡)。[3]现在看来，这个认识不得不根据考古新发现重新修订。

我们还注意到，《隋书·铁勒传》将谋落称作“薄落职”。当时谋落和契弊、乙咥、苏婆等铁勒诸部游牧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白山指今新疆天山山脉，自然包括谋落部所居西部天山之“阴山”。这座阴山毗邻铁勒诸部主要发祥地敕勒川。所以《敕勒歌》描绘的“阴山”不一定指内蒙古的狼山，可能是铁勒薄落职部所居阴山，也就是今天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的婆罗科努山。

五、大漠州都督府

九姓回鹘可汗碑第 XVIII—XIX 行残文曰：

> ……(上残)[左右]厢、沓实力……军将供奉，并皆亲观。至以贼境，长驱横入，自将数骑，发号施令，取其必胜，

---

[1] 拉施特主编、赫塔古罗夫俄译、余大钧、周建奇汉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122 页。

[2] A. v. Gabain, *Alttürkishs Grammatik mit Bibliographie, Lesestücken und Wörterverzcichins, auch Neutürkisch*, 2, Auf 1, Porta Linguarum Orientaliuzm, XXIII, Leipzig, 1950 (Wiesbaden, 3rd ed., 1974), p.332.

[3] I. Ecsedy,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Karluks in the T'ang Period,” *AOASH*, XXXIV.1—3, 1980, p.29.

勍敌毕摧。追奔逐北，直至大［□□□□］有余（下残）……[1]

1990年，日本伊朗学家吉田丰根据他对粟特文部分的解读，将最后一句复原作"追奔逐北，直至大［食国］"，以为他复原的"大食国"相当于粟特文9号残石第7行(Fr 9.7)的 t'z'yk'n'k 'xš-'w'nyh(大食国)。[2]然而，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与粟特文并非逐行对译。汉文部分自第II行起就和粟特文相差一行。换言之，和粟特文第20行对译的汉文部分至少要在汉碑第XX行以后。所以吉田君的复原颇有疑问。我们注意到汉文第XXII行提到了"大食"，只是写作"大石"而未引起研究者注意。这段残文读作："……(上残)［护］(法)宇内，僧徒宽泰，听士安乐。自法开来，［□□］大石，未曾降伏。"[3] 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记载，"永徽六年(655年)六月，大石国盐莫念并遣使朝贡。"《旧唐书·高宗纪》复述此事曰"永徽六年六月，大食国遣使朝贡"。可见，大石必为大食无疑。汉文第XXII行的"僧徒"和"听士"均

---

〔1〕 G. Schlegel, "*Die Chinesische Inschrift auf den uigurischen Denkmal in Kara Balgasun*," *MSFOu*, IX, 1896, pp.126～135.

〔2〕 吉田丰：《カラベルガスン碑文のソグド语版について》，《西南アジア研究》28，1988，24～52页；Y. Yoshida, "Some New Reading of the Sogdian Version of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entrale*, ed. by A. Haneda, Kyoto, 1990, pp.117～123.

〔3〕 "大石"两字，施古德未录，不过李文田和羽田亨都录出了"石"字。参见李文田：《和林金石考》1卷，烟画东堂小品·顺德师著述，长沙出版，约清末（无具体出版年月）；羽田亨：《唐代回鹘史の研究》，《羽田博士史学论集》上卷，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57年（同朋舍，1975年重印），310页。从九姓回鹘可汗碑柳风堂藏拓上，我们发现"石"字前应为"大"字。我们还注意到"宇"字前残存半个"法"字，故将该词复原为"护法"。

指摩尼教徒。我们还发现,这段汉碑残文实际上相当于粟特文第21行最后的残文['rt'wty ZY]nγ'wš'kt(选民和听者)。[1]这就提醒我们,粟特文9号残石第7行(Fr 9.7)应该接在第21行最后,而非吉田君建议的接在第20行最后。

另一方面,大食国在回鹘国之西。回鹘可汗岂能"追奔逐北,直至大[食国]"?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汉碑第XIX行的"大……"究竟是什么。从碑文看,回鹘可汗挥师北上,事在攻占龟兹之后,征战对象则为前文提到葛逻禄三部"[左右]厢、沓实力"部。因此,这个残缺不全的地名大概是三姓葛逻禄的炽俟部牧地"大漠"。

《新唐书·地理志》记葛逻禄谋落部所居阴山之东有一地,名曰"大漠"。葛逻禄炽俟部居地——大漠州都督府疑在此地。其文曰:

> 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

一般认为,黑水即今奎屯市奎屯河,西林守捉在博尔塔拉自治州托托乡固尔图喀喇乌苏河,石漆河即今精河县的精河。清代学者对这一带做过详细调查。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说:"自固尔图喀喇乌苏台西北经托多克军台行丛苇中,草高于人,又西北皆

[1] O. Hansen, "Zur soghdischen Inschrift auf dem dreisprachigen Denkmal von Karabalgasun," *JSFOu* 44—3, 1930, pp.3~39. 方括号内的字为我们复原。

沙阜难行,所谓草泊、小碛也。"祁韵士《万里行程记》介绍:由托多克西行渐入沙路,八十里至沙泉,西行沙路益大,六十里至晶河,俗称精河。[1] 那么唐代大漠州都督府或在今新疆精河县城东约30里托托乡(即清代托多克)一带。

据考古调查,托托乡西面古尔图(即清代固尔图喀喇乌苏台)的现代公路旁分布有古代大型土墩墓22座。最大的封土堆高达5米,底径周长达190米,颇为壮观。可惜这些墓葬已被盗掘,尚未清理。[2] 调查简报疑其为汉墓并无实据。该墓地东北临戈壁滩。西北则为艾比湖,水草丰茂。葛逻禄炽俟部牧地以及回鹘可汗北伐葛逻禄所经"大漠"或在此地。那么九姓回鹘可汗碑第XIX行最后一句大概要复原作"追奔逐北,直至大[漠,杀万人]有余"。

(此文原载《九州》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收入本书时修正了若干错误。)

---

〔1〕 岑仲勉:《庭州至碎叶道考》,收入《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孟凡人:《北庭城与外界的交通》,收入《北庭史地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2〕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博乐州文物普查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73－74页。

7

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

九姓回鹘可汗碑是回鹘汗国(744—840年)最著名的碑铭之一,位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鄂尔浑河畔哈喇巴剌沙衮附近,乌兰巴托市以西400公里处。著名的回鹘故都鄂尔都八里(Ordu Balik)遗址(参见插图46)就在这个地方。

鄂尔都八里位于杭爱山东北和硕柴达木盆地内,发源于杭爱山的鄂尔浑河和土拉河自南而北流入盆地。回鹘故都建在鄂尔浑河的西岸东经102°20″,北纬47°45″的地方。杭爱山始见于战国文献,《穆天子传》卷二将此山称作"燕然山"。鄂尔浑河始见于汉代文献,《汉书·匈奴传》谓之"安侯水"。唐代文献将杭爱山称作"乌德鞬山",而将鄂尔浑河称作"嗢昆水"。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都把鄂尔浑河流域当作政治文化中心。匈奴故都"龙城"、回鹘故都"鄂尔都八里"和蒙古故都"哈喇和林"(Karakurum)大都建在和硕柴达木盆地一带。

就目前所知,最早传入蒙古草原的文字是汉字。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大败匈奴左贤王,并在漠北狼居胥山封禅勒铭。[1] 此

---

[1] 《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狩四年(前119年)冬"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颜师古注:"登山祭天,筑土为封,刻石纪事,以彰汉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和《史记·匈奴列传》所述略同。

山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东面。[1]东汉将军窦宪大败北匈奴,命班固在燕然山勒铭纪功。[2]据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考证,突厥文表示"书写"的词 biti-,借自汉语的"笔"(古音读 piĕt)。[3]

公元6世纪末,突厥人开始用中亚粟特文为其君主树碑立传。南朝梁文士庾信《哀江南赋》有诗曰:"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4]周一良先生认为,庾信的"胡书"当指中亚粟特文。[5]《周书·突厥传》提到突厥人"其书类胡"。《北齐书·斛律羌举传》亦载:"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这件事发生在突厥汗国佗钵可汗(572—581年)在位之际。[6]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的车车尔勒格布古特地方发现粟特文刻写的佗钵可汗纪功碑。由此可知,公元6世纪末突厥汗国仍以粟特文作为官方文字。

突厥人很快就在粟特文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文字——突厥文。目前所见最早的突厥文碑铭属于突厥汗国时期。回鹘汗国继突厥汗国之后在漠北兴起。回鹘第二代君主葛勒可汗

---

〔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39页。

〔2〕《后汉书·窦融附窦宪传》。

〔3〕A.v. Gabain, *Alttürkishe Grammatik mit Bibliographie, Lesestücken und Wörterverzcichins, auch Neutürkisch*, 2, Auf 1, Porta Linguarum Orientaliuzm, XXIII, Leipzig, 1950 (Wiesbaden, 3rd ed., 1974), 303; S. Cagatay, "Zur Wortgeschichte des Anatolish Türkischen," *UAJ*, XXXII, 1966, pp.1~2.

〔4〕周一良先生疑其为粟特碑铭。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79页。

〔5〕周一良:前揭书,179~180页。

〔6〕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344~3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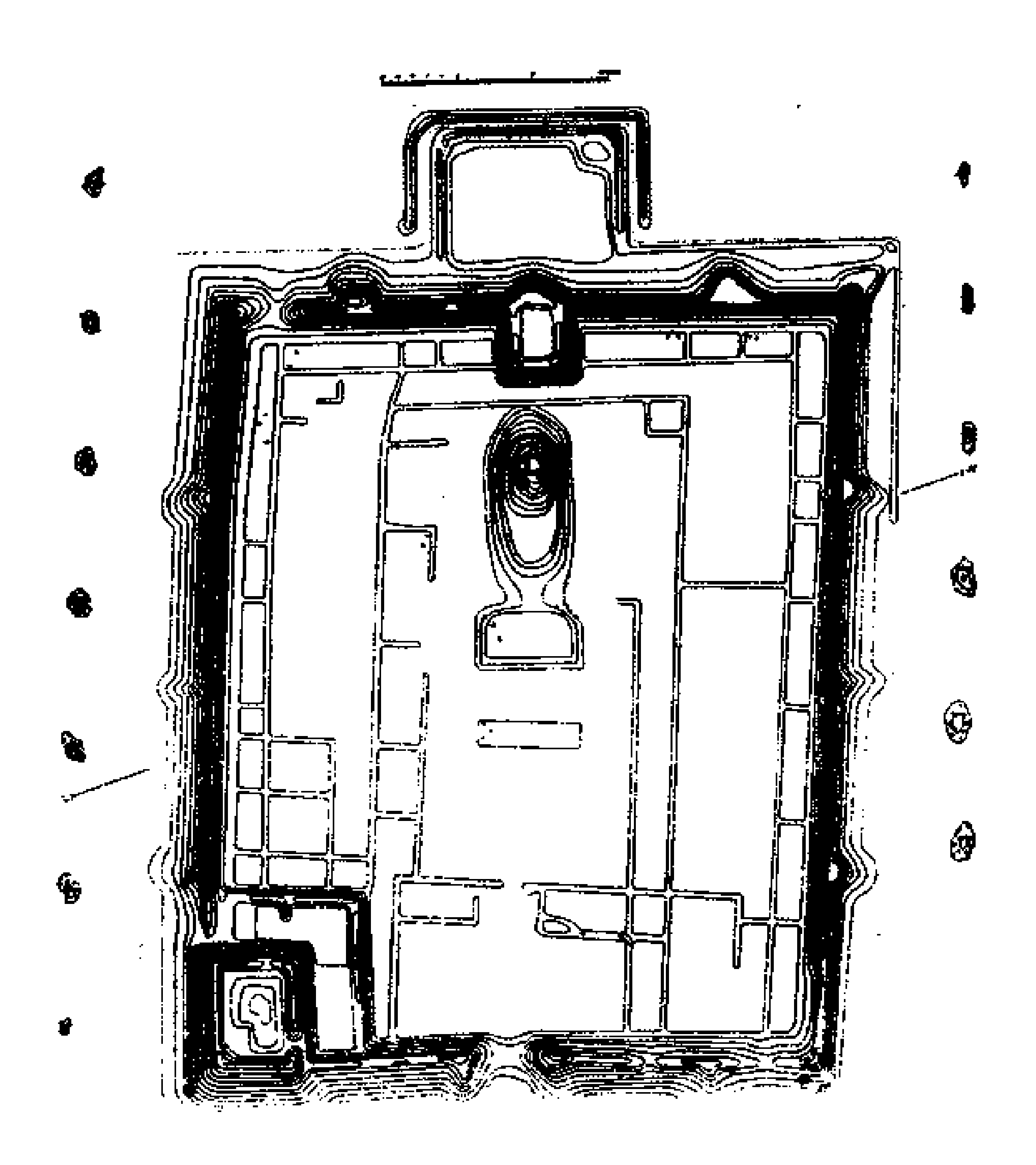


插图 46　回鹘故都鄂尔都八里城址平面图

(747—759年)建造了著名的磨延啜碑,亦称"回纥英武威远毖伽可汗碑"。碑文用突厥文(正面)和汉文(背面)两种文字刻写,汉文部分记有唐开元年号,正面则用突厥人十二生肖纪年。

九姓回鹘可汗碑用汉文、粟特文和突厥文三种文字刻写,发现时已被打碎,不堪卒读。所以研究者对它属于哪一位回鹘可汗众说纷纭。清末名儒沈曾植和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均主张其为怀信可汗碑,荷兰汉学家施古德定为昭礼可汗碑。1913年,沙畹和伯希和首倡保义可汗碑。此后,研究者大多追随沙畹和伯希和之说。公元840年,北方黠戛斯人攻入鄂尔都八里,回鹘汗国遂亡。因此,九姓回鹘可汗碑很可能毁于黠戛斯人。

一、发现与研究始末

《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回鹘可汗协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后,"回纥可汗铭石立国门,曰'唐使来,当使知我前后功'。"这是文献首次提到的回鹘首都附近有回鹘可汗纪功碑。《辽史·太祖本纪》记载:"天赞三年(924年)八月甲午,次古单于国,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同月甲子,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辟遏是突厥语"毗伽"的别译。《国语·晋语八》韦昭注:"砻,磨也。"《太祖本纪》这段话意思说,辽太祖命令磨去回鹘故都附近毗伽可汗碑上原有文字,改刻契丹、突厥和汉文三语碑铭。漠北的突厥碑铭没有完全被辽人所毁。13世纪元代诗人耶律铸再次提到蒙古首都哈喇和林附近有突厥可

汗阙特勤碑。[1]元代诗人陈宜甫《和林城北唐阙特勤坟诗》也提到阙特勤碑。[2]

13世纪中叶,波斯史家志费尼(1226—1283年)来到哈喇和林,开始撰写《世界征服者史》。他在书中提到哈喇和林附近回鹘故城之前尚有汉文刻写的卜固可汗碑。其文云:"畏吾儿人相传谓古时初居鄂尔浑河畔。河发源哈喇和林山。近时窝阔台汗(1186—1241年)筑新都名曰哈喇和林者,盖取名于山也。有三十川河,皆发源是山。有三十部落,居住河畔。畏吾儿人昔居鄂尔浑河流域时,尝分二部。人口既繁以后,乃推举一王以治众。阅五百年而卜固可汗(Buku Khan)生。相传汗即阿弗拉西亚普(Efrassiab,古代突厥王)也。哈喇和林山中有辟詹(Pijen,古代波斯名将)所居之穴。古宫城遗址在鄂尔浑河畔,皆尚可见也。古代城名鄂尔都八里,今名Mao Balik(故城)。故城之前有数碑矗立,碑文尚可读也。窝阔台汗即位,命去各碑。下见有穴,穴中更有大碑。碑文完好,汗命各国人读之,无一能者。汗乃遣使中国求萨满师(Kames)读之。碑上文字即其国之文也。"[3]

最早报道突厥鲁尼文的欧洲学者是荷兰人魏津(N. Widzen)。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他在《北部和东部鞑靼利亚》一书中提到西伯利亚的古代碑铭。[4]1730年(清雍正八

[1] 耶律铸在《取和林诗》本注中写道:"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732年)御制御书阙特勤碑。"参见(元)耶律铸撰:《双溪醉隐集》卷八,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2] (元)陈宜甫:《秋严诗集》末篇,《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225~226页。本文引用时改动了几个译名,使之规范化。

[4] N. Widzen, *Noord and Oost Tartarye*, Amsterdem, 1692.

年)，瑞典人斯特拉林别尔克(F.J. Stralenberg)在西伯利亚已生活了13年之久。回国后，他撰写《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和东部》一书，介绍了叶尼塞河流域的古代碑铭，书末还附有这些古代碑文的照片。[1]此后，西方书刊杂志不断报道类似的发现，引起了法国东方学家雷穆沙(J.P.A. Rémusat)的注意。1822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评述说："若能解读这些碑文，这对解决重要历史文化问题将起巨大作用。"[2]

九姓回鹘可汗碑的发现，归功于19世纪末欧洲探险队到蒙古草原的几次考察。这时蒙古尚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康熙年间，蒙古土谢图汗部贵族策棱率部众归附清朝。乾隆时土谢图汗部二十旗盟于汗阿林。蒙古黄教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呼图克图(1635—1723年)始于土谢图汗部属地建城，名叫"库伦"。[3]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于库伦设办事大臣，专理俄罗斯贸易，兼领蒙古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二部，由驻守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汗省会扎布哈朗特)定边左副将军节制。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库伦易名乌兰巴托。

受沙俄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委托，1889年，雅德林采夫(N.M. Yadrintsev)组建探险队远征西伯利亚。他们此行顺便调查了蒙古草原的古遗址，并在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湖畔意外发现突厥可汗阙特勤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阙特勤碑较为完整，九姓回鹘可汗碑发现时已碎成20多个残块。雅德林采

[1] F. J. Stralenberg, *Das Nord und Östliche Teil von Europa und Asia*, Stockholm, 1730.

[2] 此文未及阅，转引自耿世民：《古代突厥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8页。

[3] 蒙语谓城为"库伦"。

夫还将其中两块盗回圣彼得堡。由于碑文颇似北欧古代民族使用的Runic(鲁尼文),所以雅德林采夫在报告中将其称作“鲁尼文”。[1] 他写道:“异常坚固的花岗岩碑石,经历了千百年来的侵蚀,说明它们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谜一般的鲁尼文以前曾在西伯利亚发现过,碑侧和碑阴或刻有汉字。”后经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omsen)解读,人们终于知道这种文字实际是突厥文。[2]尽管如此,鲁尼文的名字业已约定成俗,学界目前通称为“突厥鲁尼文”。1891年,俄国学者柯赫(M.E. Koch)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第5卷首次刊布了雅德林采夫带回圣彼得堡的那两块九姓回鹘可汗碑残石,认为碑文提到的伊难主见于《新唐书·回鹘传》,并指出碑文提到了安史之乱的史思明等。[3] 从时间看,柯赫应是最早研究九姓回鹘可汗碑的西方学者。

蒙古草原发现鲁尼文碑的消息传出后,芬兰—乌戈尔协会立即派海开勒(H. Heikel)组建芬兰考察队到蒙古草原。他们于1890年抵达回鹘故都,将九姓回鹘可汗碑编为1号石,将阙特勤碑编为2号石。[4]1891年,沙俄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派院士拉德洛夫(W.W. Radloff)再次组建俄国鄂尔浑河考察队,他

---

〔1〕雅德林采夫(N.M. Yadrintsev):《1889年鄂尔浑河考察报告(受沙俄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学会委托)》,《鄂尔浑河考察队丛刊》(СТОЭ)第3卷,1889年,51～113页(俄文)。

〔2〕V. Thomsen, *Dé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 Orkhon et de l' Iénissei, Notice prélimnaire*, Copenhagen, 1894.

〔3〕Koch, [Two Yadrintsev-Fragments], *ZVORAO*. V. 1891, Lief. 2 and 4 in pp. 147～156 and 265～270;此文被Lemosof在《通报》(*TP*, II, 1891, p.113)上翻译成法文;并被E.D. Morgan在《皇家亚洲协会杂志》(*JRAS*, 1891, pp. 451～456)翻译成英文。

〔4〕R. N. Gebelentz,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édition finnoise 1890: publiés par la Scoiete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1892.

们在原碑所在地制作了九姓回鹘可汗碑和其他突厥碑铭的拓本并发现了新的残石。[1]1902年,英国驻梧州(Wu Zhou)领事坎贝尔(C. W. Campbell)仔细考察并记述了鄂尔浑碑铭。[2]同年,法国旅行家兼作家拉考斯特(B. de Lacoste)少校实地考察了九姓回鹘可汗碑,在当地拓工的帮助下,拓制了一套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他还将一块粟特文残石(拉德洛夫编为Fragment 10)盗回巴黎。[3]西方考察队刊布的突厥碑铭中尤以芬兰刊本(Tab. 1—65)最为清晰,而以俄国刊本(Taf. XXVII—XXXV)所刊碑铭最全。所以目前学界普遍使用俄国刊本。

九姓回鹘可汗碑用汉文、粟特文和突厥文三种文字刻写。突厥文残损过甚,剩字不多,而汉文和粟特文保存尚好,尤以汉文保存最好。伽伯棱茨(G. V. D. Gabelentz)和法国汉学家德微理亚(J.G. Devéria)讨论了芬兰考察队拍摄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残石,刊于芬兰乌戈尔协会1892年出版的《1890年芬兰考察队鄂尔浑河碑铭考古记》。[4]德微理亚原为法国驻华外交官,在华工作十余年(1860—1880年),1889年继冉默德(M. L. M. Jametel)任巴黎现代东方语学院汉学教授,凡十年。九姓回鹘可汗碑的汉文残石就在他任教期间释读的。九姓回鹘可汗碑

---

〔1〕W. W. Radloff, *Atlas der Alterthümer der Mongolei*, St. Petersburg, 1892—1899, Pl. 27—35.

〔2〕C. W. Cambell, *Report by Mr. C. W. Campbell, His Majestys Consul at Wuchou on a Jouney in Mongolia*, London, 1904.

〔3〕B. de Lacoste, *Au Pays sacré des Anciens Turces et des Mongols*, Paris, 1911, pp. 78~79.

〔4〕G. Devèria, "Transcription, analyse et traduction des fragments chinosi du 2nd et du 3-me monument," in R. N. Gebelentz,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édition finnoise 1890; publiès par la Scoiete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1892, xxxvii-xxxviii.

汉文部分的释读大大便利了西方学者解读突厥文鲁尼文。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omsen)就是根据阙特勤碑的汉文确定了突厥文 kül tigin(阙特勤)一词的音值。

1892 年,拉德洛夫出版了俄国鄂尔浑河考察队报告《蒙古古物图志》。该书刊布了九姓回鹘可汗碑残石及其他突厥碑铭的拓本和照片。翌年,俄驻华公使喀西尼(A.P. Cassini,1891—1895 年在任)伯爵将《蒙古古物图志》送到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考释和林三唐碑(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为此,沈曾植分别为和林三唐碑作跋。[1] 这时志文贞(字锐,光绪六年进士)刚刚就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1893—1910 年在任),他在原碑所在地拓印了一份阙特勤碑拓本赠与妹夫国子监祭酒盛昱。盛昱和沈曾植相继为这套阙特勤碑拓本作跋。1895 年拉德洛夫出版《蒙古古代突厥碑铭》第三册,以清朝驻俄公使 Shü King-cheng(许景澄,同治进士)的名义刊布了九姓回鹘可汗碑汉碑录文。[2] 不过,据王国维介绍,和林三唐碑的释文应是沈曾植之作。俄国汉学家华西里耶夫(W. P. Wassiljeff)将这个释文译为德文。[3] 1897 年瓦西里耶夫刊布了清总理衙门对和林三唐碑的释文,也即所谓“总理衙门书”。[4]

---

[1] 沈曾植的唐碑三跋,初刊于释持《和林三唐碑跋》(《亚洲学术杂志》1921 年第 2 期);又见钱仲联《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四),《文献》1992 年 2 期,231~238 页。

[2] 许景澄,同治进士,光绪十六至二十三年驻俄公使,光绪二十五年去世。参见高树:《许文肃公年谱》,《国专月刊》第 4 卷第 3—4 号,1936 年。

[3] W. W. Radloff, *Die Alttürkschen Inscriften der Mongolei*, vol. 3, St. Petersbourg, 1895, pp. 283~298.

[4] 华西里耶夫:《和硕柴达木和哈喇巴喇哈逊鄂尔浑碑铭的汉文碑文》,《鄂尔浑河考察队丛刊》(CTOЭ)第 3 册,1897 年,1~36 页(俄文)。

1893年,拉德洛夫得知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的成功解读突厥文的消息,他立即着手翻译和林三唐碑的突厥文,可惜误将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粟特文当作回鹘文。受拉德洛夫的委托,荷兰莱顿大学汉学教授施古德(G. Schlegel)系统研究了九姓回鹘可汗碑。1896年,他初步确定了汉碑部分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并将碑文译成德文。[1]1909年,德国语言学家缪勒(F. W. K. Müller)发现拉德洛夫所谓"回鹘文"实际上是粟特文,并校勘了几行残文。[2]1930年,汉堡大学教授汉森(O. Hansen)对粟特文部分作了全面研究,解读了其余粟特文。这项研究曾得到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的帮助。[3]

沈曾植之后,李文田对和林三唐碑作录文考释,刊于《和林金石录》。[4]李文田,广东顺德人,咸丰进士,清末治西北史地之学的重要人物。他校订九姓回鹘可汗碑时中国尚无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流行,他从许景澄处得到拉德洛夫的《蒙古考古图志》。[5]清宣统元年(1909年)三多赴蒙古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1910年实授库伦办事大臣。在他任职期间,拓印了许多突厥碑铭,单阙特勤碑拓本就多达200多份。他在拓本

---

[1] G. Schlegel, *Die Chinesische Inschrift auf den uigurischen Denkmal in Kara Balgasun*, *MSFOu*, IX, 1896, pp.126-135.

[2] F.W.K. Müller, "Ein iranisches Sprachdenkmal aus der nördlichen Mongolei," *SPAW*, 1909, pp.726-730.

[3] O. Hansen, "Zur soghdischen Inschrift auf dem dreisprachigen Denkmal von Karabalgasun," *JSFOu*, XLIV-3, 1930, pp.1-39.

[4] 李文田撰、罗振玉校订:《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和林金石录》,灵鹣阁丛书第四集,长沙石印,约清末(无确切出版社和年月)。

[5] 参见李文田、罗振玉前揭文;耿世民:《古代突厥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87~96页;程溯洛:《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20~28页。

题跋中自称“库伦使者”。王国维注意到，三多拓印的一块汉文残石为西方考察队遗漏。三多卸任时还为阙特勤碑建过碑亭。[1]沈曾植、罗振玉和陆和九都得到过三多拓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罗振玉写《九姓回鹘可汗碑校补》时，利用了三多拓本，谓之“三都护”。王国维据三多拓本写《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他注意到三多拓本比拉德洛夫刊布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少了两块汉文残石，当系雅德林采夫私下带到圣彼得堡的两块残石。

另一方面，法国汉学家沙畹、伯希和、日本学者安部建夫、羽田亨相继对碑文内容作了深入研究。1912 年沙畹与伯希和合写《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着重研究了回鹘摩尼教；[2]1956 年，安部健夫发表《西回鹘国史》，重点研究回鹘汗国及其西迁历史；[3]1958 年，羽田亨发表《九姓回鹘可汗碑》，侧重于文字考释；[4]80 年代末，哈密顿回顾了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史，介绍了巴黎藏拉考斯特拓本，并讨论了部分碑文的释读；[5]日

---

〔1〕三多，别号六桥，蒙八旗正白旗人，生于浙江，任库伦办事大臣之前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1910—1911 年任库伦办事大臣，参见《清史稿》卷二〇八《疆臣表》。

〔2〕Ed. Chavannes et P. Pelliot, “Un Traitè manichèen retrouvè en Chine,” *JA*, X, 1912, pp. 499～617.

〔3〕安部健夫著、宋肃瀛等译：《西回鹘国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

〔4〕羽田亨，《九姓回鹘可汗碑》，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集》上卷，京都：同朋舍，1975 年，303～324 页。

〔5〕J. Hamilton, “L' Inscription Trilingue de Qara Balgasun d' Après Estampages de Bouiliane de Lacoste,” in Akira Haneda (ed.), *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 Asie Centrale*, Kyoto: 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et University of Ryukoku, 4—8, Octobre, 1988, pp. 125～133.

本伊朗学家吉田丰则对粟特残石作了进一步解读；[1]华涛和陈得芝最近指出，碑文所谓"□媚碛"应为狐媚碛，不断把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研究推向深入。

1997年8—9月间，以森安孝夫、吉田丰为主的考察团详细地对蒙古北部地区突厥、回鹘时期的遗迹和碑文做了调查。据他们调查，此碑距离回鹘宫城约500米，附近有摩尼教寺院。他们结合拓片以及实地考察结果指出，碑高352或360厘米，碑正面宽约176厘米，侧面宽约70厘米，转角宽约5.5厘米。汉文直书，刻在碑正面左侧，正面有19行，左转角1行，碑左侧估计还有14行，共约34行，每行约78或80字；粟特文直书，刻在碑正面右侧，正面约27行，右转角1行，碑右侧估计还有17行，共约45行；突厥文横书，刻在碑背面，大约116行，每行约70至75字。他们还提出，此碑可能毁于黠戛斯人，黠戛斯人也使用突厥文，而此碑突厥文部分多处记述回鹘攻打黠戛斯之事，所以这部分毁坏最严重。[2]

二、海内外九姓回鹘可汗碑残石照片及拓本调查

九姓回鹘可汗碑现有若干残石和拓本珍藏于海内外各图书

---

〔1〕 Y. Yoshida, "Some New Reading of the Sogdian Version of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Akira Haneda (ed.), *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 Asie Centrale*, Kyoto: 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et University of Ryukoku, 4—8, Octobre, 1988, pp.117～123.

〔2〕 森安孝夫、吉田丰:《モンゴル国内突厥ウイゲル时代遗迹·碑文调查简报》,《内陆アジア言语的研究》XIII,大阪,1998年,155～156页。

馆或博物馆。海外原有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和巴黎亚洲图书馆藏九姓回鹘可汗碑残石和拓本见诸报道。另据森安孝夫和吉田丰近年的调查报告，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说明具体情况。国内收藏单位集中在天津和北京，包括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四家。

1. 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

1989年，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刊布了馆藏九姓回鹘可汗碑残石拓本，他们在拓本文字介绍中提到九姓回鹘可汗碑现藏圣彼得堡。我们尚未查到这个说法有什么根据。王国维《九姓毗伽可汗碑跋》提到俄国大佐盗窃九姓回鹘可汗碑一事。他说："光宣间（1875—1911年），此碑中二段为俄国某大佐取去，置之圣彼得堡博物馆。故近来拓本乃少五、六两段。"1990年法国突厥学家哈密顿（J. Hamilton）在日本一次学术会议上披露，王国维提到的某俄国大佐就是雅德林采夫，但是他只拿走两块残石而非全碑。[1]

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全称"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建于1818年11月。19世纪以来俄国人搜罗的大批东方古物主要集中在这家博物馆，据说，总数达数万件之多。1921年该馆成立东方学家委员会后，成为苏联东方学研究中心。1930年以亚洲博物馆和东方学家委员会为基础组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50年东方学研究所总部迁往莫斯科日丹诺夫大街12号，同时在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原址

〔1〕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观堂集林》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89～990页。

设立分所。一度改称亚洲民族研究所,现称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1] 如果这两块九姓回鹘可汗碑残石没有遗失,现在应在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馆。[2]据王国维研究,雅德林采夫拿走了第五、六两块残石。他说:其中"四、五两段即李录之第三、第四两片,第六段则李录之第五片"。王国维的碑铭编号似乎来自拉德洛夫的《蒙古古物图志》。那么它们分别相当于拉德洛夫的汉文粟特文残石(图版 XXXIV. 3/Fr. 5)和汉文残石(图版 XXXIV. 2)。汉森解读粟特文时曾将拉德洛夫的 Fr. 5 号汉文粟特文残石称作 Yadrintsev-Fragment(雅德林采夫残片)可为之证。据汉森介绍,Fr. 5 号残石有汉文 5 行(第 1 行和 3—6 行)及粟特文 4 行。[3] 缪勒就是根据这两块残石断定九姓回鹘可汗碑的胡书文字应是粟特文。[4] 1891 年,俄国学者柯赫(M. E. Koch)在一家俄国杂志上披露过雅德林采夫残片,其一(= 拉德洛夫图版 XXXIV. 3/ Fr. 5)刻有"思合伊难主莫贺"七字。[5]此文由勒摩索夫(Lemosof)翻译成法文,刊于《通报》(*TP*, II, 1891, p.113);并由摩尔根(E.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104 页、625 页、670~672 页;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114 页。

〔2〕 J. Hamilton, "L' Inscription Trilingue de Qara Balgasun d' Aprés Estampages de Bouiliane de Lacoste," in Akira Haneda (ed.), *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 Asie Centrale*, Kyoto: Kyo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et University of Ryukoku, 4-8, Octobre, 1988, p. 127.

〔3〕 O. Hansen, 前揭文,10 页。

〔4〕 F. W. K. Müller, "Ein iranisches Sprachdenkmal aus der nordlichen Mongolei," *SPAW*, 1909, p. 727.

〔5〕 Koch, [Two Yadrintsev-Fragments], *ZVORAO*, V, 1891, pp. 147~156, 265~270; Lief 2 and 4.

D. Morgan）翻译成英文，刊于《皇家亚洲协会杂志》（*JRAS*，1891，pp.451～456）。据说圣彼得堡的俄国突厥学家克里亚施托尔内（S. G. Kljaštornyj）准备重新研究这两块残石，我们尚未见到他的研究新成果。

2. 巴黎亚洲图书馆

九姓回鹘可汗碑现有一块粟特文残石流散法国，现藏巴黎亚洲图书馆(La Biliothé que de la Sociéte Asiatique)。这件粟特文残石似乎未见其他考察队著录，目前学界称之为Fr. Paris(巴黎残石)。[1] 沙畹和伯希和首揭这块粟特文残石被带到了巴黎，[2]后被汉森编号为Fr. 10号残石，凡7行粟特残文。这块残石是法国旅行家拉考斯特少校1902年考察哈拉巴剌沙逊时私下带回巴黎的。[3]拉考斯特曾在现场对九姓回鹘可汗碑进行拼合，他认为其中八或十块可以拼合。此外，他在当地拓工帮助下，拓制了一套九姓回鹘可汗碑拓片带回巴黎。这是目前所知惟一一套流入欧洲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一共15件带铭文的残石。1912年，沙畹和伯希和首次利用拉考斯特的拓片校勘并补充了前人对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之不足。[4]这15件拓片后来分散到巴黎几家不同的图书馆，几乎被人淡忘。1958年

---

〔1〕 牛汝极：《法国所藏维吾尔学文献文物及其研究综览》，《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81～89页；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24页。

〔2〕 Chavannes et Pelliot, 178, note.

〔3〕 B. de Lacoste, *Au Pays sacré des Anciens Turces et des Mongols*, Paris, 1911, pp.74～76 et Pl. 17.

〔4〕 Ed. Chavannes et P. Pelliot, "Un traitè manichèen retrouvè Chine," *JA*, X, 1912, p.177, note 1(冯承钧汉译文没翻译这条注释).

起，哈密顿在巴黎各家图书馆寻找这套拓本。他花费近两年时间，终于找到其中6件。这些拓本均带汉字，包括三块较大的碑石，其中一块相当于拉德洛夫图版 XXXII. Fr.4 号。据说，他正与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西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博士合作研究这套拓本。我们尚未见到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

3.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1933—1934 年间，乐嘉藻撰文《和林三唐碑纪略》，首次披露了河北第一博物院收藏的和林三唐碑拓本。[1] 其中包括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据说有汉文残石三块、回鹘文（粟特文）残石8块。1952 年在原天津市第一博物馆（前身似即河北第一博物院）和天津市第二博物馆合并的基础上成立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乐嘉藻介绍的这套九姓回鹘可汗碑拓片估计在今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4.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1978 年，程溯洛首次披露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据说是清末从原碑所在地拓印的。[2] 1997 年，冯家昇和程溯洛等编《维吾尔族简史》刊布了这套拓本的部分照片。[3] 根据这条线索，我们曾于 1998 年 6 月 8 日去民院图书馆调查，不料图书管理人员却说馆藏古代碑拓尚未编目，无法为

---

〔1〕 乐嘉藻：《和林三唐碑纪略》，《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44—48 期，1933 年；乐嘉藻：《和林三唐碑纪略》，《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第 50—60 期，1934 年。

〔2〕 程溯洛：《从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看唐代回鹘民族和祖国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 2 期，20～28 页。

〔3〕 冯家昇和程溯洛等编：《维吾尔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年，图版第 1 页。

我们查找。

5. 北京图书馆

1989年，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刊布了一套陆和九旧藏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参见插图47)，编号善拓274。[1] 该书介绍说："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残碑，善拓274。唐刻，附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后。碑在蒙古和林，现藏圣彼得堡博物馆。碑碎为十三块，分拓十三纸，合裱一纸。拓片通高347厘米，宽173厘米。汉文正书，并刻回鹘文。此本系陆和九旧藏清光绪年间拓本。"陆和九是近代著名金石学家，曾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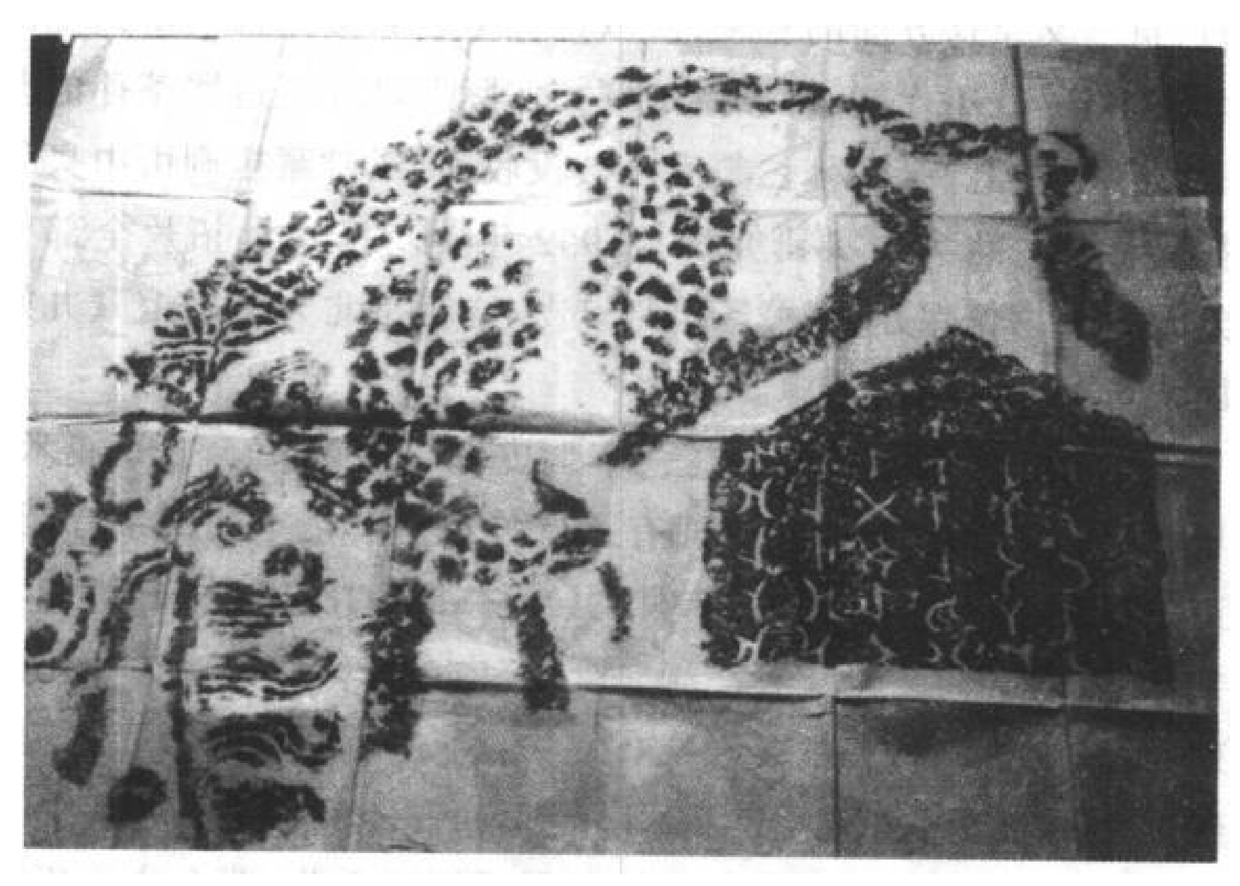


插图47　北京图书馆藏九姓回鹘可汗碑碑额拓片

---

〔1〕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3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65页。

京大学考古学系孙贯文教授即出自陆和九门下。1998年7月10日，我们到北图善本部调查这套拓本，了解到另一套未经刊布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这套拓本编在"各(地)7526号"、善拓287和善拓291的名下。

6.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参见插图48)，目前尚罕为人知。这套拓本属于柳风堂旧藏。柳风堂主人张仁蠡乃张之洞第十三子，近代金石收藏大家；20年代初，他在教育部任职；抗战时期，当过武汉和天津市伪市长。因其酷好金石，自己又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将许多名家藏拓都收罗到他的名下。到40年代初，柳风堂的藏拓实际上已经超过缪荃孙的艺风堂。抗战胜利后，张仁蠡家产被没收，柳风堂藏拓则由中央信托局移交给北大文科研究所。1952年11月，这批拓片全部交给北大图书馆保存，现藏善本部。[1] 这就是北大图书馆藏九姓回鹘可汗碑拓本的来源。

这套拓本现在折叠装在一个牛皮纸口袋(约25×35厘米)里，编号08888。纸口袋正面有几行关于这套拓本的文字介绍，正中写有："唐，和林碑，无年月，共十一纸"；"次唐末，内蕃书者共八纸，内有回鹘毗伽可汗碑二纸"；"内含三碑：一，毗伽可汗碑残石六块，唐；二，突厥文碑残石三块，额一块，唐；三，关帝庙碑，雍正六年五月十三日"云云。口袋正面左下角盖有"柳风堂石墨"红印。关帝庙碑显然与九姓回鹘可汗碑无关，那么这套拓本一共有十张拓片。其中，粟特文和汉文残石拓片凡六件，编号毗

[1] 张玉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代书法作品概述》，《书法丛刊》1998年第1期，13～26页。

伽可汗碑残石之一至之十;突厥文残石凡四件(包括碑额),无编号。分述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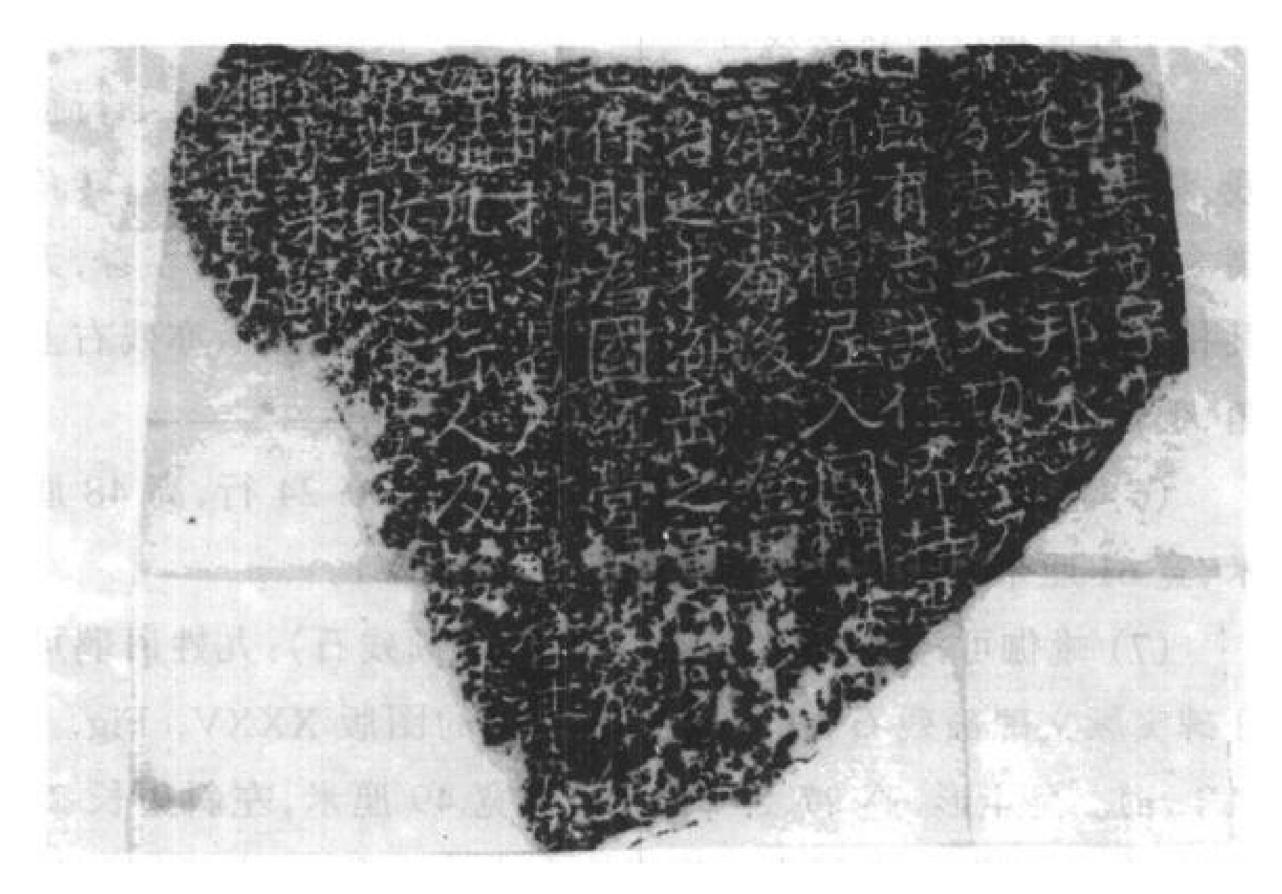


插图 48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九姓回鹘可汗碑拓片

(1) 毗伽可汗碑残石之一:粟特文汉文残石,粟特文在右,直书 23 行;汉文在左,直书 6 行,最多 26 字。宽 100.5 厘米,最高处 112 厘米。其中,“积”字 3.4 厘米见方,“国”字 3.4×3 厘米,“明”字 3.7×3.5 厘米。从形状和内容看,这块残石显然就是拉德洛夫的残石一(Fr. 1)。

(2) 毗伽可汗碑残石之二:粟特文残石,直书 27 行。宽 96 厘米,高 73 厘米,字间行距约 3—3.5 厘米。目前刊布的九姓回鹘可汗碑中似乎未见这块残石。

(3) 毗伽可汗碑残石之三:粟特文残石,直书 14 行。面积约 52×47 厘米。下边无字,似为碑底。

(4) 毗伽可汗碑残石之四:粟特文残石,直书 7 行。宽 24 厘米,残高 53 厘米,行距 3—3.5 厘米。目前刊布的九姓回鹘可汗碑中好像也没有这块残石。

(5) 毗伽可汗碑残石之五:汉文残石,直书 17 行,第 1 行很残,最后一行是碑左边转角部分。高 83 厘米,宽 75 厘米;转角高 81 厘米,宽 5.7 厘米。这块残石右上角断裂。从内容看,无疑相当于拉德洛夫的图版 XXXI 上。拉德洛夫的图版亦残右上角,但是陆和九藏拓中有这个角残石的拓片。

(6) 毗伽可汗碑残石之六:汉文残石,直书 24 行,高 48 厘米,宽 61 厘米。相当于拉德洛夫图版 XXXIV1。

(7) 毗伽可汗碑残石之七(突厥文碑额残石):九姓回鹘可汗碑突厥文碑额残石,相当于拉德洛夫的图版 XXXV. Fig. 1 (Ui. a)。呈圭形,高 27.5 + 17 厘米,宽 49 厘米,左斜边长 29 厘米,右斜边残上 27 厘米。后者应和左边对称,原长 29 厘米。圭首顶部是莲花纹,下为突厥文,横书 5 行,每字约 5 厘米见方。可惜突厥文部分下面(约 3 行)和右边(约 1 行)均残。

(8) 毗伽可汗碑残石之八(突厥文残石之二):突厥文横书 13 行,面积 39×22 厘米,相当于拉德洛夫的 Ui.c 号突厥文残石(图版 XXXV. 5)。

(9) 毗伽可汗碑残石之九(突厥文残石之三):突厥文横书 10 行,面积 35×44 厘米,相当于拉德洛夫的 Ui.e 号突厥文残石(图版 XXXV. 5)。

(10) 毗伽可汗碑残石之十(突厥文残石之四):突厥文横书 5 行,第 4—5 行间空一行,面积 27×24 厘米,相当于拉德洛夫的 Ui.f 号突厥文残石(图版 XXXV. 5)。

三、汉碑校录

本校录以施古德录文为底本，综采罗振玉、羽田亨和程溯洛诸家录文、汉森、吉田丰对粟特文的研究、拉德洛夫的突厥文释文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便于和旧释比较，本文仍采用原来的罗马字行号。()内的字表示笔划不全或字迹不清楚，[ ]内的字表示后补，□□□表示空三字。原文在"皇"字、"天恩"和可汗名前均空一字，在"天可汗"前空两字，本文分别用○或○○表示。碑文多处使用唐代异体字或避讳字。为避免繁琐，除通假字外，一律录为通行汉字。

1. 全碑录文[1]

I. 九姓回鹘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并序
○○[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胡特勤纡伽……建碑]，内宰相颉纡伽思、药罗枝[……斛嗢素颉纡伽]思合伊难主莫贺[达干　　□□□□□药罗枝][2]

II. [纡伽乌图]莫贺达干、颉纡伽哩伽思跎、[药罗枝于伽骨咄禄]、颉纡伽哩伽思[跎]、□□□□□□□□□□□□□□□□□、莫贺达干□□□□迭亿也□□□□□□□□□□

———

[1] 本校录以施古德的录文为底本，校以所见之图录及拓本，并以他人录文参校。简称如下：施：施古德(G. Schegel)(前揭文，126～135页)录文；和：《和林金石录》(李文田、罗振玉，前揭文)录文；羽田：羽田亨(前揭文，303～324页)录文；程：程溯洛(前揭文，21～23页)录文。

[2] 此处所补缺文据相应的粟特文部分补入，详参文中讨论。

□□□□□□□□□□□□□□□□□□□[1]

III. 闻夫乾坤开辟，日月照临，受命之君，光宅天下。德化昭明，四方辐凑，□□□□，八表归(仁)。□□□□□□□□□□□□□□□□□□□□□□□□□□□表裹，山河中建都焉。[先，○骨力悲罗之父○护输]□□□□□[2]

IV. 袭国于北方之隅，建都于嗢昆之野，以明智治国，积有岁年。子○骨[力可汗]嗣位，天性英断，万姓宾[伏]，□□□□□□□□□□□□□□□□□□[可]汗在位，抚育百姓，若孳[鸡卵]。□□□□□□□□□□□□□□[阿][3]

V. 史那革命，数岁之间，复得我旧国。于时，九姓回鹘、卌姓拔悉蜜、三姓[葛禄]、诸异姓佥曰：前代中兴可汗，并见□□□□□□□□□□□□□□□□□至高祖○阙毗伽可汗□□□□□□□□□□□□。[崩后，子○登里][4]

VI. 啰没蜜施颉翳德蜜施毗伽可汗嗣位，英智雄勇，表正万邦。子○爱登里啰汨没蜜施颉咄登蜜施合俱录毗伽可汗继承，英伟奇特异常，宇内诸邦钦伏。自[乱起后○皇]帝蒙尘，史思明[之子朝义]□□□□□[5]

VII. 便币重言甘，乞师并力，欲灭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窃弄神器。亲总骁雄，与王师犄角，合势齐驱，剋复京洛。○皇

---

〔1〕“迭亿也”三字由粟特文残片F4中的汉文补入。

〔2〕辐：程作“幅”，非。仁：施作“信”，羽田从之，程亦从之，此从和录。“四方辐凑”下，施补入“刑罚峭峻”四字，羽田、程从之，然意殊难解，今暂缺。焉：施误作“当”，今据拓本及图录改。

〔3〕伏：施作“服”，羽田从之，程又从之，此据和录。

〔4〕见：诸家并作“得”，此据拓片及图录。

〔5〕奇：施作“杰”，羽田等从之，按拓片及图录所见之残画，当从和录作“奇”。自乱起后，皇帝蒙尘，施作“自 大唐玄宗帝蒙尘”，羽田等从之，非。按第七行之例，此处应作“皇帝”，而不会是“大唐玄宗帝”，所以暂补如此。自，和录作“洎”。

帝[与回鹘约，长]为兄弟之邦，永为[甥舅之国。○可汗]乃顿军东都，因观风俗。□□□□[末摩尼佛][1]

VIII. 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以茹荤屏湩酪]为法，立大功绩，乃[号"默]傒悉德"。于时，都督、刺史、内外宰相、□□□□□□□□[2]

IX. 曰："今悔前非，崇事正教。"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难可受持。"再三恳[恻]："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悟真，不可复事。特望□□。"□□□曰："既有志诚，往即持受。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皆摈斥]，□□□□[3]

X. [持]受明教。"薰血异俗，化为[茹]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故□□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闻受正教。深赞虔[诚]，[□□□大](德)领诸僧尼入国阐扬。自后，○慕阇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登里骨咄禄毗][4]

XI. [伽]可汗袭位，雄才勇略，内外修明。子○登里啰没蜜施俱禄毗伽可汗嗣位，治化国俗，颇有次序。子○汨咄禄毗伽[可汗嗣位，天性]康乐。崩后，○登里啰羽禄没蜜施合汨咄

---

[1] 使：各家均作"使"，疑非是。此句最末施作"败民弗师"，羽田等从之，误。疑为"末摩尼佛师"，详见后文讨论。

[2] 默傒悉德：诸家皆作"汝傒悉德"，误。似作"默傒悉德"，此系摩尼教教徒等级之一，相当于粟特文部分第10行的 βγy m'rm'ny ðynh。此行最末施补入"司马"，羽田等从之，据拓片及图录，似不可能，今暂缺。

[3] "垂怜"、"摩尼师"、"皆"等字，据上下文补入。事：施作"非"，羽田从之，疑有误。据图录及拓片，当从和录及程。受：施作"费"，羽田等从之，疑非是，当从和录。

[4] 持：施作"而"，羽田等从之。"故"下，施补为"圣人之官人"，意殊难通。登里骨咄禄毗伽（伽字在下行）：施作"顿莫贺（贺字在下行）"，疑非是，详见文中讨论。自后：施作"自道"，其下还录有一"令"字，羽田等从之，疑非是。

禄胡禄毗伽可汗继承。○[羽录莫蜜][1]

XII. [施]合毗伽可汗,当龙潜之时,于诸王之中最长。都督、刺史、内外宰相、[司马]官等奏曰:"○○天可汗垂拱宝位,辅弼须得[贤才,□□有]佐治之才,海岳之量,国家体大,法令须明。特望○天恩允臣等所请□□。"[○○天][2]

XIII. [可]汗宰衡之时,与诸相殊异,为降诞之际,祯祥奇特。自幼及长,英雄神武,坐筹帷幄之下,决胜千里之外。温柔惠化,抚[育百姓,因]世作则,为国经营,算莫能纪。初,北方坚昆之国,控弦卌余万。[彼可汗]□□□□□[3]

XIV. 自幼英雄智勇,神武威力,一发便中。坚昆可汗,应弦殂落,牛马谷量、[杖]械山积,国业荡尽,地无居人。复葛禄与吐蕃连[兵,□□□]偏师于匀曷户对敌,智谋弘远。□□□□□□□□□□□□□□□□□□□□□□□□[4]

XV. □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天可汗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率]土黎庶,含气之类,纯善者抚育,悖戾者屏除。遂[奔逐至狐]媚碛。凡诸行人及畜产□□□□□□□□□□□□□□□□□□□□□□[5]

XVI. □□□遗弃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夷[灭],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

〔1〕 羽录莫蜜施(施字在下一行):此据上下文复原。

〔2〕 施:原施补作"前",羽田等从之。辅弼须得贤才,今大相有佐治之才:施复原作"辅弼须得,今合可汗有邦治之才",羽田等从之,文理不通。"今合"之"今",似为"贤"字之误,当从和录。邦:疑为"佐"字之误。

〔3〕 奇特:施复原作"可持",羽田从之,误。当从和录,程同。

〔4〕 葛禄与吐蕃连兵,□□□□:施作"葛禄与吐蕃连人寇,肤跌偏师",疑不确,详参后文讨论。

〔5〕 率:施作"食",疑不确,今从安部健夫(前揭书,149页)。遂奔逐至狐媚碛:施作"遂甘言以妩媚碛",意殊不通。畜产:施作"抚育",误。当从和录。

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尽。□□□□□□□□□

□□□□□□□□□□□□□□□□[1]

XVII. □□□百姓，与狂寇合从，有亏职贡。〇〇天可汗躬总师旅，大败贼兵，奔逐至真珠河。俘掠人民，万万有余，驼马畜乘，不可胜计。余众来归、□□□□□□□□□□□□□

□□□□□□□□□□□□□□

XVIII. [龟兹王]自知罪咎，哀请祈诉。〇〇天可汗矜其至诚、赦其罪戾。遂与其王，令百姓复业。自兹已降，王自〇朝觐，进奉方[物，与左右]厢、沓实力□□□□□□□□□

□□□□□□□□□□□□□□□□□□[2]

XIX. □□□□□军将，供奉官并皆亲觐。至以贼境，长驱横入，自将数骑，发号施令，取其必胜，勍敌毕摧。追奔逐北，直至大[漠]，[杀万人有余]，□□□□□□□□□□□□

□□□□□□□□□□□□□□□□□

XX. □□□□□，攻伐葛禄、吐蕃，搴旗斩馘，追奔逐北，西至拔贺那国，（剋）获人民及其畜产。叶护为不受教令，离其土壤，□□□□□□□□□□□□□□□□□□□□□□

□□□□□□□□□□□□□□[3]

XXI. □□□□□□□（黄）姓毗伽可汗，复与归顺葛禄册真珠智惠叶护为主。又十箭、三姓突骑施、九（姓）□□□□□

□□□□□□□□□□□□□□□□□□□□□□□

---

〔1〕 夷灭：施作“落荒”，据拓片及图录，“落”疑作“夷”。和录在“遗”字上补有“胄”字。后：和录作“复”，疑非是。

〔2〕 “龟兹王”三字据粟特文补入，详参后文讨论。

〔3〕 剋：施作“俘”，羽田等从之，误。当从和录。

□□□□□□□□□□□□□□[1]

XXII. □□□□[天生聪慧，护守]宇内，僧徒宽泰，听士安乐。自开法来，□□[大]石，未曾降伏，□□□[2]

XXIII. □□□□□□□□□□□□□□□□□□世[之王]中外国□□□委附□□里□□[3]

XXIV. □□□□□□□□□□□□□□□□□□□□□[以]武定祸，□□□□神□□□[4]

2. 碑文考释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讨论与碑文相关的全部问题，只能就录文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略作检讨。

(1) 汉碑每行的字数：安部健夫在《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中就明确地对施古德复原的碑文提出质疑。他说："事实上，原碑文一行的字数恐怕不仅仅以七十五为限。"[5] 海开勒在刊布九姓回鹘可汗碑的图版中附有一张全碑复原图，但从我们见到的

---

〔1〕 黄：施作"九"，羽田等从之，非。和录依沈曾植作"黑"。详参后文讨论。十箭、三姓突骑……：施作"一箭三……"，显然有误，详参后文讨论。

〔2〕 "护守"二字及"大石"二字据累特文补入，详参后文讨论。

〔3〕 "世"字据拓片及图录补入。

〔4〕 此行施无。"神"字据拓片及图录补入。

〔5〕 安部健夫，前揭书，139 页。

拓本看,海开勒的复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近年森安孝夫和吉田丰重新考察了这块残碑,他们提供的数据(见上文)使我们对此碑汉文部分又有了新的认识。不过他们对汉文每行到底多少字仍然把握不定,以为有78或80字两种可能性。我们怀疑,汉文大概每行80字。以第10行为例,施古德在这行末尾补入"顿莫"二字,在第11行最上补入"贺"字。根据此碑通例,首次提到一位回鹘可汗时均称徽号,而不直呼其名,并且徽号中均有"毗伽"二字。由此可见,此处不可能直呼"顿莫贺"。应该依例在第11行最上面"可汗"二字前补入一"伽"字,第10行最末补入一"毗"字。且"毗"字之前应是顿莫贺的徽号。"登里"即突厥语tängri(天),常用于可汗尊号。从残片所见回鹘诸汗的徽号来看,除第11行中间的"汨咄禄毗伽可汗"即唐朝册封之奉诚可汗的徽号中无"登里"二字之外,其他可汗均有。奉诚可汗的徽号前无"登里"二字可以这样理解:奉诚可汗在位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一直生活在大相颉于迦思的权力阴影底下。《旧唐书·回纥传》记载:

> 贞元六年六月,回纥使移职伽达于归蕃,赐马价绢三十万匹。以鸿胪卿郭锋兼御史大夫,充册回纥忠贞可汗使。是岁四月,忠贞可汗为其弟所杀而篡立。时回纥大将颉于迦思西击吐蕃未还回,其次相率国人纵杀篡者而立忠贞之子为可汗,年方十六七。及六月,颉于迦思西讨回,将至牙帐,次相等惧其后有废立,不欲汉使知之,留郭锋数月而回。颉于迦思之至也,可汗等出迎郊野陈郭锋所送国信器币,可汗与次将相等皆俯伏自说废立之由,且请命曰:"唯大相生死之。"悉以所陈器币赠颉于迦思以悦之。可汗又拜泣曰:

"儿愚幼无知，今幸得立，唯仰食于阿爹。"可汗以子事之，颉于迦思以卑所逊兴感，乃相持号哭，遂执臣子之礼焉。尽以所陈器币颁赐左右诸从行将士，己无所取。自是其国稍安，乃遣达比特勤梅录将军告忠贞可汗之哀于我，且请册新君。

这里的大将颉于迦思应指回鹘大相颉于迦思，也就是后来继承回鹘汗位的怀信可汗。奉诚可汗徽号中无"登里"二字，这是因为贞元十一年回纥发生宫廷政变，跌跌氏的怀信在这次政变中取药罗葛氏而代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记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四月"回鹘奉诚可汗卒，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姓跌跌氏(胡注：跌跌与回纥同出铁勒而异种)，辩慧有勇力，自天亲时典兵马用事，大臣、诸酋长皆畏服之。既为可汗，冒姓药罗葛氏(原文误为'药葛罗')遣使来告丧。自天亲可汗子孙幼稚者，皆内之阙庭"。

从怀信冒姓药罗葛看，回鹘非常重视王族血统，这是西北许多游牧部落共有的特点。这样一个非常重视王族血统的民族，此时却举异种之跌跌氏为可汗，实在令人感到蹊跷。另一方面，回鹘统兵大相取代可汗不乏其例，如顿莫贺弑杀牟羽可汗，夺得汗位。《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说顿莫贺与牟羽是从父兄，可见顿莫贺亦属药罗葛氏。而且怀信曾将"天亲可汗以上子孙内之阙庭"，恰可证明这次汗位交替是异乎寻常的。《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回鹘怀信可汗卒"条下胡三省注又说："自怀信立，回鹘药罗葛氏绝矣。"《唐会要》卷九八亦曰："至德后，回鹘于中原有功，故怀信不敢言奉诚，从人望也。"由于受到怀信的逼迫，一些药罗葛贵族率部西迁，投奔当时汗国西部的药罗葛氏统治者，并且最终导致一大批部落羊马脱离回

纥汗国的直接统治，迁到归附于回鹘汗国的所谓“归顺葛逻禄”地区，最终到了今天新疆阿图什一带，公元9—10世纪兴起的样磨人(Yaghma)，即源于这支西迁中亚的回鹘部落。[1]

碑中在此处含混地叙述怀信继位的经过，并花费大量笔墨来描写他的功绩，借以掩饰贞元十一年的政变，同时证明回鹘阿跌王朝兴起的合法性。据《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胡三省注，怀信之后的回鹘可汗都是怀信的子孙，属于跌跌氏。所以，奉诚可汗徽号里无“登里”二字是十分可能的，而顿莫贺的徽号之前则不应没有“登里”二字。据两唐书及《册府元龟》，顿莫贺的徽号是“登里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又按碑例，徽号前有一空格以表尊敬，类似于中原的习惯。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公式令第二十一之十四有“昊天、后土、天神、地祇、上帝、天地、庙号、祧、皇祖、皇祖妣(曾高同)、皇考、皇妣、先帝、先后、皇帝、天子、陛下、至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平出”云云，可见碑文第10行下端应复原作“〇登里骨咄禄毗伽(伽字在下一行)”。又，碑文第13行最上“可汗宰衡之时”的“可汗”显然指“天可汗”，所以，第12行最末尾一字是“天”。依例，“天可汗”之前空两格。第12行最下端“允臣等所请”之后应还有一动词，补人两字，恰亦成一行80字。因此，就目前资料而言，我们倾向于认为汉文部分每行80字。

(2) 关于碑文第1和第2行的拼接问题：吉田丰根据残片状况，提出了一个复原方案，可备参考。不过，我们感觉吉田丰的复原图中，Fr. 3 和 Fr. 4 两个残石的位置偏高。粟特文第1行残存“这是登里罗汨密施合毗伽圣天回鹘可汗……之碑……

---

〔1〕 王小甫：《从回鹘西迁到黑汗王朝》，《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14期，新疆社会科学院，1984年，4页。

于此，圣天……”；第 2 行残存“当朝君主，获天神所赐的、伟大的突厥世界之主、爱登里罗汩密施……胡特勤……建碑……”；第 3 行残存“……斛温素颉纡伽思合伊难珠莫贺达干……药罗葛纡伽莫贺达干……药罗葛纡伽骨咄禄……纡伽……纡伽……”[1] 参照相应的汉文残石，我们的录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复原方案，供大家讨论。

(3) 碑文第 14 行、15 行说“复葛禄与吐蕃连兵，亲统偏师于匀曷户对敌，智谋宏远(下缺)。□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天可汗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率]土黎庶，含气之类，纯善者抚育，悖逆者屏除。遂[奔逐至狐]媚碛，凡诸行人及畜产……”施古德补作“复葛禄与吐蕃连人寇，跌跌偏师于匀曷户对敌”，羽田等从之。我们上文已讨论过，怀信的改朝换代事属暧昧，而且他不得不冒姓药罗葛，因此补入“跌跌”二字似乎不妥。

8 世纪末，回鹘与吐蕃对北庭展开了激烈争夺。《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初，北庭、安西既假道于回纥以朝奏，因附庸焉。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必强取之。又有沙陀部落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亦属于回纥，肆行抄夺，尤所厌苦。其先葛禄部落及白服突厥素与回纥通和，亦憾其侵掠，因吐蕃赂见诱，遂附之。于是吐蕃率葛禄、白服之众去冬(789 年)寇北庭，回纥大相颉于迦斯率众援之，频败。吐蕃急攻之，北庭之人既苦回纥，乃举城降焉，沙陀部落亦降。”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记载，吐蕃攻陷北庭，事在贞元六年(790 年)。同年秋，颉于迦斯带兵“将复北庭，又为吐蕃所败。”碑文第 15—17 行讲述的正是这段历史。尽管回鹘、吐蕃在北庭的争夺有多次反复，北庭最终

[1] O. Hansen，前揭文，15 页；Y. Yoshida，前揭文，118 页。

还是被回鹘人夺取，也即碑文所谓"却复城邑"。正如森安孝夫分析的，"在8世纪末回鹘与吐蕃人的北庭之战中，尽管回鹘人在开始时遭到了失败，但最终却取得了胜利。包括吐鲁番盆地在内的整个天山东部地区从此始终处于回鹘人的影响或控制之下，一直到被黠戛斯人从蒙古大量驱逐出来的回鹘涌来为止。"[1] 既然如此，碑文所谓"凡诸行人及畜产……"就是《旧唐书·回纥传》"（贞元）七年八月，回纥遣使献败吐蕃、葛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中提到的"俘畜"。

第15行"遂[奔逐至狐]媚碛"，施古德复原作"遂甘言以妩媚碛"，疑不确。若依王国维之说，

> 遂□□□□媚碛者，碛名上阙数字。宋初王延德使高昌记谓高昌纳职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此大患鬼魅碛即唐初人所谓莫贺延碛。魅与媚音同，是□□□媚碛或即大患鬼魅碛矣。盖吐蕃陷北庭后，此碛实为吐蕃北庭之通道。及回鹘既复北庭，碛北无吐蕃踪迹，此道遂开，故下文云"凡诸行人及于畜产□□□□"，回鹘至此得自由往来天山南北路矣。[2]

近年华涛、陈得芝提出异议，他们正确指出此处应复原作"狐媚碛"，但是他们对狐媚碛今地的比定恐有误。从碑文看，狐媚碛当在北庭和龟兹之间。我们认为，此碛当在新疆托克逊西南96公里的库米什，也即银山碛所在地，而"银山"一词译自突厥语

[1] 森安孝夫：《回鹘、吐蕃789—792年的北庭之争》，《敦煌译丛》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255页。

[2] 王国维，前揭文，995页。

Kümüš(银)。[1]

(4) 碑文第17行上端为“□□□百姓与狂寇合从,有亏职贡”,按王国维解释,这里的百姓“亦西北种族,如三姓、九姓、十姓、卅姓、卌姓之比”。[2] 这个说法恐有误。此处“百姓”和“与”字之间应用逗号断开。“百姓”前的缺字疑为动词,大概是讲某定居城邑之王与游牧民族勾结之事,所以下一行也才有“令百姓复业”的说法。这里的“狂寇”必指游牧部族无疑,否则下文“驮马畜乘”及“余众来归”则无从说起。粟特文部分相应的记述在第19行,虽多有残缺,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四吐火罗(ctβ'r twγr'k)、葛禄(xrl-wγt)、吐蕃(twpwt)三个词,这里的葛禄一词用复数,相当于汉文中的“左右厢、沓实力”。《新唐书·地理志》“浑河州,永徽元年以葛逻禄右厢部落置”。至于 ctβ'r twγr'k,亨宁释为“四吐火罗”,他还指出“四吐火罗”位于北庭(Bisbaliq)与龟兹(Kuca)之间。[3] 在这个区域里拥有“王”的最可能是龟兹王了,《悟空入竺记》就记载了789年左右龟兹王白环在位。而且,从碑文所记地名的位置关系来看,这里的“四吐火罗”不会离龟兹太远。所以,我们将第18行前三字补为“龟兹王”。

(5) 碑文的第19行,“追奔逐北,直至大[漠],”吉田丰建议复原作“直至大食国”,[4] 但从粟特文与汉文的对应位置来看,第20行有'l-pw cw pyl-k ypγw 和 twrkyš 两词,分别对应于汉文第21行的“真珠智惠叶护”和“突骑施”,而粟特文第21行又

---

〔1〕 林梅村:《西域地理札记》,见本书274～275页;唐晓峰、李零主编:《九州》第2辑,1999年;收入本书第三编第六节。

〔2〕 王国维,前揭文,995页。

〔3〕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SOAS*, 9, 1937—1939, pp.545～571.

〔4〕 Y. Yoshida, 前揭文, 119页。

有'rt'wty(教民)和 nγ'wš'kty(听众)两词,这无疑又与汉文第22行的"僧徒"与"听士"二词对译。因而,吉田丰认为粟特文Fr.9.7中的 t'z'yk'n'k 'xš'w'nyh(大石国)所在的粟特文第20行实际上对应汉文的第22行。我们注意到汉文第22行有"□石未曾降伏",所以这里相应补成"大石未曾降伏"。据《新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

> 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

下文羁縻州北庭都护府条又说:"大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炽俟部置。"从碑文记述看,"追奔逐北,直至大口"之"大口"似在此地。所以录文将"大"字后的阙文复原作"大漠"。[1]

碑文第20行提到回鹘追击吐蕃、葛禄直到拔贺那国。按拔贺那即今费尔干纳盆地(Farghana)。根据 al-Gardizi 的说法,在792/793年,曾有葛逻禄叶护侵入到拔汗那。[2]从现有汉文、阿拉伯文记载的有关葛逻禄的材料看,葛逻禄一度在中亚地区有

---

〔1〕 林梅村:《西域地理札记》,唐晓峰、李零主编:《九州》第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收入本书第三编第六节。

〔2〕 V.V.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1977, p.207.

着广泛的分布。我们可以认为，792/793 年侵入拔汗那的葛逻禄在那里维持相当一段时间的统治，直至被赶走。巴托尔德指出，拔汗那直到 10 世纪才被阿拉伯彻底征服。[1] 而根据 10 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说法，当时的拔汗那一直是不信教的（指伊斯兰）。[2] 王国维认为“叶护教令”的“叶护”即拔贺那王，他说“自突厥西徙以后，西域诸国王多称叶护者”。[3] 可以认定，碑文中记载的回鹘对葛禄、吐蕃的追击发生时间最早不会过于 793 年，王国维所说的拔贺那王实即侵入拔贺那的葛逻禄叶护。

(6) 碑文第 21 行“……黄姓毗伽可汗。复与归顺葛禄册真珠智惠叶护为主。又十箭、三姓突骑施、九姓……”。黄，施古德录作“九”，羽田等从之。沈曾植早在跋文中认定这个字是“黑”，[4] 他的看法被《和林金石录》所接受。从拓片和图录上的残画看，这个字既不可能是“九”，也不像“黑”，更可能是“黄”字。考虑到唐朝在贞元二年赐突骑施黄姓纛官铁券，[5] 似乎表明黄姓在当时比黑姓更具实力。《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骑施传：

> 大历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指突骑施黑、黄二姓）衰微，至臣役于葛禄。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

---

〔1〕 V. V. Barthold，前揭书，216 页。

〔2〕 V. V. Barthold, "Farghana," *Islam Encyclopaedio*, vol. 1, Leiden: E. J. Brill, 1928, p. 766.

〔3〕 王国维，前揭文，996 页。

〔4〕 沈曾植：《唐□姓回鹘爱登里啰汨莫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跋》，《文献》1992 年第 2 辑，238 页。

〔5〕 参见《全唐文》卷四六四陆贽《赐安西管内黄姓纛官铁券文》，并见《唐大诏令集》卷六四。

有特庞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岭，众至二十万。

完全有可能回鹘在向西拓境的时候，树立归附的突骑施旧部，借以同吐蕃、葛禄、黠戛斯的联盟抗衡。王小甫曾指出：

回鹘进入西域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新的强权政治局面：吐蕃虽然取得天山以南部分地区——主要是塔里木(图伦碛)南缘地带，但却是依赖与葛逻禄、沙陀、黠戛斯等突厥部族的联盟东抗回鹘、西御大食的；回鹘则一开始就未能成为整个北部草原的霸主，它一直未能征服三姓葛逻禄，而且后来在同黠戛斯争斗二十年以后竟被其扫灭，赶出蒙古高原(840年)。[1]

贞元二年，唐朝赐突骑施黄姓纛官铁券，表明唐朝也认为突骑施是一支可供利用来与吐蕃、葛逻禄联盟进行对抗的力量。[2]所以我们建议将这处阙文补作“黄姓毗伽可汗”。

(7) 吉田丰在汉森的研究基础上对粟特文部分做了进一步的解读。我们认为，他拼合的粟特文19—20行可能相当于汉文第22行。据吉田丰释读，这段铭文意即“由于他的智慧，他保护了国境内外的宗教，并让教徒和听众得到和平”，[3]正好可和汉文第22行的上半段残存相对应。另据图录，“宇”字之上似为“守”字下半部残画。所以我们将这段文字补为“天生聪慧，护守宇内”。

---

〔1〕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14页。

〔2〕王小甫，前揭书，212页。

〔3〕Y. Yoshida，前揭文，119页。

(8) 此碑尚有另一残石，残存5行，《和林金石录》释作“□□□为/天□□□少/□□□□孤/□□山以为/□□进部”。北图藏有这块残石的拓本。由于残缺过甚，一时无法确定其位置，所以本文未予录入。此外，北图拓本碑额部分尚存“爱登”二字，本文亦未录入。

（此文与陈凌、王海城合撰，刊于《欧亚学刊》
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第 四 编

中亚古语与丝绸之路

1

犍陀罗语文书地理考

本世纪初叶以来，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陆续发现近千件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它们为研究公元3世纪西域地理，特别是鄯善国地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前人研究西域地理主要根据希腊罗马作家或汉文古籍的间接记载。犍陀罗语文书的发现则将西域地理研究引入直接研读第一手资料的新阶段。本文旨在归纳总结一个世纪来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对一些目前尚未阐述清楚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

一、鄯善国地理

鄯善原称"楼兰"，本是新疆罗布泊沿岸一个半耕半牧的弱小王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元凤四年（前77年）霍光派傅介子平定楼兰王的反叛，刺杀楼兰王安归，"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此事为居延汉简的有关记载所证实。居延汉简第303.8号曰："诏伊循侯章□卒曰：持楼兰王头，诣敦煌。留卒廿人，女译二人，留守□。"[1] 鄯善的胡语原名未见目前出土

〔1〕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496页。

犍陀罗语文书。据英国藏学家托马斯考证，鄯善得名于新疆若羌县一河流名称，也即唐代吐蕃文书所记地名čerčen。[1] 马可波罗访问过的丝绸之路南道古城 Charchan 亦得名于此河。这个地名今天仍在使用，也就是今天流经且末和若羌两县的河流——车尔臣河。

正如许多研究者业已指出的，楼兰之所以更名鄯善，显然因为楼兰王尉屠耆从罗布泊附近的楼兰城迁都鄯善河流域的鄯善城。公元 1 世纪末，鄯善突然崛起，摆脱北方草原匈奴人和西域霸主莎车之羁縻，统一塔里木盆地东南诸小国。《后汉书·西域传序》曰：

> 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

下文又曰：

> 明帝永平(58—74 年)中，于阗将休莫霸反莎车，自立为于阗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后遂灭莎车，其国转盛。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葱岭以东，唯此二国为大。

鄯善统一塔里木盆地东南诸小国之事亦见《魏略·西戎传》。其文曰：

---

[1] F.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I-III, London, 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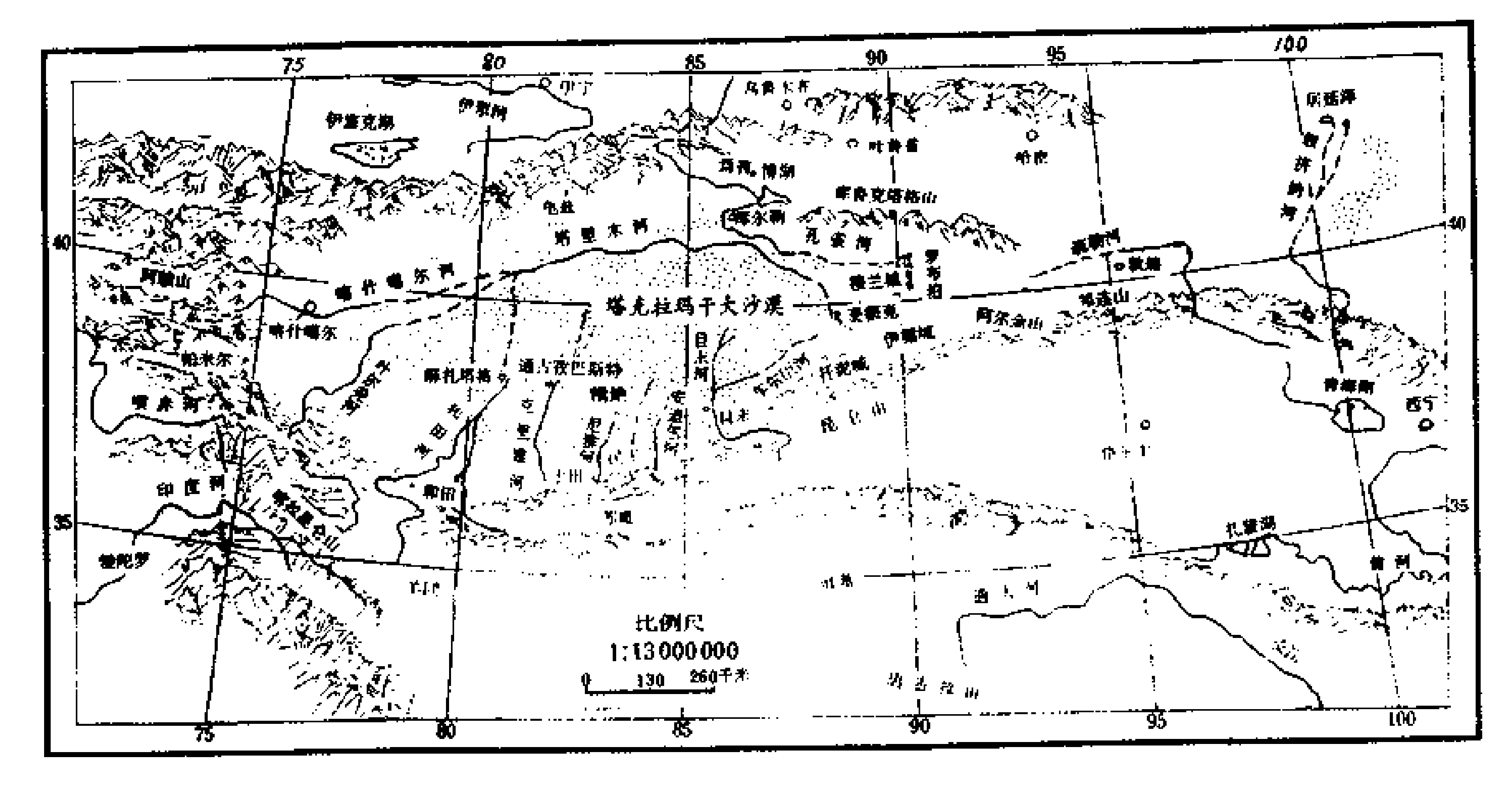


插图49 楼兰及周边地区示意图

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详，今故略说。南道西行，且志(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扞弥国、渠勒国、穴(皮)山国皆并属于阗。

由此可知，于阗和鄯善两国在扞弥和精绝之间分界，东汉末鄯善之疆土已向西拓展至精绝(今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

据犍陀罗语文书，鄯善国采用州(raya)镇(avana)制。犍陀罗语"州"字相当于梵语 rājya(国)。它们显然在鄯善兼并的汉代小国基础上设置的。既然这些小国实际在鄯善统辖之下，我们姑且将这级行政单位译作"州"。犍陀罗语文书将州一级的城称作 nagara(=梵语 nagara"城")。例如：khuvanti raya 或称作 khuhani nagara。后者在汉文史籍中译作"扞泥城"。本文沿用旧例，将州一级的 nagara 译为"城"。犍陀罗语文书提到鄯善有五州。它们是：khuvani raya(扞泥州)、caḍ'ota raya(精绝州)、saca raya(莎阇州)、calmadana raya(且末州)和 krora'iṃna raya(楼兰州)以及昆仑山区的 parvata(山地部落)。分别讨论于下：

1.1 扞泥州

据犍陀罗语文书，鄯善国有扞泥州，写作 khuhani raya。扞泥州府则称 kuhani nagara。正如研究者业已指出的，该城当即《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的"扞泥城"以及《后汉纪》的"驩泥城"。敦煌唐写本《沙州图经》称扞泥城为"鄯善大城"或"大鄯善"，[1] 所以佉卢文书屡次提到的

---

[1] 池田温：《沙州図経略考》，《榎博士还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4 年，92 页。

mahaṃta nagara(大城、京城)必指鄯善国都"扜泥城"无疑。据《法显传》和敦煌唐写本《沙州伊州图经》,鄯善国都在鄯善城。正如日本学者榎一雄指出的,"扜泥"一词就是佉卢文书所言鄯善城邦 kuhani、khvani 或 khuv'anemci。[1]只是他误把该城和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的楼兰古城混为一谈。如前文所论,扜泥城就是《沙州图经》的"鄯善大城",故址在今车尔臣河流域。

关于扜泥城的位置,《沙州伊州图经》记载:"鄯善城,周回一千六百四十步,西去石城镇廿步。汉鄯善城,见今摧坏。"1958年,黄文弼在若羌县城南偏西6公里的戈壁滩上发掘了一座古城遗址(东经88°11′/北纬38°57′),今称"且尔乞都克古城"。此前(1914年)斯坦因曾来此城调查,这位英国考古学家谓之"奥托古什古城",但是没做发掘工作。[2]据黄文弼调查,这座古城平面呈长方形,有两重城墙。内城用土坯建造,周长约220米,墙宽1.6~2米;外城则用卵石垒砌,周长约720米,墙宽1.5米。城内外均有住宅群、佛塔和寺院遗迹,其中还发现了泥塑佛像、壁画以及4世纪左右的笈多体梵文贝叶经。且尔乞都克古城沿用时间显然较长,内外两城墙和城内建筑用不同方法修筑,说明它们分别建于不同时期。土坯建筑属于早期,卵石建筑属于晚期。晚期建筑的基址用石块砌筑,并以卵石为城墙是该古城最为显著的建筑特点。此城也是塔里木盆地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座用石料修筑的古城。[3]所以他推测,且尔乞都克古城就是

---

〔1〕 K. Enoki, "Yü-ni Cheng and the Site of Loulan," *UAJ*, 33, 1961, pp.52~65.

〔2〕 M.A. Stein, *Serindia*, Oxford: the Claredon Press, 1921.

〔3〕 据近年调查,若羌地区还有一些石砌建筑,但规模很小,似属戍堡一类,不能归入城类。参见张平:《若羌县'石头城'勘查记》,《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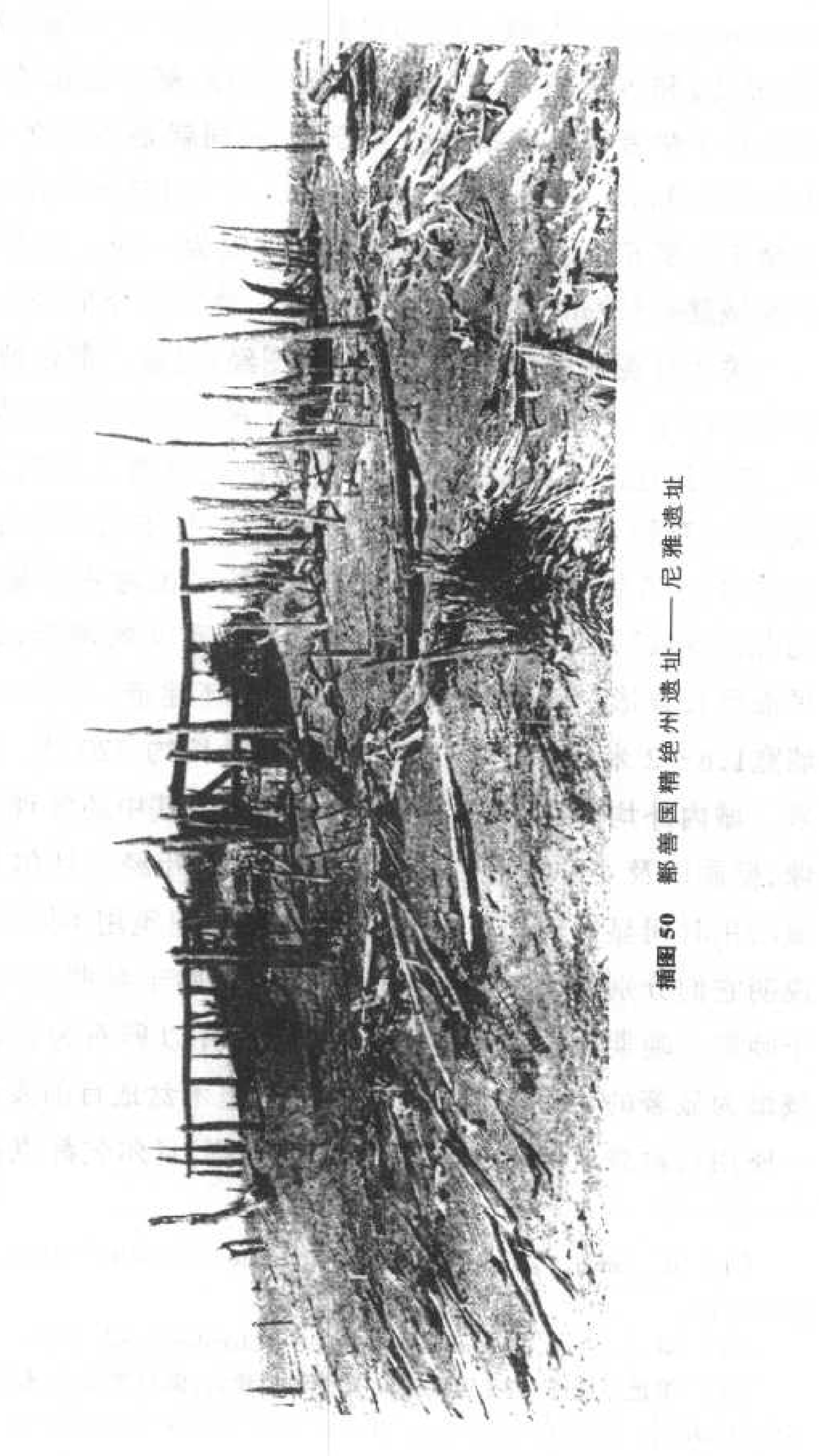


插图50　鄯善国精绝州遗址——尼雅遗址

隋唐年间塔里木盆地著名城市——石城镇。[1] 既然如此，扜泥城当在今若羌县且尔乞都克古城附近。

1.2 精绝州

精绝州位于鄯善西境，本为汉代精绝国所在地（参见插图50）。故址在今新疆民丰县城以北120公里的尼雅遗址。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期间曾在尼雅发现汉朝向精绝王下达的谕令。这个证据有力地证明鄯善的精绝州就是在汉代精绝国基础上设置的。尼雅遗址由佛教寺院、官署、住宅群、种植园、冶铁作坊和墓地等建筑组成。这里建筑物的布局相当分散，星罗棋布，遍布古代尼雅河终点处的沙丘、沙岭间。遗址范围南北长22.5公里，东西最宽处6.4公里。遗址中心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佛塔，标志着佛教在精绝的特殊位置。据全球卫星定位仪（GPS）测定的数据，这座佛塔的地理坐标约在北纬37°58′34.5″，东经82°43′14.5″。[2] 据尼雅出土文物，这个遗址的年代从公元前1世纪直迄公元5世纪。从第214号犍陀罗语的有关记载看，尼雅遗址当即精绝州府所在地，这里曾是鄯善使臣出访扜弥国（今新疆和田克里雅河下游附近）的必经之路。

精绝州下辖诸镇包括ajiyama（阿迟耶摩）、catiṣa deviya'e（哲蒂沙女神）、peta（毗陀）、toṃgraka maharayaṣa（童格罗伽大王）、traṣa（特罗沙）、navaǵa（纳缚）、piǵina（皮吉那）、deviya'e ogu

---

[1] 黄文弼：《新疆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48～49页；又见《若羌考古调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291～293页。

[2] 林梅村：《汉代精绝国与尼雅遗址》，《文物》1996年第12期，53～59页，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Anuǵaya(奥古·安努加耶女神)、vaṃtu(梵图)、yav́e(叶吠)和yiruṃḍhina(夷龙提那)以及尼壤(nina)等,凡十二镇。

精绝十二镇中只有一镇见于汉文古籍,这就是《大唐西域记》卷一二瞿萨旦那国条提到的"尼壤城"。关于尼壤的位置,犍陀罗语第14号文书这样写道:

> 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州长毗摩耶和税监黎贝谕令如下:今有沙弥伽上奏本廷,彼将出使于阗,应由且末派一扈从送其至莎阇,再由莎阇派一扈从送其到尼壤。从尼壤到于阗,应由精绝派一扈从(送其)到于阗。当你收到此楔形泥封木椟时,自尼壤至于阗途中扈从之薪俸应由你按惯例连同额外津贴一起支付,务必依法作出裁决。

联系《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尼壤是从鄯善出访于阗(今新疆和田市近郊约特干遗址)的必经之路。故址疑在今民丰县城以北90公里的卡帕克阿斯坎绿洲,今天仍有300人在这片小绿洲上生活。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时曾在卡帕克阿斯坎绿洲的伊斯兰圣地伊玛目·伽法尔·萨迪克麻扎附近发现两件犍陀罗语文书(第426和427号)。[1]凡此表明,卡帕克阿斯坎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鄯善国统治时期。

1.3 莎阇州

莎阇州与精绝州相邻,两州似在莎阇州的累弥那(remena)

---

[1] M.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p.385.

镇交界。关于累弥那的位置,犍陀罗语文书第214号写道:

> 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诸州长柯利沙和索闍伽谕令如下:现在朕委派奥古侯阿罗耶出使于阗。为办理你们州的事务,朕还委托奥古侯阿罗耶带去一匹马,馈赠于阗大王。务必向这匹马提供从莎阇至精绝之饲料。由莎阇提供面粉10瓦查厘,三叶苜蓿15瓦查厘和紫苜宿2袋,直到累弥那为止。再由精绝提供谷物饲料15瓦查厘,三叶苜蓿10瓦查厘和紫苜宿3袋,直到扜弥为止。[1]

累弥那疑即民丰县安迪尔牧场附近的安迪尔古城。斯坦因曾在这座古城发现佉卢文书和唐贞元年间的汉文题记,故知安迪尔古城的年代约在公元3至8世纪左右。鄯善亡国后,这里被併入于阗国版图。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于阗毗沙都督府下辖十州,其东境为兰城州,又称"兰城镇"或"兰城守捉"。我们以前怀疑兰城之"兰"来自于阗文地名niña(=佉卢文nina"尼壤")。但是兰城之"兰"和犍陀罗语地名remena(累弥那)读音也很相近,所以不能排除后者指兰城镇的可能性。

累弥那似为莎阇州西境城镇,这个州的州府当系莎阇城。《大唐西域记》卷一二记载:"从此(指尼壤)东行,入大流沙……行四百余里,至都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即沮沫地也。"若以里程推算,《大唐西域

---

〔1〕巴罗教授曾详细讨论这件文书,参见T. Burrow, *A Translantion of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0, p.40. 其中有两个以前不识之字讨论于下:satu相当于梵语śaktu(面粉);而phalitaǵa大概相当于婆罗钵语warg(叶子),指三叶苜蓿。

记》所谓“都货逻故国”或指莎阇州的州府莎阇城。故址疑在今安迪尔河与且末河之间若羌县的喀拉米兰河下流。1994 年冬，我们乘直升机从且末至尼雅作低空飞行，考察这一线的古代遗址。虽然这次飞行未在喀拉米兰河流域发现古代遗址，但我们见到这里有适于人类生活的大片绿洲，鄯善国显然在这片绿洲建有城镇。犍陀罗语文书所言莎阇城或在此地。

1.4 且末州

且末很早就出现城市文明，是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公元 5 世纪左右随鄯善灭亡而销声匿迹。唐代玄奘从印度归国途中曾凭吊荒芜多年的且末故城，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一二称之为“折摩驮那城”，本注曰：“沮末”。折摩驮那译自佉卢文 calmadana，也就是汉魏文献所谓“且末”，南北朝文献的“左末”。且末城在敦煌五代于阗语写本钢和泰藏卷中写作 tsabadä。所以敦煌文书所记塔里木盆地重镇“炎摩多”就是且末。[1]

关于且末的地理位置，《汉书·西域传》云：

> 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里，户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胜兵三百二十人。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诸果。西通精绝二千里。

从目前所知塔里木盆地古城分布情况看，精绝当即民丰县北部

---

[1] 炎摩多其名见敦煌写本 P.3016《天兴七年(404 年)章子全状》。其文云：“所以不惧仲云、炎摩多将军持弓，偻罗之人，尽命血战。”

沙漠腹地的尼雅遗址。[1] 西域都护治所约在今轮台县策大雅乡东南。[2] 至于小宛的位置,《汉书·西域传》云:

> 小宛国,王治扜零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户五百五十,口千五十,胜兵二百人。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东与若羌接,辟南不当道。

小宛之南不复有城,那么小宛之扜零城大概就是今天且末县城西南约6公里来利勒克古城。据考古调查,此城年代约在两汉至南北朝时期。[3] 来利勒克古城靠近现代交通线,而汉代东西

---

〔1〕1995年夏,笔者在大英图书馆调查了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期间从新疆发掘的考古资料。这批文物全被扣留在喀什,故斯坦因未发表这次考察的发掘报告。我从这批未发表的资料中意外发现尼雅出土汉简中有一封写给"汉精绝王"的书信。以前学界多认为精绝即在尼雅,这枚记有"精绝"的汉简首次以出土古文字资料证明精绝即在尼雅,说见林梅村:《汉代精绝国与尼雅遗址》,《文物》1996年第12期第53～59页。

〔2〕据考古调查,轮台县策大雅乡西南约3—20公里范围有多座汉代古城,新疆文物普查队调查的五里旁古城(黄文弼称其为"阿克沁城")、阿孜甘古城、乌勒方城、阿克热克城堡等。这些汉代城堡基本上分布于汉代烽燧线上,其地理位置和《汉书·西域传》所说乌垒城位置相近,疑汉代乌垒城即其中某城。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集,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24～25;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张平等:《轮台县文物调查》,《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5～6页;新疆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58～59页;刘建国等:《新疆库尔勒至轮台间古代城址的遥感探查》,《考古》1977年第7期,68页。

〔3〕斯坦因曾到此城作过调查,参见M.A. Stein, *Serindia*, 5 vols, Oxford, 1921, Map No.46。近年新疆文物考古所沙漠考古队确认此城年代当在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参见刘文琐:《且末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21～26页。该文将这个遗址分成耶勒克和玉姆拉克开特买两遗址,但这两个相邻的遗址所出古代遗物的年代和性质具有一致性,所以后来的调查报告又将其归併为一个遗址。参见新疆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36～37页。

交通孔道大多在远离现代绿洲100公里左右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丹丹乌里克及尼雅一线。所以来利勒克古城的位置当在汉代“辟南不当道”之地。《汉书·西域传》记载,且末“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又载小宛比且末至都护治所多300里。故知“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当按日行百里计算。以此推之,汉代且末城或在来利勒克古城以北约150公里左右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汉书·西域传》说,且末西通精绝二千里,而不是西北通或西南通精绝。此亦表明且末城必在远离现代绿洲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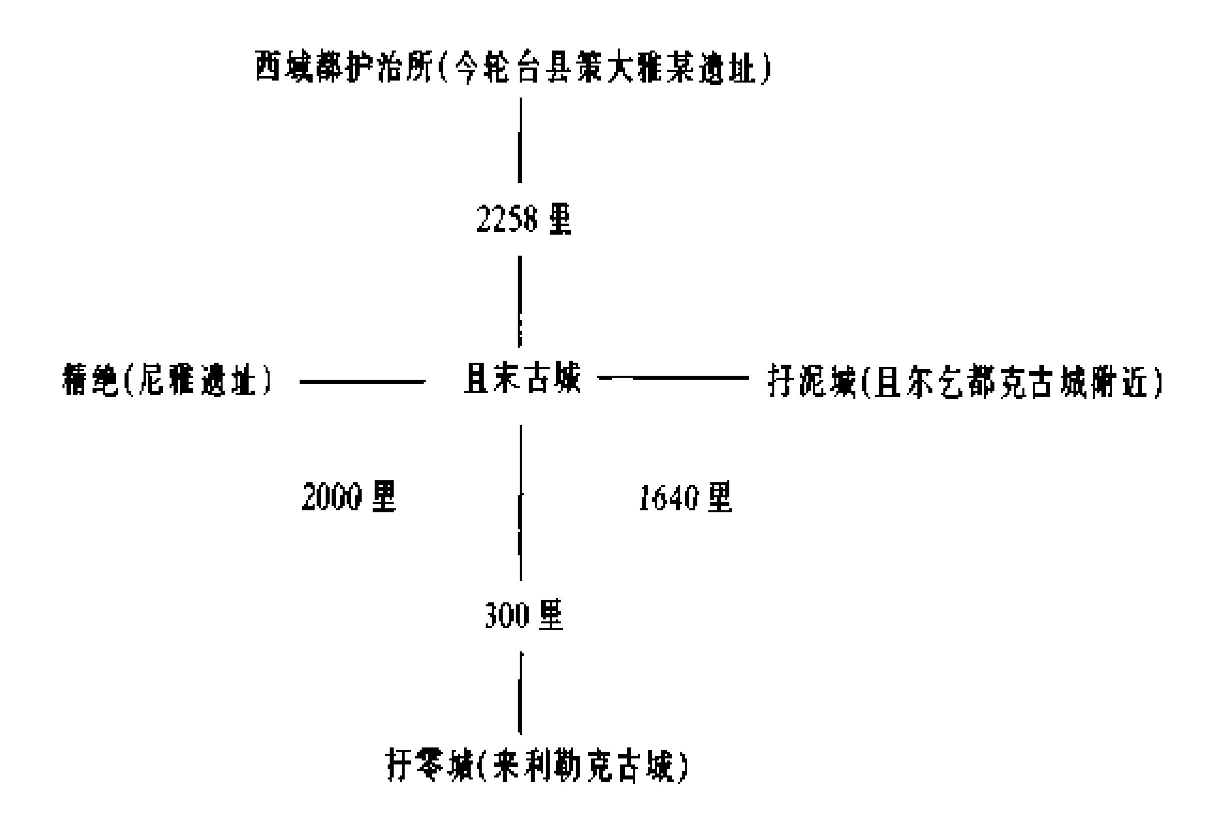
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宋云和慧生等人到西域取经,他们从洛阳出发,经青海吐谷浑部落,来到鄯善。此鄯善当即鄯善都城扜泥城。据前文讨论,扜泥城就在今天若羌县城南偏东9公里的且尔乞都克古城附近,毗邻唐代石城镇。[1]《洛阳伽蓝记》卷五记载,宋云等人离开鄯善城之后的行程是:

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所作。

左末城就是汉代文献所谓且末城。据宋云的记录,且末居民以农业和种植业为生,城中有佛教寺院。其位置当在今若羌县城且尔乞都克古城之西约820公里处。那么汉魏文献所述且末城的相对位置如下图所示:

---

[1]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1978年,马雍先生参加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河西走廊沙漠考察。其间他听到考察队成员谈起前几年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考察发现的一座沙漠古城。这座古城保存完好,并有数以百计的佉卢文木牍暴露地表。当时因不知其重要价值,未予采集,仅检回十多件作为木材标本,后复散失,下落不明,但有两小块残牍送给了甘肃博物馆。[1] 新疆文物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先生对此事作了进一步调查。他最近告诉我,这支沙漠考察队的负责人即中国沙漠专家朱震达。据朱先生介绍,这座沙漠古城位于且末县以北沙漠腹地,他们的考察队对古城的位置作过详细记录,这份资料现存兰州中国沙漠土壤研究所朱震达沙漠考察档案中。[2] 朱震达

---

[1] 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资料综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67～68页。

[2] 1996年5月,王炳华先生来京商量新发现的尼雅佉卢文研究事宜,其间谈起他从朱先生那里得到的这座且末古城的情况。承蒙王先生告知他调查的上述情况,谨致谢忱。

先生在且末以北沙漠腹地发现的那座古城将为我们寻找且末城带来新的希望。

1.5 楼兰州

楼兰州是鄯善王族楼兰人祖先居地。《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廓,临盐泽。”文中提到的楼兰城是一座西汉城池,无疑即公元前 77 年楼兰王迁都鄯善河流域以前之国都。就目前调查而言,罗布泊沿岸的古城遗址中惟有斯坦因编号的 LE 古城年代可追溯到西汉。所以我们怀疑该城就是楼兰王迁都扜泥城以前的国都——楼兰城。[1] 在犍陀罗语文书中楼兰被称为 krora'imna,相当于粟特语 kr'wr'n 和于阗塞语 raurata。据楼兰出土魏晋文书,西域长史的治所设在鄯善国的楼兰州,今楼兰 LA 古城。[2]

1.6 山地部落

犍陀罗语文书屡次提到 parvata 部落。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巴罗所考,该词相当于梵语 parvata,意为“山丘”。这个地方距离精绝州不远,疑在精绝以南昆仑山区。鄯善兼并的汉代小国中有“戎卢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南至戎卢国四日行”。鄯善兼并戎卢后显然要在此地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理,故疑精绝州以南的山地部落即汉代戎卢之遗民。汉代戎卢国似在今新疆民丰县城以南昆仑山区。可惜目前这里缺乏深入调查,鄯善国山地部落究竟在何地,仍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

---

〔1〕 林梅村:《楼兰国始都考》,《文物》1995 年第 6 期,79~85 页;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279~289 页。

〔2〕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除鄯善七州外,汉文古籍和于阗语文献提到的鄯善城镇还有佉台、帕德克、弩支、伊循等。有些当为鄯善州府所在地。由于这些地名迄今未见犍陀罗语文书,我们将另外拟文讨论。需要在此附带说明的是,鄯善国小于州的行政单位是avana。据巴罗研究,该词或来自波斯古语 āvahana(乡村)。[1]犍陀罗语文书有时也用 nagara(城)来表示avana,如 peta avana(第 494 号)或称 peta nagara(第 25 号)。为了和鄯善州一级的城相区别,我们把avana或这个级别的城姑且译作"镇"。鄯善国镇之下的行政单位有 kilme(部落)、grama(村)、śadavida(百户)、daśavita / daj'avita(十户)、predej'a(部)、viṃlsa(管区)和 goṭha(庄园)等。目前尚不十分清楚它们之间的隶属关系,但其规格全在州、城或镇之下,是为鄯善王征收赋税的基层单位。

二、鄯善之邻邦

犍陀罗语文书所见鄯善邻邦凡七国。东方有 cina 或 cinasthana(旧译秦、汉地或震旦),西方有 khema(扜弥)和 khotana(于阗国);北方有 kuci(龟兹)和 arġi(焉耆),南方有 bhoṭi(吐蕃)和 supiya(苏毗)。

2.1 汉　地

佉卢文表示中国内地有 cina 和 cinasthana 两词。前一词在汉译佛经中译作"支那"或"中国",它还借入粟特语,在敦煌出土

[1]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77.

粟特古书信中写作 cyn;后一词 cinasthana 在汉译佛经中译作"震旦"或"汉地"。支那本为古代印度人对中国之称谓,屡见于印度古籍《利论》、《妙闻集》和《摩奴法典》诸书。据说《利论》作者桥胝厘耶是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侍臣,那么"支那"一词早在公元前 3 世纪业已出现。所以伯希和推测该词来自秦国之"秦"。[1] "震旦"一词由 cina-加表示地名的后缀-stana 构成。后者相当于梵语-sthana,意为"地方"。巴基斯坦、阿富汗斯坦和塞斯坦中的"斯坦"均为该后缀之音译。

2.2 扜 弥

扜弥是塔里木盆地诸国最古老的王国之一,其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公元 1 世纪扜弥被于阗兼并,成为于阗六城之一"媲摩城"。媲摩一词音译自于阗语 phiṃmāṃña,也即《马可波罗游记》所谓 peim(培因州)。这个于阗语地名在一份于阗文汉文双语文书(H. 24 号)中和汉文"坎城"对译。后者相当于吐蕃文地名 kaṃ-śen,源于犍陀罗语地名 khema(扜弥),《法显传》译作"捍麼"。斯坦因在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北纬 37°50′及东经 81°3′)以北 7 公里的热瓦克遗址发现两件语言奇特的塞语文书,其中一件提到 phemä kṣīra(媲摩之地)。故疑汉唐扜弥城或在此地附近。[2] 最近中法克里雅联合考察队在克里雅河流域,靠近河流终点处发现一座汉代古城,今称"圆沙古城"。[3] 据

[1] 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汉译文收入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重印本,36～48 页。

[2] 林梅村:《新疆和田出土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考古学报》1993 年第 1 期,89～107 页。

[3] 羊青:《圆沙古城:待解的千古之谜》,《华声》1997 年 11 月号,42～44 页。

《汉书·西域传》,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故疑克里雅河发现的这座汉城有可能就是扜弥城。

2.3 于阗(附瞿萨旦那)

于阗是鄯善西部邻国,丝绸之路南道大国,曾在汉唐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据斯坦因调查,于阗国都在今新疆和田市附近约特干遗址。于阗史诗《赞巴斯塔书》曰:huna ciṃgga supīya kye nä hvatäna-kṣīru bajottändä,意为"匈奴人、秦人和苏毗,他们蹂躏了我们于阗的国土"。故知于阗人自称 hvatäna。这个词相当于犍陀罗语 khotana,所以斯坦因建议和汉文史籍所记"于阗"以及马可波罗访问过的塔里木盆地重镇 Khotan 相联系。[1]玄奘又称于阗为"瞿萨旦那国"。《大唐西域记》卷一二记载:瞿萨旦那国,"唐言地乳,即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汉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于阗上述胡语名称其实各有所本,并无讹误。于阗国别称"瞿萨旦那"也见犍陀罗语文书,写作 kustaṅaga(第 153 号),相当于梵语 gostāna(牛地)或 gostana(牛乳),只是两词均无"地乳"之义。

2.4 龟　兹

龟兹位于鄯善国西北方(今新疆库车市),是丝绸之路北道重要的王国之一。犍陀罗语文书称其为 kuci raja(第 621、629 和 632 号)。其名始见《汉书·西域传》,在中国古籍中有许多古译名。故址在今新疆库车市皮朗古城。据考古调查,龟兹一度

---

[1] M.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p.385.

流行佉卢文犍陀罗语。1906年德国考察队在克孜尔千佛洞发现一件佉卢文婆罗谜文双语文书。其中佉卢文犍陀罗语部分(编号T.II.MQ.224正面)记有koci maharaya devaputra"龟兹大王、天子"云云。故知龟兹人自称koci人[1],道安《释氏西域记》的"屈茨"疑来自该词。公元5世纪左右,龟兹人改用婆罗谜文拼写本族语言,学界称之为"吐火罗语B"。在吐火罗语B文献中"龟兹"一名写作kuśi-。例如:kuśiñe orocepi lāne"伟大的龟兹王"[2],《大唐西域记》的"屈支"疑来自该词。在回鹘文献中"龟兹"被称作küsän,《元史》所谓"曲先"或来自这个突厥语词。中原地区关于龟兹的知识多半来自粟特商贾。粟特语"龟兹"一词写作'kwčyk,[3]《出三藏记集》所谓"拘夷"或许和这个粟特语词有关。

2.5 焉 耆

焉耆位于鄯善之北(今新疆焉耆县),是为丝绸之路北道重要的王国之一。公元7—8世纪,焉耆人曾用婆罗谜文拼写自己本族语言,学界称之为"吐火罗语A"。犍陀罗语文书第209号记有arǵiyo tǵisava'e,意为"焉耆人特吉萨婆"。《大唐西域记》卷一曰:"出高昌故地,自近始者,曰阿耆尼国。旧曰焉耆。"高昌就在今吐鲁番盆地。焉耆在《法显传》中译作"乌夷"。正如亨宁指出的,其名来自吐火罗语arǵi,相当于犍陀罗语arǵiyo、粟特

---

[1] W. Winter, "Tocharians and Turks," *Aspects of Altaic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PIAC held at Indiana University*, June 4-9, 1962 (UAS 23), Bloomington, 1963, pp.239～251.

[2] H.W. Bailey, *Khontanese Texts*, VII, 1985, p.6.

[3] W.B. Henning, "Sogdian List," *Sogdica*, London, 1940, p.10.

语'rkčyk 以及于阗塞语的 argīna。[1]

2.6 吐 蕃

吐蕃位于鄯善国之南，很早就为印度和罗马人所知。公元2世纪希腊作家马林诺斯的《地理学导论》提到中国西部有 Bautai 人。挪威梵学家拉森认为 Bhautai 就是梵语 bhoṭa，当源于藏文 Bod(= Bon)。[2]唐礼言《梵语杂名》释该字为"吐蕃"。吐蕃其名在犍陀罗语书中写作 Bhoti。由此可知，吐蕃与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很早就开始交往。犍陀罗语文书两次提到吐蕃，其一见斯坦因收集品第 69 号文书，写作 bhoti nagara(吐蕃城)；其二见斯坦因收集品第 84 号文书，写作 bhotici manuśa(吐蕃人)。它无疑即古罗马推罗城作家马林《地理学导论》所谓 Bhautai。[3] 这是目前所知有关藏族人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

2.7 苏毗(附女国)

苏毗位于鄯善之南昆仑山区。犍陀罗语和于阗塞语文书多次提到 Supiya 人。[4]这是一个强悍的游牧部落，他们经常从昆仑山南下塔里木盆地，和定居于阗、鄯善的古代居民发生冲突。[5] 该字起初被误释为"鲜卑"。托马斯根据伯希和的研究

---

[1] W.B. Henning, "Argi and Tokharian," *BSOS*, IX, 1938, pp. 564 ~ 571.

[2] M. Lalou, "Tibetan ancient Bod / Bon," *JA*, 1953, pp. 275 ~ 276; G. Lassen, *Indische Altertumskunde*, vol. III, Bonn, 1861, p. 132.

[3] 林梅村：《公元 100 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 4 期；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27 页。

[4] H.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II, Cambridge, 1985, pp. 79 ~ 81.

[5] 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

最先指出，其名当释“苏毗”。[1]苏毗在汉文史籍出现较晚，始见于《隋书·西域传》，文中说：“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金聚，译自梵语 suvarṇa-gotra，后一成分 gotra 有“家族”之意。所以《大唐西域记》卷四译作“金氏”。文中说：“有苏伐剌拏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躁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犍陀罗语文书提到 veǵa kilme 一词。据巴罗考证，后一字来自吐火罗语 A 的 kälyme（区），前一字来自伊朗语，如婆罗钵语 wēwag 及新波斯语 bēwa，意为“寡妇”。因此 veǵa kilme 意为“寡妇村”或“女儿国”。《隋书·西域传》所谓“末羯”疑来自该词。那么 veǵa 或许是苏毗人别称。苏毗鼎盛时领有西藏高原中部和西北部，公元 7 世纪被吐蕃王朗日论赞兼并。

三、西方诸国

犍陀罗语文书所述西方诸国有 arṣaǵa（安息）、yona（耶槃那）、kuṣana（贵霜）、naǵaraǵä（那揭罗曷）、siṃdha（印度）和 suliǵa 或 sokhliǵa（粟特），凡六国。

---

[1]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苏毗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 1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F. W. Thomas, *AO*, XII, 54;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I, 1963, pp. 704～706.

3.1 安　息

公元前 247—公元 224 年，帕提亚人(Parthian)在伊朗呼罗珊建立的帕提亚王国。该国创立者为安息(Aršak)兄弟，所以波斯人将其称为“安息王国”。东汉桓帝和灵帝(147—189 年在位)年间来华传教的西域高僧安世高就是一位安息王子。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乌茨教授考证，安世高之名就来自安息国王族之名 aršak。[1]其说可从。汉文史籍将安息国来华的高僧均冠以安氏，也即波斯语 Aršak 之音译。其中有东汉末来华的安玄、西晋年间来华的安法钦。安息亡国后，不少安息人流亡中国，如入仕北魏的安同和入仕北齐的安吐根等。此外，许多安息人还曾人仕鄯善。据巴罗考证，犍陀罗语arṣaġa或来自波斯语aršak(安息)。因此，犍陀罗语文书提到的 arṣaġa apamana(第 87、147、210 和 531 号)、arṣaġa koḷýisa(第 560 号)以及 arṣaġa u-vasena(第 542 号)当即流寓鄯善之安息人。

3.2 耶槃那

耶槃那为印度、波斯和中亚人对古希腊之称谓。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希腊雄主亚历山大东征中亚，并在当地建造了许多希腊移民城市——亚历山大城。史载东方各地以亚历山大名义命名的城市有 70 多座，目前考古发现的亚历山大城已达 40 多座。据法国考古团 60 年代调查发掘，亚洲最东部的亚历山大城一直建到阿富汗东北边境昆都士城东北的阿伊哈努姆。希腊人在这

[1] David A. Utz, “Aršak, Parthian Buddhists, and Iranian Buddhism,” a paper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uddhism across Boundaies: the Sources of Chinese Buddhism” hold at Hsi Lai University, Hacienda Heights, California, 1993.

个时期大批移居中亚和北印度。大夏首都“蓝氏城”也得名于希腊语“亚历山大”一词。印度人将移居东方的希腊侨民称为 yavana 人,巴利文和阿育王碑铭写作 yona,汉译佛经旧译“耶槃那”。一种意见认为,大宛国之“宛”可能来自印度人对中亚希腊侨民的这个称谓。据考证,其名源于古波斯碑铭的 Iauna,后者来自希腊语 Ioniana。该词指原居小亚细亚西部的古民族——爱奥尼亚人。公元前 10 世纪,爱奥尼亚人从希腊半岛迁入小亚西部,以后又不断向东方移民。于是,爱奥尼亚人成为东方人对希腊人之泛称。[1] 值得注意的是,鄯善国也有希腊移民,例如:第 46 号文书的 yona sag̊itoṃga和第 204 号文书的 yona kuñita。本世纪初,斯坦因曾在新疆米兰佛寺遗址发现希腊籍画师狄图(Tita)所作佛画,他认为这位画师的名字当来自希腊人名 Titus。鄯善国的这些希腊侨民当来自中亚希腊化王国——大夏(今阿富汗)。50 年代末,尼雅东汉墓曾出土绘制有希腊命运女神堤喀(Tyche)像的腊染棉布。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在和田地区洛普县山普拉东汉墓地发掘出一件织有希腊神话半人半马神怪喀戎(Chiron)或涅索斯(Nessos)像的毛织物。看来,希腊文化和宗教艺术不仅对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日常生活有影响,可能还深入到他们的宗教活动。

3.3 贵 霜

贵霜是大月氏人在中亚和印度建立的庞大帝国。它与鄯善的关系目前尚不十分清楚。“贵霜”一词在犍陀罗语文书(第 79 号)中两次出现,写作 kuṣana-,但都是作为私名出现。鄯

---

[1]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87 页。

善出土最早的贵霜遗物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队近年在楼兰古城采集的贵霜王阎膏珍发行的铜币。楼兰尼雅出土魏晋文书多处提到“月支胡”。故知鄯善境内确有贵霜人侨居。更说明问题的是，鄯善国使用贵霜官方文字——佉卢文作为王国的行政语言，鄯善书吏往往世代相袭，所以鄯善王御用书吏大多是贵霜遗民。

3.4 那揭罗曷

那揭罗曷是中亚著名城镇,法显、宋云和玄奘都访问过该城。《法显传》译作“那竭”,《洛阳伽蓝记》卷五作“那迦罗诃”,《大唐西域记》卷二作“那揭罗曷”。据考古发掘,那揭罗曷故址在今阿富汗南部贾拉拉巴德附近的喀布尔河南岸。[1]犍陀罗语第661号文书提到该城,写作 naǵaraǵā。据托马斯研究,其名相当于梵语 nagarahāra(那揭罗曷)。[2]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题记,著名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即在那揭罗曷从梵语翻译成吐火罗语的。

3.5 印　度

犍陀罗语文书两次提到印度。其一见于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在楼兰古墓发现的一件佉卢文帛书。据挪威语言学家柯诺解读,这行佉卢文读作 siṃdhācāriyaṣa paṭa 20 20,意为“印度法师

---

〔1〕关于那揭罗曷,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20~221页。

〔2〕F.W. Thomas, "Some Notes on Central-Asian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BSOAS*, XI, 1946, p.524.

之丝绸 40(匹)。"[1]这件帛书中的siṃdha-即相当于梵语的sindhu(印度)。其二见于犍陀罗语第109号文书罗列的一批礼品清单。据巴罗研究,其中一件称作 sidha-lavaṃna 的礼品相当于梵语 sindhu-lavaṇa,意为"印度盐"。[2]印度在粟特语文献中写作'yntk'w(印特伽),在于阗塞语文献中写作 hiṃduva(信度),在波斯语文献中写作 hindu(信度),[3]均与汉文史籍对印度的古译名"身毒"或"天竺"相去甚远。我们认为,其名之所以读作"天竺",似与犍陀罗语有关。因为犍陀罗语往往/s/和/dh/不分。例如:梵语 madhu 被犍陀罗人读作 masu(葡萄酒)。[4]大概由于这个原因,犍陀罗人把 siṃdhu 读若 dhiṃdu,结果被中国僧人译作"天竺"。

3.6 粟 特

粟特古称"康居",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活跃于丝绸之路南道。《汉书·西域传》中有一封西域都护郭舜致汉成帝(前32—前7年)的上书。文中说:康居(即粟特)"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粟特人在鄯善的行踪进一步为犍陀罗语文书所揭示。

---

[1] S. Konow, "Note o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ilk-Strip No. 34: 65," in 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Stockholm, 1939, pp. 231~234.

[2]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 130.

[3] H.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ol. V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2~24.

[4] 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 110~111.

其中第 660 号犍陀罗语文书第 2 行读作：……［a］huṃno sokhaliga sarthaṣa，意为"……今有粟特商队的"云云。[1]所谓 sokhaliga 相当于粟特语 swγδyk（粟特）；其后一词 sartha-来自粟特语 s'rtp'w（萨宝、商队首领）之 s'rt（商队）。[2]和这件文书同出于安迪尔古城的第 661 号犍陀罗语文书也提到粟特人，只是写作 suliga。后者和吐蕃人对塔里木盆地古民族疏勒人的称谓 šu-lig 读音相近，托马斯起初怀疑suliga可能是对疏勒人的称谓。然而这件文书记录了一位名曰 nani vadhaġä 的 suliga 人。英国语言学家布腊夫最先指出，此人和敦煌出土粟特古书信记录的粟特人 nanai vandak 同名同姓。[3]既然如此，犍陀罗语suliga必指粟特无疑。第 661 号文书是一件按照于阗王在位年代纪年的犍陀罗语文书，该文书混有许多于阗塞语词汇。例如：hinajha 来自塞语的 hinaza-（将军），dhahi 来自塞语的 dai（烙印）。所以犍陀罗语suliga可能也是塞语借词，借自于阗塞语的 sūlī（粟特）。[4]《大唐西域记》对粟特的别称"窣利"疑源于该词。

（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 年第 6 期）

---

〔1〕 A.M. Boyer et al., *Kharoṣṭ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7—1929, p.250.

〔2〕 吉田丰：《ソグド语杂录（II）》，《オリエント》第 31 卷第 2 号，1989 年，168～171 页。

〔3〕 J. Brough, "Comments of Third 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SOAS*, XXVIII, 1965, p.594(Part III).

〔4〕 H.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ol. V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76～78.

2

犍陀罗语文学与中印文化交流

犍陀罗语属于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西北方言(North-Western Prakrit)。这种语言最初流行于古代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始见于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所立佉卢文摩崖法敕。所以英国语言学家哈罗德·贝利爵士(Sir Harold Bailey)建议命名为Gāndhārī(犍陀罗语)。[1]这个建议目前已经为学界普遍接受。

犍陀罗语在丝绸之路上的流行,归功于公元前后在中亚和印度建立贵霜帝国的大月氏人。贵霜帝国以佛教立国,随着帝国的扩张,佛教亦被大月氏人推广到东方各地。他们向征服者输出的不单是物质文化,还有宗教思想。

大月氏对佛教的传播有两大贡献。第一,他们借鉴希腊罗马艺术发明了佛像,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犍陀罗佛教美术";第二,他们将以前口头传播的佛言写成文字,于是贵霜帝国的官方语言——犍陀罗语成了大月氏人编撰佛典的圣语,后来发展成中亚早期佛教最重要的文学语言之一。

1890年,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德兰斯(J. L. Dutreuil de Rhins)在新疆和田征集到一部出自古代于阗佛教圣地牛角山的

---

[1] H. W. Bailey, "Gāndhārī," *BSOAS*, XI, 1946, p. 790.

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拉开了犍陀罗语文学研究的序幕。于阗不产桦树，亦无使用桦树皮作书写材料的习惯。因此，有研究者怀疑，这部桦树皮犍陀罗语写经可能来自中亚。[1]

1900—1930年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 A. Stein)先后四次到中亚考察。斯坦因中亚考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尼雅发掘出公元3世纪左右的犍陀罗语文书。这些文书分别抄写在木牍、丝绸、皮革和麻纸上。内容多系古代鄯善和于阗国商业文书及官方档案，也有少数佛经残卷。[2]那么，犍陀罗语传播范围向东可达塔里木盆地东南的鄯善。

1995年，盗宝人在阿富汗东境一个大夏佛寺内发现13捆犍陀罗语桦树皮写卷，现已流入欧洲，入藏大英图书馆。据美国华盛顿大学梵学教授邵瑞琪(R. Salomon)考证，它们是犍陀罗语三藏，现已鉴定出20多种不同内容的佛经。这些佛经的抄写年代约在贵霜帝国建立之初(公元1—2世纪)，相当于中国的两汉之际。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佛典。[3]大夏佛教考古最近又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1997年战火中的阿富汗再次发现大批古代佛典，不久流入伦敦古物市场，据说已被

---

〔1〕 G. Fussman, "Gāndhārī écrite, gāndhārī parlée," in *Dialectes dans les littératures indo-Aryennes*, ed. by C. Caillat, Paris: College de France, 1986, pp. 433～501.

〔2〕 A.M. Boyer et al.,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0—1929.

〔3〕 参见 J. Darnto, "Fragile Scrolls Cast New Light on Early Buddhism," *New York Times*, July 7, 1996; R. Salomon,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Some Early Buddhist Manuscripts Recently Acquir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JAOS*, 117, 1997, pp. 353～358。本文所引 R. Salomon 之说均据这两篇报道，恕不一一出注。

一位挪威亿万富豪全部购得。据伦敦山姆·弗吉稀有印本和写本书店(Sam Fogg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刊布的目录披露,流入伦敦的大夏古代佛教写本的总数多达6000余件,主要是婆罗谜文和佉卢文写本。柏林大学哈特曼(J-U. Hartmann)教授、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桑德尔(L. Sander)博士和奥斯陆大学冯·辛森(Von Simson)教授正在整理这批文书。[1]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学术界的原始佛教语言、佛教初传中国、犍陀罗艺术起源等问题,必将随着这批写卷的解读和研究而取得重大突破。

一、犍陀罗语文学的兴起

公元前4世纪末,印度军人旃陀笈多在北印度起兵,越过兴都库什山,占领坎大哈、喀布尔和赫拉特,结束了希腊人在中亚的统治。尔后,他又向印度南部扩张,推翻恒河流域的难陀王朝,建立了横跨中亚和印度的大帝国——孔雀王朝。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Aśoka,前268—前232年在位)笃信佛法。为了在帝国全境推行佛教,阿育王派人到印度和中亚各地刻石立碑,颁布法敕。据巴利文史籍和阿育王碑铭记载,阿育王所派佛教使团曾到中亚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雪山(今兴都库什山)、迦毕试(今阿富汗东南伯格腊姆)和耶槃那(今阿富汗西北马扎里沙里夫)立碑,弘扬佛法,甚至远及希腊化王国安条克和托勒密的领地(今叙利亚和埃及)。

19世纪以来,阿育王碑铭不断在印度和中亚各地发现,单

[1] Cf. "Manuscripts from the Himalayas a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Catalogue No. 10 and No. 17 of Sam Fogg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London, 1997.

在中亚地区就发现了九个阿育王碑。值得注意的是，中亚所立阿育王碑铭都是用当地语言文字刻写的。例如：犍陀罗地区用佉卢文犍陀罗语，阿富汗拉格曼河流域和巴基斯坦北部呾叉始罗用阿拉美文印度俗语，阿富汗东南坎大哈使用希腊文希腊语以及阿拉美文和希腊文双语。惟有一件在犍陀罗发现的阿育王碑铭采用孔雀王朝官方文字——婆罗谜文刻写。[1]凡此表明，阿育王时代的佛教尚无统一的经堂用语，犍陀罗语只在印度西北流行。

目前所知最早的犍陀罗语文学是佉卢文刻写的阿育王法敕，其中包括1836和1889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发现的沙赫巴兹迦尔希法敕(Śāhbāzgarhī Rock-Edicts)和曼色赫拉法敕(Mānsehrā Rock-Edicts)两大碑铭。经欧洲语言学家普林谢甫(J. Prinsep)、拉森(Ch. Lassen)、孔宁汉(A. Cunningham)和塞那(É. Senart)等人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全部解读。1925年德国语言学家胡尔兹(E. Hultzsch)发表了他对犍陀罗语阿育王碑的精细校勘和语法分析。[2]今天我们对阿育王时代犍陀罗语文学研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

沙赫巴兹迦尔希法敕得名于白沙瓦附近一个村落的名称。它刻在一块不甚规则的大岩石上，内容包括阿育王颁布的第I—XIV法敕。这块岩石的东面是第I—XI法敕(第VIII法敕刻在岩石顶部左边)，西面是第XIII—XIV法敕，而第XII法敕补刻在这块岩石附近另一块圆石上。

---

〔1〕F. R. Allchin and K. R. Norman, "Guide to the Aśokan Inscriptionus," *SAS*, vol. 1, 1985, pp. 43～50.

〔2〕E. Hultzsch, *Inscriptions of Aśoka*,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5.

曼色赫拉法敕得名于白沙瓦附近另一个村落的名称。内容也是阿育王颁布的第 I—XIV 法敕。和沙赫巴兹迦尔希法敕不同的是，曼色赫拉法敕分别刻在三块圆石上。第 1 块圆石刻有第 I—VIII 法敕；第 2 块圆石的北面刻有第 IX—XI 法敕，南面则是第 XII 法敕；第 3 块圆石刻有第 XIII—XIV 法敕。

为便于了解阿育王时代的犍陀罗语文学，我们将沙赫巴兹迦尔希法敕中的一段文字（大岩石东面 A—H）翻译如下：[1]

> 此系诸神爱戴的国王（指阿育王）颁布的法敕。此地不许宰杀或祭祀任何生灵，也不得举行任何节日庆典，因为诸神爱戴的爱见王见到节日庆典上充满罪孽。当然，有些节日庆典还是得到诸神爱戴的爱见王的赞许。以前在诸神爱戴的爱见王的厨房里，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动物惨遭杀戮。然而，当这道法敕颁布以后，每天只许宰杀三只动物，也即两只孔雀和一头鹿。即便只有一头鹿，亦非每天宰杀；即便只有三只动物，将来也要禁止宰杀。

犍陀罗语文学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和佛教结下不解之缘。随着佛教的传播，犍陀罗语成了丝绸之路上最早的 lingua franca（国际交际语）。佛教赋予犍陀罗语强大的生命力。阿育王碑铭创造的 devanaṃpri'asa（诸神爱戴的）和priyadarśin（爱见的）等文学词汇在 500 年后塔里木盆地古代王国官方文书和私人书信中仍在使用。

---

〔1〕参见 E. Hultzsch，前揭书，51 页。

二、贵霜时代的犍陀罗语文学

早在19世纪中叶，贵霜帝国统治中心地区就曾出土过写在桦树皮上的犍陀罗语佛经，但都是仅存零星字母的残片。[1]贵霜时代犍陀罗语佛教文学的完整标本是上世纪末在新疆和田发现的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该写卷用-ṣa来表示梵语单数属格语尾-sya。[2]这种现象始见于贵霜王胡维色伽时期（迦腻色伽纪元第51年/公元179年）刻写的瓦达克瓶铭，后来在公元3世纪鄯善国犍陀罗语文书中普遍应用。所以，犍陀罗语《法句经》的年代大致在公元2世纪末。[3]

史载贵霜帝国的创立者丘就却（Kusula Kadphises）已经皈依佛门。由于缺乏证据，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1995年大夏遗址新出土的犍陀罗语三藏首次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直接证据（参见插图51）。

这批犍陀罗语三藏是在一个藏经罐内发现的，罐上刻有丘就却时代一位历史人物的题名。所以邵瑞琪教授将年代定在公元1—2世纪。我们注意到，新发现的犍陀罗语三藏不用-ṣa表

---

〔1〕H.H. Wilson, *Arian Antiqua*, London, 1840 (repr. Delhi, 1971), pp. 52～53 and Pl. III-11.

〔2〕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V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从该书所附图版可知，犍陀罗语《法句经》采用-ṣa表示单数属格语尾，可惜Brough未予区别，将其一概转写成-sa。

〔3〕关于迦腻色伽在位的绝对年代，学界尚有争议。我们认为伦敦大学Bivar教授将其断在公元128年较为可信。参见A. D. Bivar, "History of Eastern Iran," in E.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1, Cambridge, 1983, p.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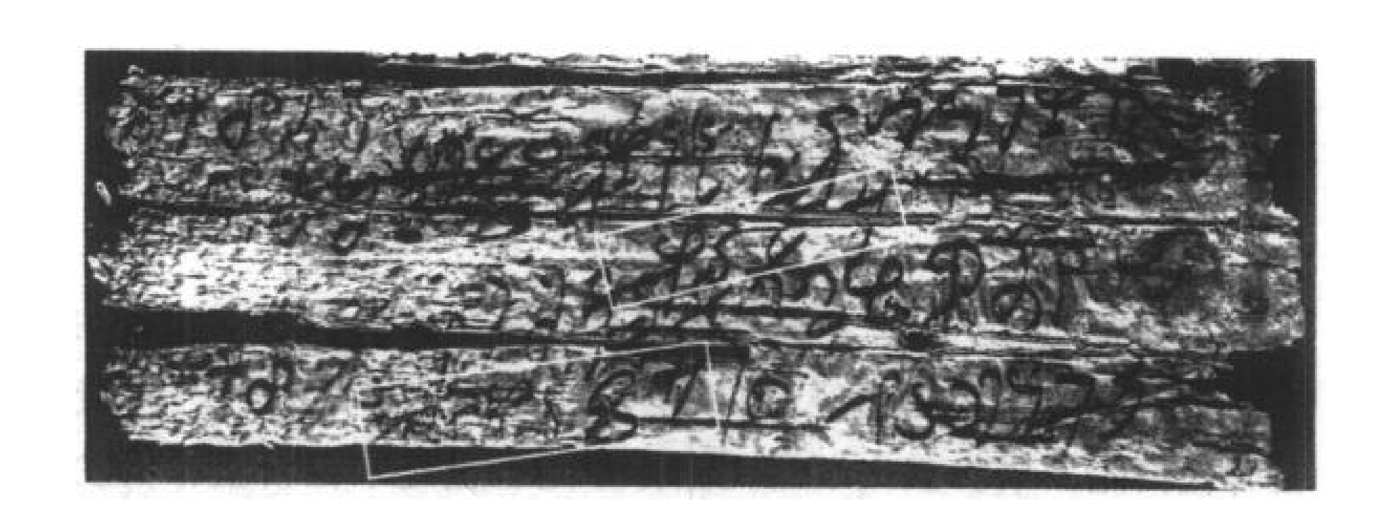


插图 51　世界上最早的佛经残卷(阿富汗出土,约公元 1 世纪)

示单数属格语尾,而且多处用/ṇa/来表示/na/。这些都是早期贵霜碑铭的显著特点。后一现象在新疆和田所出公元 2 世纪犍陀罗语《法句经》中未曾发现。据邵瑞琪介绍,这批大夏三藏中一个残卷的行间插注说,该写卷在"下葬"前曾被重新抄录。换言之,这部佛经是个古本,重新抄录后才埋入藏经罐的。无论如何,新发现的犍陀罗语三藏早于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估计写于公元 1 世纪。

犍陀罗语三藏全都写在桦树皮上,《纽约时报》记者称其为 Fragile Scrolls(极易破碎的写卷)。这种极易破碎的写卷居然能保存两千年,简直是个奇迹。据说,目前已经从中鉴定出 20 余种三藏。它们从仅有几个字母到数百行不等。其中,经藏有《犀角经》(khagga-sūtra)、《集众经》(saṃgīti-sūtra)和各种《譬喻经》(apadāna-sūtra)。《犀角经》以前仅见过巴利文本。新发现的犍陀罗语《集众经》带有一个以前不知道的经注。目前尚不清楚新发现的犍陀罗语三藏中是否有律部文献,但有《阿毗达磨论》(abhidharma-śāstra)等论藏残卷。

一般认为,经藏的最初形式是 dharma(达摩、法),由佛陀遗

教片断集成。佛陀说教的总汇称作 dharma-paryāya(法门)。阿育王法敕记录的七种法门就是研究原始佛典的重要材料。后来佛说又按照内容的不同和编纂形式分类为九分教或十二部经。九分教由契经、应颂、记说、偈颂、自说、如是语、本生、方广和未曾有法组成。九分教加上因缘、譬喻和论议构成所谓"十二部经"。更为完善的经藏形式,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佛经。由于传播路线不同,佛经分南传和北传两大系统。北传佛典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和《杂藏》,分别相当于南传佛典的《长部经典》、《中部经典》、《相应部经典》、《增支部经典》和《小部经典》。[1] 关于佛法的说明和解释亦被纳入经藏。例如:《十上经》(dasuttara-suttanta)和大夏新出土的《集众经》都是最早对佛法进行说明和解释的著作。这些经藏以三界、四念处或五蕴等法数来分类,名曰 mātṛkā(论母)。随着佛教的发展,又形成独立解说经藏的文献,也就是 abhidharma(阿毗达摩)。大夏新发现的犍陀罗语三藏中就有《阿毗达摩论》。

东汉灵帝年间,有数百贵霜大月氏人从中亚流寓塔里木盆地诸国,乃至东汉首都洛阳。[2] 于是犍陀罗语成了中亚与洛阳之间丝绸之路的国际交际用语(lingua franca)。这些贵霜移民的遗物竟然在洛阳汉魏故城发现,也即20年代北京大学马衡教授征集的佉卢文井阑题记(参见插图 52),现在分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3]

---

〔1〕 佐佐木教悟等著、杨曾文等译:《印度佛教史概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年,45～48 页。

〔2〕 参见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一三《支谦传》。

〔3〕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387～404 页。



插图 52 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犍陀罗语碑铭

三、犍陀罗语东渐疏勒、于阗和龟兹

1907 年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在丝绸之路北道巴楚县图木舒克遗址发现一件佉卢文纸本残文书,可惜他当时未能予以辨认。60 年代,韩百诗(L. Hambis)整理伯希和中亚收集品才注意到编号为 P. 413 的文书是佉卢文书。[1]1959 年新疆博物馆前馆长李遇春先生在巴楚县托古孜沙来古城曾发掘出一件犍陀罗语木牍文书。他告诉我,该古城还出土过一件犍陀罗语木牍文书,为当地维吾尔乡民私藏,他仅拍摄了一张照片。从他拍摄的照片看,这件文书确系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

于阗国流行犍陀罗语首先由于阗本地所出土汉佉二体钱披露。这种钱币常见的佉卢文铭文有两种。其一曰:maharajasa

〔1〕 L. Hambis, *Tumchouq* II, Mission Paul Pelliot, Documents archéologiques publiés sous les auspi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Paris, 1964, 112, P[elliot].413.

rajatirajasa mahatasa gugramayasa，意为“伟大的国王、众王之王、太上秋仁之(钱货)”；其二曰：maharayu-thubiraja-gugramadasa，意为“伟大的国王、都尉之王秋仁之(钱货)”。于阗王秋仁的上述称号几乎是从贵霜碑铭逐字抄下来的。据大英博物馆钱币部主任克力勃(J. Cribb)先生研究，斯坦因收集品中还有一位名叫“伊那巴”的于阗王发行的汉佉二体钱。其铭曰：maharajasa thabi-rajasa rajatirajasa inabasa，意为“伟大的国王、都尉之王、众王之王伊那巴之(钱货)”。据我所知，新疆和田博物馆近年又收集到一枚类似的钱币。[1]

斯坦因在新疆安迪尔古城内曾采集到一件按照于阗王尉迟信(Vij'ida Siṃhä)纪年的犍陀罗语文书，编号661号文书。据我们考证，这位于阗王就是《梁书·西北诸戎传》提到的曹魏明帝年间(约220—230年)的于阗王山习。这是现存文献所载最早的以尉迟为姓的于阗王。汉佉二体钱记录的两位于阗王不以尉迟为姓，其年代必在于阗王山习之前，也就是公元2世纪后半叶。[2]

70年代末，海德堡大学教授耶特玛尔(K. Yettmar)领导的中亚考古团在印度河上游丝绸之路古道旁发现了大批古代摩崖石刻。计有汉文、粟特文、中古波斯文、古藏文、婆罗谜文、佉卢文、大夏文和希伯莱文铭刻数百条。他们在巴基斯坦北部边境齐拉斯灵岩发现的一条婆罗谜文佉卢文双语题记相当重要。据

---

〔1〕 J. Cribb, "The Sino-Kharoṣṭhi Coins of Khotan, Part I," *NC*, 144, 1984, pp. 128～152; ibid., Part 2, 145, 1985, pp. 136～148；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313页。

〔2〕 林梅村：《佉卢文书及汉佉二体钱所述于阗大王考》，《文物》1986年第2期，35～42页。

法国梵学家福斯曼(G. Fussman)解读,婆罗谜文部分读作[deva] dharmoyaṃ,佉卢文部分读作 vijiya-priya ribeṃdhatha-vaṃsa-raja。那么整个铭文意为"这是虔诚的供物,Ribeṃdhatha种国王尉迟敬"。福斯曼认为这条双语铭刻的年代不早于公元5世纪。尉迟敬大概是齐拉斯历史上某个国王。[1]众所周知,尉迟氏是塔里木盆地西南于阗国王室姓氏。所以耶特玛尔提出,灵岩题记上的尉迟敬也许是于阗史上某个国王。[2]后一说似乎更为合理。既然如此,这条双语题记则不一定是公元5世纪的产物。因为5世纪以后塔里木盆地已不复流行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流行的晚期(公元3—4世纪)犍陀罗语文书中,"国王"一词通常写作 raya,而在塔里木盆地早期(公元2世纪左右)犍陀罗语文书和公元1—2世纪贵霜碑铭中这个词一律写作 raja。所以印度河上游发现的这条双语碑铭似乎不晚于公元3世纪。

犍陀罗语文学流行于阗的史实进一步为新疆和田出土犍陀罗语佛经证实。最好的例证就是前文介绍的犍陀罗语《法句经》。其实,杜特雷依·德兰斯收集的这部佛经残卷仅是该写本的一少部分。它的主要部分落入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得洛夫斯基(N.F. Petrovskii)手中,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格勒分所。1961年,英国梵学家布腊夫(J. Brough)整理校勘了这部犍陀罗语佛经。[3]据他研究,某些残片不属于《法句

[1] G. Fussman, "Les Inscriptions Kharoṣṭhī de la Plaine de Chilas," in K. Yettmar (ed.),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vol. 1, Mainz: Verlag Philip von Zabern, 1989, p. 24.

[2] K. Yettmar (ed.),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vol. 1, Mainz: Verlag Philip von Zabern, 1989, p. 51.

[3] 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riental Series V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经》,而和巴利文佛典最古老的经文《集经》(Suttanipāta)的诗颂相似。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斯克林在和田策勒县卡达里克佛寺遗址,还发现了一批写在桦树皮上的犍陀罗语佛经残片,现藏大英博物馆人类学部,[1]但是目前尚无人研究。

丝绸之路北道出土犍陀罗语文书屡次被学者们提到,可惜大多数材料尚未发表。据法国印度学家费寥才(J. Filliozat)和保罗(B. Pauly)报道,伯希和收集品中有一些出自新疆库车的犍陀罗语材料。据报道,它们是和公元7世纪的婆罗谜文写卷一起发现的。不过从发表的照片看,其中有些犍陀罗语材料写在桦树皮上,字体和犍陀罗语《法句经》类似,当属于公元2世纪的遗物。1993年访美期间,邵瑞琪教授请我看过几件伯希和在库车收集的佉卢文残文书。其中一片为佉卢文梵语残文书,并提到[maṃ]j[u]śriḥ(文殊师利)一词,当为佛经残片。这个残片的文字和尼雅佉卢文梵语佛经残卷的文字完全相同,大约写于公元3世纪。

本世纪初,德国东方学家勒柯克(A. von Le Coq)在库车还发现过犍陀罗和吐火罗B双语文书。据汉堡大学汉森教授解读,犍陀罗语部分有 koci maharaya(龟兹大王)和 devaputra(天子)等。后者和吐火罗语B的 ñäkteṃts soy(天子)对译。[2]

据以上调查,公元2—4世纪塔里木盆地的疏勒、于阗和龟兹历史上都曾流行犍陀罗语,不仅是三地佛教经堂用语,甚至影

---

[1] C.P. Skrine, *Chinese Central Asia, An Account of Travels in Northern Kashmir and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Methuen, 1926, pp.170~171.

[2] W. Winter, "Tocharians and Turks," in *Aspects of Altaic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PIAC held at Indiana University*, June 4-9, *Ural and Altaic Studies* 2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3, pp.239~251.

响到这三个古代王国的官方行政用语。

四、鄯善流行的犍陀罗语文学

犍陀罗语何时传入鄯善，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1991年，我们曾推论这个时间当在东汉末年，并首次提出斯坦因收集品第549号文书记录的国王童格罗伽（Toṃ graka）是目前所知佉卢文书中最早的鄯善王。[1] 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一年，尼雅考古取得重大新发现。中日联合考察队在尼雅N.XXXVII号遗址发掘出一批佉卢文书。[2] 1996年7月间，新疆文物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先生将新发现的佉卢文书的照片带到北京，委托我们做解读工作。我们很快发现其中91NS9号文书与众不同，语言特征接近公元2世纪中亚贵霜碑铭的语言，于是首先着手解读这件文书。令人振奋的是，它竟然是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3] 这个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发现将拨开长期笼罩在佉卢文时代鄯善国早期历史上的迷雾。如果把目前所见佉卢文中记录的七位鄯善王在位的最大年数相加，长达一百三十一年。据《晋书·张骏传》，第七位鄯善王元孟曾于公元335年向前凉张骏献楼兰女。那么佉卢文时代第一位鄯善王童格罗伽的年

---

[1] 林梅村：《佉卢文时代鄯善王朝的世系研究》，《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2] 新疆文物考古所的王炳华、于志勇和张铁男共同核定，该文书当出自斯坦因编号的N.XXXVII号遗址；文书照片编号为91NS9，谨致谢忱。

[3] 林梅村：《尼雅新发现的鄯善王童格罗伽纪年文书考》，《西域考察与研究续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收入《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78～197页。

代就可追溯到公元210年(汉献帝建安十五年)。所以佉卢文犍陀罗语传入鄯善的时间和龟兹、于阗等塔里木盆地诸国基本同步,必在东汉末年无疑。

丝绸之路开通后,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与日俱增,给鄯善国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而经济的繁荣又推动了鄯善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于是鄯善国成了古典世界各文学艺术流派争奇斗艳的舞台。在尼雅出土的犍陀罗语文书(第514号)中,一位佚名鄯善作家这样写道:

> 大地不曾负我,须弥山和群山亦不曾负我,负我者乃忘恩负义之小人。我渴望追求文学、音乐和天地间一切知识,追求天文、诗歌、舞蹈和绘画。世界有赖于这些知识而存在。

当时丝绸之路流行的文学正是犍陀罗语文学。目前中外学者在鄯善境内古城遗址发现的犍陀罗语文书已经积累了近千个标本,可是绝大多数文书是鄯善国的公私档案。因此鄯善出土为数不多的犍陀罗语文学作品显得弥足珍贵。据考证,第511号文书正面和第647号文书上的两首偈颂出自《譬喻经》(avadānaśataka)。第511号文书背面写的则是佛经律部(vinayapiṭaka)文献。第510号文书是《解脱戒本》(prātimokṣa)残片。第204号文书抄有《法集要颂经》(udānavarga)的偈颂。第512号文书抄有所谓"佛教神秘字母"(arapacana)。第702号文书背面抄有印度医典《医理精华》(siddhasāra)。[1] 其中,《解

[1] 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9年,41页。

脱戒本》属于小乘佛教法藏部经典。《法集要颂经》属于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文献。佛教神秘字母则与大乘教密宗教派相关。[1]

为便于深入了解犍陀罗语佛教文学，我们将《法集要颂经》和《解脱戒本》残卷翻译如下：

> [请听]我这个已获得最高果位的人说：从疲倦的睡眠中醒来之后，令人满心欢喜。我要向听众宣讲佛的语录《法集要颂》。世尊起初是这样说的。
>
> ——犍陀罗语《法集要颂经》

[毗婆尸]："忍是最高的苦行，最好的忍是涅槃。"诸佛说："出家人绝不伤害他人，沙门远离杀界。"

尸弃："就像明眼人脱离危险到达智慧的彼岸一样，智者能避免人世上任何罪恶。"

[毗叶罗]："不诋毁别人，尊敬别人，不嫉妒别人，按照解脱戒守戒如下：饮食要知道节制，住房和座位要选隐蔽之处，专心致志，达到脱凡超俗的心境。这是诸佛的教诲。"

阿罗汉、苦行者和导师拘楼孙："就像蜜蜂采蜜，从花上飞过，不伤害花香花色。所以圣贤路过乡村时，既不挑剔别人，也不管别人做什么不做什么，他只应注意自己的行为正确与否。"

佛陀拘那含牟尼："对于圣贤来说，他不沉迷于超凡脱俗，而是遵循圣人的旨意。所以救世主们总是幸福的，有德

---

[1] Lin Meicun, "Kharoṣṭhī Bibliography: The Collection from China (1897—1993)," *CAJ*, 1996, p.195.

的人能入静，然后进入涅槃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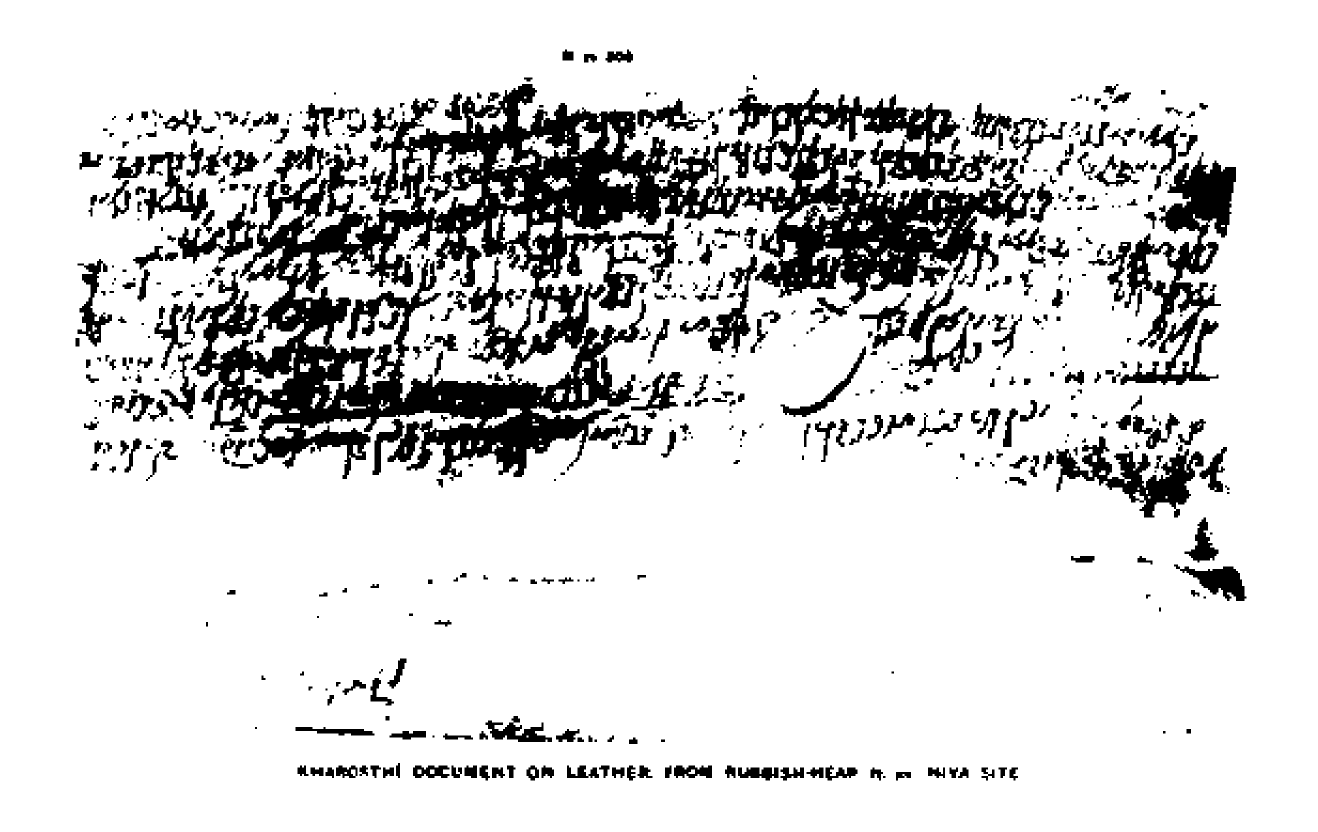
[迦叶]:“别犯任何罪恶，要严格守戒，净化心灵。这是诸佛的教诲。”

[……]、佛陀、耆那、[释迦牟尼]:“……在人世上，他能避免罪恶……”

——犍陀罗语《解脱戒本》

鄯善出土犍陀罗语文书中还有若干佛教文学残片。比如，第647号文书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学描述。文中说:“所闻为导者(船筏)回避。耆婆啊！你的美德无量。让我们用满足之心来听斋戒沐浴之课!”可惜我们尚不知这段文字出自哪部佛经。

鄯善国采用的书写材料充分反映了中印文化交流。桦树皮和皮革文书(参见插图53)纯属印度和中亚文书形式，而丝帛、纸和简牍等则是典型的中国古文书形式。



KHAROSTHI DOCUMENT ON LEATHER FROM RUBBISH-HEAP N. xv NIYA SITE

插图53　新疆尼雅出土皮革文书，约公元3世纪

五、以犍陀罗语为媒介的中印文化交流

众所周知，印度佛教文学曾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譬喻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曹操《短歌行》有诗曰：

>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据考证，这段诗文实际上仿自汉末粟特高僧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八八的偈颂。其文曰：

> 犹如朝露，滴在草上，日出则消，暂有不久，如是人命如朝露。

汉代翻译的佛教譬喻文学首推《法句经》，而尼雅发现的《法集要颂经》残片就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派传承的《法句经》，和田市牛角山佛教遗址出土犍陀罗语《法句经》和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譬喻经》，均为印度譬喻文学的代表作。凡此表明，中印文化的最初接触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犍陀罗语文学这个中介。这个推论从古汉语中早期外来语借词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

研究者注意到，早期汉译佛典的原本不都出自梵文，相当一部分来自中亚胡语，尤其是犍陀罗语。下面一组佛教词汇的梵语、犍陀罗语和汉语译名相当说明问题。[1]

---

〔1〕 梵语的/h/在犍陀罗语中读/y/，所以大夏王名 hermaeus 受犍陀罗语影响才被《汉书·西域传》译作“阴末赴”。

	梵语	犍陀罗语	汉语音译	汉语翻译
1	dharmagupta	dharma'ute	昙无德	法藏
2	vihāra	viyara	毗耶罗	寺院
3	kṣapita	jhāpita	阇维	侵扰
4	śramaṇa	ṣamaṇa	沙门	僧侣
5	hermaeus	—	阴末赴(大夏末代君主之名)	
6	bodhi(sattva)	bosa	菩萨	觉悟者

除佛教文学外,印度世俗文学也通过犍陀罗语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影响。据胡适和陈寅恪等学者考证,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即取材于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1]塔里木盆地诸国出土犍陀罗语文书中未见《罗摩衍那》,而印度两大史诗中的另一部《摩诃婆罗多》却见于尼雅古城出土犍陀罗语文学残片,也即斯坦因收集品第 523 号文书(参见插图 54)。其文曰:

就像行路人感到疲惫而在这里或那里歇息,而后精力逐渐得到恢复。

人之初精力旺盛,而后精力枯槁;人之初受到赞美,而后受到责骂;人之初心中悲伤,而后喜悦;人之初乐善好施;而后向人乞讨。

有人因为悭吝,既不舍弃他们的财产,又不能正当地享用他们的财产,已经失去种种愉快,正刺痛着他们的心。犹如贪婪者不断地将其所有谷物堆放在谷仓而在饥馑发生时

〔1〕 胡适:《西游记考证》,原载《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收入郁龙余:《中印文学关系流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年;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2~19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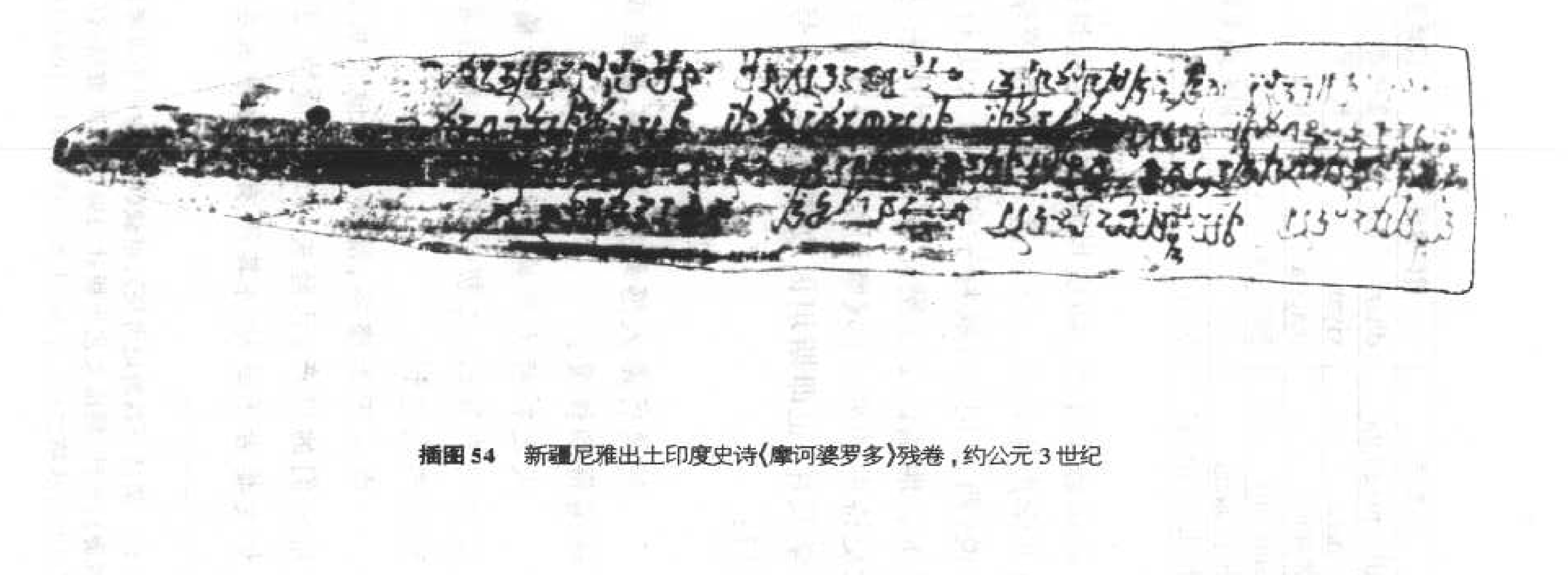


插图 54　新疆尼雅出土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残卷，约公元 3 世纪

全被焚为灰烬一样。

穷人的命运呀！那些不知享受或分配(自己财富)的富人的命运呀！

据英国语言学家巴罗考证，这个文学残片中的第2段出自《摩诃婆罗多》浦那版第36-44颂。

随着佛教的传入，数以万计的佛经从梵语或中亚胡语翻译成汉语，然而很少有汉语文学译成梵语或中亚胡语。惟有老子《道德经》曾有过一个梵文译本。太宗年间，大唐使臣李义表和王玄策首次取道吐蕃出访印度。李义表在印度时曾访问东天竺迦摩缕波国。此国佛法未兴，外道盛行。国王童子听说中国在佛教传入以前盛行道教，于是请求中国使臣将道教经典翻译成梵语。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下诏，令玄奘会同道士蔡晃、成玄英等人组成30多人的译场，将《道德经》逐字逐句译成梵文；同时将《大乘起信论》从汉文还译为梵文。[1] 王玄策第二次出访印度时将这部梵本《道德经》送到童子王手中。迦摩缕波国外道从此染上道教习俗。[2] 这部梵本《道德经》迄今尚未发现，但是斯坦因收集品中有个《日书》的犍陀罗语译本(第565号)。译文如下：

星宿之首谓之鼠日，这天可做任何事，万事如意。星宿日牛日，宜沐浴。吃喝之后，可演奏音乐取乐。星宿日虎

---

[1] 参见《佛祖统记》卷三九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

[2] P. Pelliot, "Autour d'une traduction Sanskrit du Ta-Tö-King (Tao Tê Ching)," *TP*, vol. 13, 1912, pp. 350--43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42页。

日，宜作战。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星宿日蛇日，百事皆凶。星宿日马日，宜向东西方向旅行。星宿日羊日，宜沐浴。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星宿日猴日，万事如意。星宿日狗日，来去从速。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耕作顺利并能增产。

这件文书引起东西方研究者的广泛兴趣。以前一直被视为占星术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先生最近提醒我注意，该文书可能出自先秦两汉流行的《日书》。我根据他提供的材料作了进一步分析，大量类似语句使我们相信，这件文书应是《日书》的犍陀罗语译本。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汉语原本，但类似的句子在近年出土的《日书》中随处可见。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衣篇》（甲种 121 背）有"丁酉，材（裁）衣常（裳）"，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睡虎地秦简《日书·秦除篇》（甲种 24 正贰）有"开日，亡者不得"，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又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稷辰篇》（甲种 44 正）有"彻，是胃（谓）六甲相逆，利以战"，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虎日，宜作战"。[1]

纵观中印文化交流史，不难发现，在学习外来文化方面，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更为积极。正如北京大学王瑶教授分析的：

---

〔1〕 本文所引睡虎地秦简《日书》句例，参见李零《中国方术概观·选择篇》上，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2 年；刘勒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接受过外来的影响，譬如由印度来的佛教文学，就对中国的小说戏曲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发展着的向上的民族。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原是勇于和善于接受一切外来的有用事物的，鲁迅在《看镜有感》一文中所称道的汉唐时代主动地摄取外来文化的事例，就是明证。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国粹主义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他们顽固守旧，敌视一切新鲜事物，从而导致了国力的衰弱和文化的停滞。[1]

（此文是作者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召开的中日联合考察尼雅遗迹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做学术演说稿。日文概要题为《Gāndhārī 语文献と古代中国印度の文化交流》，刊于《日中共同ニヤ遺迹学术研究国际シソポヅゥム发表要旨》，京都：佛教大学ニヤ遺迹学术研究机构，1997年，102～105页）。

---

〔1〕王瑶：《论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收入费振刚、温儒敏主编：《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74页。

3

公元 3 世纪的西域纺织物

本世纪初叶以来，丝绸之路南道鄯善国古城址相继出土了数以百计的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书记录了大批公元 3 世纪左右的西域纺织物。1936 年柏林大学吕德斯教授发表《古代突厥斯坦纺织物》一文，揭开了西域纺织史研究之序幕。[1]我们今天对古代西域纺织物名称能有如此深入的认识，首先归功于吕德斯以及后来英国语言学家托马斯、巴罗、贝利和中国学者季羡林和马雍等人的不懈努力。丝绸之路流行的古代纺织物最直接的记录莫过于犍陀罗语文书，可惜尚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美国伊朗学家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和薛爱华的《撒马尔干的金桃》对西域纺织物作过深入考证，但是他们都没利用犍陀罗语材料。[2]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犍陀罗语文书所记西域纺织物作全面调查，旨在研究公元 3 世纪西域纺织史，并考察中国与古代印度和波斯在纺织方面进行的文化交流。

本文参考的语言学资料主要根据以下几种：梵语根据榊亮

〔1〕 H. Lüders, "Textilien in alten Turkistan," *APAW*, Nr. 13, 1936.

〔2〕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三郎校勘的《翻译名义大集》和荻原云来等人编著《梵和大辞典》;犍陀罗语根据巴罗《中国突厥斯坦所出佉卢文的语言》和《中国突厥斯坦所出佉卢文书译文集》;于阗塞语根据贝利《于阗塞语辞典》;波斯语根据麦坎奇《婆罗钵语精选辞典》和尼伯克《婆罗钵语手册》;粟特语根据基舍维茨《摩尼粟特语语法》。犍陀罗语文书编号根据波耶尔和拉普逊等人校勘的《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书集成》。[1]为避免繁琐,恕不一一出注。

一、西域纺织品原料

东晋隆安三年(399 年),法显自长安西行印度,途中访问了鄯善国。据他报道,鄯善"俗人衣服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汉地指中原地区。中原贵族穿丝绸服装,百姓穿麻布衣而称"布衣"。鄯善贵族和百姓的着装亦当如此。最具地方特色的西域服装是"毡褐"。"毡"字偏旁从毛,必指毛织物;"褐"字亦指毛衣。《诗

〔1〕榊亮三郎:《梵藏汉和四译对校翻译名义大集》,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三,1926 年版;荻原云来等编:《梵和大辞典》,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年版;T. Burrow, *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 (Reviewed by E. Schwentner, *ZDMG*. 16, 1937); T. Burrow, *A Translantion of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0; H. W. Bailey,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D. N. MacKenzie, *A Concise Pahlavī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H. S. Nyberg, *A Manul of Pahlav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4; I. Gershevitch, *A Grammar of Manichean Sogdi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1; A. M. Boyer et al.,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0-1929.

经·豳风·七月》郑笺云:"褐,毛布,撚驼毛织为衣也。"由此可知,公元4世纪鄯善国所在丝绸之路南道流行三种纺织材料:丝绸、麻纤维和羊毛。这三种纺织纤维均见于犍陀罗语文书。此外,犍陀罗语文书还提到棉花、金缕织物等,一并讨论于下。

1. 丝纤维

斯坦因早年曾提出第697号文书的śirka当释"丝绸",建议和拉丁语sericum(丝绸)作语言学比较。经拉普逊等人验证,这个词的正确转写实际是yirka。不过犍陀罗语文书常用/y/来表示伊朗语的/z/,如中亚塞王Azes的名字在贵霜碑铭中写作Ayasa。所以犍陀罗语的yirka仍可读作zirka。不过,据我们研究,这个字大概是伊朗语借词,相当于于阗塞语的śśärka(优良的)。尽管它在于阗史诗《赞巴斯塔书》(Z2:63)中也用来形容丝绸服装,但和罗马人对丝绸的称谓没有词源关系。



插图55 楼兰出土对兽对禽面纹丝绸

犍陀罗语表示"丝绸"的词有prigha(绫)和citra(锦)。正如吕德斯指出的,犍陀罗语"绫"相当于梵语pr̥ṅga,《翻译名义大集》第5866号译作"彩绢"。从读音看,该词似为汉语"绫"字的音译。犍陀罗语"锦"字同梵语citra或吐火罗语citre,本义为

"杂色、彩色"。若为纺织品,则指"织锦"。《翻译名义大集》第5866号译作"彩绢"。在犍陀罗语文书中"锦"字有许多拼法,如citra(703和556号)、cetra(660号)、citraǵa(318号)等。近年在楼兰古墓发现的一件绢衣上,这个词写作ciṭa(=citra)。

犍陀罗语第660号文书的纺织品名单中两次出现palaǵa varna一词,相当于第431号文书的某种纺织品paliya[va]rnaǵa。贝利建议前一字相当于伊朗语palang(杂色,彩色),后一字是某种纺织物名称,但不会是贝利建议的相当于梵语varṇa(彩色)。[1]该词疑来自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和中古波斯语的parnagān或新波斯语的parniyān,意为"彩饰、织花布",在新波斯语中或指锦缎。《魏略·西戎传》记西域纺织物曰:"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2]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胡绫或称"胡锦",大概就是罗马人用中国丝织成的纺织物。犍陀罗语varnaǵa借自伊朗语,它也许是波斯人用中国丝织成的某种纺织品,吐鲁番出土文书有"钵(波)斯锦",似乎就是这种纺织品。所以我们称其为"波斯锦"。

印度人很早就知道丝绸,在梵语文献中写作cina-paṭṭa(中国布、丝绸)。该词始见于印度古籍《政事论》和《摩奴法典》。后者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前者成书年代学界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政事论》是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侍臣侨胝厘耶的著作。月护王约公元前321—前297年在位,相当于我国战国晚期。这个时期丝绸已传至中亚,甚至欧洲。印度与中国是近邻,如果公元前3世纪印度人著作里提到丝绸,不足为

---

[1] H. W. Bailey, "Gāndhārī," *BSOS*, XI, 1946, pp. 764～797.

[2]《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

怪。该词未见犍陀罗语文书，不过其简称 paṭa(布)不仅见于楼兰所出公元 2 世纪犍陀罗语资料，还见于敦煌汉长城出土的一件贵霜婆罗谜文绸布条。

1928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方团员伯格曼在楼兰地区发现一座汉墓。墓中所出汉锦上写有佉卢文。据挪威语言学家柯诺解读，这行佉卢文读作 siṃdhācāriyaṣa paṭa 20 20，意为"印度法师之绸缎 40(匹)。"[1]

本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汉长城烽火台发现许多丝绸残片。其中一片写有贵霜婆罗谜文。其文曰：[ai]-ṣṭhasya paṭa giṣṭi ṣapariśa。[2]第一字[ai]ṣṭhasya 当即犍陀罗语文书常见纺织品名称aǵiṣḍha(或作 akiṣḍha 及aǵiṣṭa)。该词在第 431 号文书中被称作 astarana。后者相当于婆罗钵语 stabraga 和阿拉伯语 istabraq，意为"短丝绸"。那么这行贵霜婆罗谜文意为："短绸布 46 拃"。从词源看，犍陀罗语aǵiṣḍha相当于梵语 akṛṣṭa(野生的)。印度人种植棉花作为纺织纤维，他们对丝绸制造技术不会有太深人的了解，误以为出自某种野生植物纤维。于是"野生布"成了中国丝绸的代名词，这个词在犍陀罗语文书中至少沿用到公元 4 世纪。

讨论丝绸西传不能不提到蚕桑。《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伊吾(今新疆哈密)地宜五谷、桑、麻、蒲萄。"那么至迟东汉西域已开始植桑。丝绸之路南道是养蚕技术西传的一个重要传播中

---

〔1〕 S. Konow, "Note o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ilk-Strip No. 34: 65," in 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Stockholm, 1939, pp.231～234.

〔2〕 M.A. Stein, *Serindia*,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p. 701～704.

心。唐代初年玄奘西天取经途经于阗。他在当地听到一个有关蚕种西传的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唐西域记》卷一二瞿萨旦那国条说：

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女，我国素无丝帛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

自时厥后，桑树连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佑。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

欧阳修把这个故事写入《新唐书·西域传》，只是东国公主改为邻国公主。于阗东边的邻国正是鄯善王国。那么东国公主不是中国内地王朝某位公主而是楼兰公主。[1] 斯坦因在和田北部沙漠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许多唐代木板画，其中就有蚕种西传故事（参见插图56）。斯坦因在鄯善西境尼雅古城附近还发现许

〔1〕 林梅村：《楼兰公主与蚕种西传于阗和罗马》，《文物天地》（北京）1996年第4期，12－15页（香港《文汇报》1996年9月25日第8版转载）。

插图56　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蚕种西传故事木板画

多枯死的古桑树，说明公元3世纪鄯善国已经种植桑树。鄯善人植桑的目的无疑是养蚕。

2. 毛纤维

正如法显所言，利用动物毛发作为纺织纤维是西域纺织物的一大特色，羊毛自然是西域人首选纺织材料。犍陀罗语中对羊毛有两种称谓，其一来自梵语 ūrṇā(羊毛)，但在犍陀罗语文书中写作 urna、arna 或 uṃna。例如：第318号文书有 uṃnama'e（=梵语 ūrṇâmaya），意为"羊毛制的"；第345号文书有 urna-varaṃḍe(羊毛褥)，后一成分可比较于阗塞语动词 ūdāṃde(铺盖)和 vuḍa(被铺盖)；第318号文书有uṃna-thavanaǵa，意为"毛织布"；第83号文书中有个以前不识之字，写作 arna-vaj'i。犍陀罗语/r/和/v/字形相近，故疑该字当读 arna-raj'i，意为"羊毛线"。

楼兰和尼雅遗址出土了不少用西方技法织成的高档毛织物，学界称之为"缂毛织物"。据古纺织专家武敏研究，缂毛就是《后汉书·西南夷传》提到的西域纺织物"罽"，也就是波斯人所谓 gilim(罽织物)。这种纺织物起源于小亚半岛安那托里亚的格里木(Goreme)，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出产罽织物著称，是古代毛织品重要集散地。[1] 波斯人对罽织物的这个称谓亦借人犍陀罗语，写作ǵilẏaṃya或 kilẏaṃya(第151和246号)，作为某种羊的专名。从词源看，犍陀罗语ǵilẏaṃya来自中古波斯语 grāmīg，意为"珍贵的"。东汉年间安那托里亚在古罗马统治之下，中国史籍称之为"大秦"。《后汉书·西域传》记大秦国方物曰："又有细

〔1〕 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8页。

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罗马人掌握丝绸制作技术不会太早。这种名曰“水羊毳”的罗马细布想必不是野蚕茧所织。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地区洛普县山普拉东汉墓地发掘出大批西方技法织成罽织物。其中一件织有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神怪喀戎（Chiron）或涅索斯（Nessos）像。据报道，类似的罽织物在古巴比伦城附近的阿尔塔尔（Al-Tar）遗址亦有发现。[1] 不过从艺术风格和纺织技法看，和田和巴比伦发现的这种罽织物大概都是丝绸之路传来的大秦方物。

除羊毛外，犍陀罗语文书还提到几种兽毛纤维。例如：第534号文书有 pukṣama，相当于梵语 pakṣavat（带羽毛的）；第252和第387文书有 śamuḍa raya，前一字相当于婆罗钵语 samōr（黑貂），后一词即梵语 rajju（线）的犍陀罗语形式。貂毛是极其名贵的兽毛。《新唐书·吐蕃传》记公元9世纪吐蕃给唐廷的贡品中就有貂毛，称之为“獭褐”；第660号文书有 kremeru，相当于梵语 kṛmilika，《翻译名义大集》第9137译作“钱毛红布”。吐鲁番文书中所记绯毛胡锦殆指此物。

3. 大麻纤维

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很早就栽培麻类植物以提取纺织纤维。中国主要栽培苎麻，西亚主要栽培亚麻，而大麻起源于中亚。犍陀罗语文书（第318号）有 ṣaṃna，巴罗建议和梵语śaṇa（大麻）相联系。但是这个字最后一个音节是/n/而不是/ṇ/，所以它很可能来自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及新波斯语的 šan（大麻）。

---

[1] 武敏，前揭文，第8页。

犍陀罗语表示大麻还有一词，写作 kaya(第 534 号)或 kaj'a (第 583 号)。犍陀罗语的/h/有时读作/y/或/j'/(=/z/或/ś/)。例如：梵语 iha(这里)在犍陀罗语中写作iśa；梵语 vihāra(寺院)在犍陀罗语中写作 viyara，也即汉译佛经对寺院的称谓“毗耶罗”。故疑犍陀罗语 kaya 借自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 giyāh (草)和于阗塞语 kaṃha(大麻)。那么犍陀罗语 kaj'a-havaṃne 意为“麻布”，犍陀罗语 kaya-baṃdhana 意为“麻布带”。

从犍陀罗语有关大麻词汇的词源看，西域提取大麻纤维的技术大概本自中亚本地或波斯文化传统。

4. 棉 花

法显在西域逗留时间不长，他的旅行记《法显传》没有提到塔里木盆地是否栽培棉花或使用棉布。不过《梁书·西北诸戎传》提到渴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人“衣吉贝布”。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歌《孤园寺》也提到这种布。其诗曰：“巾之吉贝布，馔以旃檀饵。”在汉译佛经中“吉贝布”或作“劫贝”，译自梵语 karpāsa(木棉)，《翻译名义大集》第 9164 号译作“布衣”。犍陀罗语文书屡次提到这个词，只是写作 kavaj'i(第 431、432 和 581 号)或kavaśi(第 505 号)。拉普逊和巴罗建议该词相当于梵语 kavacikā(铠甲)，疑不确。因为第 431 号文书中它作为namadaǵa (毡)的修饰语。所以这个字当即汉文史籍所谓“吉贝”，本指木棉而言，但在西域多指栽培棉。《玄应音义》曰：“劫波育，或言劫贝者，讹也。正言伽波罗。高昌名叠毛，可以为布。罽宾以南，大者成树；以此形小，状如土葵，有壳，剖出华如柳絮，可纫为布也。”文中所谓“劫波育”似来自犍陀罗语 kavaj'i。那么第 431 号文书的 kavaj'i namadaǵa 4 意为“吉贝布 4 匹”。尽管犍陀罗语

文书屡次提到棉布,但从未提到种植棉花。因此这些棉布可能都是从犍陀罗或印度进口的。

1959年尼雅东汉墓发现两块残破的棉布画。"其中一件的图案内容为正负三角形,残长77,高46厘米;另一件的内容为上端残破处有佛脚、狮尾和蹄形痕迹,下边一条横格中有长龙、飞鸟,左下角有一半身菩萨(或为供养人像),裸体露胸,颈与臂上满佩缨络,头后有背光,双手捧着一个喇叭口形状的长筒容器,内盛葡萄,侧身向右,残幅88×47厘米;其中的菩萨半身像高21厘米"(参见插图57)。塔里木盆地原本不产棉花,棉花起源于印度。所以有人认为这幅画是印度或犍陀罗艺术品,边饰上的女神像也被解释为菩萨像。我们以前盲从其说,后来意识到其说颇有疑问。

印度绘画中的菩萨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的形象,无一例外都是有胡须的男士,菩萨像传到塔里木盆地之后,尤其是传到中原以后,逐渐改为女像。新疆库木吐拉石窟公元4—5世纪



插图57　尼雅东汉墓出土绘有希腊丰收女神的棉布画

壁画上的菩萨像就是带胡须的女性形象。因此尼雅东汉墓出土布画上的女神不一定是菩萨。从图案设计看，这幅画的主题是具有波斯文化因素的狮子图案。所以有学者主张布画上的神像是中亚和西亚崇祀的女神伊什塔尔；另一些学者注意到，这幅画表现了具有典型希腊画风的裸体女性，手中拿着长筒卷状物象征丰收，因而主张这是希腊丰收女神提喀（Tyche）像。无论如何，这两块残棉布画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棉布标本。

5. 金 缕

第318号文书纺织品名单中有一不识之字，写作suvarna-dare。该词前一成分很清楚，相当于梵语suvarṇ（黄金），但是后一成分dare以前不识。这个词疑来自波斯语，相当于婆罗钵语darz（缝纫），那么整个词义为“黄金织成的”。《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犍陀罗语的suvarna-dare大概就是《后汉书》所云“金缕罽”。那么第318号文书的prahuni suvana-dare 4意为“金缕罽衣4件”。采用金缕织布制衣属于西方艺术传统。《摭异记》（《说郛》卷五二引）记外国方物21件，其中有“罽宾国黄金衣”。《旧唐书·高宗纪》下记唐开耀二年“十二月，吐火罗献金衣一领，上不受。”1987年4月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金缕丝袈裟一件，当是唐王室赠物。1990年我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队到西北考察。在法门寺考察时，陕西文物考古所所长韩伟先生带我们到文物库房观摩了这件金缕丝袈裟。据他介绍，这件袈裟是用金箔裹成的丝线织成。那么唐人已改用丝线替代毛线，掌握了纺织金缕罽的技术。

二、西域纺织品种类及相关词汇

犍陀罗语文书提到的纺织品种类繁多，若加上和纺织品相关的词汇，大约有40多个词汇。分述于下：

1. 纺线及纺织工具

犍陀罗语文书对纺线的称谓有两个来源。其一来自印度梵语，如 sutra、rajiye 和 baṃdhana 等；其二来自波斯语，如 rasaṃna 和lastuǵa等。

1.1 sutra(线、绳)：该词同梵语 sūtra(绳或线)，《翻译名义大集》第5877号译作"线"。

1.2 rajiye/ raju/ raya(绳索、毛线、网)：该词或写作 raju(第534号)，所以巴罗建议和梵语 rajju(绳索)相联系。在犍陀罗语文书中它有时指毛线，如 arna-raj'i(第83号)。这个词有时写作 raya(第252和第387号)，前面用śamuḍa一词修饰。该词疑相当于婆罗钵语的 samōr(黑貂)。因此śamuḍa raya 的含义或许是"貂毛线"。

1.3 baṃdhana/ baṃdhitaǵa(带子、绳索、捆)：该字同梵语 bandhana(带子、绳索、捆)。第二种词形采用犍陀罗语后缀 -taǵa。第149号文书的 kaya-baṃdhana 勘同梵语 kāya-bandhana，《翻译名义大集》第5855号译作"系腰、束带"。

1.4 rasaṃna(带子、绳索)：这是个印度伊朗语共有词汇，巴罗建议和梵语raśanā(绳索)及新波斯语 rasan(绳索)相联系。该词其实亦见于婆罗钵语，写作 rasan(绳索)，在犍陀罗语文书中

有时指毛线。

1.5 lastuǵa(线、带子):该词以前不识,疑来自波斯语,相当于婆罗钵语的 rištag(绳、线)。那么第 566 号文书的 citra paṭa ma'e lastuǵa意为"绸布带"。

犍陀罗语纺织工具名称目前尚不十分清楚,第 318 号文书提到一种刺绣,名曰 ly'okmana,前一音节 ly'ok-相当于婆罗钵语 dōk(纺锤)。所以 ly'okmana 大概指某种波斯刺绣。

2. 布匹、地毯、被褥类

据《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有"十种氍毹、五色毾㲪、五色九色首下毾㲪、金缕绣、杂色绫、金塗布、排持(特)布、发陆布、绯持(特)渠布、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宿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罗马商人来华经商的货源不在罗马而在西域。上述大秦纺织物清单中的温宿布产自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温宿,而排持疑为"排特"之误,指中亚古国乌弋山离国(在今阿富汗西部)。所以这份大秦纺织品名单罗列的大都是西域纺织物。其中,氍毹、毾㲪、金缕绣、杂色绫等均见于犍陀罗语文书。

2.1 alena(褥子):在第 549 号文书中该词用来修饰 koj'ava(毛毯),巴罗建议和梵语 ālaya(住所)相联系,可能指褥子。

2.2 areṣa(褥子):该词屡见于犍陀罗语文书(第 225、345 和 672 号)。犍陀罗语的/ṣ/有时代表/j/,而/j/和/k/经常相互替代。故该字疑相当于梵语 eraka,《翻译名义大集》第 9180 号译作"褥子"。

2.3 astaraṃna(短丝绸):该词仅见第 431 号文书,以前不识。我们怀疑它可能相当于婆罗钵语的 sthabraga 和阿拉伯语

istabraq，意为"短丝绸"。

2.4 avale/ avalik'a（被子）：该词见第 575 号文书，以前不识。大概相当于梵语 āvaraka（盖）或 āvaraṇa（被子）。

2.5 goni（布袋）：拉普逊建议该词相当于梵语 goṇī（布袋）。

2.6 kaśpiya（褥子，枕头）：该词仅见第 534 号文书，以前不识。从词形看，这个词大概是梵语kaśipu（褥子，枕头）的犍陀罗语形式。

2.7 koj'ava/ kośava（毛毯）：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西域纺织物，正如马雍所考，先秦文献所记西域古部落"渠搜"之名当来自 kośava。[1] 而《魏略·西戎传》所列西域纺织品名单中的"氍毹"当译自该犍陀罗语词的另一形式 koj'ava。《翻译名义大集》第 5861 号译作"褐子"，并引慧琳《音义》卷六一云："孤坫薄迦，细妙好白布名也。"

2.8 namata'e/ namataǵa（毛毡）：正如巴罗建议的，该词为印度伊朗语共有词汇，相当于粟特语 nmt、于阗塞语 namata 和梵语 namata。后者在《翻译名义大集》第 5862 号译作"毡"。不过这个词有时也指布，如第 431 号文书的 kavaj'i namaǵa意为"吉贝布"，用来表示棉布。

2.9 nutaṃna（铺盖布、毛锦）：该词以前不识。我们认为该词借自伊朗语，相当于粟特语 nβndyẖ、婆罗钵语 nihuftan/ nihumbīdan 和于阗塞语 nvadāvaunä，源于阿维斯塔语 nivanda "铺盖布"。第 660 号文书中该词用 kremeru（牛犊红毛）修饰，疑

---

〔1〕 马雍：《新疆佉卢文书中之Kośava即氍搜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50～55 页。

即吐鲁番文书所言“绯毛锦”。[1]

2.10 paṭa(麻布或丝绸):该词相当于梵语 paṭa 或 paṭṭa,前一形式《翻译名义大集》第 5864 号译作“褐子”;后一形式同书第 9167 号译作“绢”。这两个梵字实际没有区别,本义都是“布”。布料是什么则要根据前面的修饰词来判断。例如:cina-paṭa 意为“中国布、丝绸”,citra-paṭa 亦为“丝绸”,而 ṣaṃna-paṭa 则指麻布。

2.11 paṭaṃca(绢、罗):该词仅见第 660 号文书,相当于梵语 paṭṭāṃśu,《翻译名义大集》译作“绢、罗”。

2.12 paliśa(枕头):该词仅见第 225 号文书,以前不识。疑其借自波斯语,相当于婆罗钵语 bālaš(枕头)。

2.13 suj'inakirta(毛绣):吕德斯建议和新波斯语 sōzankard 相联系,可与亚美尼亚语 sūsanj'ird 作语言比较,意为“毛绣”。

2.14 thavaṃnaǵa/ havaṃnaǵa(布):在某些文书中该词写作 havaṃnaǵa(538 号)。吕德斯怀疑可能是书吏误写,但是尼雅近年出土文书中仍采用这样的写法,想必另有原因。犍陀罗语/ha/与/sa/有时不分,同时又见/sa/与/tha/交替。因此犍陀罗语 taha 相当于梵语的 tathā(如此)。[2] 而 thavaṃnaǵa 写作 havaṃnaǵa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巴罗指出的,该词源于伊朗语,可与于阗塞语 thauna(布,丝绸)及新波斯语 tafnah(毛织物)作语言比较。如上节所论,第 583 号文书的 kaj'a havaṃnaǵa意为“麻布”。

2.15 thavitaǵa/ tavastaǵa(地毯):正如巴罗建议的,这个词

---

〔1〕 关于毛锦的讨论,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209~210 页。

〔2〕 A.M. Boyer et al.,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III, Oxford, 1929, p.348.

系波斯语借词，如琐罗亚斯特婆罗钵语及亚美尼亚语的 tapas-tak(地毯)以及新波斯语 tāftan(地毯)等。《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粟特王"其妻可敦献柘辟大氍毯二、绣氍毯一。"柘辟疑即犍陀罗语thavitaġa。这个词还有更古老的译名，就是《魏略·西戎传》所记西域纺织品名单中的"毾㲪"。《后汉书·西域传》提到的罽宾纺织品有"毾㲪"，汉代罽宾指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所以"毾㲪"一词可能由犍陀罗语借入汉语。这个词和前文讨论的thavaṃnaġa当为同源词，但是它们往往同时出现于同一文书(第 534 和 583 号)。两者含义必然有别。从使用实例看，thavaṃnaġa的确切含义是"布"，而 thavitaġa则专指"地毯"或"挂毯"一类的纺织品。

2.16 vaṃnidaġa(织布)：该词由 vaṃna-加犍陀罗语后缀-daġa构成，词根相当于梵语 vāna，《翻译名义大集》第 381 号译作"织得"，指某种纺织物。vaṃnidaġa中的-idaġa系犍陀罗语后缀。类似的后缀又见baṃdhitaġa(= 梵语 bandha"带子")。

2.17 varna/[va]rnaġa(织花布、波斯锦)：第 660 号文书的纺织品名单中两次出现palaġa varna。故疑第 318 号文书的paliyarnaġa应读 paliya[va]rnaġa。贝利建议 varna 来自梵语 varṇa(彩色)，似有误。其实，这个词来自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和中古波斯语的 parnagān 或新波斯语的 parnayān，意为"彩饰、织花布"，或指丝绸锦缎。既然犍陀罗语varnaġa借自伊朗语，那么它应是波斯人用中国丝织成的某种纺织品，吐鲁番出土文书有"波斯锦"，大概就是指这种纺织物。那么第 318 号文书的 khara varna意思是"黑色波斯锦"。

2.18 varṣaġa(垫子)：该词频频出现于犍陀罗语文书，以前不识。我们怀疑它可能相当于梵语 vṛṣikā，《翻译名义大集》第

8991 号译作"铺陈、厚垫子"。该词系印度伊朗语共有词汇，相当于于阗塞语的 vrrīsa(某种布)，源于阿维斯塔语 barezīš-(垫子)。那么第 311 和 243 号文书的hasta-varṣaga意为"手垫"；第 530 号文书的uṭa-varṣaga意为"骆驼鞍子"而非巴罗建议的"骆驼之年龄"。

2.19 varaṃḍe(被子)：该字以前不识，其实可比较于阗塞语 ūḍāṃde(盖)和 vuḍa(被盖)。所以第 345 号文书的 urna varaṃḍe 大概指毛被。

2.20 vastaraṃna/ vastarna(被褥)：拉普逊建议和梵语 avastraṇa(穿衣)相联系，巴罗则认为可能相当于梵语 upāstaraṇa (被子、枕头)。后一说与犍陀罗文书使用该词的情况相符。这个词是印度伊朗语共有词汇，参见婆罗钵语 wastar(衣褥)和阿维斯塔语 wastra(衣服)。

3. 服装类

南北朝时，鄯善迁都且末。其王安末深盘派使者到梁朝贡献方物。梁元帝萧绎《职贡图》上的且末使者当即鄯善使者。[1] 30 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伯格曼在孔雀河支流小河墓地发现大批楼兰古墓，墓中的楼兰人服装保存极好，居然和《职贡图》上鄯善使者的服饰如出一辙。[2] 凡此皆为我们研究鄯善人的胡服提供了生动的实物标本。犍陀罗语文书提到的鄯善人的服装种类很多，大部分来自印度古语，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古波

---

〔1〕 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文物》1960 年第 7 期，14 页。

〔2〕 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y the Lop Nor Region*. Stokholm: Bokfo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1939 (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

斯语，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于阗塞语。

3.1 artavaśa(半身装、上衣或下衣)：该词仅见第431号文书，以前不识。这个词大概相当于梵语ardha-vāsas，意思是“半身衣服”，指上衣或下衣。

3.2 chataǵa(衣服、覆面)：该词见于第634号文书，正如吕德斯建议的，该词相当于梵语chādaka(衣服)。

3.3 cimira(上衣)：拉普逊建议该词为梵语cīvara(上衣)的俗语形式。在《翻译名义大集》第9190号该词译作“袈裟”，指僧人服装。犍陀罗语文书屡见该词，如第255、544和615号文书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件称为cina-cimira(汉式上衣)，可见它不限于僧人服装。

3.4 coḍ'aǵa(上衣)：该词并见第19、506和722号文书，或作coṭaǵa(第316号)。这个词相当于梵语coḍaka(=colaka)，意为“上衣”，《翻译名义大集》第5845号译作“袍”。

3.5 kaṃculi/ kaṃjuliya(短外衣)：拉普逊建议和梵语kañculikā(短外衣)相联系。

3.6 kaṣara(袈裟)：该词屡见于犍陀罗语文书，如第606号文书。正如巴罗指出的，该词当即吐火罗语A的kāṣār。后者在汉译佛经中和梵语kaṣaya(袈裟)对译。

3.7 kiǵi(衣服)：该词以前不识。疑来自于阗塞语khai(衣服)。那么第318号文书的nila rataǵa kiǵi意为“染成蓝色的衣服”。

3.8 paṃjhavaṃta(上衣)：犍陀罗语/y/和/jh/以及/v/和/m/之间经常相互替代，故该词可读作payamaṃta。因此我们怀疑它可能借自波斯语，相当于婆罗钵语的paymōzan(衣服)。

3.9 pasāṃna/ pasaṃnaṃta(衣服)：该词本指羊毛织物，相当于婆罗钵语pašmen(羊毛的、毛衣)。不过第316号文书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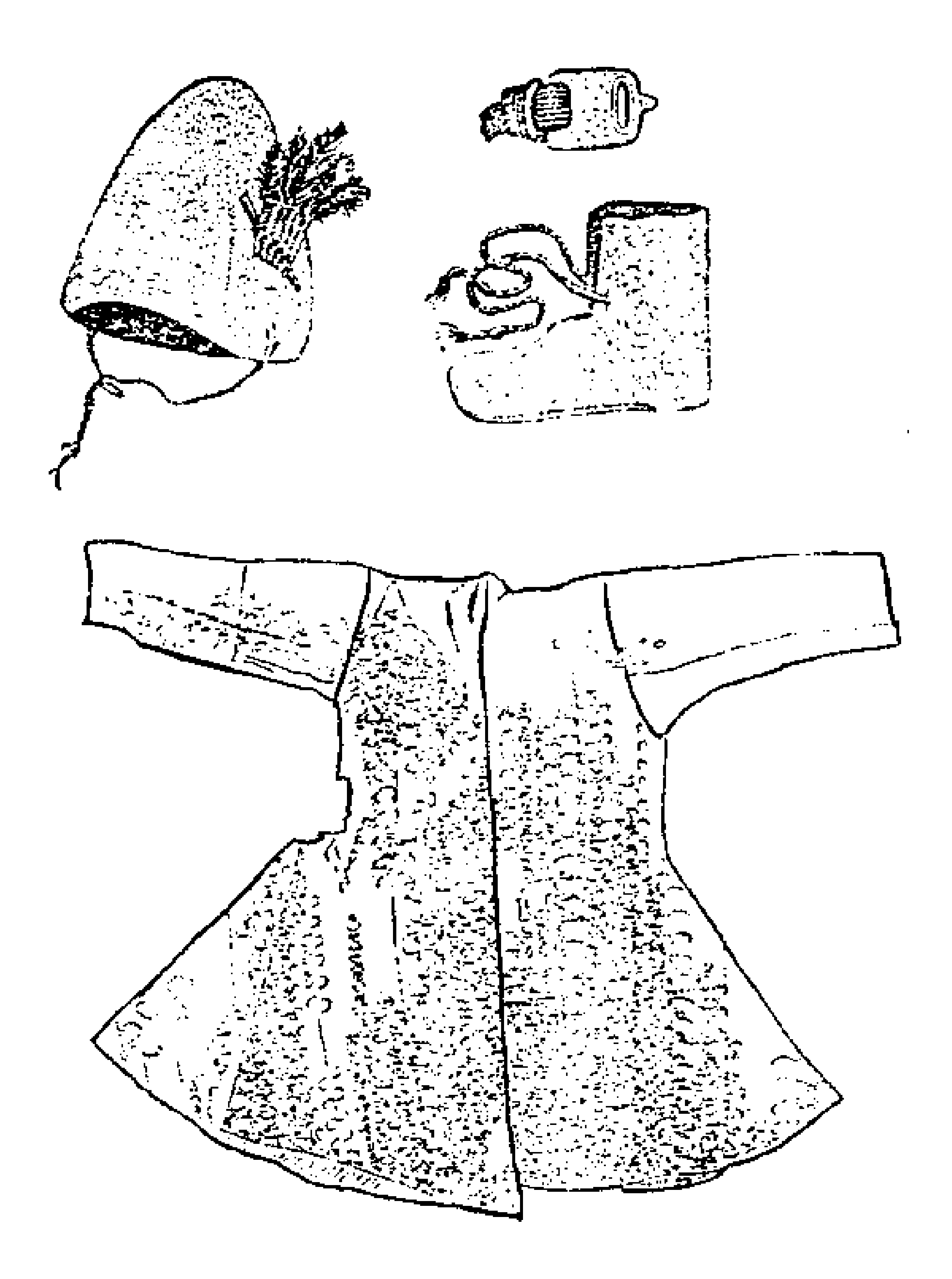


插图 58　孔雀河支流小河墓地出土楼兰人服饰

用绫罗制做的这样一件波斯服装，第 534 号文书提到 4 件用麻布制作的这样的服装(thavaṃna ma'e pasaṃnaṃta)。第 627 号文书还有 pasāṃnakara 一词，意为“制衣匠”。

3.10 prahuni(衣服)：该词在第 318 号文书中多次出现，巴罗和贝利都建议和于阗塞语 prahoṇä(衣服)相联系。

3.11 ṣamiṃna(衣服)：该词以前不识，仅见第 318 号文书。我们怀疑它来自伊朗语，如婆罗钵语的 j'āmag(衣服)或于阗塞语的 yāmabakä(衣服)。

3.12 soṃstaṃni(裤子)：该词见第 149 号文书纺织品名单，贝利认为 soṃstaṃni 系罗马方物，可与古罗马纺织物名称 sosten(裤子)作语言学比较。

3.13 vaṣe(衣服)：该词以前不识，仅见第 534 号文书纺织品名单。该词大概相当于梵语 vāsa 或 vāsaka(衣服)。

3.14 veṭa(头巾)：该词仅见 353 号文书，写作 cina-veṭa，前一成分很清楚，相当于梵语 cina(中国)。拉普逊建议后一字和巴利语 veṭha(头巾)相联系。

4. 西域纺织品颜色及染料

据《魏略·西戎传》记载，西域纺织品的颜色丰富多彩，计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讨论如下：

4.1 黄色：犍陀罗语文书有 paṃdura(黄色)，如第 660 号文书的 paṭa paṃdura，意为“浅黄色布”。

4.2 白色：犍陀罗语有śpeti/śpetaǵa(白色)，相当于梵语 sveta/śveta(白色)。因此第 83 号文书的 arnaraj'iśpeti意为“白毛线”；第 431 号文书的śpetaǵa koj'ava 意为“白毛毯”。

4.3 黑色：犍陀罗语文书有黑色，写作 kriṣa(第 74 号)，相当

于梵语 kṛṣna(黑色)。该词在句中形容骆驼颜色,未见用来表示纺织品颜色。犍陀罗语表示纺织物的黑色用 khara,如第 318 号文书的 khara varna(黑色锦缎)。该词前一字相当于新波斯语 xīrah(黑色)和于阗塞语 khara(黑色)。突厥语 kara(黑色)也和这个词有关。

4.4 绿色:目前所出犍陀罗语文书未见绿色。

4.5 紫红:犍陀罗语文书有 sānapru(朱砂色),和紫红颜色最接近。该词见第 660 号文书,用来形容丝绸颜色。贝利建议和古波斯语 sinkabruš(朱砂色)相联系。

4.6 绛:绛色指深红色或绯红色。犍陀罗语有 kremeru(深红色),见第 318 和第 660 号文书。在后一文书中,它用来形容纺织品颜色。贝利建议和琐罗亚斯特婆罗钵语的 krmyr(深红)以及新粟特语的 kmĕr(深红色)相联系。这个词似为印度伊朗语共有词汇,亦相当于梵语 kṛmilika,《翻译名义大集》第 9137 译作"毯毛红布",也即吐鲁番文书中所谓"绯毛锦"。

4.7 绀色:绀色指天青色,深青透红之色。犍陀罗语文书中有一种颜色和绀色十分接近,写作 nila(第 318 号)。该词相当于梵语 nīlī 或 nila,《翻译名义大集》第 5920 号译作"靛[青]"色。那么第 318 号文书的 nila ratağa kigi 意为"染成绀色的(麻布)"。

4.8 金黄色:犍陀罗语文书有"金黄色"一词,写作 suvarna varna。该词出自一个犍陀罗语佛经残片(第 511 号),但是未见用该词表示纺织品颜色。

4.9 缥色:缥色指淡青色。第 660 号文书有 rayağa paṭa 一词,巴罗译作"皇家的丝绸",贝利译作"黄色丝绸",均不确。该词即梵语 rāja paṭa,《翻译名义大集》第 5921 号译作"青[丝绸]"。

4.10 留黄色：第 225 号文书有 govita paṭa 一词，以前未识。该词前一字疑即梵语 go-pitta(牛胆)。其中 pitta(胆汁，在 318 号文书中写作 peta(黄色)。古代印度人从牛胆提取黄色染料，故疑该词意为"黄色(牛胆色)绸布"。

三、有关西域纺织品的几件犍陀罗语文书

据以上讨论，我们对西域纺织品有了一个初步认识。为便于今后的研究，我们对有关西域纺织品的四件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加以校勘和翻译。

1. 难民摩沙伽失窃案上诉状(第 149 号文书)

时惟第 9 年 1 月 28 日，据难民摩沙伽上诉，他(指窃贼)从我这里拿走许多财物。计有：麻布 (kaj'a thavaṃnaǵa) 4 块，毛布(uṃna thavaṃnaǵa)3 块，银叵罗(rupya bhana)1 个，铜钱(maṣa)2500 文，短上衣(kaṃculi)1 件，罗马式裤子(soṃstaṃni)2 条，麻袍带(kaya baṃdhana)3 条，汉袍(cina cimara)3 件。

这是一份关于难民摩沙伽失窃案的上诉状。失主摩沙伽被盗财物清单生动地反映了丝绸之路国际贸易之盛况。其中纺织品有塔里木盆地诸国自产的大麻纺织品麻布、麻纺束带和毛布，中原地区出产的汉袍，东罗马传来的裤子。《新唐书·西域传》记上元二年(761 年)，龟兹向唐廷献"银颇罗"。李白有诗曰："葡萄美酒金叵罗"。颇罗或称"叵罗"，指饮酒用的金银碗。据考古

发现的实物，西域早期类型的金银叵罗大都产自波斯。本文书提到的银叵罗大概也是波斯方物。

2. 迦查诺盗窃案上诉状（第318号文书底牍正面）

惟大王、天子、侍中元孟（Vaṣmaṇa）陛下在位之9年3月19日，奥吉侯阿修罗伽、皮特耶、罗诃那、遮亚沙、吉尔提沙密和罗德沙，州长驮克罗、且渠普尔耽、州长友护共同审理此案。罗苏上诉说："我以前丢失的财产，现在从僧吉罗的奴隶迦查诺处搜出。计有：vidipanada 刺绣（suj'inakirta vidipanada）、白绫短外衣（speta prigha kaṃculi）、上衣（ṣamiṃna）、彩色波斯织物（citraǵa lýokmana）、黄色织物（peta vaṃnidaǵa）、旧上衣（kuv̇ana prahuni）、麻布上衣（ṣaṃna paṭa ma'e kaṃculi）、黑色波斯锦上衣（khara v́arna prahuni）、波斯刺绣（suj'inakirta ly'okmana）、毛布上衣（uṃna thavanaǵa ma'e kaṃculi）、绯毛锦（kremeru）、波斯彩锦（paliya-[va]rnaǵa）。此外，还有金缕罽上衣（prahuni suv̇arna-dare）4件，垫子（varṣaǵa）1件，毛织物（uṃna ma'e）5件，染成绀青色的衣服（nila rataǵa kiġi）2件。这所住宅价值1[……]，所有赃物业已追回。"

这件文书中的 vidipa 1 da 当读 vidipanada，是一种波斯刺绣的名称，词源不明。另一个以前不识之字 paliyarna 当读 paliya[va]rnaǵa，比较第660号文书的palaǵa varna（波斯彩锦）。显然书吏遗漏了varnaǵa（=婆罗钵语 parnagān"锦缎"）中的/va/。犍陀罗语语尾-ya 有时写作-ġa，所以这件文书的 paliya 当即第660号文书的palaǵa。据贝利研究，该词相当于粟特语 pwrδnk 和琐

罗亚斯特婆罗钵语 palang，意为“杂色的”。这件文书的varnaġa大概来自婆罗钵语 parnagān，也即唐代文献所谓“越诺布”（古音读 γiwat-nak）。《魏略·西戎传》所记西域纺织品“杂色绫”或指这种纺织品。这件文书以当地出土古文字资料，全面揭开了公元 3 世纪西域纺织史，特别是波斯纺织物的众多奥秘。文中明确提到当时西域纺织物已采用大麻、毛、丝、黄金凡四种纺织原料，大大深化了我们对西域纺织史的认识。

3. 耶吠村酒税账（第 431 号文书）

此系耶吠村酒税案。耶吠村好酒的三年税收要分别计算。阿波苏萨查、僧人佛军以及耶吠村所有村民原欠好酒每人 19 硒。酒税现已征收两年。第三年瓦苏兼税官摩利伽来信说：这批酒先要卖出去，以换取短绸（astarana）和衣褥（vastarana）。罗苏将这些酒作价为一匹年齿 5 岁的马。他用一匹马换取酒 5 硒和绸缎（aġiṣḍha）2 块。阿格陀色波伽将把第二匹马从这里带到你处，连同两块毛布（koj'ava）和 1 块绸缎（aġiṣḍha）一起，由税官摩利伽负责收取。第三匹马我将派人从通伽苏查处送来，亦由摩利伽收取。这是一匹 4 岁的马，和这匹马一同送来的还有被子（avale）1 条，毛布（koj'ava）2 块和绸布（aġiṣḍha）1 块等，总数为 44 件。还要再加上 1 件白毛毯（śpetaġa koj'ava）。这些东西全在扜泥城由通伽萨查打包。再加上毛毯（koj'ava）和毛毡（namataġa）4 件，毛线（rajiya）1 束。王后曾来此地巡游，她想要一枚金币。由于此地无金币，我们给她一块长 13 柞的毛毯（thavastaġa）权充金币了事。色罗伽已将毛毯取走，许多人目击此事，可以作为见证人。最后，再加上上衣

(artavaśa)1 件。

这件文书相当重要，它证明一个以前不识之字agiṣḍha必指前文提到的短绸(astarana)。布、毡、毯、线在同一文书中出现，丰富了我们对西域纺织物类别的知识。

4. 精绝州支取纺织品清单(第 660 号文书)

A 栏

1) 他们再次到扞泥城时，带回黄绸缎(paṭa paṃdura)。

2) 他们从普斯迦里亚处送来绀青绸缎(rayaǵa paṭa)1 块。

3) 策特罗吉尔提收取紫红[绸缎](sānapru [paṭa])1 块。

4) 罗塔帕罗收取波斯彩锦(palaǵa varna)1 块。

5) 达卢格收取绸缎(paṭa)1 块。

6) 弥支迦购买波斯彩色丝毛混纺锦(palaǵa varna nutaṃna)1 块。

7) 喀婆陀耶收取波斯彩锦带(baṃdhitaǵa palaǵa varna) 1 条。

8) 普那色那收取绢(paṭamca)7 块。

9) 他们购买摩嚅亚的绯毛锦袍带(baṃdhaǵa kremeru nutaṃna)1 条。

B 栏

1) 山地人收取绢(paṭaṃca)2 块。

2）那弥尔嚐耶收取紫红绸布（sanapru paṭa）1块。

这件文书涉及许多纺织物方面的专有名词，令人无所适从。巴罗的《中国突厥斯坦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就根本没收这件文书。1946年，贝利在讨论犍陀罗语的一篇论文中初步解读了这件文书。[1]他的重要贡献是解读了若干表示纺织品颜色的词，可惜他把这件文书提到的纺织品全当作中国丝绸处理，还把rayaǵa paṭa误释为"黄色绸缎"。其实，这个词相当于梵语的rāja paṭa，《翻译名义大集》第5921号译作"青[绸缎]"。我们的贡献主要是破译了varnaǵa（波斯锦）和nutaṃna（毛锦）两个关键词，从而发现palaǵa varna nutaṃna是一种波斯彩色丝毛混纺织锦，最终使这件文书可以完全通读。

（原载《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

[1] H. W. Bailey, "Gāndhārī," *BSOS*, XI, 1946, pp. 764—797.

4

上海博物馆藏中亚三语钱币

1992年夏，上海博物馆邀我出席该馆中国钱币馆落成仪式。开馆典礼上首次展出了杜维善先生捐献的一批丝绸之路金银货币。笔者从事中亚死文字研究及丝绸之路考古多年，但是多为"纸上谈兵"，许多丝绸之路古币是在参观上博中国钱币馆时才亲见实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枚中亚三语钱币。杜先生丝绸之路古币藏品目录上有此钱拓片。据说是"西突厥 Vasudeva(世天)银币"，但未能说明有何根据。[1] 法兰西国家图书馆钱币馆馆长蒂埃里(F. Thierry)先生也参加了上博中国钱币馆开馆典礼。他告诉我，巴黎也藏有几枚相同的中亚古币。如果我有兴趣，他愿提供研究之便。不久他寄来几张法兰西国家图书馆钱币馆藏中亚三语钱币拓片(参见插图59)，并且随函寄来英国古钱学家米奇涅尔(M. Mitchiner)中亚古钱目录中介绍这种钱币的一页复印件，为我们研究这枚三语钱币提供了重要线索。[2] 当时，我正准备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访美归国后又调北大任教，一直忙于其他研究和教学工作，无暇顾

〔1〕 杜维善：《丝绸之路古国货币》，上海博物馆中国钱币部，1992年，90页。

〔2〕 据蒂埃里先生1992年10月31日给笔者的信，这里我们应再次对他的热情帮助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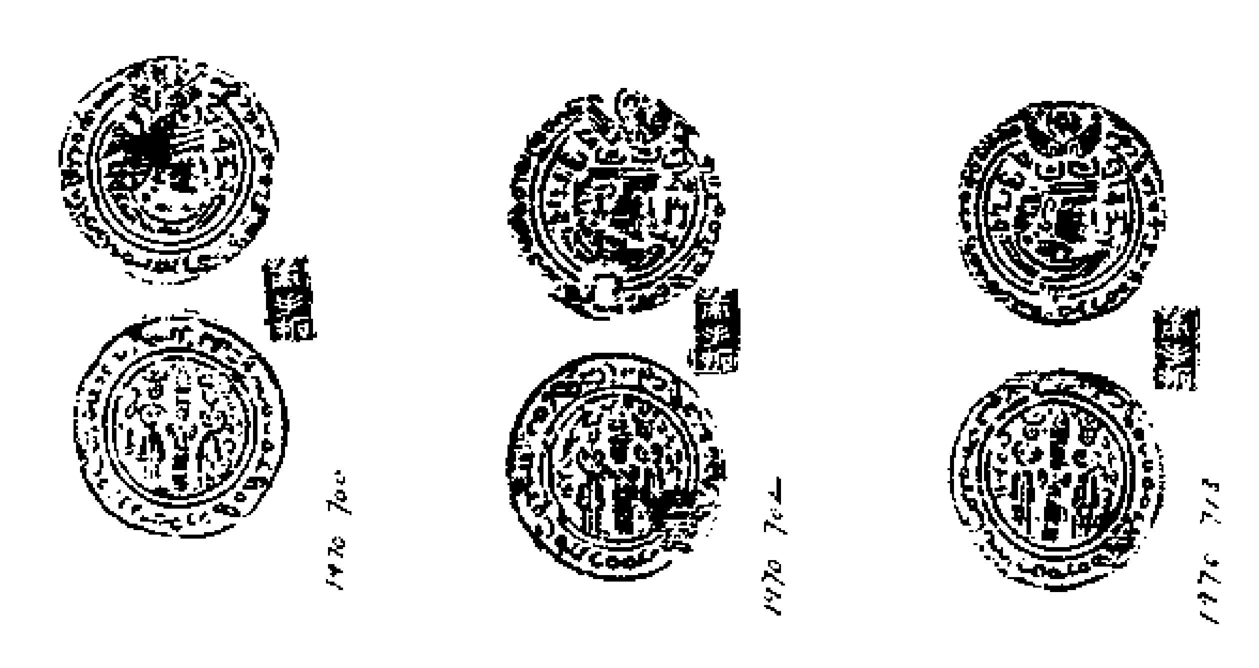


插图 59　法兰西国家图书馆钱币馆藏中亚三语钱币

及此钱研究。1997 年 5 月，新疆博物馆吴震先生和上海博物馆周祥先生旧事重提，来信询问这种三语钱币的情况。因为问题比较复杂，我只在回信中对文字作了初步鉴定，并允诺一有时间将仔细考订，再告知详情。最近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发现这种钱币对研究中古时期中亚语言、宗教和历史地理相当重要。撰写此文，试解吴震和周祥两先生之疑问。

一、文字考释

这种中亚三语钱币上的文字分别为大夏文、梵文和婆罗钵文。正面是梵文，背面是婆罗钵文，大夏文两面都有，铭文也最长。这个现象表明它主要在古代大夏（或称"吐火罗斯坦"，今阿富汗）流行。我们先从大夏文谈起。

大夏文是在草体希腊文基础上创建的一种文字，屡见于哌哒统治时期流行的中亚钱币，以前一度被认为是"哌哒文"。50

年代末,法国中亚考古团在阿富汗发现了用这种文字刻写的贵霜碑铭,说明早在哌哒称霸中亚以前,这种文字已经流行于大夏。既然不是哌哒文,而吐火罗斯坦故地又发现了这种文字的碑铭,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文字表达的语言是所谓"真吐火罗语"。吐火罗是古典作家对从天山东部西迁中亚的大月氏人的称谓,他们后来定居大夏,所以大夏有吐火罗斯坦(意即"吐火罗人的地方")之称。吐火罗语是新疆古代流行的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新疆是大月氏人的故乡,他们无疑讲吐火罗语的某种方言,而阿富汗发现的草体希腊文碑铭的语言显然不是吐火罗语。

1960年,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B. Henning)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他在文中首次论证了这种草体希腊文拼写的语言介乎于粟特语、花拉子模语和安息语等古代伊朗语方言之间。考虑到这种语言主要流行于古代大夏,他建议将其命名为"大夏语"(Bactrian),所用文字则相应地称为大夏文。[1]《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由此可见,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到伊朗高原的安息国流行各种伊朗语方言,两地间的大夏人显然讲古代伊朗语方言,这样才能和安息诸国"相知言"。《大唐西域记》卷一对大夏语文曾作如下描述,"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大夏文有23个字母,若加上ksi和psi两个复合辅音字母,正与《大唐西域记》说大夏文"字源二十五言"相合。虽然大月氏、哌哒和西突厥统治中亚时采用大夏文作为书面语言,但是这并非他们本民族语言文字。正如《梁书·西北诸戎传》所云,哌哒"无文字,以

---

〔1〕 W. B. Henning, "Bactrian Inscription," *BSOAS*, XXIII, 1960, pp. 47~55.

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所以亨宁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目前已经为学界普遍接受。

目前只有欧洲学者研究过这种三语钱币上的大夏文。德国中亚史家容克(1930年)、法国伊朗学家吉尔什曼(1948年)、德国语言学家洪巴赫(1966年)、奥地利古钱学家戈贝尔(1967年)、俄国语言学家李夫什茨(1969年)、德国语言学家达瓦利(1980年)先后参加讨论。戈贝尔将其编为244号钱币，也即英国古钱学家米奇涅尔的1560号钱币。古钱学界大多采用戈贝尔的编号。根据他们的讨论，戈贝尔244号钱币的大夏文应转写为：sri bago azrobadigo sandano bago xoadēo(正面)；sri bago adēbo bagdaiggo kagano soi bagi (背面)。[1]讨论于下：

正面第一字 sri 并见背面第一字，当系梵文借词，相当于这种钱币梵文部分第一字śri。这个字的规范写法是śrī，意为“吉祥”。汉译佛经或译“师利”，也即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文殊师利的“师利”。

正面第二字 bago 在此钱正反面凡四次出现。除背面最后一字作 bagi 外，其余均写作 bago。这个词是大夏人对天神或国王的称谓，相当于阿维斯塔语 baγa，古波斯碑铭的 baga-或粟特语的 βγ-(天神)，皆为“天神”之意。据达瓦利分析，bago 是名词形式，意为“天神”，而 bagi 则是形容词形式，意为“天神的”。[2]《魏书·世宗纪》记载：永平二年(509年)正月壬辰，“呎哒薄知国遣使来朝，贡白象一”。文中所谓“薄知”疑来自大夏语 bagi(天

[1] G.D. Davary, *Baktrisch: Ein Wörterbuch auf Grund der Inschriften, Handschriften, Münzen und Siegelsteine*, Heidelberg: Julius Groos Verlag, 1982, pp.99～100.

[2] G.D. Davary，前揭书，171～172页。

神的、国王的)。洛阳出土隋大业十一年(615 年)翟突娑墓志云:"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日月以见勋效……春秋七十。"[1] 这是一户寓居洛阳的祆教世家。翟突娑的字"薄贺比多"疑来自粟特语 βγnpt,意为"祆祠之主"。[2] 该词前一成分 βγ(= 阿维斯塔语 baγa-"神")即相当于大夏语 bago。这个伊朗语词还借入突厥语,用作突厥官号。突厥碑铭写作 baγa-,唐代文献一般译作"莫贺"。

正面第三字 azrobadigo 系大夏语词,相当于中古波斯语 hazārapati(千夫长)。不过我们怀疑该词前一成分 azro-(千)在这里用作地名,也就是《大唐西域记》所记漕矩吒国首都"鹤萨罗"。那么这个大夏语词就要释为"鹤萨罗城主",意指漕矩吒国王。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节详细讨论。

正面第四字 sandano 是大夏语中的梵文借词,借自梵文 candana(檀香)。贵霜王迦腻色伽也有这个王号,汉译佛经或译"旃檀"。该词在正史中还有几个译名。《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35 年)三月辛未,"滑国王安乐萨丹王遣使献方物"。滑国王号"萨丹"疑来自大夏语中这个梵文借词。《隋书·西域传》又载:"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罽宾国也。其王姓昭武,字顺达。"漕国王的字"顺达"疑是其王号,可能亦出自大夏语中这个梵文借词。

正面第六字 xoadēo 系大夏语词,相当于中古波斯语 hwt'y,摩尼教帕提亚语 xwd'wn,意为"主人、国王"。南朝史官称哌哒

---

[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 年,90 页。

[2] 这个词并见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第一号书信及中亚慕格山出土粟特文书。

国为"滑国"。汉语"滑"字是个以 t 收尾的入声字,中古音读作 ɣwæt。[1]《通典·边防典》滑国条曰:"滑国,车师之别种也……至后魏时谓之滑国。"故疑滑国之名来自大夏语 xoadēo。[2] 这个大夏语词后来还借入突厥语,汉文史籍或译"和卓"。

背面第三字 adēbo 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认为,这个字大概要和摩尼教粟特语的"δβγ(读作 ādbag)相联系。[3] 粟特火祆教徒敬重阿胡拉·马兹达,不直呼其名,而将这位祆教主神尊称为 ādbag,意为"主神"或"大神",相当于婆罗门教的湿婆(Śiva)。[4] 据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考证,粟特人对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这个尊称就是吐鲁番文书中的"阿摩"以及敦煌文书中的"大祆"。[5]

背面第四字 bagdaiggo 系大夏语词,相当于阿维斯塔语的 baxta-,摩尼教粟特语的 bγt 以及摩尼教中古波斯文的 baxt,意思是"授予"。它和前一词显然要连读,意为"阿胡拉·马兹达授予的"或"主神授予的"。

背面第五字 kagano 系突厥语借词,相当于突厥碑铭的 qaγan(可汗)。后者还借入粟特语,写作 x'γ'n。大夏人或称可汗为 xagano,这个译名可能来自粟特人对可汗的称谓。

背面第六字 soi 系大夏语词。据达瓦利等人分析,其中前一

---

〔1〕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12 页。

〔2〕林梅村:《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所藏嚈哒钱币考》,《中国钱币》1993 年第 4 期,3~8 页;收入《汉唐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31~141 页。

〔3〕I. Gershevitch, *A Grammar of Manichean Sogdi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1, §437, 498 and p.148.

〔4〕G. Azarpay, *Sogdian Painting*,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 31~37.

〔5〕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239~241 页。

成分 so-读作 aso，来自阿维斯塔语 haca（和……一起），后一成分-i来自阿维斯塔语 hē（他的）、那么，整个词的含义是“及其”。

戈贝尔 244 号钱币上的第二种文字是印度古文字梵文（或称“婆罗谜文”），因受北印度犍陀罗语俗语影响，所拼语言不太规范。英国古钱学家米奇涅尔建议读作śri vajara vakhudavaḥ。[1]正如前文所论，第一字的规范写法是śrī（吉祥）。第二字在梵语中的规范写法是 vajra 或 vajira，相当于粟特语 β'žyr 以及婆罗钵语的 wazr（= warz），意为“金刚”。《太伯里史》（915 年成书）所记哌哒王朝末代君主就以 wazr（金刚）为名号。[2] 第三字是中亚人普遍采用的名字，规范写法是 vasudevaḥ，意为“世天”汉译佛经或译作“婆数天”。该词还借入许多伊朗语方言。例如：塞语的 wāsudewā、大夏语的 bazodēo 或 bazdēo。《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明帝年间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向曹魏献方物。波调其名疑来自大夏语 bazdēo。

戈贝尔 244 号钱币上的第三种文字是萨珊王朝官方文字婆罗钵文，写在钱币背面的左右两边。英国古钱学家米奇涅尔读作 PIY SHAMRAT（右边）和 AFZUI（左边）。然而，据我们研究，这段文字大概要转写为 PWN ŠM [ZY]（右边）和 yzdt（左边）。其中 PWN 是婆罗钵文表意字，读作 pad（= pty），系表示“在……上”的介词。其后一字 ŠM 也是婆罗钵文表意字，读作 nām（= n'm），意为“名字、名誉”。从上下文看，该词之后还应有个婆罗钵文表意字 ZY，读作 ī（= i）。这是个关系代词，但是

---

[1] M. Mitchiner, "Oriental Coins and their Values," *The Ancient and Classical World*, 600BC—650AD, London, 1978, p. 242.

[2] 宋岘译、余太山注：《〈太伯里史〉所载哌哒史笺证》，《中亚学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57 页。

被造币者遗漏。最后一字读作 yazd，这是古代伊朗人对天神的统称，相当于疏勒塞语的 jezda-(天神)以及于阗塞语的 gyasta-(天神)。

据以上讨论，这种三语钱币上的大夏文意为“吉祥天、鹤萨罗城主、檀香天、国王；吉祥天、阿胡拉·马兹达授予的、可汗及其天神之(钱货)”；梵文意为“吉祥金刚世天”；婆罗钵文意为“以天神的名义”。

二、相关问题讨论

从钱币体系看，戈贝尔 244 号钱币属于萨珊波斯货币体系。正如吴震先生来信指出的，此钱属于“萨珊波斯库思老二世(Khusru II, 591—628 年)钱币类型或仿制品”。[1] 夏鼐先生研究库思老二世钱币时这样写道：

> 库思老二世(590—627 年在位)虽不及他的祖父那祥英明，但仍可算是萨珊朝最后一位雄主。他曾西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攻下耶路撒冷城。后来以残暴被弑。波斯便发生内乱，相争王位，国势便一蹶不振。到了他的孙子伊嗣俟时候(632—651 年)，虽内乱平息，而外患趋剧，为阿拉伯所灭。《隋书·西域传》所说的波斯王库萨和，便是库思老二世。

据他调查，新疆乌恰唐代钱币窖藏、库车苏巴什古城、吐鲁番阿

[1] 此据吴震先生 1997 年 4 月 27 日给笔者的信。

斯塔那古墓和高昌古城、山西太原金胜村唐墓、西安近郊隋唐墓和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都曾发现库思老二世银币。[1]这种带有三种文字的库思老二世类型的银币发行者显然不是库思老，而是此钱梵文部分提到的“世天”。中国境内似乎尚未发现此类银币，杜维善先生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的这枚当出自葱岭以西地区。

这种三语钱币的发行者世天还发行过一种库思老二世钱币类型的梵文婆罗钵文双语钱币，戈贝尔编为212号钱（=米奇涅尔的1563号钱）。其中梵文部分有发行者世天的名字，婆罗钵文部分有库思老二世35年纪年以及发行地点ZAVLISTAN。库思老二世35年相当于公元624年，ZAVLISTAN就是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Zabul国，也就是《大唐西域记》所记漕矩吒国的别称“漕利国”，《隋书·西域传》作“漕国”，《慧超往五天竺行传》作“谢飓国”。关于这个地名的中外名称，日本学者桑山正进等人的新著《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所论甚详，[2]可惜他们忽略了这个地名的最早汉译“叶波罗”（详下）。

50年代初，阿富汗南部重镇坎大哈以北175公里加兹尼的乌鲁兹甘（Uruzgan）镇发现一处哌哒统治中亚时期的大夏文题记，发现地点位于阿富汗中部赫尔曼德河上游与阿尔甘达布河上游之间。据伦敦大学教授毕瓦尔（A.D.H. Bivar）研究，这则题记读作Bo[g]o šaho zooloo mihroziki，意为“天神、漕矩吒（Zabul）王摩醯逻矩罗”。[3]摩醯逻矩罗乃当朝哌哒王头罗曼

---

[1]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93～107页转110页。

[2] 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京都大学文科研究所，1992年，pp.135～147页。

[3] A.D.H. Bivar, "The Inscription of Uruzgan," *JRAS*, 1954, pp. 111～118.

(Toramāṇa)之子，嚈哒定都拔底延城(Bactra，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漕矩吒国似为这位嚈哒太子的封地，所以大夏题记称其为"漕矩吒王"。北魏僧人宋云曾访问嚈哒统治下的犍陀罗。《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行记》曰："正光元年(520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土地亦与乌场国相似，本名叶波罗国，为喝哒(即嚈哒)所灭，遂立勑懃(即特勤)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大夏语的/z/在犍陀罗语中往往读作/y/或/j/，嚈哒发行的大夏文梵文双语钱币中大夏地名 zaoblo(= zooloo)和梵文犍陀罗语地名 javūvlaḥ 对译。[1] 故疑宋云的"叶波罗国"很可能译自犍陀罗语中的这个大夏语借词 javūvlaḥ，乃漕矩吒最早的汉译名。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勑懃"即突厥官号特勤，其职往往由太子或突厥王室成员担任。[2] 宋云访问犍陀罗时，这里大概由封地在漕矩吒国的嚈哒太子或特勤兼管。所以宋云说犍陀罗"本名叶波罗，为嚈哒所灭，遂立勑懃为王"。

据以上调查，漕矩吒或 Zabul 大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该国南部重镇坎大哈之间加兹尼的乌鲁兹甘镇附近。世天应是波斯王库思老二世末年在位的漕矩吒国王储。中亚人常把某国君王称为某国都城之主或神。例如：粟特人将唐朝皇帝称作"洛阳城之神"，而称吐鲁番的高昌王为"秦城之神"。大夏钱币称迦毕试王为"迦毕试城之神"。[3]所以，戈贝尔 244 号钱币大夏文

---

〔1〕 G.D. Davary，前揭书，297 页。

〔2〕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韩儒林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517 页。

〔3〕 D.N. MacKenzie, "The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AI*, X, Tehran-Liege, 1976, Introx, 34；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 年第 9 期；收入《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74 页；A.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l. IV.8.

将世天称作漕矩吒国首都"鹤萨罗城之主"。

若按时间推算,戈贝尔 244 号钱币提到的"可汗"当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统叶护可汗称霸中亚前漕矩吒系萨珊波斯属国。公元 558 年顷,萨珊波斯和西突厥联兵推翻哌哒在中亚的统治。他们以阿姆河为界,瓜分哌哒故土。据波斯史家迪奈韦里(Dīnawarī,卒于 895 年)记载,"[库思老一世]派遣军队进入哌哒国土,占领了吐火罗、谢飓(Zabul)、喀布尔和石汗那……突厥王室点密(Singibū)可汗向呼罗珊进军,占领了柘枝、费尔干纳、撒马尔干和佉沙。他一路劫掠,直抵捕喝。"[1] 由此可知,哌哒覆灭后,漕矩吒国沦为波斯人的殖民地,这个时期漕矩吒国经济文化自然要受波斯影响。这大概就是漕矩吒王世天为什么会发行波斯类型钱币的原因所在。

《旧唐书·西域传》记载:隋大业十三年,统叶护可汗(617—630 年)继承西突厥可汗王位,并与波斯人交战。同书《突厥传》说:"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受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唐贞观二年(628 年),玄奘离开高昌取道中亚到印度,途经碎叶城时受到统叶护可汗热情款待。他为属下诸国作书,并派遣摩咄达官护送玄奘"法师到迦毕试国"。[2] 迦毕试国就是《旧唐书·突厥传》所记西突厥南境罽宾国,故址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 62 公里的伯格拉姆

---

[1] 宋岘译、余太山注:《〈太伯里史〉所载哌哒史笺证》,《中亚学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57 页。

[2] 唐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 年,29 页。

(Begram)。然而，统叶护时代西突厥疆土已不限于迦毕试，其南境已达漕矩吒国以北五百余里的弗栗恃萨傥那国。《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中介绍说，该国"土宜风俗，同漕矩吒国，语言有异。气序寒劲，人性犷烈。王，突厥种也。深信三宝，尚学遵德。"[1]玄奘拜见的漕矩吒王很可能就是戈贝尔244号钱币提到的漕矩吒王世天。

西突厥统治中亚采用两种方式：其一，分封突厥王室成员特勤或派吐屯实施直接统治；其二，以夷治夷，扶植当地土著首领进行间接统治。从《大唐西域记》有关记载看，国王世天似乎不是西突厥人，而是西突厥扶植的本地土著首领。该书卷十二漕矩吒国条介绍说："虽祀百神，敬崇三宝。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叶承统，务兴胜福，敏而好学。"既然统叶护可汗时代当朝漕矩吒王是"累叶承统"，可见他是大夏本地土著人首领。

漕矩吒历来是中亚各族杂居之地。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中亚时(约公元前5世纪)这里曾是古波斯帝国的大夏行省。1962年，意大利中东亚研究所考古团在加兹尼发现了刻有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陶器，这说明波斯人很早就向大夏移民。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雄主亚历山大东征中亚，又给大夏带来许多希腊人口。阿富汗南部重镇坎大哈发现的希腊文希腊语阿育王碑铭说明公元前3世纪漕矩吒南方已有希腊人定居。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中亚时曾向大夏派驻印度移民团。因为阿富汗南部的兰帕卡、坎大哈和拉格曼发现的阿育王碑采用阿拉美文印度俗语。这些来自波斯、希腊和印度的侨民对日后漕矩吒人口的种

---

〔1〕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959页。

族成分不能不产生影响。随后贵霜和哌哒进入中亚历史舞台，他们给漕矩吒带来大批吐火罗和突厥移民。《新唐书·西域传》记漕矩吒云："国中有突厥、罽宾、吐火罗种人杂居。"《慧超往五天竺行传》亦载："至谢飓国。自呼社护罗萨他那。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其中，突厥人既指西突厥人，也可能包括突厥系统的哌哒人。吐火罗人是中亚人对贵霜大月氏人的称谓。唐代将迦毕试称作罽宾，故址在今阿富汗喀布尔以北60公里的伯格拉姆。迦毕试国土著居民是大夏人。所以漕矩吒国的罽宾人应指当地土著大夏人。无论如何，漕矩吒国的主体民族是大夏人。因此漕矩吒王世天发行以大夏文为主的三语钱币。

综合全文讨论，上海博物馆藏中亚三语钱币是西突厥统治中亚时代漕矩吒国发行的钱币。正面大夏文的"吉祥天、鹤萨罗城主、檀香天、国王"，指当朝漕矩吒王，梵文部分将他称作"世天"。漕矩吒王世天在波斯王库思老二世36年(624年)发行过一种纪念币，那么玄奘西行中亚时(628年)拜见的漕矩吒王可能就是这种三语钱币提到的漕矩吒王世天。背面大夏钱文的"吉祥天、阿胡拉·马兹达授予的、可汗及其天神"，当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西突厥原来信仰草原游牧人古老的萨满教，统治中亚后改奉当地流行的火祆教。这种三语钱币的发现为研究西突厥的宗教变革提供了重要史料。

(原载《中国钱币》1998年第4期)

5

大谷探险队所获佉卢文藏文双语文书

1997 年访日期间，在日本友人小岛康誉先生热心安排下，我们专程到京都市龙谷大学调查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所获楼兰古物。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收集品中有几件佉卢文藏文双语文书。以前只在新疆库车发现过佉卢文吐火罗文双语文书，在新疆巴楚发现过直体佉卢文梵文双语文书，分别属于勒柯克(A. von Le Coq)和霍恩雷(A. F. R. Hoernle)收集品，而佉卢文藏文双语文书却鲜为人知。后来了解到，早在 1915 年这些佉卢文藏文双语文书就在日本国华社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刊出，[1] 可惜研究整理楼兰文书的欧洲语言学家都没注意到这个材料，所以未收人他们的三卷本《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一书。我立即向龙谷大学的井ノ口泰淳教授提出，希望容许我们研究这批文书。不久，日本京都佛教大学的真田康道教授寄来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五件大谷文书的照片，其中四件是佉卢文藏文双语文书。为使学界及时了解这批双语文书的情况，草成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

[1] 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国华社，1915 年；上原芳太朗：《新西域记》下卷，有光社，1937 年，21 页。

一、发现与研究

真田康道教授寄来的五件文书中的三件贴有“吐峪沟”字样的标签。在龙谷大学访问时，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井ノ口泰淳教授。他告诉我，1953 年大谷收集品移交龙谷大学以前就贴有这些标签，因此他编写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品目录时，就把这些文书的出土地都标作吐鲁番的吐峪沟。[1] 这些标签显然有问题，因为其中一件文书(No. 11104)按照鄯善王安归伽纪年，当属鄯善国文书，出土地点也应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鄯善国故地。大谷探险队由一些日本僧人组成，他们的中亚收集品往往没有出土地点，即便有出土地点，也时常张冠李戴，如把吐鲁番文书误当作敦煌文书就不乏其例。所以我们的研究基点不能放在这些不可靠的标签上。

龙谷大学的上山大峻教授后来访问北京，他给我带来了他的学生莲池利隆和市川良文研究这批文书的一篇论文。[2] 两人对文书的出土地点和刊布情况做了周密调查。他们首先对《新西域记》所载出自于阗的说法和文书标签上关于出自吐峪沟的说法提出质疑，然后根据片山章雄等人对大谷探险队的研究，推测这些文书可能是这个探险队的队员橘瑞超于 1909 年在塔里木盆地东南缘鄯善国某遗址采集的。这个意见和我们的判断

---

〔1〕 井ノ口泰淳:《西域文化资料选》,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1985 年,37 页;《大谷探险队搜集中央アジア出土佛典资料选》,京都:龙谷大学,1988 年,39 页。

〔2〕 论文题为《龙谷大学图书馆藏のカローシユテイー木简について》,但是没有注明将在何处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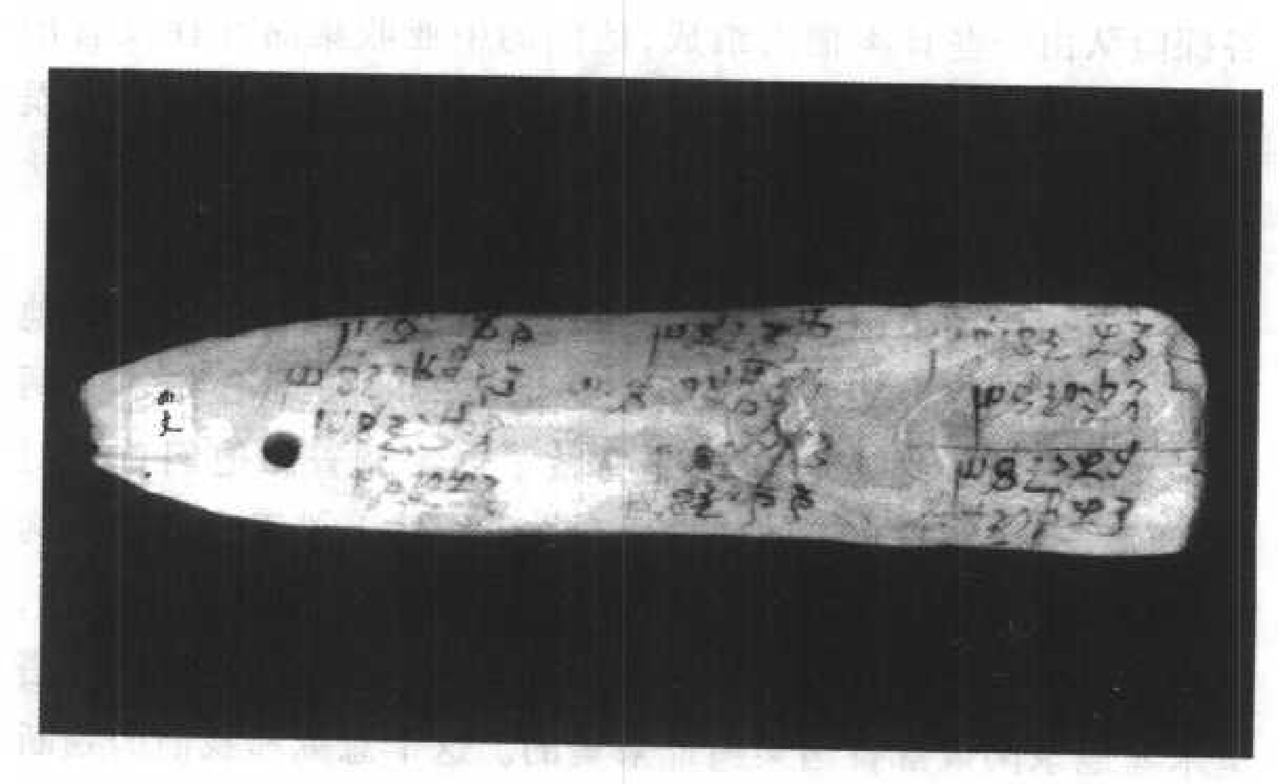


插图 60 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新疆出土佉卢文古藏文双语文书(龙谷大学图书馆供稿)

大致相同。

在龙谷大学访问期间，我们还了解到大谷收集品中有若干新疆出土的古藏文简牍。橘瑞超曾在新疆米兰大肆发掘，并剥取米兰佛寺壁画，其中两块现藏汉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1]我们怀疑，这四件双语文书是橘瑞超在米兰荒漠吐蕃古城一带发现的，大概和大谷收集品的吐蕃简牍一起出土。

这两位日本朋友对这四件双语文书做了初步解读并翻译成日文。这项研究总的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可惜莲池君对佉卢文的读法仍采用本世纪初的转写方式，不够规范，而且有错误。鉴于这批双语文书的重要性，我们深感有必要根据现代通行的标准转写重新释读。市川君解读了其中三件文书(Nos. 11102、11103 和 11105)的古藏文，可惜既没作任何讨论，也没说明两种文字的关系。本文将对这些双语文书的藏文及佉卢文的关系试加讨论，更为深入的研究则有待于藏学专家。

二、文书解读

根据真田康道教授寄来的照片，现将四件双语文书依次释读如下。[2]

第一、(大谷西域文化资料 No. 11102)鄯善僧人书信

(原刊《西域考古图谱》卷下图版 18，3 及《西域文化资料

〔1〕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编：《中央アジア美术》，三和出版社，1989 年，8 页。

〔2〕 这套转写参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140 页。

选》图版 32：2）

A. 转写

正面

（1）—（2）（字迹漫漶）

（3）deva[ma]n [uśa……] nu [……]śeṣa

（4）mi pa na [……]ġayaṣa [……] śramana [……] ṣa vaṃti tita [……]

（5）dhi tsa he na [……] śaḍa [……] vaṃti tati kridati vaṃ ma [……]vuti

（6）[x] da [……] suġi[ya] hoti [……]

（7）ga ma [……]

背面

（1）gter yig 3（藏文）

B. 考释

这件文书正面胡语部分已漫漶不清，故莲池君未作任何考释。不过我们还是分辨出了 deva[ma]n [uśa-saṃpujitaṣa]（1.3）"人神爱见的"、śeṣa（1.3）"欠债"、śramana（1.4）"僧人"、vaṃti（1.4 和 1.5）"在……处"、tita（1.4）"交纳"、śaḍa（1.5）"高兴"、kridati（1.5）"做"、suġi[ya]（1.6）鄯善人名"苏耆耶"和 hoti（1.6）"是"等字。从残文"人神爱见的"一词判断，这件文书当是一封书信。

这件文书背面的藏语部分相当清楚。第一字正如市川君指出的，读作 gter。在藏文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ṇa-prabhāsa-sūtra）中，古藏文 gter 对译梵文 nidhi"宝藏、财

宝”。[1]第二字被市川君读作 yig。这个词也出现在米兰古藏文简牍第 69 和 72 号，王尧和陈践读作 yige，[2] 在西藏发现的吐蕃碑铭中或作 yig。它有两重含义，其一表示“书写”，在藏文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中，古藏文 yi-ge 用来翻译梵文的 lipi（书写）。此外，它还有第二重含义。在古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Li yul lun-bstan-pa）中用来表示“文书”。[3] 这件双语文书的 yi-ge 似乎使用它的第二重含义，表示“帐单”。这行最后一字是个数目字，市川君读作“7”。这类数目字借自梵文（今称“阿拉伯数字”），从字形看更像是 3，而不是 7。

C. 译文

正面：人神（爱见的）……尚欠……/……交到僧人……处/

……高兴……交纳…… /……是苏耆耶……/ ……

背面：财产帐单之三（藏文）。

第二、（大谷西域文化资料 No. 11103）苏耆耶等人谷物帐

（原刊《西域考古图谱》卷下图版 17，1-2 及《西域文化资料选》图版 32：3）

A. 转写

正面	A	B	C
(1)	sugiyas̱a aṃna khi 3	pitǵas̱a khi 3	kak'e[yas̱a] khi 3
(2)	opǵeyas̱a khi 3	cojhbo lýimsu'as̱a khi 3	vasu lýipeyas̱a khi 3

---

[1] R. E. 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Oxford Universtiy Press, 1967, p. 127.

[2]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38 和 40 页。

[3] R. E. Emmerick，前揭书，152 页。

(3) moġatas̱a khi 3   kaṃciyas̱a khi 2   opiṃtas̱a khi 3
(4) saġapeyas̱a khi 3   tsutsiyas̱a khi 3   taġiyas̱a khi 2
(5)   [……] s(u)ha [……]

背面

(1) gter yi-g 6(倒写藏文)

(2)   daśavita opiṃta [ku]ciyas̱a ca aṃna milima 1 khi 10 4

B. 考释

这件文书的胡语部分,莲池君大都转写出来,但是他把/tġa/误作/ṅġa/,/lẏa/误作/lṗa/,把/tsa/误作/bha/,则需要订正。此外,他对第1行C栏,第4行B栏和第5行C栏的释读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根据照片,一一作了订正。由于不明词源,我们在《沙海古卷》中将 vasu 一词译作"司土"。[1] 在其他佉卢文书中,该词有时写作 v́asu(=vesu),犍陀罗语/v/往往表示伊朗语/p/。我们怀疑,该词借自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 pēsōbāy 或新波斯语 pēšwā,意为"首领"。那么这个鄯善职官意思是"头人"。度量衡单位 milima(弥里码)和 khi(硒)是丝绸之路流行的希腊度量单位。两者的换算单位是:1弥里码相当于20硒。

这件文书背面的藏文倒写在木牍上,内容和前面讨论的文书相同,只是最后的数目字写作"6"。

C. 译文

正面	A	B	C
(1)	苏耆耶的谷物3硒	皮特迦3硒	卡克耶3硒

[1] 林梅村:《沙海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639页。

(2) 乌波格耶 3 硒	州长黎摩耶 3 硒	头人黎贝耶 3 硒
(3) 摩迦陀 3 硒	龟兹耶 2 硒	乌宾陀 3 硒
(4) 萨迦贝耶 3 硒	楚齐耶 3 硒	驮耆耶 2 硒
(5)		……一起……

背面

(1) 财产帐单之六(倒写藏文)。

(2)　　十户长乌宾陀和龟兹耶之谷物 1 弥里码 14 硒。

第三、(大谷西域文化资料 No. 11104)鄯善王安归伽 23 年纪年文书

(原刊《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图版 18, 2 及《西域文化资料选》图版 32: 4)

A. 转写

正面

(1) saṃvatsare 20 3 maṣe 4 1 [divaṣe x mahanu'ava maharaya]ṣa j[iṭu](gha) [aṃgu]vaka

(2) devaputraṣa kṣuṃnaṃmi asti maṃnuśa lepaya ni kuv̌iṅeya'e nama de kaly̌ig̃eya ni ku-

(3) v̌iṅaka ṣa vaṃti miṣi bhumana vikrida taṣa bhumaṃmi bhij'apayati jaṭhi milima [1] khi

(4) 10 taṣa miṣiyaṣa muli kuv̌iṅeka ṣa paride lepaya ni kuv̌iṅeya giḍ'a

(5) asp'a 1 vito 10 2 uṭa 2 [……] muli [……]na ṣarva piṃḍa muli [……] taha taṣa mi-

(6) ṣiya bhumaṣa vaṃti kaly̌ig̃eya [eśvari hoda] kiṣaṃna'e va-

vaṃna ['e sarva] boǵa ki[ka]-
(7) ma karaṃni siyati tasa [……] atra [……]

背面

(1) gter-ma/ gter yig / 9(藏文)

B. 考释

这件文书的胡语部分，莲池君大都转写出来，但把/kṣa/误作/ch'a/，有些照片上尚可辨读的文字，没有转写。本文一一作了补正。

这件文书的藏文部分相当清楚。第一字的后缀-ma相当于藏语常见后缀-mi或-myi，表示"某种人"。[1]例如：《翻译名义大集》提到groń-mi(城里人)、yul-gyi-mi(乡下人)、lha-khań-bsruń-mi(寺院守护人)和gla-mi(佣人)等。[2]《旧唐书·高宗纪下》记上元二年(675年)正月"辛未，吐蕃遣其大臣伦吐浑弥来请和，不许。"吐浑弥的"弥"当译自藏文-mi，意为"吐谷浑人"。这个后缀有时也写作-ma，如gshed-ma(刽子手)。[3]新疆米兰出土古藏文简牍记有bod-ma(蕃人)。[4]所以这件双语文书的gter-ma意为"财宝守护人"。

C. 译文

正面

(1) 时惟威德宏大的、伟大的国王、侍中安归伽天子在位第23

[1] R.E. Emmerick，前揭书，144页。

[2] 榊亮三郎：《翻译名义大集》，京都大学，大正五年，259和263页。

[3] 榊亮三郎，前揭书，264页。

[4] 王尧，陈践，前揭书，1986年，27页。

年5月……日。

(2) 此时有位男子,名叫列帕耶,属于库维涅耶家族。他向同属于库维涅耶家的

(3) 喀利格耶出售若干可耕地。这些可耕地的播种量为1弥里码10

(4) 硒。关于库维涅耶家的可耕地的价钱,要由库维涅耶家的列帕耶来支付,

(5) 计有马一匹,四岁幼畜12头,骆驼2头……价值……目厘……共计……目厘。

(6) 现在喀利格耶对这块可耕地拥有所有权,有权耕耘、播种、为所

(7) 欲为。他的……在此……

背面

(1) 守护财宝者,财产帐单之九(藏文)。

第四、(大谷西域文化资料No. 11105)鄯善武士牟耆耶书信

(原刊《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图版17, 3—4及《西域文化资料选》图版32: 5)

A. 转写

正面

(1) [……ṣa] padamulaṃmi

(2) [……] ekhara moǵiya śirṣa

(3) gter yig/ 4(倒写藏文) [……] evaṃca śiraṣa iṃthu viṃña-veti asti purva kalaṃ

(4) [……] punu maṃnuśa masmoya

nama maṃnuśa ho'ati

背面

(1) [e]de maṃnuśa śirṣa [……] ede gaṃna bhratare ho'aṃti ede bhratare ekhara mecaṣa ca suha ni daśaṃmi ho'ati aṣaṃna

(2) raspara cmika cyikaṣa suha ni daśaṃmi ho'ati ede bhratare kriñaġa masmoya śilġakaṣa ca uthitaṃti śraṃmana budhamoyaṣa vaṃti

(3) [……]limi pramana bh[ratare] ekhara moġiyaṣa pitu kolaṃṣta kriñaġa kuroyaṣa ca krinitaṃti edaṣa bhuma pa[……]

(4) [……] [e]ṣa bhuma meca raspara ṣa ca aṃña taha dadati va taṣa [……]

B. 考释

这件文书正面第一行的第2行的 aṣaṃna 借自于阗语 aṣaṇa（和尚）。这行的 ekhara 似为伊朗语，相当于婆罗钵语的 ēraxtār（武士），在佉卢文书中表示某种贵族阶层。

C. 译文

正面

(1) ……足下

(2) ……武士牟耆耶·施尔沙

(3) 财产帐单之四（倒写藏文）……今有施尔沙禀报如下：从前

(4) ……还有一男子，名叫摩斯牟耶。

背面

(1) 施尔沙这个人……这些噶那都是兄弟。这些兄弟现在和武

士弥查一起，都在一个十户里。和尚

(2) 罗斯伐罗、左弥伽、池伽一起，在一个十户里。这些兄弟克里纳伽、摩斯牟耶和实利伽愿意在沙门佛陀牟耶处。

(3) ……无量，由众兄弟武士牟耆耶之父廓兰斯塔、克利涅伽和库若耶共同买下。这块土地……

(4) ……这块土地由弥查和罗斯伐罗交给别人。或者，他们的……

三、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的消亡

若要澄清这批双语文书上两种文字的关系，首先得了解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消失的时间。佉卢文作为鄯善国的官方文字而流行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并随鄯善国的灭亡而销声匿迹。《梁书·西北诸戎传》记载："永明中(约492年)，(芮芮)为丁零所破，更为小国，而南移其居。"丁零是南朝士大夫对北方草原一个游牧部落的称谓，北朝史官谓之"高车"。丁零人很快从高昌南下鄯善，向芮芮(即柔然)发动了争夺塔里木盆地的战争。《南齐书·芮芮虏传》说："先是，益州刺史刘悛(约491—493年在任)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国威德。道经鄯善、于阗。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丁零僭称天子，劳接景玄使，反命。"目前学界将鄯善国的灭亡定在公元5世纪末就根据这条史料。鄯善灭国后，鄯善遗民大批流亡吐鲁番盆地，今天吐鲁番的鄯善县就因鄯善人大批移居此地而得名。

丁零人统治鄯善时间不长又被青藏高原的吐谷浑人驱赶出境。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秋七月庚申，吐谷浑遣其世子贺虏头入朝于魏。诏以伏连筹为都督西垂诸军事、西海公、吐谷

浑王"。[1]《北史·吐谷浑传》记北魏赏赐伏连筹的头衔是"使持节、都督西垂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也就是说，北魏皇帝同意将已经失去的西域诸国拱手相让给吐谷浑。如何得到这块肥田沃土，还得靠"都督西垂诸军事"的吐谷浑王自己想办法。

最早提到吐谷浑在西域活动的是《宋云行记》。文中提到北魏神龟元年（519 年）胡太后派僧人宋云、惠生等人出使西域。他们"从吐谷浑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北朝史书还提到吐谷浑不单进驻了鄯善城（今新疆若羌县城附近），而且"地兼鄯善、且末"。[2]南朝史官则说吐谷浑疆域"东至垒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3]那么吐谷浑王全面接管了原来属于鄯善王国的全部领土。

吐谷浑兼并鄯善以后，许多鄯善遗民又重返故乡。《周书·异域传》鄯善条记载："大统八年（542 年），其兄鄯米率众内附。"鄯米，一作"鄯朱那"。可知吐谷浑入主鄯善后，扶植了一位回归故里的鄯善酋长自理国土。后来其兄鄯米带着部分鄯善人投奔西魏，于公元 542 年迁到内地定居。

南朝史官还记录了公元 6 世纪鄯善遗民的踪迹。《梁书·西北诸戎传》说："末国，汉世且末国也。胜兵万余户。北与丁零接，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土人剪发，著毡帽，小袖衣，为衫则开头而缝前。多牛羊骡驴。其王安末深盘，普通五年（524 年），

---

〔1〕《资治通鉴》卷一三七。

〔2〕《北史·吐谷浑传》。

〔3〕《梁书·西北诸戎传》。

遣使来献。"由于鄯善故都打泥城(或称"鄯善城")被吐谷浑王子占据,回归故里的鄯善王室不得不另择他地,大概迁到鄯善城之西的且末定居。《梁书》提到末国(即且末)王,名曰"安末深盘"。这个名字很像是鄯善人名字。其中"安末"译自 aṃmacika(见第108、147 及 242 号文书),源于梵语 āmātyaka(大臣),唐代文献或译"阿摩支"。这个名字后一成分"深盘"的胡语原文不易确定,与其读音相近的鄯善人名非常多,如 saṃbhaṃdhaṃma(第721 号文书)、saṃrpina(第 324 号)及 saṃprañа(第 620 号)等。不过这位末国王是位吐谷浑扶植的鄯善酋长殆无疑问,也许就是公元 542 年投奔西魏的鄯米之弟。梁元帝萧绎画过许多来访的西域使者,他的名作《梁职贡图》绘有末国王安末深盘派往梁朝的一位鄯善使者肖像。[1] 这位鄯善使者头戴毡帽、身着开领长衫,与鄯善古墓出土木乃伊的装束几乎完全相同。

既然公元 6 世纪中叶仍有鄯善遗民在且末活动,佉卢文可能在吐谷浑统治时期仍在塔里木盆地东南的鄯善遗民当中流行,这些双语文书中佉卢文的年代有可能晚至公元 6 世纪中叶。

四、吐蕃与塔里木盆地居民的最初接触

这批双语文书的古藏文显然是吐蕃人与塔里木盆地居民最初接触的产物,因而有必要调查吐蕃人进入西域的最初进程。

史载吐蕃人进入塔里木盆地始于松赞干布之父朗日论赞(? —629 年)。公元 7 世纪初,朗日论赞和其弟伦果尔对势力

---

[1] 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文物》1960 年第 7 期第 14~17 页及所附图版。

强大的苏毗女国发动战争。他们先和琳藏古、韦义策、韦梅囊、蔡邦纳森等苏毗旧臣歃血为盟，然后里应外合，联兵攻打苏毗女王，“遇大河即行涉渡，逢沼泽地即绕道而越，遂攻破宇那(今拉萨北)堡寨，灭顽敌魁渠森波杰(苏毗王)，芒波杰(王子)孙波逃遁突厥。自是，上起帕之勇瓦以下，直至工布哲那以上，均为赞普统领之辖土矣”。吐蕃人从此走出狭小的雅砻河谷，迁入更为广阔的天地——拉萨河流域。朗日论赞随即颁布命令，将苏毗故地岩波(今西藏北部)更名为彭域。[1]

苏毗盛产黄金，故称“苏伐剌拏瞿呾罗国”。《大唐西域记》卷四说：

> 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拏瞿呾罗国(本注：唐言金氏)。出土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躁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

据此，苏毗的四至当为：南方有大雪山(今喜马拉雅山)，东方是吐蕃国(今西藏波密和琼结县雅砻河谷)，西方为三波诃(或称“秣罗娑”，今西藏吉隆县至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之间)，北方与塔里木盆地的于阗(今新疆和田和民丰)、鄯善(今新疆若羌及且末两县)接壤。苏毗境内的阿尔金山(在今青海、新疆和西藏交界处)是中国著名黄金产地之一，苏毗或称“金氏”，即得名于此山。

---

〔1〕 王尧、陈践译：《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161～162页。

朗日论赞征服苏毗在公元7世纪初。吐蕃征服苏毗女国后，一部分苏毗遗民向东迁徙，在今西藏昌都一带建立了东女国。《旧唐书·西南蛮传》的一条记载值得注意。其文曰："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国焉。俗以女为王……其王所居名康延川……隋大业中(约617年)，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武德(618—626年)中，女王汤滂氏始遣使贡方物，高祖厚资而遣之。"今天西藏东部的昌都即康延川的遗音，而东女国统治中心就在西藏昌都河流域。[1]既然隋大业中苏毗遗民已在昌都建立了东女国，那么吐蕃征服苏毗必在公元617年以前。

吐蕃征服苏毗时正值西突厥称雄中亚。《旧唐书·西突厥传》记当时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说："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之千泉。其西域诸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西突厥不仅在塔里木盆地的疏勒、于阗、焉耆和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派驻吐屯，征收当地赋税，而且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年)派中亚撒马尔干粟特大首领康艳典在罗布泊地区建造了一批粟特移民城镇。敦煌唐写本《沙州图经》记载，罗布泊地区的粟特移民城镇有弩支城、石城镇、蒲桃城和萨毗城等。萨毗城建于石城镇(今新疆若羌县且尔乞都克遗址)东南约480华里处。从里程推算，该城约在今新疆东南境阿牙克库木湖一带。

吐蕃征服苏毗之后，又向北方发动战争。萨迦·索南坚赞在《王统世系明鉴》第八章说：朗日论赞"战胜了汉人和突厥，从北

[1]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160页。

方得到了食盐”。[1] 这时的吐蕃北方显然指原苏毗北边的塔里木盆地。

大业五年(609 年),隋朝在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隋书·炀帝纪》)。《隋书·地理志》和敦煌唐写本《沙州图经》卷五还提到隋朝西域四郡下辖若干镇县名称,[2] 但是文献从未提到隋朝在于阗设置郡县之事。《新唐书·于阗传》说:“于阗国……先臣于西突厥。其王姓尉迟氏,名屈密。贞观六年(632 年),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故知朗日论赞发动北方战争时于阗国隶属于西突厥,且末和鄯善诸城皆在隋朝统治下。由此推测,朗日论赞在北方征服的突厥人指西突厥统治下的于阗,而在北方战胜的汉人则指且末和鄯善一带的隋朝郡县。

塔里木盆地有着相当丰富的食盐资源,最大的盐场就是罗布泊。《水经·河水注》说:

> 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行人所逕,畜产皆布氈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盐泽之称也。

---

〔1〕 参见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第八章及《松赞干布遗训》,转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25 页;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45~46 页。

〔2〕 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曆纪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5 年,90~91 页。

藏文史籍《松赞干布遗训》提到朗日论赞"从北方的龙池(Bla mtso)取得食盐,从此开始了食盐的习俗;还自汉地得到了历算和医药。"[1] 龙池指罗布泊,因在龙城附近,故被称作"龙池"。据《北史·西域传》记载,朗日论赞曾于隋大业四年和五年(608、609年)两次派使者到中原贡献方物。汉地历算和医药显然是这些吐蕃使者从中原引进的,吐蕃王朝后来使用中原干支纪年法盖源于此。

其实,这条通往罗布泊的食盐之路早就被苏毗人开辟。《隋书·西域传》说:苏毗女国"尤多盐,恒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同传介绍苏毗物产有"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骏马、蜀马",但是没有提到食盐。那么苏毗人向印度贩运的食盐不一定是本地物产,而来自苏毗北方盛产食盐的罗布泊。敦煌唐写本《沙州伊州图经》又载,"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险阻,恒有吐蕃及土谷浑来往不绝。"这条路似即沟通吐蕃与罗布泊的食盐之路。

隋炀帝在鄯善、且末等地设置郡县在大业五年。时隔不久,这些城镇就因罗布泊地区发生的一次大动乱而荒废。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图经》提及此事。文中说:"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造成鄯善诸城荒废的这次动乱发生在隋朝末年,而动乱的制造者显然是为获取食盐发动的北方战争的朗日论赞。

朗日论赞发动北方战争不单是获取食盐,还有其政治目的。据《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传记篇》,苏毗亡国后,苏毗王子"芒波杰孙波逃遁突厥"。这里的突厥当指西突厥,但是不一定在帕米尔以西的西突厥统治中心,而可能在西突厥统治下的塔里木盆

[1] 转引自《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20页。

地。所以吐蕃发动北方战争显然有其政治目的，要将苏毗王子在内的尚未臣服的苏毗遗民一网打尽。吐蕃征服苏毗之后，在其故地设置孙波茹(吐蕃军政单位)进行管理。据《贤者喜宴》记载，吐蕃设置的孙波茹连同汉户凡十一东岱，其中包括 Rtse-mthon(伊循城)，也即唐代文献的"七屯城"，故址在今天新疆若羌县米兰吐蕃古城。古藏文简牍也称此城为 Nob chung(小罗布城)。[1] 那么，早在7世纪初，吐蕃的触角已经伸到塔里木盆地东南缘。

公元647年，唐太宗下诏讨伐龟兹。除了调集中原军队外，他还"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2]《贞观二十一年太宗伐龟兹诏》则说："又遣吐蕃酋长，逾玄菟而北临；步摇酋渠，绝昌海而西骛。"[3] 步摇酋渠指吐谷浑王，昌海就是蒲昌海(今罗布泊)。既然吐蕃军队是从罗布泊方向进军龟兹的，当系吐蕃赞普派驻七屯城的吐蕃守军。

五、藏文起源问题

关于藏文起源问题，学界流行三种不同意见。其一，吞米桑布札造字说；其二，本教象雄文字起源说；其三，西域于阗文字起源说。

第一种意见代表了藏族传统的说法。据藏传佛教史大师布

[1] 杨铭：《吐蕃简牍中所见西域地名》，《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87～94页。

[2]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3] 《册府元龟·外臣部》卷九八五。

顿·仁钦珠的《善逝教法史》(约1322年成书),藏文字母是松赞干布时代(629—650年在位)的文臣吞米桑布札(Thon-mi Sam-bho-tra)创制的。据说松赞干布时代,"西藏没有文字,特派吞米阿努的儿子(即吞米桑布札)和随行人员一行十六人赴印度去学习文字。他们在班智达拉日生格(神明狮子)座前,学习声明(即音韵学),而与西藏原有的语言配合起来,总摄为藏文三十个辅音,以及"阿"和四个元音字,并参照迦湿弥罗的字体,在拉萨玛如堡,制造出西藏文字和《八种声明论》。藏王也在此闭户学了四年。继后,也就译出了《宝箧庄严经》、《百拜忏悔经》、《宝云经》等。"[1] 于是吞米桑布札成了吐蕃历史上七大贤臣之一,如同中原历史传说中的仓颉一样,被尊奉为吐蕃的"字圣"。

约公元9世纪成书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也说藏文出现于松赞干布时代,可见这个传说来源甚早。现代语言学家对此说深表怀疑,因为许多被认定为吞米桑布札的文法著作如《三十颂》和《性入法》等,实际上全都晚于松赞干布时代。[2]此外,古藏文碑铭写卷大都各行其事,并不遵循某一规范化体系。迟至八九世纪,新疆和敦煌的古藏文文献仍不十分规范。藏文字母体系的最后确立无疑经历了藏族文人千百次实践。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积累过程,绝非某一人某一时所能发明创造的。

第二种意见来自本教历史传说。按照这个说法,藏文最初由大食国(Stag gzig)的一种叫作"崩伊"(叠字)的文字首先转为

---

[1] 布顿·仁钦珠著、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169页。本文引用时改动了个别译名。类似的传说亦见藏文史书《松赞干布遗训》、《五部遗教》和萨迦派金刚教持索南坚参的名作《西藏王统世明鉴》。参见王尧、陈践,前揭书,1986年,9页。

[2] R.A.Miller,"Thon-mi Sambhoṭa and His Grammatical Treatises," *JAOS*, 83, 1963, pp. 485~502.

象雄文字,再由这种古象雄文转为"曼扎"文,最后逐渐转化为藏文的有头字和"竹麻"(有头字的另一种字体)。[1] 其说不足信。首先,8 世纪大食才兴起于伊朗高原。大食统治者使用阿拉伯文,普通民众使用伊朗当地文字——婆罗钵文,这两种文字都和属于印度文字体系的藏文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公元 740 年左右成书的《通典》卷一九〇明确记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人。其人辫发,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既然 8 世纪中叶象雄(即羊同)尚无文字,藏文岂能来自象雄文字。

第三种意见是现代西方藏学家提出的。从文字学角度看,于阗文和古藏文相当接近。况且,吐蕃与于阗频繁往来,松赞干布时代曾不少于阗僧人到逻些(拉萨)弘布佛法。吞米桑布札的梵文老师名叫"李敬",而于阗王室姓李氏,李敬可能是于阗法师。所以有学者认为,中亚婆罗谜文系统的于阗文才是古藏文的真正蓝本。[2]

佉卢文古藏文双语文书的发现为研究藏文起源问题注入了新鲜史料。这批双语文书上的佉卢文不能晚于公元 6 世纪初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最后废弃之年。但是,文书上的两种文字内容无关,藏文显然在胡语文书废弃之后书写的。这样,就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在胡语文书废弃很久以后书写的,和米兰出土绝

---

〔1〕 罗秉芬:《藏文》,《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13 页。

〔2〕 F.W. Thomas, "The Tibetan Alphabet," Festschrift 2. Feier d. Zweihundertjährigen Bestehens d. Akad. d. W. in Göttingen, Berlins/ Göttingen/ Heidelberg, 1951, pp. 146~165; 恩默瑞克著、荣新江译:《于阗语种的藏语借词和藏语中的于阗文借词》,《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6 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

大多数古藏文简牍一样，写于公元8—9世纪；其二，在胡语文书废弃不久书写的，写于公元6—7世纪。这个问题关系到吐蕃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

目前尚未发现可以确认属于公元6—7世纪的藏语文献，可我们还是找到了确切证据，说明用印度文字拼写藏语的实践最迟在朗日论赞时代已经开始。最早用印度文字拼写藏语的不是吐蕃人，而是历史上和西域频繁往来的苏毗人。

据前文讨论，苏毗亡国后，一部分苏毗遗民向东方迁徙，在今西藏昌都一带建立了东女国。《旧唐书·西南蛮传》记"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而同书《吐蕃传上》则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公元9世纪成书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传记篇》亦载"往昔吐蕃无文字，乃于此王之时出现也。吐蕃典籍律例诏册……举凡吐蕃一切纯良风俗，贤明政事，均为此墀松赞王者之时出现也。一切民庶感此王之恩德，乃上尊号曰松赞干布。"[1] 所以苏毗使用文字无疑早于吐蕃人。这种"同于天竺"的东女国文字自然用来拼写苏毗人讲的藏语方言，它和同样源于印度字母体系的藏文想必不会有太大差异。

那么苏毗人何时开始使用文字呢？不难设想，苏毗遗民迁到东女国后，就和使用天竺文字的西域诸国完全脱离接触。苏毗人无疑是在原始故乡——岩波（吐蕃的"彭域"）学会使用印度文字的。既然苏毗灭国在隋大业年间，那么苏毗人使用藏文应在7世纪初迁往东女国之前。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抄录了一篇苏毗旧臣与吐蕃赞普朗

---

[1] 王尧，前揭书，63页。

日论赞的盟约。在这份盟约中朗日论赞被称作“悉补野”，藏语原文作 Spo rgyal(悉补之王)。[1] 北京藏学研究中心张云博士注意到，这个称号表明吐蕃王族来自悉补国(Spo yul)或数布部落(Spo po)。他推测悉补野部就是《北史》和《隋书》说的“附国”，故地在今西藏波密县境内。[2]

《北史·西域传》说：

>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附国王字宜缯。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大业四年(608 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609 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欲献良马，以路险不通，请开山道，修职贡物，炀帝以劳人不许……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

蜀郡在今四川成都，女国即苏毗的别称，而附国是位于苏毗之东的吐蕃王族悉补野部落。既然如此，隋大业年间的附国国王宜缯当即藏文史籍说的悉补野王朗日论赞。他原来尊号为“论赞弄囊”，征服苏毗后才给予“朗日论赞”(天山之王)尊号。他的名字“宜缯”，古音读作 ŋie-dziəŋ，[3] 更接近这位吐蕃王后来的尊号“朗日论赞”(gnam-ri srong-btsan)。由此推测，吐蕃征服苏毗当在公元 608 年以前。这就有力地证明，松赞干布的文臣吞米桑布札创制藏文前，苏毗人已经开始使用印度文字拼写藏语了。

---

〔1〕 王尧，前揭书，40 页。

〔2〕 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132～133 页。

〔3〕 郭锡良：《汉语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64 和 268 页。

简牍是藏文最早的书写材料之一,藏文简牍在形制上和西域简牍,尤其是鄯善出土的佉卢文简牍有着更为直接的亲缘关系。在米兰出土古藏文简牍中,这类文书往往称作 Khram(简牍),和鄯善人对简牍的称谓 Kilamudra(带封泥的木牍文书)颇为相近,说明苏毗人可能从鄯善人那里学会使用简牍的。只是苏毗文字并非来自鄯善官方文字——佉卢文,而来自鄯善或于阗宗教人士使用的婆罗谜文。

婆罗谜文很早就随佛教从中亚传入塔里木盆地。东晋隆安三年(399 年),法显从长安西行印度,途中访问了鄯善国。他在游记中写道:

> (鄯善)其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

由此可知,公元 4 世纪末,鄯善、于阗的佛教徒就将梵语当作经堂用语,同时广泛使用天竺书——印度婆罗谜文。因为这个时期在摩揭陀崛起的笈多王朝重新统一全印度,佛教中心又回到故乡摩揭陀。这时佛教已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宗教,佛教徒纷纷摒弃俗语,采用印度贵族语言梵语;同时也由于当时全印度出现广泛使用梵语的浪潮,人们把梵语视为学术语言及通用语以取代原来印度各地流行的各种俗语。在这一形势下,佛教徒力图用梵语来改写原来的俗语佛典。这股梵文化的浪潮自然影响到塔里木盆地诸国。

大约 14 件鄯善佉卢文书的行间或背面写有婆罗谜文字母或数目字。本世纪初,斯坦因在米兰两所寺院遗址内发现了梵

语经典《工艺论》(śilpa-śāstra)等婆罗谜文残卷。50年代,黄文弼在鄯善故都扜泥城附近寺院遗址再次发掘出笈多体婆罗谜文佛经残片。据美国梵学家邵瑞琪和德国梵学家哈特曼研究,其中有赞佛乘派诗人《一百五十赞佛颂》的作者摩特尔吉陀(Mātṛceṭa)的作品以及小乘佛教论部著作《阿毗达摩》(Abhidar-ma)残卷。[1]早期藏文佛典《一百五十赞佛颂》的胡语原本可能就是从塔里木盆地辗转传入吐蕃的。[2]斯坦因还在楼兰LM.II遗址发现过婆罗谜文书,40年代,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在且末和瓦什峡发现过写有婆罗谜文的陶片。[3]鄯善人使用梵语的趋势从4世纪末鄯善王室使用休密驮(梵语sumitra)、素延耆(suyāmaka)这样一些典型的梵语名称也可以清楚地见到。若不是鄯善王国过早地于5世纪末消亡,鄯善官方文字可能要像于阗和龟兹一样,用婆罗迷文书写当地语言。

公元3—4世纪,吐蕃人就开始和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频繁接触,被鄯善人称作Bhoti(ci)。两件鄯善佉卢文书提到"吐蕃"。其一,斯坦因收集品第69号文书,写作Bhoti nagara(吐蕃村镇);其二,斯坦因收集品第84号文书,写作Bhotici manuśa(吐蕃族人)。罗马帝国东方行省推罗城作家马林诺斯的《地理学导论》将"吐蕃"称作Bhautai。正如挪威梵学家拉尔森指出

---

[1] R. Salomon and C. Cox, "Two New Fragments of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JIABS*, vol. II.1, 1984, pp. 141~153; J.-U. Hartmann, "Neue Aśvaghoṣa -und Mātṛceṭa- Fragmente aus Ostturkistan,"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1988, 72f.

[2] D.R. Shackleton Bailey (ed), *The Śatapañcaśatka of Mātṛceṭa*, Cambridge, 1951.

[3] 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Stockholm: Bokfü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1939, pp. 36~37.

的，罗马人所谓 Bhautai 来自梵语 Bhoṭa，源于藏语 Bod（= Bon）。[1]唐礼言《梵语杂名》将梵文 Bhoṭa 译作“吐蕃”[2]可为佐证。这时吐蕃人仍偏居山南雅砻河谷（今西藏波密和琼结两县）一隅。他们和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接触只局限于民间交往。这种民间接触自然不足以影响吐蕃的文明制度。

苏毗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与塔里木盆地诸国堪称近邻。自公元 3 世纪以来，苏毗人时常从昆仑山北下，不断打破楼兰、扜泥、且末、莎阇、精绝等鄯善国城镇田园牧歌式的安宁生活。鄯善的这个强敌在佉卢文书中通称 Supiya（苏毗人），[3]苏毗人对于阗城镇的滋扰一直持续到公元 5—6 世纪，于阗塞语文献称其为 Supīya（苏毗人）。于阗史诗《赞巴斯塔》有诗曰：“赭面（指吐蕃人）、匈奴、汉人和苏毗人蹂躏过我们于阗的国土。”[4]《大唐西域记》说的苏伐剌拏瞿呾罗国无疑即《隋书·西域传》的苏毗女国。

吐蕃征服苏毗后，朗日论赞在苏毗故地设置了十一东岱（千户），其中包括新疆米兰的七屯城。这表明吐蕃征服苏毗前夕七屯城已不属于吐谷浑，而属于苏毗领地。米兰出土的这批双语文书的藏文部分有可能是苏毗人墨迹。米兰古藏文简牍大概还包括其他一些苏毗文书。例如：米兰古藏文简牍第 7 号文书记有“蕃人（Bod-ma）领受，茹本达萨结之农田一突（Dor）”云云。

---

〔1〕 M. Lalou, “Tibetan ancient Bod / Bon,” *JA*, 1953, pp. 275～276; G. Lassen, *Indische Altertumskunde*, vol. III, Bonn, 1861, p. 132.

〔2〕 林梅村：《公元 100 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 4 期；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

〔3〕 林梅村：《犍陀罗语文书地理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 年第 6 期，35 页。

〔4〕 H. W. Bailey, *Khotanese Texts*, VII, Cambridge, 1985, pp. 79～81.

据王尧和陈践考释，Bod-ma 指历史上侨居西域的吐蕃人的后裔，如称“老蕃子”。[1] 这实际上是对吐蕃人的一种蔑称，似乎不是出自吐蕃人的手笔，年代或许在吐蕃征服苏毗以前。

1901 年，斯坦因在新疆尼雅东面安迪尔古城一个佛塔的塔基北侧发掘出两捆纸文书。其中一件用斜体婆罗谜文书写，可是语言不是梵语；另一件写有粗大的直体笈多体婆罗谜文。据研究，这些纸文书出自某部非梵语的大部头著作，使用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藏语”，其中经常出现梵语借词 bhaiṣajya（药物），说明此书属于咒术或医药文献。斯坦因在这个佛塔附近还发现梵夹装的藏文残页，内容为《舍利婆坦摩经》。这部藏文佛经使用的纸也很特别，经化学分析，含有瑞香科植物（可能是月桂）的生纤维，而新疆不产月桂或同类植物。斯坦因甚至认为，这些纸张可能产自西藏。[2]安迪尔古城一个残墙上写有“□元七年”的汉文题记，法国汉学家沙畹推测是“开元七年”（719 年），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疑是“贞元七年”（790 年）。[3] 两说之中似以后一说为是。那么，安迪尔古城发现藏文佛经不晚于公元 8 世纪，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藏文佛经之一。

苏毗人和有具有千年文明史的西域人长期频繁往来，他们在唐初吐蕃诸部落中文明程度最高，并对吐蕃文明的勃兴作出过重要贡献，一位唐朝官吏甚至说：吐蕃“军粮匹马，半出其中”。[4] 松赞干布的大论（宰相）禄东赞原系苏毗旧臣。《新唐

---

〔1〕 王尧、陈践，前揭书，27 页。

〔2〕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81 年。

〔3〕 森安孝夫著、劳江译：《吐蕃在中亚的活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12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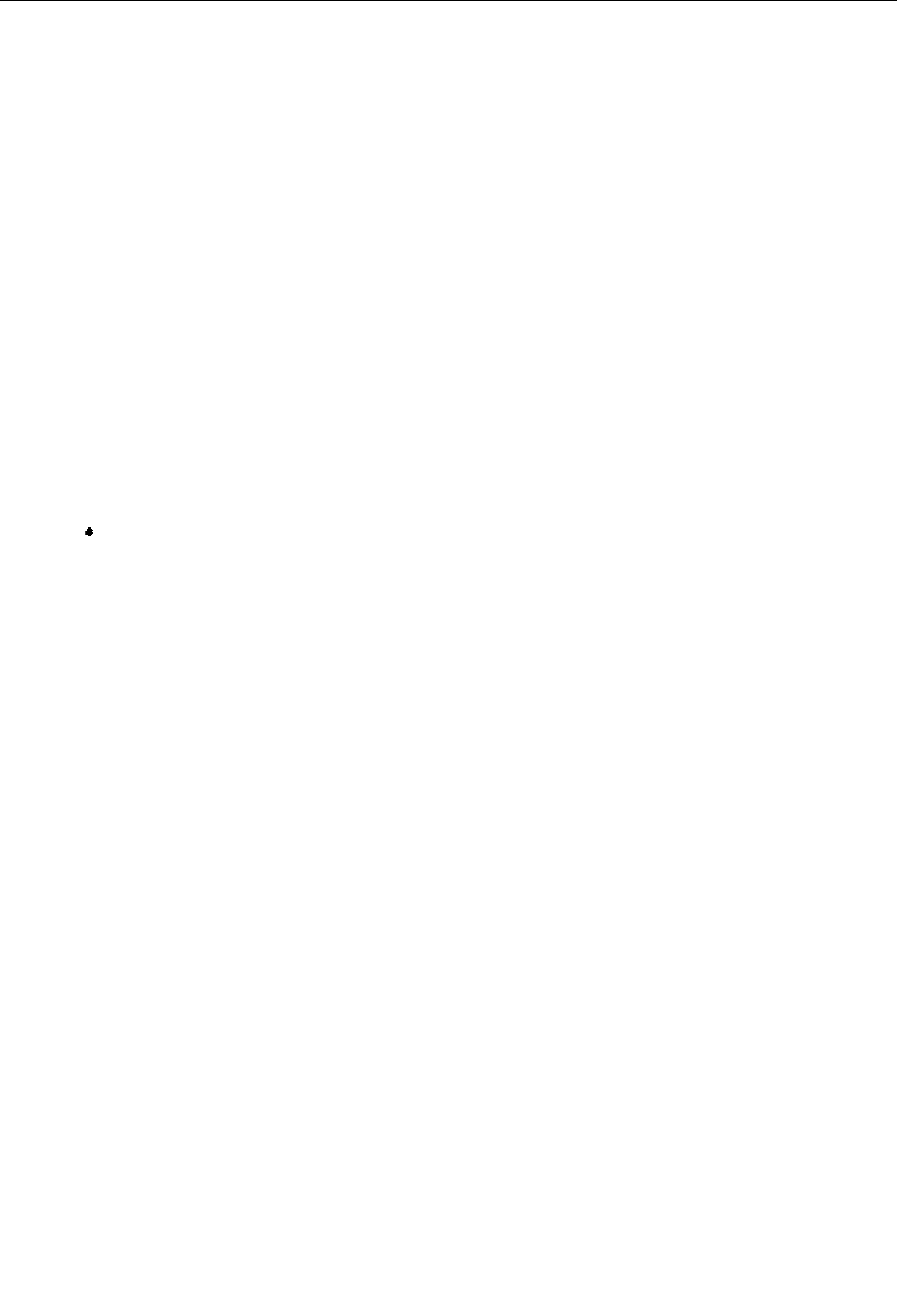
〔4〕 《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书·吐蕃传上》说："东赞不知书而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记载："及至兔年(655 年)，赞普驻于美尔盖。大论东赞于高尔地，写定法律条文。是为一年。"[1]由此可见，禄东赞不仅通晓文字，而且是写定第一部吐蕃法典的重要人物。禄东赞大概只会藏文而不识汉文，才被唐朝史官说成"不知书"。

据以上调查，松赞干布的文臣吞米桑布札大概对藏文字母的规范化起过重要作用，而藏文字母的真正创制归功于苏毗历史上某位文臣。藏文模仿印度文字的蓝本可能是苏毗邻邦——吐谷浑统治下的鄯善佛教徒使用的梵文或于阗国文字，创制年代不晚于朗日论赞征服苏毗之年——公元 608 年。

---

〔1〕 王尧、陈践，前揭书，2 页。



索　引

E

F

G

H

J

K

L

M

N

P

Q

R

S

T

W

X

出版后记

当前，在海内外华人学者当中，一个呼声正在兴起——它在诉说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它在争辩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它在呼喊中国优秀知识传统的复兴与鼎盛，它在日益清晰而明确地向人类表明：我们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我们还要群策群力，力争使中国在21世纪变成真正的文明大国、思想大国和学术大国。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气氛中，三联书店荣幸地得到海内外关心中国学术文化的朋友们的帮助，编辑出版这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以为华人学者们上述强劲呼求的一种纪录，一个回应。

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应本店之邀，组成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完全独立地运作，负责审定书稿，并指导本店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工作。每一本专著书尾，均刊印学术委员会推荐此书的专家评语。此种学术质量责任制度，将尽可能保证本丛书的学术品格。对于以季羡林教授为首的本丛书学术委员会的辛勤工作和高度责任心，我们深为钦佩并表谢意。

推动中国学术进步，促进国内学术自由，鼓励学界进取探索，是为三联书店之一贯宗旨。希望在中国日益开放、进步、繁

盛的氛围中，在海内外学术机构、热心人士、学界先进的支持帮助下，更多地出版学术和文化精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九七年五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古道西风　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
作者＝
页数＝４４８
ＳＳ号＝１０２２９３２８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